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是美国弗蒙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协会斯拉夫和东欧历史研究会主席。

《革命的良心》一书叙述的是十月革命至三十年代初苏联党内斗争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次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历史，也是所谓苏联模式的形成史。在这段时期里，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建立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若干原则问题至今仍是苏联东欧政治、经济改革中所争论的问题。本书记载了苏共党内历次重大争论的由来、发展过程及其最终结局。该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写，它除了依据官方公布的材料外，还引用了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当时的官方出版物及地下刊物，材料来源广泛，所引证的资料均注有出处，便于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虽然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有些观点尚待探讨，但书中援引的大量资料可供有关领导干部，以及国际共运、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人员和史学工作者参考。

目 录

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1)
导言	(7)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	(15)
一、党的思想	(15)
二、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右的布尔什维主义	(22)
三、国际主义与各个党团	(48)
第二章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58)
一、不断革命	(59)
二、“重新武装党”	(66)
三、左派孟什维克的加入	(76)
四、革命的纲领	(84)
五、起义问题	(90)
六、是联合还是专政	(103)
第三章 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争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114)
一、革命战争与和约	(115)
二、处于党分裂的边缘	(123)
三、工人监督与国家资本主义	(131)
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统一	(142)
第四章 战时共产主义和关于集权化的争论	(148)
一、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和集中领导问题	(149)

二、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	(153)
三、乌克兰——反对派的堡垒·····	(156)
四、军事反对派·····	(165)
五、工业管理·····	(171)
六、政治权力的集中·····	(175)
七、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183)
第五章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188)
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188)
二、托洛茨基和劳动军事化·····	(190)
三、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反对派·····	(197)
四、工会问题的讨论·····	(204)
第六章 一九二一年的危机·····	(216)
一、压制极左派·····	(217)
二、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226)
三、党的统一的建立·····	(229)
第七章 列宁主义的恢复·····	(241)
一、新经济政策——是策略还是演进?·····	(241)
二、控制工会·····	(244)
三、党内紧张气氛·····	(249)
四、作为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僚政治·····	(259)
第八章 政权空白期·····	(267)
一、继承人和“三驾马车”·····	(267)
二、民族问题和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	(273)
三、官僚主义和党的改革·····	(291)
四、运转中的机器·····	(300)
五、经济政策上的分裂·····	(308)
六、围绕继承问题所进行的幕后活动·····	(317)

第九章	围绕着新方针的争论	(323)
一、	一九二三年夏的危机	(323)
二、	外国共产主义问题——德国危机	(328)
三、	幕后的争论	(333)
四、	公开的分裂	(346)
五、	机关的胜利	(354)
第十章	列宁逝世后的党	(362)
一、	统一和教条	(362)
二、	“十月的教训”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战役	(372)
三、	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381)
第十一章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386)
一、	“三驾马车”的分裂	(386)
二、	农民和新经济政策	(393)
三、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	(400)
四、	党和书记处	(408)
五、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崩溃	(412)
第十二章	联合反对派	(418)
一、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形成	(418)
二、	斗争过程	(424)
三、	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443)
四、	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特米多尔式蜕化？	(448)
五、	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	(456)
六、	党的统一的心理学	(463)
七、	左翼反对派的毁灭	(473)
第十三章	右翼反对派	(489)
一、	粮食危机和斯大林的向左转	(490)
二、	共产国际和“右倾危险”	(509)

三、莫斯科党组织的危机·····	(514)
四、工会中的右翼反对派·····	(525)
五、经济计划问题·····	(532)
六、哲学上的争论·····	(550)
七、公开的分裂和右派的毁灭·····	(554)
第十四章 “人民的敌人”·····	(565)
一、流放中的左派·····	(566)
二、不幸中的右派·····	(575)
三、清洗运动·····	(589)
四、死者不死·····	(598)
第十五章 反对派为什么会失败·····	(611)
一、反对派政治上的虚弱·····	(611)
二、列宁主义的前提·····	(616)
三、社会演变的吸引力·····	(619)
四、马克思—托洛茨基—斯大林·····	(624)
五、斯大林的俄国·····	(628)
附件 苏联共产党历史年表·····	(631)

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自本书于五十年代写成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本书就是探索它的早期历史）已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这不仅在苏联社会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民族分支（在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中）都引起了风波。旧的、由莫斯科制定的运动纪律已溶化在多中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使各个党有可能根据当地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偏离苏联的旧路线。一九五六年以来，各个东欧共产党政府已开始在本国试行内部自治，并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新的共产党巨人中国不仅在外交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走上了它自己的道路，并成为一支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许多非执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本国的一个政党，并与本国的民族传统建立了联系，这首先反映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现象之中。最后，在苏联本国，自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以来（赫鲁晓夫的垮台使非斯大林化必将导致苏联社会真正自由化的希望破灭了），出现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场运动至少对加深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些非常的变化是否使苏联的早期历史，即斯大林主义被确立之前的派别斗争史和社会演变史，变得没有二十年前那么重要了呢？根本不是。很显然，情况恰恰相反。苏联、它的卫星国和依赖于它的兄弟党以及苏联国内的批评家们之间存在的意见

分歧和差别，使革命后的头十年的苏联反对派运动史变得更加重要了，它有助于认识今日的共产主义运动。

今天，这段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增强了，其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今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分裂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是对革命后按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特殊统治制度的一种反动。这种统治制度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头十二年内产生的，并在当时激起了反对派的一系列抗议。这个统治制度的特征是：牺牲地方苏维埃的自治，实行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统治化；牺牲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监督，在工业中恢复经理统治；压制党内由普通党员到领导层的真正的民主讨论和民主集中过程；把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要求置于权势利益之下，置于政治和军事利益之下；以极不严肃的态度操纵外国同情者，使之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或某个集团的政治利益；压制文化自由和实行严厉而又蛮横的纪律控制，并强迫各流派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接受这种纪律；发展一种单一的教条，操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人们盲目地顺从领导和不容置疑地相信他们所作的辩解。所有这些特点从斯大林牢固确立了其统治地位的一九二九年起直到今天，始终是苏联统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尽管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进行了某些有限的改革，但上述特征甚至可以说更切合今日苏联的实际。在《革命的心》能首次得以发表的时代，这些特征显得更清楚了。

由于人们对苏联官方模式的不满，近年来，已出现多次以各国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为目标的，或者代表着不同观点的运动，而所有这些运动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上述问题中的某几个问题。不仅如此，目前，任何一种偏离莫斯科的运动都能从苏联当年的各种反对派中找到其相类似之处。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从铁托的南斯拉夫直到今日的波兰和匈牙利），即使与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布哈林右翼反对派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哲学却有着

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运动虽然是按纪律严明的统一的党的设想在进行，但它允许在经济方面实行分权制度，注意消费者的愿望，并允许较大程度的文化自由和个人自由。西方的新左派似乎已重新回到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苏联极左集团的理想上。当时，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激烈抗议正在出现的苏维埃官僚制，要求保持平均主义，贯彻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就其目的和希望来说，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为建设一个“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而发起的运动（它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结构民主化）可能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内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在这一反对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发起的“工人民主运动”最接近至于把政治民主化与放宽经济政策等反对派观点都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尽管在二十年代只得到很少几个人的拥护（其中有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如果说我们把非法的孟什维克排除在外，他们的观点与这种观点是很接近的），但今天，这种观点在国际运动中仍有它的代表，它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里所做的比较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一定是苏联反对派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的继续。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经验，因此不可能是简单地抄袭反对派的旧观点而形成当代的纲领。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对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感到不满的，基本上也正是反对派在五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就已认识并徒劳地与之展开了斗争的那些根本问题。在他们探讨的问题中，至少有部分是相同的问题。这首先是，他们不得不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教条提出疑问，按照这一教条，一个领袖或一个小集团可以垄断真理，并有权取缔一切其他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也被迫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这

一教条提出疑问。这一教条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反对派分子来说，仍是不可逾越的崇拜偶像，即使当他们对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猛烈抨击时，他们也没有公开怀疑列宁主义的这一基本先决条件。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人们显然拒绝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实际上也是持这种态度；但是，这两种发展最终都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明确主张民主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们要想赢得人们的信赖，只有公开审核这一致命的党的一元化思想，这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所没有做的。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大的区别了——同二十年代一样，持不同政见者迟迟不承认这一点。

《革命的良心》的中心思想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企图贯彻其观点的，例如：国家的落后和人们对各种强制办法的偏爱等主要条件（这些都是革命和内战的遗产）。这些条件使反对派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很难成功。相反，这些条件却为贪权的个人野心家获得统治开辟了道路，他们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不惜歪曲革命的理想，甚至把它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从而使这种革命理想已失去任何有效价值。因此，许多西方革命者认为，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开西欧共产党人的眼界时，他们已开始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当时不得不——也许今天还始终必须——通过认识苏维埃俄国的历史及其起源来开辟一条道路，以便重新揭示革命者的真正理想以及这一理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但这里有一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那种曾使苏联反对派的希望与打算落空的、十分落后的、突然爆发革命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由于这个原因，今日的反派思想要比它开始形成的那个时期更有效、更适用。而且还因为苏联今天已不再是一个落后的、遭到破坏的国家，所以这种情况在它本国也

是如此。

尽管（或正是因为）反对派的历史对认识当前苏联制度的性质、问题和弱点至关重要，苏联官方对反对派的历史所持的态度自赫鲁晓夫以来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只有很少几个没有经过审判而被处决的反对派分子被恢复了名誉（例如阿·谢·布勃诺夫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但人们闭口不谈他们是属于哪个反对派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披露了大量记载于档案中的详情，但这仅是出于支持正统路线这一目的，即说明反对派完全错了，说明反对派即使不是撒旦的子孙，也是最反动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和公开审判的牺牲者被恢复名誉或者以较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尽管他们活着的亲人慷慨激昂地呼吁要求平反，如托洛茨基的遗孀对托洛茨基的案件和布哈林的遗孀及其儿子对布哈林的案件都发出过重新审查的呼吁。）

尽管在历史问题上坚定不移地坚持斯大林的观点，这将在国内外明显地有损于苏联的身份和信誉，但苏联领导仍旧不准备对它的真实起源进行一次审核。从苏联当局压制反对派的真实思想和贬低其领袖的功绩这一点中可以看出，苏联制度患有一种只能被看作是严重的历史神经官能症的毛病，它类似一个精神受到严重干扰的人，由于忧虑、冲突和令人遗憾的事件与他有关，从而压制或歪曲对其过去的回忆。这种官方神经官能症的难以治愈就是苏联领导仍然保持着斯大林主义特性（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基本的特性）的见证。然而，人们迟早会突破被掩盖的历史所固有的压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像我在一九六〇年所设想的那样，它将成为苏联官方风气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从而也是苏联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我这次不对本书的细节和结论作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尽管苏联历史学家从文献中援引的资料可以使某些历史情节变得更清楚，但

近二十年来情况的进一步明朗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改变本书的中心思想或某些结论的必要。①这一中心思想和某些结论在此期间甚至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①本书索引的许多材料可以从后来由乌尔弗·沃尔特主编、奥勒—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文选：《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苏联左翼反对派》中找到它的原始资料，因此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从中详细地了解这段时期的争论情况。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社会主义辩论》，它是上述文选的一个讨论文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讨论了各项争论问题。

导 言

一九一七年，一批革命者在俄国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所喜爱的称呼）。按照传说，这个布尔什维克组织^①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经受过锻炼的和有纪律的集团，它忠实地执行其领袖列宁的意志。自一九一七年起，共产主义革命的追随者和反对派都断言，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最核心的阶层突然承认：革命已陷入死胡同近二十年之久；一个固执的、掌握着大权的人控制了革命的社会并违反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准则。

正像俄国之外的受到震惊的共产党人在努力对这种情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时所承认的那样，斯大林的专政不只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恶人所致，它的根源很深，一直延伸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追随者们的身体上。但是，对苏联的极权主义绝不可简单地加以解释，仅就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加以论述也是不够的。在斯大林按其个人设想塑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是

^①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此以前，它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四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之后，它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五二年，这个名称再次改动，现在就叫苏联共产党。按照共产党人自己的说法，本书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一九一八年以后，这两个措词的含义有了一点细微的差别，“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指不很具体的运动思想，“共产主义”是指组织构成。

单一的、清一色的和铁板一块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分裂的和不断变化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简单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克服了意见不统一；但在第二个阶段中，不得不承担其后果。

就像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第一个阶段或极权主义之前的阶段（直至一九二九年），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和冲突。在这些年中，运动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情况演变的产品。

因而，从一开始就弄清楚苏联共产主义的这种由发展过程和各種情况所决定的、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人们就会严重误解党内派别斗争的历史，并忽视这场斗争对苏联制度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本作者认为，对苏联制度和苏维埃政治表现的误解大都产生于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静止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不管是好是坏）乃是列宁和马克思思想出来的，并被一批坚定的年轻人运用于实践。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批追随者中大部分人已或迟或早地发现，运动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然后，他们不是与它断绝了关系就是本身被统治者清除了。

尽管官方后来所写的历史硬把党说成是无所不知的，但总的说来，导致俄国共产党人分裂和争论的那些路线变化并不是事先早有计划的。政策之所以变动，是因为人们要解决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或者是因为一批具有不同价值尺度的新人物上升到了有影响的地位。苏联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些因素是：历史环境，社会和经济状况，理想和思想，相互争斗的领导人物的习性、意向和爱好。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人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现实形势行动的，不大可能意识到他们的行动

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他们的意志和行动又仅仅是汇集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中的诸因素之一。弗·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写道：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①

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相同类型的政治态度，可以用提纲式的论点对它们加以描绘和区分。当然，这样做有可能冒过分简单化的危险。本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其在革命时期的状况来说，基本上包含了两种始终不渝的、具有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如果允许的话，人们将宁愿用它们各自常用的说法来称呼这两个对立的流派，即“列宁主义”派和“左”派。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区别就是政权和原则、革命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虽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始终那么分明、单一，但不能不承认，它们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一派注重革命的目的，另一派首先想的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手段。

以纲领和理想为一方与以政权工具和实际必要的强制办法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就是苏联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共产主义列宁派战胜了左派、现实战胜了纲领，这种紧张关系也就消失了。那些比较忠于原来的革命目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权力，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也被证实是一种幻想（至少在俄国的状况下是如此）。代表现实和能适应各种情况的人占据了政权中的领导位置，这种人的典型代表是斯大林。共产党专政这一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却成了本身的目的，而且变成经久不变的目的。

^①弗·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302页。

显然，对本书的基本思想需要作较仔细的说明。共产主义运动的二重性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也不是任意强加的想法。它是一种根据手头资料得出来的论文假设。可以说，它大体上已被资料所证实，而且被证明是收集和解释其他资料最为有效的指南。这种根据一定的假设进行论述的方法是一种通用的社会科学方法。

要理解共产主义二重性的这一论断，首先必须弄清“左”和“右”这一对政治术语的定义。如果这种术语的含义不明确，那么它就缺乏可取性。然而，在反对派存在的时期，人们经常用它来说明苏维埃政策的特性。

“左”和“右”作为政治类别的名称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在复兴时期的下议院中，人们习惯于以主席席位为中心线分两边就座，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顽固的保皇党人，这样就形成了“左”和“右”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一表达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人们并不以此来表示议会自由和保守的君主制独裁主义的对立。随着独裁主义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左”和“右”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说明人们对社会演变和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同态度。直至今日，这两个措词在一般的语言习惯中仍保持着这种含义；人们同时还以此来划分从维持昨天的原状直至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之间各种不同的政治音阶。

此外，左和右之间还始终存在一种更狭义的区别，这不是指政治目的而是指其采用的方法及其热情程度。在某个运动中（不管它在整个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人们总可以从其中区分出较大胆的或按教条办事的“左”翼和十分谨慎从事的“右”翼。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里，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翼就属于这种差别。在本书分析苏联共产主义时，“左”和“右”这两个措词一般就是

按这种较狭窄的含义使用的。

在俄国，这两个措词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前不久才开始流行的，人们主要把这两个措词用在自由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身上。马克思主义者很少用这两个措词来称呼自己内部形成的集团，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对“左派”波格丹诺夫集团的抨击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内部使用这个术语的首例。一九一八年以后，直到反对派的一切活动被彻底镇压为止，人们在所有的口号和抨击中不断使用了“左”和“右”这两个措词。对革命者来说，“左”自然有积极的含义；而且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本人就试图占据左的位置：“拉柯夫斯基断言反对派是我们党的左派。同志们，这真是可笑之至。……，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①

在近几十年里，广义的左和右的范畴越来越自相矛盾、混乱不清。人们只要以某些狂热的反保守的法西斯运动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运动往往被称为“右派”运动。但是，从许多实际情况看，“极右派”和“极左派”的统治方式已变得很相似，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情况中看出：“极权”这个术语既可以用到“极右派”，也可以用到“极左派”的身上。如果人们进一步仔细观察，那么，他们就会从中得到印象：这两种极端分子事实上已日趋合流。在所有极权国家和运动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它们已不能以左和右来加以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所表示的差别已经消失。问题还不仅于此，更深刻的原因是：政治不是线性的，是多方面的。

解决这种划分上的困难可以采用以下办法，即利用两种相互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05、306页。

独立的尺度来衡量各种政治运动及其思想。^①一种尺度是就其政治纲领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进行划分的尺度，这就是一般所熟悉的左、右派的划分；另一种尺度是按其政治组织和政治方法进行划分的尺度，人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绝对民主化的、相信说服教育的、直至极端独裁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三种政治组织和政治方法，并可在这三者之间分出更多的等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一方面。用“强硬”派和“温和”派这种措词来说明它们的区别，似乎更为合适。

为了在研究共产党政治的过程中弄清问题，人们必须无条件地区分这两方面的政治变化和政治争论。如果以政治分歧作为单一的尺度来说明俄国共产党内的派别形成，这将导致严重的混乱，例如：列宁和斯大林就会被看作是左右派之间的“中间路线”代表。这种设想不仅抹煞了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时期路线发展的特点，而且也抹煞了各种倾向之间的共性。

在共产党员中，可以说存在五种派别。在纲领方面（即以左和右的尺度来衡量），在政策方面（即以“强硬”和“温和”的尺度来衡量），各派之间都有一定的区别，具有各自的特点。虽然个别的人可能动摇，从这一派转为另一派，但基本的派别倾向是比较稳定的。鉴于人们对政治方法及其有效性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忠于理论和纲领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左派又分成了两大分支，一个称为“极左派”，另一个称为“温和左派”。一派是更多地富于空想和偏爱民主，而另一派则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并更多地倾向于采用暴力。当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像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界线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差别首先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

^①这种政治分类方法是由作者和阿尔弗雷德·格·迈尔教授共同拟定的。

就右派来说，它的进一步划分就更复杂了，但是，在政治方法方面存在着三种明显不同的立场。最谨慎从事的和考虑民主和合法性较多的人，即“极右派”，它同孟什维克很接近。这两者在共产党内部都是无足轻重的。在我们论述共产党政策的二重性时，可以暂不考虑它们。在政治方法方面处于另一端的是具有强烈政权意识的强硬派，即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极右派”和“列宁主义者”这两派之间是“温和的右派”或称“谨慎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在制定纲领和研究实际问题时均采取谨慎态度，但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则倾向于采用专制方法。温和的右派和列宁主义者共同组成了一般被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派，它在方法上是强硬的，在对待纲领的态度方面是实用主义的，并且有不同程度的勇敢、果断精神（这一点与左派的区别不大）。

在不同程度上指导共产党各个派别行动的纲领，即使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可以被说成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所预言并号召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为目标的纲领。一般说来，新的社会制度就是指：建立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消灭或同化其他所有的集团（建立“无阶级社会”）；由广大居民广泛地承担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责任，并分享经济成果；树立一种新的集体主义道德风尚（而这种道德风尚是建立在所谓产业工人固有的道德基础之上的）。在运动早期阶段，所有共产党人都追随这一理想，即使他们怀有不同程度的热情和认真态度。

左派与列宁主义者的区别是，这种理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主要事业。而在列宁主义者看来，首先是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这种侧重点的区别对他们说来也是学说上的区别。实际上，列宁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种组织学说，它强调纪律、斗争精神和使用暴力的不可避免性。

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观点，十九世纪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似乎纯属空想，因此许多评论家倾向于以更大的怀疑来看待早期共产党人的信条。但是今日的无幻想性也可能反过来导致严重的谬误。艾赛亚·伯林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人写道：“不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或者秘密警察头子甚至斯大林个人曾犯过什么错误，都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信念或原则的真诚和忠实。”^①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越性或论述它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为了了解共产主义的发展，首先应考察这种理想是怎样在俄国特定的条件下（那里试图实现这一理想）被证实是不现实的。在具体运用以理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人们本应可以预见到它的失败，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经济，而俄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这一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相反的断言只能掩饰这一事实：在那里出现的只是另外一种社会制度。

^①艾赛亚·伯林，《俄罗斯文化的沉默》，《外交》杂志，一九五七年十月刊，第7页。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

在革命胜利之前的十五年，俄国共产主义已开始了它的政治生命，并具有自己的特征。它的创始人是列宁，它的化身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在运动的早期，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就已出现，它发展为政权和纲领之间的不统一，这可能是布尔什维主义在随后的关键性年代里，始终具有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当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已势在必行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对列宁的组织和政权学说感到陌生的集团。对后来的十多年政治论战来说，当时就已具备了论战的土壤，这场争吵直到忠于革命纲领的左派分子完全被消灭，以及斯大林建立起他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组织时才告结束。

一、党的思想

一九〇三年七月，五十一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开始作为全国性的组织而存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于一八九八年在明斯克举行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为数很少的会议参加者们成功地建立一个持久的组织之前，他们被捕了。）在布鲁塞尔的大会上，代表中已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当代表们被迫在伦敦继续举行会议时，这种不一致的意见仍未消除，尤其在讨论党的章程

时，出现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争论的焦点看上去似乎在于一个细节问题——党员的定义。尔·马尔托夫（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党的较为年轻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提出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当时他已以列宁这一名字闻名于世，三十三岁，同样是运动最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了意思略有不同的条文：“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①早在这之前，他们对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就已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成员资格问题只是已经出现的紧张关系的爆发。实际上问题涉及的是列宁本人，涉及他关于建立一个严密组织的思想、领导岗位的人员配备计划、他本人担任革命领导人和他谋求运动领导权的问题。

尽管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但列宁在党员资格问题上还是失败了。普列汉诺夫以空洞的言词表示了“强硬派”的观点：“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翻译成革命的语言就是说：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如果说革命的安全可能需要暂时限制一种或另一种民主原则，这时若犹豫不决就是在犯罪。”^②对列宁的组织思想，特别是对他关于党应是一个积极革命者的秘密活动组织、并与它所领导的广大群众相分离的设想，人们提出了异

^①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和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草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4、41—42页。

^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记录》，一九〇三年日内瓦版，第167—170页。

议。马尔托夫在另外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勃朗施坦）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集团，以二十八票的多数否决了列宁的“强硬的”组织计划。^①

然而，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权。他巧妙地进行活动，使党代表大会表示赞同党应有一个中央的领导集团。这时，犹太人的“崩得派”和修正主义的“经济派”的代表为此而退出了大会。这些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持“温和”观点的中间派退出后，列宁就在剩下的代表中占据了多数。因此，他的党团获得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的称号。列宁以十七票弃权，二十五票对二票的多数达到了改组党报《火星报》和设立一个编辑部的目的；这个编辑部由他本人、普列汉诺夫和作为少数派孟什维克代表的马尔托夫组成。^②为了抗议免去当时的三名编辑的职务，马尔托夫没有接受《火星报》编辑的职务，少数派也拒绝继续参加大会的讨论。接着，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让代表们选举一个纯粹由“强硬派”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俄国地下工作，普列汉诺夫担任了同样仅由“强硬派”组成的党的最高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列宁的胜利并不长久，他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而普列汉诺夫很快就开始对他自己在分裂由他发起的运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他要求他的孟什维克同事重新参加《火星报》的工作，而这在当时就是意味着叫列宁走开。所以，列宁愤怒地退出了编辑部。在此期间，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增选了其他几个“强硬派”参加工作，其中有列宁的心腹、著名的工程师、党的财政家和炸弹制造者列昂尼德·波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第263—285页。

^②同上，第376页。

里索维奇·克拉辛。这时，中央委员会在克拉辛的领导下蓄谋打破相互的“戒备状态”。中央委员会还采取了步骤，以重新建立与孟什维克的统一。“温和派”的三名代表被吸收到委员会里参加工作，列宁的统治也就结束了。^①但是，在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准备回击时，他们坚持采用了“布尔什维克”这一名称。这一词语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含义（在两个俄国马克思主义集团分道扬镳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团经常处于少数地位），但现在它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举世闻名的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了。

列宁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在他的《怎么办？》这篇名著中以论战的形式阐明了他的党的学说，这一论战是针对要把重点放在工会方面的“经济主义”派的。列宁强调指出，党对革命运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党本身必须实现这些严格的要求，以便卓有成效地完成地下革命工作：“革命家的组织所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②这一思想就是以列宁关于党员的定义为基础的。

列宁强调党及其秘密活动组织的重要性，不仅是对处在一个警察国家里的秘密革命集团面临明显困境的反应，它还反映了，或者说来源于他对革命力量的某种估计和解释。他认为，不能指望群众（包括产业工人）会自动产生革命的思想。《怎么办？》一文中最著名的观点是：“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③要把群众运动引

^①参阅费·伊·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四六年纽约·版，第278—279页。

^②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45、323页。

^③同上，第247页。

上正确的轨道，一个有纪律的党组织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原则始终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思想。列宁写道：“（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①

按照列宁的观点，这种革命军队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脾性；而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中的主要职位又不可避免地为这些知识分子所占据。为了抵制他们的典型的特性——无休止的争论，不坚定性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列宁特别强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他解释说：“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使我们除掉小组的刚愎自用，除掉小组的任意胡闹，除掉小组的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无谓争吵。”②

列宁给他的组织设想起名为“民主集中制”，今天，共产党人还在使用这个术语。③人们经常指出的是，列宁等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更多强调的是集中，而不是民主。虽然先决条件是由选举出来的成员代表决定政治路线，但在实际决定政策时，民主集中制就等于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所以，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和地方组织自治的原则正表明完全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批评不会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而且不容许进行任何破坏或者阻挠党既定的行动的一致的批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34页。

②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488页。

③参阅阿尔弗雷德·G·迈尔：《列宁主义》，一九七五年剑桥版，第五章。

评。”^① 尽管列宁多次表示拥护民主原则，但他运用集中观点的结果却使民主理想成了幻想。如果集中制一旦获胜的话，民主制就要停止实行，因为它往往将破坏“行动的一致”。如果一个坚强有力的集团控制了按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那么，就不可能爆发出任何抗议的呼声，也不会出现违反党的最高原则的行动。按照列宁的观点，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都将变成反革命分子；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② 但是，在僵化的组织内，以及在各种决定均由权威作出的情况下，要想为了阐述和解释像“社会主义思想”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而进行必要的探索，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就是列宁的思想；在他的追随者中，那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他不一致的人最终只有脱离布尔什维克党团，别无其他选择。

一九〇四年，《火星报》当时是孟什维克的传声筒，报上出现了激烈攻击列宁的组织观点的文章。作为回答列宁提出的运动中必须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央这一要求，一名孟什维克分子写道：“列宁同志更为重视的是官僚主义者和革命家，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列宁书信的主要缺点是：他过分强调我们活动的技术方面和军事革命方面，而完全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和任务。”^③ 已经发誓完全放弃“强硬”学说的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犯了所有可能犯的政治错误——波拿巴主义的、巴枯宁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并企图建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④ 孟什维克的

^①列宁：《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412页。

^②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

^③《列宁同志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一九〇四年四月十八日《火星报》，第六十四期。

^④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纽约版，第一卷，第32、33页。

其他领导人也赞同这一谴责。列宁由于大搞“职业革命家的个人崇拜”而遭到了许许多多的嘲讽。^①更有甚者，列宁也同样不合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心意，正如不合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意一样。当时，《火星报》曾发表了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成员）的文章，抗议列宁以教训人的口吻低估群众运动的行为。罗莎·卢森堡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但在我们看来，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②

当时，托洛茨基（他后来成了共产党人）领导了这场与列宁展开的最激烈的论战。在《我们的政治任务》这篇较长的批判性的文章中，托洛茨基激烈地反对列宁的党的概念和他发表的历史见解。他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雅各宾分子；他要以党和由党的上层决定的神学代替群众运动，以便加快历史发展的速度。托洛茨基预见性地指出：“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办法要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最后结束他的文章时呼吁自由：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展开公开的竞争。他说：工人阶级“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干枯的树木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清除，“但是，这一复杂的任务不能这样去完成，即把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撤职权力的一批人，或者更恰当地说，这样的一个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③不过，托洛茨基在这里反对的学说最后获

^①参阅斯塔罗维尔：《我们的不幸》，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火星报》，第七十六期。

^②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版，第二卷，第492页。

^③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九〇四年日内瓦版，第54、105页。

得了胜利，而他对此并不是毫无责任的。

二、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右的布尔什维主义

尽管有严格的纪律原则，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像全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样也开始染上了宗派主义这一全国性通病。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之后，组织各种宗派集团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它是以不同的特点和组织原则为基础的。此外，就纲领中的激进主义问题，左右派的分歧又有所发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一样也有左翼和右翼。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布尔什维克党团不断被左右派之间的派别争吵搞得七零八落，这种分裂状况直到革命爆发，甚至在革命爆发后的整整十年时间内始终贯穿在运动历史之中。

在列宁于一九〇四年失掉对党报和地下中央委员会的统治以后，他毫不犹豫地重新寻找政治机会。作为第一步行动是，他组织了一次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工党党人会议（与会者一直是他的忠实信徒）。会议于一九〇四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总共有二十二名“强硬派”分子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列宁本人，他的夫人和他的姐姐），^①知名的参加者有后来的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国民经济学家、后来的计划专家弗·亚·巴扎罗夫，后来的苏联外交官瓦·瓦·沃罗夫斯基（一九二三年在瑞士被害），后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党机关领导人谢·伊·古谢夫，马·尼·利加多夫（一九〇七年后作为左倾分子出现，以后，即一九二八年，在右翼反对派内起了作用），马克西姆·马

^①参加者名单见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后来的著名外交家）和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后来曾一度作为苏联总理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当时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的革命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入党对列宁大有益处。他是革命的鼻祖，当时三十一岁，职业虽是医生，但作为党的哲学家而闻名。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强硬”学说的预言家，但往往是一意孤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基础就是正在发展的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工党的纪律和多数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之间的矛盾。^①看来，波格丹诺夫说动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参加了列宁派；他自己则成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②

“二十二人的布尔什维克会议”（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以它作为牢固的组织机构而开始发展的）满腔热忱地支持列宁反对正统的党的机关，并签署了一个提纲，其中说：分裂成温和派和强硬派，是“社团的思想与党的思想发生冲突的结果”。^③这时，列宁主义者全力以赴地开始在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争取追随者。到一九〇四年秋天，他们甚至发展到能否定曾经摆脱列宁控制的正式的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权威这种地步。十一月份，经过亲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同意，建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它的领导人是波格丹诺夫。同时，布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创办了一份报纸，即《前进报》，他们把它看作是常务局的

^①参阅亚·亚·波格丹诺夫：《我们的误会》，莫斯科版，第二卷，第520、521页。

^②参阅大卫·舒伯：《列宁，自传》，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65—66页；有关波格丹诺夫的自传见《百科词典》，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30、31页。

^③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第一卷，第377页。

机关报。^①有了这一武器，列宁就开始着手新的党代会的筹备工作。由于正式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其中有克拉辛）再次与孟什维克疏远并支持列宁的计划，这就使列宁更加容易地实现了这一计划。^②

这次党代表大会（根据记载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五年四——五月份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表明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纯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而列宁还要求赋予这次党代表大会和由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为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作出正式决议的权利。党内分化已威胁到组织的统一，出现了日趋公开分裂的危险。但列宁仍毫不犹豫地反对党的权威，因为那不是由他创建的。如果说一种分裂有助于巩固他的权力，并使他能够控制由追随者组成的核心力量，那么，这种分裂将受到他的欢迎。列宁曾写道：“千万不要相信孟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和他们决裂，决裂，一定决裂。”^③

一九〇五年的党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在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当构成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组成部分的人民的怒火迅速达到顶点时，布尔什维克满怀希望地宣称，通过革命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他们并宣布了要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设想。他们批评孟什维克“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来强调它的

① 参阅马·尼·利亚多夫：《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三期，第62页。（《无产阶级革命》为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历史杂志。——译注）

② 参阅伊·尼·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一九三四年纽约版，第一卷，第135、136页。

③ 列宁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书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四卷，第264页。

重要性，^①并以此强调实行有计划的暴力的政治行动的趋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全面谴责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猛烈指责了孟什维克关于把革命政府的领导权交给自由党人的思想。当时，布尔什维克建立在革命极端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是空前的。为此，列宁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写道：“各国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那末立宪的幻想和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②

就某些方面看，列宁的追随者比列宁本人还要激进些。行为轻浮的倾向一再造成党内的不安。鉴于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和孟什维克的批评给列宁造成了一些困难，列宁终于看到党在组织方面必将越来越趋向于民主。这时，他又遭到了他自己的追随者们的反对，他们以革命的纯洁性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名义违抗列宁！^③

但是，却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愿意像列宁那样准备与孟什维克公开决裂。虽然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强硬”的组织原则，但他们认为，这是全党的学说，必须使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一原则。在俄国国内，处于地下状态的工人党员往往难以理解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那种愤怒情绪。一个后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人在自传中写道：“我开始与党联系时，就跟孟什维克建立了关系，但这丝毫不是因为我想努力介入意见分歧。

^①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93页。

^②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117、118页。

^③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一九五二年维也纳版，第200—208页。

当时，作为一个工人积极分子，我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世界观。”^①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出现了许多要求重新恢复党的统一的建议，列宁对此不得不进行抵抗，但最后他被迫同意了一项赞同统一的秘密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并拟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已分裂出去的部分合并的条件”。^②

所有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统一的、“准备和解的”愿望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中是一种盛行的倾向，这种愿望一再出现，而且不只是在某一个地下小组中出现。看来，除了列宁，没有一个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曾想要一个独立的、处于列宁的毋庸置疑的领导下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以及单独由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实际上，所有列宁的追随者都有和解的愿望，无论是左派或右派也都不像列宁那样在为党的分裂而努力。只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列宁才找到一批新人来担任党的领导，他们愿意殊死追随列宁的迂回曲折的方针。

表明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分化的这一程式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它表明，支持列宁的决议的人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动机，这就为理解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两种对立思潮（当时已开始表露出来）的相互作用支配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个集团对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行动充满热情，它的目标是乌托邦式的，它迫不及待地而且一贯愿意采用暴力方式，这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开始形成的左翼——它激烈反对走议会道路，并相信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的

^① 《奥尔尼昌斯基小传》，《百科全书》，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版，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录，第32页。

^②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139—204页；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准备同孟什维克合并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06页。

党能够激励群众举行伟大的起义。而另一个集团首先是以谨慎而闻名，属于这一集团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因为认为群众中的革命力量很强大，从而感到列宁的组织体系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群众中的革命力量太微弱；因而，他们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他们热衷于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一个他们所相信的领袖来掌握。虽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右派之间有时会出现像与左派争吵时那样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列宁最终还是可以使他们服从。对他们，也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来说，党组织正象它所表明的那样往往是本身的目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很少是实现一种英雄目标的手段。

看来，在一九〇五年的政治斗争十分火热的时候，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大部分意见分歧，已为共同的事业聚集到一起了。此后不久，他们又公开要求结束由列宁召开分裂的代表会议所造成的形式上的组织分裂状况。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在统一运动中是站在第一线的，而且波格丹诺夫还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为教义上的意见分歧提供了一定的土壤。^①一九〇五年九月，为制定党的策略而召开的联合代表会议在里加举行。当布尔什维克于十二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代表会议时，人们都普遍希望能出现一个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列宁不可能阻止代表会议赞同立即实行组织联合和召开一次能证实运动统一的党代表大会，^②然而，这种形式的党的统一只艰难地维持了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举行了两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记载为一九〇六年

^①参阅《给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俄社会民主党干部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原编者注）的公开信》，由波格丹诺夫撰写，中央委员会署名。

^②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08—109，113—119页。

的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一九〇七年的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四次党的(统一)代表会议(范围很小的、没有多大权威的党代会)。当时也有一个统一的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一九〇六年,除了七名孟什维克,有三名布尔什维克被选进这一委员会,其中有主张统一的克拉辛和李可夫。①

尽管如此,宗派仍同过去一样明显存在。布尔什维克还保留了它于一九〇五年在其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为机关报的《无产者报》。②当统一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军事技术局”时,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这个机构的领导权,并给它下达了一个急速左转的命令:着手准备武装起义。③这时,非正式的列宁—克拉辛—波格丹诺夫集团已作为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在发挥作用,掌管着独自の财政,与地下活动保持着独自の组织联系。④列宁公开宣布了纪律的双重准则:“我们不要使自己上统一思想的圈套,我们也决不允许孟什维克管束我们。”⑤

党派之间存在的一个比较棘手的争执问题,即与党的财务有关的“游击小组”和“剥夺”问题。为了给运动筹集经费,一些布尔什维克小组采取了抢劫银行和其他的不正当的手段,这使孟什维克感到极不愉快。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某些布尔什维克无保留地维护游击队行动的观点,并批判了针对私人的剥夺行为和暴力行动。⑥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是不一致的,以调和派面貌出现的克拉辛同意禁止这类措施。在布尔什维

①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194—195页。

②同上,第220、221页。

③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376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79—185页。

④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一九五二年科伦—柏林版,第140—141页。

⑤参阅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版,第21页。

⑥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30—131、156—158页。

克中只有占半数的极端主义分子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①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的几年对革命者来说是日益清醒和绝望的时期。沙皇政府经受了暴风雨的考验，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立宪许诺在激进的反对党和温和的反对党之间打下了楔子。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处在这种痛苦中而不得不放弃革命的希望，并做好反动派统治将持续很长时期的准备；相反，布尔什维克左派并不甘愿去适应这种状况。

寻求党在革命后的局势中应采取的正确策略，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暗中存在的分歧。引起争吵的问题是，党是否应参加第一届杜马，即那个具有有限职权的议会团体（它是由政府按照它一九〇五年的十月宣言建立起来的）。围绕杜马问题，在列宁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之间出现了长期的论战——它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后的十年内党内重大斗争的序幕。

在一九〇五年后半年的政治动乱中，革命的激情实际上已驱使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抵制杜马，并再次号召人们直接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当时有少数几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列宁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斯大林曾叙述过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塔墨尔福斯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所做的慎重的讲话（斯大林首次作为代表出现在那儿，而且与列宁面对面坐着）：“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②在莫斯科进行的起义尝试和由它带来的革命希望显然已促使列宁支持抵制杜马的行动。^③会议的正式声明表露了不妥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第三版，第420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376页。

^②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80页。

^③参阅《沃尔弗全集》，第349页。

协的激进主义：“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努力搞垮这种警察式的杜马，拒绝参加杜马。代表会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利用选举集会，……，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并在各阶层人民中鼓动武装起义。应当迅速在各地准备起义，组织起义”。^①

尽管所有坚持抵制杜马的革命党进行了阻挠，杜马选举还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举行了。革命党人恼火地发现，人民给仅能找到的最激进的政党投了赞成票，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谓的工人小组。尽管代表的选举制是不公正的和间接的，但杜马内部仍出现了一个敌视政府的多数派。孟什维克立即认为抵制是无用姿态，从而放弃了抵制，并把参加未来的杜马选举列为四月的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退却并强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积极筹建革命政府的必要性。克拉辛批驳了孟什维克的虚伪行动：“武装起义在俄国革命的客观发展过程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②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如此寻求科学根据的。按左派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参加选举只能瓦解革命力量。只是利用选举大会进行革命宣传鼓动，这一策略重新被确认了。^③

在这一点上，列宁坚决反对抵制并解释说，应该利用杜马作为革命的论坛。在党是否应该参加第一届杜马补选（首先是参加格鲁吉亚的选举）这个问题上，列宁与他的党团发生了分裂，并与孟什维克一道投了赞成票，而他的绝大部分老的追随者则弃权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国家杜马》，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期，第91—92，198—199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20—121页。

^②《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记录》，第385页。

^③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37—139页。

或采取了坚决不妥协的反对立场。^① 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选举获胜（一次真正的地陷）证明，新的方针是有效的。一九〇七年，社会民主工党人广泛地参加了第二届杜马选举，结果是显著的：有六十五名社会民主工党代表被选上，其中有十八名是亲布尔什维克的。^② 列宁强迫布尔什维克接受的适应能力得到了报酬：在伦敦举行的统一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微弱的多数。^③

尽管布尔什维克现在在整个党内仅占微弱优势，但他们却继续保持了派别中心，甚至还扩大了这个中心。从成员名单上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知名人物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和李可夫，加上另外几个新人：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调和派领导人），维·巴·诺根（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为著名的右派布尔什维克），巴·亚·罗日柯夫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两个历史学家）以及列甫·波里索维奇·罗森费尔德和格里哥利·叶夫谢也维奇·拉多梅斯尔斯基（他们当时都是二十四岁，后来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曾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他们在历史上以革命的假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闻名）。^④

党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各革命政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九〇七年六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颁布了一项新的在相当程度上不包括真正人民代表机构在内的选举法，政府想以此来了结反对派占多数的这一令人恼火的局面。按革命者的观点，这是一次政变。这一来，不久前刚刚缓和

^①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141—143页。

^② 参阅阿尔弗雷德·莱温：《第二届杜马》，一九四〇年纽黑文版，第70页。

^③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89页。

^④ 同上。

下来的有关抵制的争论马上又激烈起来了。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重新抵制杜马。^①在党的一九〇七年七月芬兰代表会议上，在场的九名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八名（以列宁的副手波格丹诺夫为首）投票赞成重新开始抵制，这八名代表有：卢那察尔斯基、阿·谢·布勃诺夫（来自莫斯科的年轻代表，一九一七年以后参加左翼，后来成了斯大林分子）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之一）。而唯一的一位与孟什维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派代表一道投票反对抵制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就是列宁本人。^②

由于考虑到群众的革命情绪已让位于长期的反动统治时期，列宁认为重新抵制是一种不可同意的冒险行动。在劝说他这一派中的谨慎分子拒绝抵制上，他并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但是他这一派中的左翼却顽固坚持原来的观点。在很快改变看法的人中间，加米涅夫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③与列宁的所有其他有名的同事相反，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显然没有参加抵制运动。这时，党的领导集团已开始有了轮廓，它与苏维埃政权早期的领导班子大致相似。

当一九〇七年秋天按照新法令举行大选时，社会民主工党在杜马中赢得了十三个席位——七名孟什维克和六名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举行的党代表会议上（它像通常一样在芬兰举行，以便逃避秘密警察的干扰），在十名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中反对杜马的人仍旧是多数。在与第三届杜马同时举行的这次代表

^①参阅沃伊廷斯基：《抵制主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35页。

^②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18、224页。

^③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八—九期，第44页。

会议上，工业中心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地区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代表。^①从这一建议中，人们引伸出一个概括了当时一些左翼反对派的称号——“召回派”。列宁在右翼的孟什维克和左翼布尔什维克召回派之间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从而使他的路线，即利用杜马作为革命宣传的讲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②

一九〇八年，召回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得到加强，并开始严重地威胁到列宁在党内的地位。在俄国国内的亲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中，列宁主义分子和召回派分子在争取党员追随者问题上展开了斗争。列宁历尽艰难困苦才掌管住莫斯科组织，而由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领导的中央地方局仍顽固地持反对意见。^③显然，在这一组织内存在着左的传统，因为这一组织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是布尔什维克激进派的堡垒。

在彼得堡有一个较强硬的反对派变种占据着统治地位，即所谓“最后通牒派”。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的追随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党团采取毫不妥协的激进态度。这个集团的领导人起初是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④这些最后通牒派分子直到一九一〇年还统治着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们不仅激烈反对议会活动，而且反对参与工会工

^①参阅阿·谢·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33页。

^②参阅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策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30—232页。

^③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33页；马·尼·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一九二三年尼斯尼—诺夫哥罗德版，第56—57页。

^④参阅沃伊廷斯基：《抵制主义、召回派、最后通牒》，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58页。

作和利用其它合法机会。①列宁在他的忠实追随者（特别是一九〇八年流亡前的季诺维也夫）的帮助下为争取控制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彼得堡组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敌对情绪非常强烈，以致于这个组织中的一些非最后通牒派分子也反对列宁的策略，他们害怕这样下去所有的最后通牒派分子会被全部驱逐出布尔什维克党团。②

在选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九年一月（旧历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时，召回派作为一个独立集团开始反对列宁，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一致公认的左翼领导人波格丹诺夫在会上以他们的名义作了发言。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完全被这两个主要党团的各自内部的意见分歧所掩盖。正当列宁与他的左翼批评家产生意见分歧时，孟什维克本身由于“取消主义”的出现也发生了争吵；它的保守派建议限制秘密的政治活动或取消秘密的政治组织。列宁的右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左派孟什维克结成了同盟。④

这时，列宁主义分子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由于对哲学的先决条件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看法不一致，更加复杂化了。这一意见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波格丹诺夫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实证论哲学（它与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名字

①参阅奥斯特罗乌肖娃：《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27—30页。

②参阅奥斯特罗乌肖娃：《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30—32页；百科全书关于季诺维也夫的小传，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143页。

③参阅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7页；奥斯特罗乌肖娃在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的文章，第20页。

④参阅格·叶·季诺维也夫：《俄国共产党（布）的历史》，一九二三年汉堡版，第157页；沃伊廷斯基的文章，见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八—九期，第63页。

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协调。当波格丹诺夫开始说明他的想法时(一九〇〇年以后不久),普列汉诺夫立即指责它为唯心主义的倾向。在这场哲学争论中,列宁起初没有参与任何观点,他后来在给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信中说道:“我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内行。”^①而他于一九〇四年却向高尔基说,他开始感到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但是,他们两人把有意见分歧的地方当作“中立地区”,因为在一九〇五年整个一年里他们(包括他们的追随者)在党组织和革命策略方面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在那以后在革命热情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团结得也很紧密。随着因对杜马的看法所展开的策略问题的争论(是建立在对革命形势乐观主义的评价和悲观主义的评价这一对立基础上的)开始后,哲学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了。整个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的上半年,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充满了有关哲学的论战和有关召回主义的政治理论的激烈讨论。列宁以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加了论战,并取得了胜利。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裂痕在扩大。一九〇九年初,左翼领导人为提高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在充满田园风光的喀普里岛创办了一所特别的学校。按说,这所学校与派别毫无关系,但是从教员组成(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和阿列克辛斯基为最高领导人)来看,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正因为他们在那里讲授的是异端邪说,所以列宁反对开办这所学校。但是他们的活动一直很频繁,并且与俄国国内的地下党组织保持着经常的联

^①列宁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425页。

系。^①因此，列宁也仿效这种做法，在巴黎附近创办了一所学校。在哲学问题争论中，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容忍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所谓的“造神说”，他们玩弄从马赫—波格丹诺夫哲学中推导出来的神秘思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形式。列宁对这种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倾向十分恼火，他的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是：在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倾向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团极为不利。^②

一九〇九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分子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党团机关报《无产者报》的四个编委（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波格丹诺夫），三个来自俄国地方组织的代表（其中有未来的乌克兰领导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和来自圣彼得堡的真正无产者米哈伊尔·巴·托姆斯基，他在二十年代成了苏维埃工会主席）以及五个中央委员——其中有李可夫和列宁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③当时左派仅有两个代表（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一个同事），^④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左翼反抗阵线的前景是极为暗淡的。当时，在党内虽已引起了骚乱，但列宁已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防止党组织受到第二种异端邪说的影响，并有效地促使会议公开谴责分裂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波格丹诺夫谴责这种对待孟什

^①参阅弗·萨·沃伊廷斯基：《论“前进”集团》——一九〇九——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九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十二期，第73页；利亚多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8—59页。

^②参阅列宁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425—432页。

^③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42页。

^④参阅《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69—271页；在这里波格丹诺夫和肖采尔仅是以他们的假名马克西莫夫和马拉特被提到。

维克的态度是“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①

会议很快地解决了造神说倾向，波格丹诺夫本人赞成列宁主义者对造神派思想所作的批评，但反对对他们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列宁主义者以九票对一票（波格丹诺夫弃权）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谴责造神说思潮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倾向，并宣称将其代表人物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团是有充足理由的。^②同时，列宁决心将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要把持不同政见者全部排除掉。代表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召回派分子被谴责为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产物，是“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子”。^③为了组织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团，列宁就是这样来刻画大多数在一九〇七年以前曾帮助过他的人物的特征。

波格丹诺夫的行动是虚弱的，他强调他们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并试图以此来保护自己，从而也就同意了人们对左翼中的召回主义进行的谴责。^④这是反对派首次犯下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一再重犯了这种错误：赞同消灭异端分子和企图通过牺牲许多坚定的同志，来保持运动的统一以及使他们的温和观点为全党所接受。波格丹诺夫为保护他的最后通牒主义所采用的手腕是一个严重的失

①参阅《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6页。

②参阅《“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未发表的记录》：列宁反对造神说的斗争，见一九三一年《文学遗产》第一期，第17—18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81—282页。

③参阅一九〇九年六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7—287页。

④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八—九期，第59—60页。

误。会议指出，“现在，最后通牒主义同召回主义在政治上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当时典型的做法是，把所有批评列宁的左翼分子都一律同等看待，并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等同起来；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反面”。^①波格丹诺夫立即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以会议名义发表的公报宣称，“派别”必须要有真正的“思想的一致”，^②这一准则在列宁建立了自己的党之后，又被认为是对“党”适用的。决议说，波格丹诺夫和“造神派”的背离行径已经威胁到党的统一，^③正是由于这种背离，他们自绝于派别，自绝于党。也正是由于列宁本人解决了统一问题和驱逐了反对派，才使这种对统一的威胁得以消除。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列宁派的一种典型作法。

列宁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决裂是彻底的。列宁对他的党团摆脱了这些“左的蠢人”甚表高兴，并声称：“由于它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已经扩大了党的思想阵地”。^④打倒倔强的反对派集团并将它们清洗出党，这种策略是与列宁的集中制一脉相承的。少数反对派集团由于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不愿接受党领导制定的政策，这就等于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就不能占有位置。

在列宁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强行造成分裂之后，布尔什维克左

^①“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80页。

^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272页。

^③同上，第277—289页。

^④同上，见《列宁全集》第十卷，第98、99、109、110页。

派已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集团，他们开始从喀普里岛党校回击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起草了一个文件，其中表示，小组对“保持我们党内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革命倾向”十分关切。^①他们警告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们不支持激进主义，他们将失去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信赖。（这就招来了对他们自己的谴责，他们竭力与这些集团同流合污，并使自己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②）这些左派分子把自己比作是一九〇四年的二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并要求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代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他们开始发行自己的党团机关报，并给它取了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九年曾用过的报名，即《前进报》。^③根据这一报名，左派党团就获得了“前进派”的称号。

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巴黎会议上（这次会议作为一次认真谋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作的会议而著名），前进派分子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党团而出席的。他们激烈批评当时所采取的组织合并措施，并以同样手段回敬列宁，指责他倾向于孟什维主义和致力于解散布尔什维克党团。列宁主义者一方也控告前进派分子，说他们缺乏反对孟什维克“取消主义分子”的坚定态度，并违反了列宁主义的严格的党的组织原则。^④

事实上，前进派分子这种在党内任意发表派别观点的行为已接近一个诚挚的党容许其成员保留各色各样派别观点和自由发表

^①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88、89页。

^②谢·伊·古谢夫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信，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197—199页。

^③参阅奥斯特罗乌肖娃：《前进派》，见一九二五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期，第214页；《波波夫全集》第一卷，第243页。

^④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93—103页。

意见的极限。他们被开除出了列宁的集团，但这却使这些左派分子更加公开地沿着他们自己的倾向发展下去，并且在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民主思想而反对严厉的组织约束。他们是那样地敌视纪律，从而人们完全可以按列宁的观点把他们称为孟什维克倾向分子。（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布尔什维克运动中的左翼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布尔什维克中的左派和孟什维克中的左翼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清楚地表现在这两个集团竟然于一九一〇年在波洛尼亚联合创办了一所新的党校这个问题上。^①

在召回主义运动全盛时期，左派分子要比列宁本人更倾向于搞革命密谋活动。从许多方面看（特别是从他们拒绝参加任何议会活动看），召回派分子已类似无政府主义者，^②就像三、四十年前的巴枯宁信徒那样，他们蔑视在群众中进行的平凡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拒绝任何妥协。一份同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文件曾这样描写了左派及其地下活动，他们“完全与工人运动相脱离，致力于徒劳的军事准备工作”。^③由于布尔什维克左派轻视经济力量的缓慢作用，突出地夸耀政治组织和坚决行动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们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面超过了列宁。然而，与训育导师列宁很大不同的是，左派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密谋活动上，不是因为不太信任群众，而是因为过分信任群众。按照他们的观点，只要坚决地攻击政府，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就会变成起义行动。

波格丹诺夫宣称，党面临着两种对立的前景，“新的革命浪

^①参阅利亚多夫：《俄共（布）的三十五年》，第59页。

^②参阅沃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84页。

^③古谢夫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信，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六期，第197页。

潮”或“按部就班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方针放在按部就班的发展上，那么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根本不存在革命一军事问题和任务。按部就班的传统是一种有害的因循守旧的传统……在俄国，这种缓慢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只不过是十月党人的梦想。”^①波格丹诺夫排除了社会渐进发展的可能性，并认为党的任务仅在于激发和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正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持的观点。列宁在谋求政权的过程中从这些左派人物方面获得的支持多于列宁分子的支持，这不是偶然的。

在左派的眼里，列宁的保守主义使其强硬的组织原则失去了根据。在一九〇九年六月公开决裂之后，左派开始以回忆孟什维克过去提出的论点这种方式向列宁的集中制组织原则发起攻击。在各式各样的文章中，列宁的观点被指责为“党内的独裁统治”、“党的沙皇主义”和“党的君主政体结构”。^②利亚多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造成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并断言说：“对列宁来说，党的集中制问题只不过是加强其在俄国运动中个人影响的合法性问题。”^③当波格丹诺夫就列宁的特点进行笔战时还写道：“对级别低于自己的人采取粗鲁和傲慢的态度，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表示尊敬，这是当今社会中权威心理的一般特征。”^④

在召回派—前进派的历史中——正如在革命前的整个布尔

^①波格丹诺夫一九一〇年给“所有同志”的信，引自奥斯特罗乌肖娃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一期，第200页。十月党是一个保守党，它仅满足于政府一九〇五年十月作出的让步。

^②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03页。

^③参阅马·尼·利亚多夫，《党的危机》（一九一一年），引自沃伊廷斯基的文章，同上，第104页。

^④参阅波格丹诺夫：《信仰与科学》（一九一〇年），引自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08（608）页。

什维主义的历史中所表现的那样，关于革命运动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首先是有关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争论，使革命前的统一的左翼布尔什维主义走向崩溃。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小制度，而是一个可变的整个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即“建立在同志关系的社会基础上的组织”。这就是说，“绝不能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仅仅看作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战争”，社会主义是随着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逐步提高而产生的。^①前进派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翼对这种“修正主义”发起了激烈的攻击。^②不断的理论冲突以及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所引起的厌恶导致了这一集团的迅速崩溃。^③

尽管列宁分子和前进派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大部分前进派分子先后又回到了列宁的党内。在这个集团解散后不久，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马上又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进行合作，波格丹诺夫甚至为彼得堡《真理报》（它是现在《真理报》的前身）撰稿。但后来，《真理报》的编辑以一种婉转的口吻反驳了他的一篇文章，《真理报》的文章说：“只要前进派的政治主张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混淆不清，马克思主义者就将把它看成是冒险主义的。”^④这时，波格丹诺夫停止了撰稿，并与孟什维克建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系。革命爆发后，他退出了政治领域，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化”解释工作，并作为生理学家从事着科学工作。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他的名字再次与反对派的活动一

^①波格丹诺夫，《当代的社会主义》，“前进派”文集第二期（一九一一年二月二日，第63页。

^②参阅D·金，《前进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三卷，第388页。

^③沃伊廷斯基在“无产者报”上的撰文，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09页。

^④奥斯特罗乌肖娃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一期，第213页。

起出现。波格丹诺夫属于一个自称为“工人的真理”的共产主义小集团。一九二六年，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一次医学试验时牺牲了。（也有谣传说，他是自杀的。）^①

一九一四年，阿列克辛斯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断了联系。他成了“护国派分子”，并公开支持俄国进行战争。后来，他一直发展成为君主政体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在内战期间，他站在白军一边，最后作为流亡者移居巴黎。^②然而，前进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像列宁分子和大多数孟什维克那样忠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主义思想（为了保卫祖国，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这些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观点，大多数前进派分子重新靠拢布尔什维克，并在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第一次有组织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失败，正好与列宁克服种种阻碍使其党团保持团结所获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列宁的组织思想是完全适合俄国国情和俄国气质的，正是列宁所警告过的弊端（例如，缺乏高度的纪律性，花费大量的劳动来建立繁多的理论，知识分子的极端个人主义，策略不能完全适应变化着的政治形势）导致了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失败。

一九〇九年，列宁解决了左倾问题后不久，右派又开始骚动了。后来，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又再次出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斯大林在排除了左派之后就马上卷入了与右翼反对派的争吵。当列宁在一九〇九年排除左翼时，从未消失的主张调和的

^①格茨尔格·德尼克的报告。

^②金：《前进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三卷，第389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489页；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46页；舒布：《列宁》，第403页。

倾向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在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一九一〇年一月巴黎会议上，几乎所有在场的布尔什维克都主张与孟什维克搞统一。^①起初，调和派分子的领袖是列宁的新的追随者杜勃洛文斯基，但他的政治生涯立即随着流放西伯利亚而告结束，并在那里被迫自杀。^②后来获得声誉的其他调和派分子是李可夫、诺根和一些较新的领导人：索·阿·洛佐夫斯基（他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犹豫不决，后来成了共产党工会国际领袖）和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后来的苏维埃财政人民委员，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追随者）。似乎，统一运动也得到了加米涅夫的一些支持。^③

一九一〇年一月决定的、把党统一起来的措施，超过了一九〇三年以来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派别报刊（它始终是引起流亡者在政治上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被停办了，为办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编辑部，它由布尔什维克二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二人（马尔托夫和唐恩）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一人（阿道夫·瓦尔斯基）组成。（自左派被清除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两个非调和派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从这时起，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在一九一七年事变严峻考验他们的合作之前，季诺维也夫受到列宁的完全信任。）巴黎会议不仅批判了左的倾向，而且也批判了右的倾向，即不仅批判了反对从事合法活动的前进派分子，也批判了拒绝搞地下工作的取消主义分子。不过，列宁认为，这一批判还不够尖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62页；布勃诺夫：《俄共（布）二十五年》，第549页。

^②参阅季诺维也夫：《俄共党史》，第162页；舒布：《列宁》，第161页。

^③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49页；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248页。

锐。^①

由于在原则问题和人事问题上一直发生争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持久的统一仅是一种幻想。列宁是一个不会屈服于相反意志的人。一九一〇年四月，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道：他不忍看到号称已经统一起来的党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希望肃清所有的倾向分子。^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遵守保持统一的条件。孟什维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约束或开除取消主义分子，而布尔什维克却根本没有放弃使其同盟者严重不安的剥夺一类的暴力行动。^③一九一〇年秋天，各个派别又采取了好战态度。这时，接替了已被逮捕的调和派领导人杜勃洛文斯基职位的李可夫，自己也因执行一项任务而在俄国被捕。这对列宁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接替李可夫，流亡者中的调和主义运动开始崩溃。^④这时，列宁正在竭尽全力地为召开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而努力。这个会议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举行，它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彻底决裂。

此外，列宁并不想把布尔什维克党团仅仅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党，而是要求把这次派别的代表会议变成代表所有温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会议。一个新的、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产生了，它自称代表全党。但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尽管他们从未像左倾分子那样正式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团）。除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新的。为报答他们的忠诚和组织能力而被提拔上

^①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48—249页。

^②列宁一九一〇年四月十日致高尔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69—270页；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第555页。

^③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67—269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28—529页。

^④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28—529页。

来的人物有：奥尔忠尼启泽、戈洛晓金、施瓦尔茨曼和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他是一个莫斯科工人，与马林诺夫斯基一波格丹诺夫没有亲戚关系，他如火一般的宣传鼓动才能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候补委员有：布勃诺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后来是农业人民委员）和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斯塔索娃，这三个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还有两位新人物：苏廉·斯潘达罗维奇·斯潘达梁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他是一个家长式农民，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为止，是苏维埃国家元首）。^①马林诺夫斯基进了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一个新党团的代表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是沙皇保安局的密探。会后，还有一名地下工作者被增选进中央委员会，他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他当时已开始以其最新的假名斯大林而闻名，他刚强、冷酷无情，并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列宁召集布拉格会议并宣布它为党的正式会议时，前进派分子和孟什维克联合提出了抗议；这对所有希望恢复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人都是一种打击。前进派发表的文章说道：“会议竟敢命名为‘全俄’代表会议”，它是“一个使党分裂的集团单方为篡夺党旗所进行的一次明显的尝试”。^②与他们希望召开“一次全党会议”的心情相适应，前进派分子支持孟什维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即所谓的八月联盟代表会议。阿列克辛斯基作为前进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会议，但他不能接受由控制会议的孟什维克右翼提出的路线，从而退出了会议。^③这些事件清

^①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274页。斯潘达梁于一九一六年在西伯利亚逝世。

^②《每日题目》文集（一九一二年），引自奥斯特罗乌肖娃一九二五年在“无产者报”第一期撰文，第212页。

^③同上，第212—213页。

楚地表明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局限性——对孟什维克来说，它太左了，对列宁分子来说，它又太“温和”了。

就是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会议和由它所引起的相互指责也都没有能扼杀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为了迫使这个党完全分裂，列宁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方面，当时从上到下混杂在党内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的保安局密探也助了列宁一臂之力，他们当然欢迎革命者之间发生争吵，保安局并逮捕了主要的调和派分子。例如，一九一一年李可夫的被捕似乎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使列宁的分裂政策更容易地得到了实现。尽管如此，一九一二年秋被选进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仍坚持调和的立场，投票赞同尊重社会民主工党整个代表团的统一，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新《真理报》的编辑——斯大林和年轻的地下工作者维亚切斯切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他是一个作曲家的侄子，后来以莫洛托夫这一名字而闻名）——感到不得不压低一下列宁反对统一的语调；特别是社会民主工党杜马代表赞同部分地合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彼得堡的报刊。这时，列宁再也忍耐不住了。①

他特地在克拉科夫召集了一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以便对《真理报》出版发行者施加影响。通过他直接的指示和派遣新的人员前往俄国——其中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他革命后成了党的第一书记和第一任国家元首，列宁在报刊上贯彻了他的方针。② 一九一三年秋的另一次会议终于使布尔什维克认识到：永远与孟什维克决裂是必要的。这时，得到保安局批准作为布尔什维克被选进杜马的马林诺夫斯基（由于他的口才而

①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40—562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41页。

②参阅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147—149、159—160页。

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团领导)以暗暗得意的心情执行由列宁和保安局委托给他的任务,制造更大的分裂。^①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终于破灭了,但人们对重新统一的希望并没有破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间,有许多讲演都建议在国际主义的反战宣言的基础上使党重新统一起来。一九一七年三月,即在十月革命的前夜,统一的希望再次出现,事实上也出现了许多次会谈。但是,当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国并使布尔什维克党坚定地走夺取政权的道路时,统一的思想又消失了。此时,国际主义者大联合的思想起了最后的、但是重要的作用:激进的孟什维克(其中有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自那以后,他们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和在随后的反对派运动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际主义与各个党团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爆发使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像所有欧洲姊妹党一样)陷入了一片混乱。在第二国际中的大多数党党内,多数人支持他们的参战政府,这在反战集团看来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明显背叛。但“保卫祖国”则被许多人看作是进一步取得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与其他各地的情况不同,“保卫祖国”的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

^①参阅阿·叶·巴达也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三二年伦敦版,第12—14章。马林诺夫斯基一九一四年离开杜马和布尔什维克党,以避免他的真相被揭露。尽管列宁的大多数合作者对他已产生怀疑,但列宁却拒绝怀疑这个实际上已成为领导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第二号人物对革命的忠诚。直到一九一七年,人们从保安局的文献中了解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况,真象终于大白。马林诺夫斯基于一九一八年被判决。(参阅舒布:《列宁》,第126、194—195、333—335页;沃尔弗:《震撼世界的三个伟人》,第548—557页。)

党人中并不占统治地位。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都同样地投票反对战争贷款。然而在孟什维克中，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甚至有一些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前“前进派分子”阿列克辛斯基离开了国际主义队伍。在布尔什维克巴黎党委会的五名委员中，有两名委员自愿报名参加了法国军队，其中一名在战斗中身亡。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自愿报名参军或以另外的方式支持反对德国的战争；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反战派分子曾长期地犹豫不决，直至列宁肯定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才坚定起来。^①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起初也同样犹豫不决。当沙皇政府于一九一四年秋作为对列宁公开兜售革命失败主义的回答，下令逮捕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时，这些人才试图以疏远领导人的极端行动来进行自卫。^②

关于“保卫祖国”与国际主义这一问题的争论，充斥在各个派别集团的内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完全新的分化和改组。这已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种新的分化与改组打破了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派别关系，并导致了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说道：

“前进集团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以及左翼普遍的加强都是战争的结果，”这种情况“导致了早期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左派集团融合成一体而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统一的共产党”。^③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九〇三年的分裂就已勾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后期的

^①肖恩亚夫科，《在地下和流亡国外——一九一一——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斗争》第四期，第186—199页。

^②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69页；布勃诺夫把那些极端的做法归咎于加米涅夫（见《布勃诺夫文集》，第600页）。

^③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伟大的转变》，一九一九年彼得格勒版，第52页。

轮廓。像一九一七年那样的运动不可能单纯由同意列宁组织原则的人所组成的党所发动，它首先是由反战的国际主义者的党所发动的。许多从不拥护列宁组织原则的人被引诱进了布尔什维克圈子，那些政治历史极不相同的人也逐渐被卷进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一九一四年，列宁主义者、左派布尔什维克和左派孟什维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一九一七年，这个联盟形式上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在这个党内，大多数领导人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倾向都不是独特的列宁主义的。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中的国际主义者的两个主要聚集点之一；另外一个聚集点是巴黎日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编辑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后来是十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苏维埃政府最初的三名军事人民委员之一）。在这一报刊的周围聚集着许多非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有的是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持有相同的政见或者对报纸持同情态度的人。从他们的来源看，既有布尔什维克左派，也有孟什维克左派。与报刊保持紧密联系的有前进派分子卢那察尔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分子洛佐夫斯基和索柯里尼柯夫。^①安东诺夫曾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之间徘徊不定。^②同样，马克思研究家达·波·梁赞诺夫也时常为报刊撰稿，他同经济派分子、列宁的党团以及前进集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③回顾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们后来成了共产党党内的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我们的言论报》还有一些生活在法国以外的工人

^①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一九五四年伦敦版，第221—222页。

^②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8—9页。

^③参阅梁赞诺夫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31—232页。

员，他们当中有：后来的人民委员契切林、急进的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她一九一五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莫·索·乌里茨基（他在被杀害之前，即一九一八年前，是一个主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契卡干部）、波兰社会主义者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拉柯夫斯基（根据出身，他是保加利亚人，后来成了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和后来的苏维埃外交家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伊斯基（在参加了孟什维克的几年之后，他与新政府*讲和了）。①

尽管厌恶列宁的组织思想，《我们的言论报》集团却仍倾向于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一个编委曾写道：“人们不应该也不要有什么宗派狭隘思想，但不可否认，在俄国，由于迫切要求政治行动，列宁主义已消除了宗派色彩……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的报刊）联合起来的工人小集团现在在俄国是唯一积极而又坚定的国际主义力量，……；对那些无派别的国际主义者来说，除了与列宁主义者联合外，没有其他出路。”②似乎正是那些过去与列宁比较亲近的编辑们为重新统一开辟了道路。托洛茨基当时对此有点犹豫不决，他和列宁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列宁曾试图劝说托洛茨基与一九一五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村举行的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会议保持距离，而托洛茨基则拒绝放弃在国际主义反战宣言的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民主党重新统一的这一希望。当托洛茨基声明他同意以联合作为奋斗目标时，马尔托夫则顶住了布尔什维克的吸引力，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报社，以表

* 指反革命的西伯利亚政府。——译注

① 这一名单摘自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22—223页。

② 参阅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我们的言论报》，巴黎版；引自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33页。

示抗议。^①在中间派集团内部出现了这次分裂之后，中间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极分化的形势迅速明朗。

在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国际主义的最坚固的支柱，而孟什维克则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整个孟什维克组织崩溃了。但当时仍存在着几个较小的、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中间派小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彼得格勒^②区联委员会（它是各区之间的联合组织，所以它的成员被称为“区联派”）^③。这个组织主要由那些同意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但反对列宁的狭隘派别思想和赞成整个社会民主工党重新统一的工人所组成，他们很自然地得到了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的非列宁主义者的同情。一九一五年，“区联派”开始向国外派遣代表团，与流亡分子建立联系；许多《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成员也开始为区联派想要创办的报纸撰稿（但这份报纸还没有问世就被保安局查封了）。区联派的口号是：“第三国际万岁！俄国统一社会民主工党万岁！”^④这种纲领上的“左的”观点与组织上的“温和的”态度的结合，正好说明这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者的特点。

区联派作为组织桥梁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许多国际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就是通过这一桥梁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二月革命后，政治流亡者成群结队地回到俄国时，《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许多成员也像其他的非列宁主义者一样加入了区联

^①参阅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我们的言论报》，巴黎版；转引自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托洛茨基》，第225页注释2、第226—235页。

^②圣彼得堡一九一四年改名为彼得格勒，一九二四年改名为列宁格勒，这里用的是当时已使用的名字。

^③参阅康·康·尤烈涅夫，《区联委员会，一九一——一九一七》，见一九二四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二期。

^④同上，见一九二四年《无产者报》第二期，第125页。

派，其中有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阿·阿·越飞（他一九一八年作为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成了托洛茨基的继承人）、索柯里尼柯夫、曼努伊尔斯基、波里斯·列别捷夫（当时的前进派分子，后来成了作家和斯大林分子）、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举行的第四次党代会上，这个集团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的国际主义者，其中像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尤里·拉林（米·亚·卢利叶——译注）和洛佐夫斯基则于一九一七年单独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正象卢那察尔斯基所表示的那样，“所有左派集团合并”的倡议主要来自非列宁主义者。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俄国所有反对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新组织。典型的例子是，重新活跃起来的“前进派”号召：“所有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应不顾那些不涉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歧而联合起来。”^①然而，国际主义者如此迫切希望的统一不可能马上就实现，因为从前的组织问题又出现了。非列宁主义者想要在广泛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老社会民主党和尽可能多地把护国派分子拉到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②他们遭到了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们拒绝与护国派在组织上实行明显的决裂。于是，“前进派”就公开谴责了列宁的“不健康的分裂主义倾向和命令方式”。^③列宁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深感不安，因为统一思想对他在俄国国内的追随者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威胁到他本人的

^①转引自奥斯特罗乌肖娃一九二五年在《无产者报》第一期上的撰文，第218页。

^②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一卷，第336页。

^③参阅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18—119页。

政治影响。①

在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中，在统一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这在一九一五年二、三月召开的伯尔尼党代会上已充分暴露出来。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领导下的一个小组首先对列宁进行了批评。布哈林老早就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所赞赏的人，后来成了一个杰出的反对派领袖；他起先站在左派一边，后来站到了右派一边。②尼·瓦·克雷连柯支持布哈林，他老早就已表现出工团主义倾向，后来成了苏维埃军事人民委员和司法人民委员之一。③他们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只有与其他的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特别是与《我们的言论报》集团进行合作才可以着手准备成立第三国际。然而，这一动议被列宁主义者否决了。④

组织问题仅是伯尔尼会议期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内，一个新的左翼反对派又形成了。在伯尔尼会议上出现的布哈林派就是这一集团即将形成的首次征兆。像非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样，这个新出现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也认为列宁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太顽固了。

列宁以“推翻沙皇政府”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的口号概括了他的思想。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种僵化的失败主义把事物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它实际上是在帮帝国主义德国政府的忙。“主张推翻俄国政府是社会爱国主义在政治上作出的不适当和不公正的妥协，它不是沿着反对战争和反对导致战争的各

①列宁一九一六年九月或十月《致施略普尼柯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274—275页。

②参阅布哈林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55—56页。

③参阅克雷连柯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242页。

④参阅M·西罗姆雅特尼柯夫，《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见一九二五年《无产阶级革命》第五期，第154—171页。

种关系的革命斗争路线，而是沿着所谓‘祸害最小’的路线而采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解决办法。”^①如果说托洛茨基反对简单的失败主义和主张把建立“欧洲联邦”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布哈林集团和当时的前进派分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他们拥护“没有并吞和赔偿的民主和平”^②这种不太激进的口号。

布哈林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为依据的、极左的国际主义的典型代表。根据这种理论，金融资本主义使世界变成了一个经济整体，那么，人们所盼望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因此而超越国界地在全球展开。列宁不赞成这种盛行一时的观点，他强调说，各个民族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③可见，列宁认为，希望通过“欧洲联邦”来简单地解决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仅是一种“和平主义的幻想”。

与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反，列宁从革命过程具有不同特点这一思想出发，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纲领。这种承认民族感情

^①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文章，转引自叶·朱·雅罗斯拉夫斯基，《俄国共产党简史》，英文油印版，第二卷，第34页。

^②参阅西罗姆雅特柯夫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五年第五期，第154—182页；托洛茨基，《前进报》，原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言论报》；沃伊廷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九二九年第十二期，第114—116页。

^③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23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21页。这种观点后来成了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把俄国当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设想，他只认为西欧工业强国能成熟为社会主义。

的思想与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左派所代表的纯国际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布哈林与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一起站在左派布尔什维克反对自决权原则的最前列；拉狄克和柯伦泰等作为左派孟什维克的代表和残存的前进主义左派布尔什维克（其中有波克罗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①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一个狂热的波兰人，在苏维埃政权开始几年内领导过契卡）在民族问题上开始以左的面目出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显然是受罗莎·卢森堡的影响。^②

依据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左派论证说：自决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毫无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一种无用的障碍，因此，托洛茨基说：“民族国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范围、阶级斗争的基础，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已经过时了。”^③ 他警告人们当心那种弥赛亚*式的民族革命的情绪，从而相信民族国家定能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④ 就是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争论也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当时，拉狄克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拒绝自决权思想，说它具有时代性的错误。当列宁不能说动他的党刊《共产党人》杂志反驳拉狄克时，他就让报刊停刊了。^⑤ 自决权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而且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革命利益问题在这期间又产生了。这些问题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间再次出现，并加深了左派教条式的激进主义与反教条主义的实用主

^① 参阅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一九五四年坎布里奇版，第47—48页。

^② 同上，第48页；捷尔任斯基小传，《百科全书》第四十五卷第一分册附件，第123页。

^③ 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撰文。

* 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教士。——译注

^④ 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二月四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撰文。

^⑤ 参阅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47页。

义之间的鸿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列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许多难题，对布尔什维克党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分化改组，²⁴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十月革命的党。接着，在这个党内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继续平行发展的列宁派和战前布尔什维克左派分支。然而，属于当时这一左翼流派的还有许多过去从未直接与列宁主义有过联系的激进的孟什维克，和一个新的从列宁追随者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左派集团。这个由各色各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内左翼反对派的核心。

第二章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中的 布尔什维克党团

一九一七年巨大的革命事变并没有使布尔什维克党忘记它的内部分歧，但为了革命的目标，布尔什维克党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在革命的冲击下，在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两个流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尖锐了。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由于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和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纷纷加入左翼，从而使左翼在实力上有了明显的增强。它的特点是：竭力宣扬革命的国际主义，坚决反对与临时政府进行任何合作。在社会政策方面，左翼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最高纲领，并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措施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制。与此相反，列宁派没有立即提出自己的明确政策。起初，它不倾向于采取坚决反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党更接近，与布尔什维克左翼较疏远。后来，列宁主义者逐渐尾随左派，但又不断发出抗争的信号，因为左派当时不太相信在俄国以及在欧洲已出现革命形势。

当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要求彻底反对战争和临时政府并号召党准备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政权时，他使整个党和列宁派大吃一惊。但他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左派（尽管他们过去与列宁发生过冲突）的热情支持。形象地说，列宁是从他本身的“列宁”派转变为左翼的；特别应强调指出的是，直至十月革命

后列宁才从这一位置上重新转变过来。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党的左翼重新发生冲突，这是由于与德国签订和约而引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获得了一九一七年前曾是他最忠诚的追随者的支持。

一、不断革命

导致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分裂的意见分歧是围绕着如何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在十月革命之后都继续产生着影响。它表现在对俄国革命事件的预言以及如何说明这一事件等方面。一个在布尔什维克运动史上曾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的思想就是闻名的“不断革命论”——一种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一七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当党在一九二三年之后分裂为领导人与反对派两大争论集团时，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中心。

无疑，托洛茨基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与此同时，在俄国出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亚·拉·格尔方德（帕尔乌斯）应称为鼓动者和合作者。当托洛茨基一九〇四年在德国逗留时，这两个人共同起草了这个纲领。在托洛茨基作为第一任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捕之后，他在狱中对这一纲领作了仔细的加工。^①在托洛茨基的关于一九〇五革命的文集中，即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这种理论是以《总结与展望——革命的推动力》这一文章标题问世的。^②

^①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101—105、118页。

^②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革命的推动力》，托洛茨基的《我们的革命》文集，一九〇六年日内瓦版。

托洛茨基想借助他的理论来解决使所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烦恼的问题。按照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还未成熟到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这个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阶段，在那里只能出现象西方几百年前所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如仅仅满足于这个分析，那就意味着：放弃在近期内由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为下一步的革命开辟出道路之前，工人阶级只能扮演合法反对派的角色。这种结论对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来说当然没有一点吸引力。对大多数孟什维克来说，由于他们拒绝列宁的严格的党的学说，他们因此更倾向于相信长期的演变。他们是自由主义者、温和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狂热为实现自身目的而奋斗的革命追随者。

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当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得出革命条件不够成熟的结论时，列宁不但不承认这一点，而且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中找出为他的坚定不移的革命观点进行辩护的其他根据。按照列宁的观点：不能信赖俄国的资产阶级，它太软弱、太反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和代表工人的党来完成；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并按照革命阶级的利益来执行一切国家事务。列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革命。他认为，坚强的领导和夺取政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工人力谋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①列

①参阅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598页。

宁在一九一七年写的一篇评论中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政治哲学：“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①

在俄国的条件下要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革命的斗争精神相协调，是十分困难的，它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孟什维克和列宁在运用学说时，前者放弃斗争精神，后者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牺牲了历史哲学。然而，还有第三种态度，尽管当时人们对它的产生很少注意，但它对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它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所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了。

托洛茨基开始是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证实的看法来提出论据的：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在与先进的西方加强联系的情况下受到推动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俄国，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俄国经济是在落后的乡村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靠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起现代形式的大工业；^②因此，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在革命热情方面都很快有了增强，一种社会性的、复杂的、多条战线的斗争也随之而开始；一方面是政府和部分地主与几乎所有其他人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工厂主与工人的对抗。

这种形势不仅使列宁而且使托洛茨基于一九〇五年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占有利益，可能背叛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争取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和剥夺地主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进行到底。为了把这种必要性与资本主义在俄国继续发展的预言结合起来，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

^①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9页。

^②参阅约·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13页。

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形式。托洛茨基提出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把俄国无产阶级视为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根据他的理论，无产阶级已被号召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领导，并且有能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断”革命论的第一层意思——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马上继续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俄国的社会和经济还很落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单独存在下去，但它必然会得到外部的援助，俄国革命是欧洲普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这看来是“不断”革命论的第二层意思——当俄国革命蔓延到许多先进的国家时，将出现不断革命的形势。工业国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欧洲的组成部分，而落后的俄国则是整个欧洲的一个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

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类似的思想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左派集团中逐渐普及。罗莎·卢森堡是其最坚决的拥护者之一。^①前进派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后来成为一个托洛茨基的激烈批评家）表示赞同这种观点。^②战争期间，布哈林和拉狄克等也拥护这种理论。^③对那些渴望采取行动、而同时又想保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断革命”论是唯一的理智而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正如后来与托洛茨基进行论战的人所强调的那样，列宁最初断然拒绝托洛茨基的观点。然而，在战争的年代里，他的激烈反对战争的国际主义又使他站到了与托洛茨基实际看法十分接近的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版，第109—110页。

^②参阅波克罗夫斯基小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119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24页。

^③同上。

立场上。①列宁曾在一九一五年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②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爆发和沙皇的垮台促使列宁宣布：“……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③这时，列宁完全接受了从国际范围来考虑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二月革命的爆发完全出乎布尔什维克的预料之外，认为不可能出现的、由一个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来接管政权使列宁的“民主专政”设想成为一种无对象的设想，事态的发展更多地符合孟什维克的期望。孟什维克和多数社会革命党人照原计划做出了反应：他们决定充当守法的反对派。由于开始时他们在苏维埃中占绝对优势，就竭力按他们的思想来引导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建立所做出的回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谨慎派分子和激进派分子之间显露出来的基本矛盾是戏剧性的。俄国大多数旧类型的列宁分子缄默地承认，孟什维克的分析业已证实；他们同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是当时能够有的最先进的政府；为了民主革命的利益，他们甘当警犬和暂时的监督人。相反，列宁本人和左派（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却不愿如此地任凭革命自由发展。他们怀着对俄国革命寄予极大希望的心情以公开的或未明确表示的方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

①列宁没有明确表明他已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这一情况后来使他的对手能断言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论始终存在相反的看法。然而，为了弄清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列宁补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区别所在，不得不进行一些烦琐的研究，它使我明确地看到：这两个人在一九一七年间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参阅迈尔：《列宁主义》，第143—144页；以及雷斯武施金：《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见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十、十一—十二期。

②列宁：《几点纲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81页。

③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380页。

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为俄国宣布了一项以他的国际革命的梦想为基础的纲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推翻他认为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临时政府。

一个直接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战争的继续问题。在俄国人民中，要求和平的思想已广为流行，但列宁认为：要获得和平，“就需要有一个工人政府，而这个政府首先要同贫苦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其次要同各交战国的革命工人结成联盟。”^①在同一时期，托洛茨基在纽约也独自表示了相同的观点：“站在俄国人民群众队伍最前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完成其历史工作，……沙皇主义和战争必将被消灭，……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职责就是要指出：在自由资产阶级险恶的帝国主义意图背后不存在力量，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缺少工人群众的支持。”^②

不断革命的理论在革命的年代具有双重意义。它作为布尔什维克战略准则激励着人们去夺取政权，并为在一个自称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进行这种“工人”革命提供了理论解释。它同时又十分精确地预言和描绘了革命的发展过程。这是就国内情况而言的意义。此外，它还为在实践中检验一种社会理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前景：它号召人们坚决地行动起来，用行动成果来证实这一理论。

由于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强烈不满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在完成了分配土地和政教分离等“资产阶级的”改革之后，他们又开始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象银行国有化和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等。

^①列宁：《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十七日）的提纲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298页。

^②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月刊上的撰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十九、二十日于纽约）；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九三一年柏林版，第一卷，第446～448页。

一九一七年十月，人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左翼，坚信国际革命将接踵而来。布哈林一九一八年的那些幻想就表明，党赞同托洛茨基的理论：“俄国的不断革命将转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①按照这一理论，要使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在俄国站住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正是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点上，事态并没有按这种理论所说的那样向前发展。火花并未发出，热情预言的西方革命从未到来。因为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胜利，所以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俄国并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希望；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前提还没有充分具备，所以，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所做的孤立的尝试注定要失败。

紧接着，各色各样的布尔什维克集团都得出了这种结论。早在十月起义前夕，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下的谨慎派反对冒险行动时，他们就论证说：欧洲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企图统治国家，那么，它必然会失败。在军事政变之后，党的左翼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方面：左派共产党人反对与德国缔结和约，因为要唤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又因为俄国政府如果出于自我保存的考虑与德国缔和，那么，它由于孤立无援而不得不采取非社会主义的形式。然而列宁却坚决要求缔结和约。尽管整个党仍旧渴望欧洲无产阶级援助俄国同志的这一天能够到来，但是，这一天从未到来。

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幸存的。但意外的是，新政权继续存在着。人们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新政权的继续存在是因为它迫于形势已停止发展，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了。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沉默下来时为止，不断强调这种观点。另一

^①尼·伊·布哈林：《从沙皇主义的崩溃到资产阶级的垮台》，转引自托洛茨基的《弄虚作假的斯大林流派》，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78页。

种观点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存在证明了：只要具备意志和精力这些先决条件，不管外国的发展如何，俄国的物质生活状况就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障碍。斯大林赞成这种理论性的结论，另外还有些人也表示同意，但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同意这种观点。

二、“重新武装党”

尼古拉二世的垮台使俄国人民迎来了异常美好的政治自由。警察消失了，各种地下小组也合法化了，形形色色被流放的政治犯怀着惊喜而又激动的心情从西伯利亚或其他流放地点涌进了首都。到处充满着强烈的希望。同时，混乱也开始了，主义也被抛置一边，只有少数政治活动家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从二月革命到返回家园这段时间内，没有一个小组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混乱和无组织无纪律。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国外，小组内也没有一个能凭权威来担任领导的人。在对待新的临时政府和战争的态度上，党马上就分成了三个明显不同的派别：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数量上很弱但在彼得格勒很有影响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持反对政府和反对战争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列宁派和左派流亡者的观点很接近；大多数闻名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是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远不是那么毫无妥协性；第三集团，也就是在尼·巴·阿维洛夫、弗·萨·沃伊廷斯基和弗·亚·巴扎罗夫领导下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除了阿维洛夫外，他们立即决定全部退出布尔什维克党），^①最后断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保卫祖国就更加有充足理由了。

^①参阅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176—177、187页。

二月革命后，由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它由莫洛托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查鲁茨基组成）领导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很快在彼得格勒党组织中占了优势，他们向临时政府发起进攻，并催逼各苏维埃掌握政权。他们宣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为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对人民的压迫者，即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① 区联派（孟什维克的“区联派”集团）支持左派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并要求士兵们：“将政权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② 然而，在这种激情中也掺杂着犹豫不决的成分，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却疏忽了在苏维埃论坛上针对极端的观点进行批驳。^③ 他们忙于与区联派谈判左翼联合之事。据施略普尼柯夫称，与这一集团完全合并已是一件基本上决定了的事，他说：“这个问题在三月中已顺利地得到了解决，当同志们从西伯利亚归来以及我们的《真理报》开始站到护国派一边时，联合之事只是由于我们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才遭到阻止。”^④

在“西伯利亚的同志”归来之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内出现了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政变。在新归来的人中，有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显贵，他们的职位远远高于那些迄今领导着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工作人员。例如：马·康·穆拉诺夫曾是杜马代表，斯大林曾是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在他被捕前的一九一四年就属于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当这个新的集团掌握了领导权之后，他们首先改变了《真理报》的政治路线。他们接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

^①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186，208页；第二卷，第144页。

^② 同上，第一卷附件24，第261—262页。

^③ 《施略普尼柯夫全集》第一卷，第97页；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见《托洛茨基全集》第一卷，第277页。

^④ 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173页。

惯用语：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不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并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这一观点。^① 斯大林曾写道：“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②

当出席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于三月底来到首都举行会议时，布尔什维克中暴露出来的派别分歧更加明显。^③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集权领导得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城市组织和彼得格勒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两名当时的调和派分子，即李可夫和诺根的支持，这两个人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导人物。除了彼得格勒局，代表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区党组织的莫斯科区域局也站在左派一边，莫斯科区域局在第二年就成了左派最重要的堡垒。在返回俄国之前就与列宁保持密切联系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及时地到达了这里，以便加入左派批评家队伍。^④

在会上，左派坚决支持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指导原则：“只有当俄国革命成为西欧无产阶级反对它们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运动的起点，那么它才能保证俄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和社会改革。”按照左派的观点，临时政府是反革命背叛的温床：“临时政府在搞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因此有必要作好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准备。”^⑤ 他们以推荐“工人赤卫队”为斗

① 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183页。

② 斯大林，《论战争》，刊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真理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9页。

③ 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主要是通过托洛茨基公布会议记录才被人们所悉，《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会议》，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94页。

④ 参阅列·格·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一九五五年伦敦版，第27—28页。

⑤ 斯克雷普尼克，《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见《斯大林流派》，第253、272页。

争的手段，并赞成作为“革命政权萌芽”的苏维埃。①

加米涅夫—斯大林中间派集团当时态度不明确。它作出了一项决议，号召全体人民起来反对交战中的政府，要求“把政权真正交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党的手中”。不过，决议还说道：只是在各敌对政府拒绝缔结和约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人民才不得不把战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它变为与西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战争。因为我们拒绝解散军队并认为有必要保持它的实力来作为反对反革命的堡垒，所以我们号召全体士兵和工人到那时要坚守岗位和维护巩固的组织机构。”②当斯大林把临时政府称为“革命人民的胜利成果的保护者”时，他同样作了模棱两可的表示。他断言说：如果临时政府真正接受苏维埃的监督，那它显然可以加以利用，即使是暂时的；如果它一旦“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的话，那接管政权的时机对苏维埃来说就已成熟。③但是，情况表明，赞成会议“支持”临时政府的思想对那次会议来说有点走得过远，有关的段落被人们从斯大林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删去了。④

①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204—205页。

②转引自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208页。

③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大林 流涕》，第238—239页。

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承认：在列宁回国前，他的政策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89页。）

后来，在斯大林在世期间，所发表的这段演说已避而不谈这一错误，但在一九五六年二十大非斯大林化之后，斯大林过去的右倾错误再次被提及。

（见布尔加罗夫的《论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三—四月的策略》，《历史问题》杂志，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④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92—193页。

可以肯定，俄国国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时期是不知所措的，他们不知道应如何评价新政权。与列宁的态度完全相反，温和派布尔什维克迟迟不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和战争这一态度，他们害怕由于采取这一方针会分裂民主革命运动。因此，孟什维克观察家苏汉诺夫写道：“我并不怀疑加米涅夫想在当前具体的情况下采取真正的争取和平的方针。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一切行动都具有这种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太温和的特点。”^①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乘坐一辆闻名的上了封条的火车经过德国和芬兰回到了彼得格勒。列宁的归来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具有火山爆发的作用。当列宁贯彻他坚定不移的意愿，将党变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时，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那天起，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路程就已标明清楚。

列宁的狂热行动使曾经热烈欢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大大为恼火。列宁马上向加米涅夫发起了进攻：“《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玩意儿？我们已看过多期，也狠狠地责骂过你们！”^②接着，他又轻蔑地拒绝了苏维埃温和派领导人的问候词，并对大家说：“我十分高兴地同你们一起欢呼获得成功的俄国革命……，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整个欧洲内战的开始……，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已开辟了道路和新纪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③使聚会在一起听列宁演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列宁于同一天表示了他要接管政权的决心，这

^①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57页。

^②参阅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关于《列宁同志到达俄国》的报告，见《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一期，第221页。

^③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73页。

就是他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月提纲的核心。苏汉诺夫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具有雷击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而且使所有的右派惊异得目瞪口呆。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番讲话。”^①

为了悄悄地采纳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曾解释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他毫不留情地责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是荒谬的，是对……极大的侮辱。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人政府对抱轻信态度。而这却会断送社会主义的。那我们就搞不到一起。大部分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背叛了社会主义。你们愿意建立新的政党。^②

当列宁全部掌握党的领导权时，一位布尔什维克目击者对当时人们由此而引起的震惊情景作了描绘：“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个人诧异不已，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他们曾期望，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归来，他会劝戒俄国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采取不可调和态度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可是，看来莫洛托夫最先支持列宁。”^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在他的党内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如在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柯夫领导下的早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左派小集团和柯伦泰等刚从国外返回的几个流亡者。四月八日，也就是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后的一天，加米涅夫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列宁不是为党说话，他有关

^①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280页。

^②参阅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十七日）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452—458页。

^③雅·达·德拉勃金：《列宁的归来和布尔什维克组织三月代表会议》，见《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七年第四期，第157页。

民主革命很快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深信不移地说：“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一个由无产阶级的广大革命者组成的党存在，而且不愿变成一个由共产主义宣传者组成的集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地捍卫我们作为拥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①

就在同一天，彼得格勒市党委会讨论了列宁的提纲，以十三票对二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提纲。^②一个党员曾称列宁的政策为“乌托邦式的，……这也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的生活。”布哈林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本身的一部分组织只是把它（四月提纲）看作是对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③

尽管初期人们拒绝他的观点，但列宁不受其影响，坚持对临时政府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他同时利用他具有魅力的、几乎能起催眠作用的个性把党拉到了他的激进路线上。两个星期后，他在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参加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组织会议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反对派的核心仍旧存在。加米涅夫直截了当地反对列宁有关通过苏维埃来接管政权的纲领，并建议以苏维埃对临时政府实行“最警觉的监督”来取代列宁的主张。除九票弃权外，会议以二十票对六票的多数否决了加米涅夫提出的这种形式。^④

在这期间，执政还不到两个月的旧临时政府就解体了。反对它外交政策的群众示威游行（所谓的四月的日子）导致了首次的

①加米涅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真理报》。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一卷，第81页。

③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98页。

④《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城党的会议》记录，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记录，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9、53、242—243、258页。（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0—456页。——译注）

内阁危机，并给杜马领导人和苏维埃领导人的联合开了方便之门。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把“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作为冒险行动而加以拒绝之际，莫斯科党组织却发表了一项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支持工人赤卫队和主张由苏维埃接管政权的充满热情的宣言。^① 政治情绪越激进，布尔什维克中反对列宁的反对派就崩溃得越迅速。

在这种气氛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于四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三月份还担任领导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都没有被选进由五人组成的主席团。^② 列宁强调他反对临时政府和反对战争的观点，加米涅夫坚持他的反对立场，他为少数派辩护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掉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这种说法太早了。”他再次强调说：与“小资产阶级”集团合作是合乎人们的愿望的，但革命者必须“监督”有必要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③ 与列宁一道从瑞士归来的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反驳了加米涅夫的批评，并为列宁说话。^④ 斯大林善于看风使舵，他几乎是布尔什维克著名领导人中唯一的从来不敢反对列宁已明确表示的意愿的人。

在四月会议上，列宁已在各项实际问题上将所有的人拉到他一边，跟着他走。会议一致表示反对继续进行战争，仅有七个顽固的右派分子弃权。^⑤ 当代表会议决定，为“使全部国家政权胜利地转到苏维埃手中”，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时，一百三

^① 参阅普·恩·阿夫杰也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60—61页。

^②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第51页。

^③ 同上，第66—70页。

^④ 同上，第87—91页。

^⑤ 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6—437页。

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仅有三票反对，八票弃权。^① 四月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极右派来说就是选择道路的时刻，他们中的多数人马上投奔了孟什维克。

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派之所以在会议上坚决反对列宁，是因为他们在决议草案中发现了不断革命论的理论结论。李可夫当即谨慎地说道：“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准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他承认：“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② 决议承认：“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然而，社会主义者将会（他们希望）得到政权，会朝着社会主义目标采取监督措施和实行反官僚主义的改革；不过，这一胜利要取决于即将开始的国际革命。与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相信这一点；在总共一百一十八名表决者中，仅以二十四票的多数采纳了这个决议（反对票和弃权票共有四十七票）。^③

鉴于这种顽强的抵制，列宁并没有马上继续推行他的计划，这就避免了一次新的分裂，但列宁不得不因此而忍受右派在党的领导中获得几乎数量相等的代表。除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伊·帖·斯米尔加外，四月会议

^①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8—439页。

^②李可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93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53—454页。

还选了四名右派（加米涅夫、诺根、费·巴·米柳亭和格·弗多罗夫）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①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这种小心翼翼的暗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每当出现任何一次危急形势时都可以感觉到。党虽然已服从于列宁的领导，但右翼仅是踌躇地表示同意夺取政权。列宁一直在期待着更多的同盟者，他为此所作的尝试不是徒劳的。五月至七月，布尔什维克党吸收了一大批著名的左派孟什维克，首先是托洛茨基。这些比列宁的老追随者还要坚定的新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七月份，布尔什维克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群众性的革命示威游行已变成巷战。布尔什维克被控告具有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但实际上布尔什维克认为以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当时，以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抓住机会公布了一批文件，它以此为根据公开谴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在这次闻名的伪造事件中，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插了手。）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受到了谴责，它的领导人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了地下，一直隐藏到十月革命的前夜；加米涅夫曾遭逮捕，并被长期监禁；要求采取唐吉珂德式行为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同他们所同情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遭到同样的对待。②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第190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31页。——译注）

②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457—458页；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273—278页。最近人们从德国文献中公布的材料中看出，布尔什维克的确曾接受过德国的金钱，但他们肯定不像一九一七年控告书所说的那样，受德国的操纵。列宁是不愿从于任何人的。（参阅Z. A. B. 策曼主编，《德国和俄国革命》，一九五八年伦敦和纽约版；F. L. 卡斯滕的《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载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一九五九年一—二月，第44—48页。）

临时政府试图镇压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动都是无效的，布尔什维克仍能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举行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九〇七年以来第一次召开的这种级别的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大多数最高领导没有出席会议，代表会议只是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展开了绝大部分是毫无结果的争论。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实现了联合。这样，党就具备了它下个十年所保持的轮廓。

三、左派孟什维克的加入

在尼古拉二世垮台后的“蜜月”里，重新统一已成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话题。在某些地方组织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一些孟什维克建议，所有党团都应合并。在大多数问题上和孟什维克观点一致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衷心地拥护联合的建议。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表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中间派”的观点：“我们应当这样做，……，按照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①的路线实行联合是可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与孟什维克联合。查鲁茨基（他曾是彼得格勒党常务局中的领导之一，但很快结束了他的领导作用）控告说：“仅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才单纯地谋求联合……，仅仅在表面上赞成在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会议路线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这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对这一反对意见置若罔闻，他说：“事先就着手说明和解决意见分歧是无意义的。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②

^①这里是指欧洲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在瑞士举行的两次反对战争的会议。

^②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斯大林流派》，第256—268、274—275页。

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批准了与孟什维克进行联合的协商，不过，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翼实行联合的具体建议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不仅在左派内部，而且在公开感到忧虑的极右派布尔什维克之中，都有人反对这一建议。他们显然害怕因此将促进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和有损于整个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①有一个孟什维克向党团联合会议提出建议：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分裂为护国派分子和国际主义者两派的基础上，重新组合分类。^②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发表的这一看法正说中了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

当列宁回到俄国时，人们突然放弃了联合的思想。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结尾部分断然地说：“……与护国派联合。这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③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不同意列宁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并赞同孟什维克中持相同意见者提出的建议：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局，以筹备召开联合的党代会。这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产生了动摇，并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局。当时，只有两人例外，他们是公开倒向孟什维克的右派分子沃伊廷斯基和戈尔登贝尔格。^④

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全面联合的计划没有能继续进展下去，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的战争反对派却在准备搞联合。布尔什维克四月会议决定：“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但首先要它们同小资产阶级背

^①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1922》，第28—29页。

^②《一九一七年三月党的代表会议》，见《斯大林流派》，第263页。

^③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459页。

^④参阅阿夫杰也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第二卷，第10—11页。

叛社会主义的政策断决关系。”^①这样，联合运动开始活跃，但它基本上像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所发生的那样，所谓联合只不过是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行列而已。这里再次证明组织问题是分裂的因素。

区联派（即几乎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自二月革命以来就讨论过与布尔什维克联合的问题。当托洛茨基于五月四日回到俄国并在区联派这一集团中担任领导职务时，区联派想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对列宁来说已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合并的好处对这两个党来说也是明显的：托洛茨基和他在区联派中的战友并没有多少信徒，而且只有在列宁的群众组织中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他们也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可贵的鼓动能力和很高的革命威望。另外，列宁也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党团内的谨慎从事的右翼；与左派孟什维克的联合必然会加强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革命势力（情况正是如此）。

五月十日，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一起讨论了联合问题。托洛茨基告知说，他希望所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一致，行动划一。他并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条件，仅仅与战争反对派集团联合。列宁表面上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并无条件地邀请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答应让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在党组织和《真理报》编辑部里担任领导职务。^②然而，双方都存在反对意见。布尔什维克领导拒绝列宁原来任命托洛茨基为《真理报》编辑的提议。^③托洛茨基满意地确认，布尔什维克已“非布尔什维克化”了，但他冲着党的名称说到：“我不能自称是一个布尔什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48页。

^②参阅列宁在区联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文集》第四卷，第300—303页。

^③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257—258页，注释2。

维克，旧的党团关系是不切合实际需要的。”^①据说，列宁在这一点上就看出了托洛茨基极为傲慢的表现。^②

除了过去在组织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外，策略上的考虑对拖延联合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列宁还是区联派，他们都希望能在缓慢的行动过程中将所有的国际主义孟什维克，特别像马尔托夫和他的追随者，拉进布尔什维克阵营。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右派的卢那察尔斯基和区联派一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也希望马尔托夫加入这一政党，因为他很想看到马尔托夫作为一个右翼的领导人能发挥重要的影响。^③然而，这些愿望都未实现。尽管马尔托夫与布尔什维克在纲领上没有根本的意见分歧，但他顽固地拒绝转变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组织路线上来。

“七月事变”一结束，也就是当列宁隐居芬兰和托洛茨基蹲监狱时，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形式上接受了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过，也有一些布尔什维克一直对这一步骤表示不满。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光彩夺目的个性和他享有的很高的威望是不合那些曾帮助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平凡人物的心意的。同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长期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它无疑源出于季诺维也夫本能的偏见。自一九〇九年季诺维也夫就已成为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而现在却被一个新的杰出人物遮蔽了他的光辉。季诺维也夫对这种局势当然感到厌烦，这也许是他投奔左翼和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当然他自己常常提到的怯懦也是原

^①列宁关于托洛茨基讲话所作的笔记，见《列宁在区联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列宁文集》第四卷，第303页。

^②参阅安吉利卡·伊萨科夫·巴拉巴诺娃：《我作为一个反叛者的一生》，一九三八年伦敦版，第155—156页。

^③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258页；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革命的轮廓》，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69页；尤列涅夫的发言，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47—48页。

因之一。在第六次党代会已经完成了联合之后，仍然还有人反对联合，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集团越来越感到不安这一原因，这些集团不完全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①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于八月四日改组党报编辑部时，任命托洛茨基为编委的新提议却以十一票对十票遭到否决。直到九月份，当托洛茨基被释放出狱并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重要领导人时，中央委员会才推翻了它原来的决议，接受他同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为编委。^②

第六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新领导班子的不纯性，这个新领导班子加上同期涌进党的许多新成员给党带来了新的面貌，它不同于地下活动时期的面貌。^③四月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八名保住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诺根、米柳亭和斯米尔加。只有费多罗夫没有再次当选，而候补委员布勃诺夫却被提升为正式委员。上述人员除在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有些与列宁步调不一致外，他们在一九一七年之前都是列宁的忠实信徒。然而，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这个由老领导人组成的集团内部已存在明显的右的倾向，加米涅夫、斯大林、米柳亭和诺根坚决拥护以前的谨慎从事的路线。当斯大林后来转而拥护列宁的方针时，季诺维也夫却倾向于右派。列宁利用他的领导地位指派了许多新的军官。

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十二名委员都是新人。没有证据能说明，杨·安·别尔津、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也夫)和斯·格·邵武勉三

^①参阅加里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城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七次党代会文件选编，第42页。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一八年二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6页。

^③新领导班子的成员名单见《百科全书》第四十卷，第555页。

名委员不是列宁的忠实信徒。前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也同样是这种人，^①只不过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曾在一定程度上持过温和的态度；相反，战前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领袖李可夫却始终不移地站在右翼一边；索柯里尼柯夫以前是调和派，战争期间投奔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的《我们的言论报》集团；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是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曾受到列宁批评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党书记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是左派孟什维克《新生活》报刊（由高尔基任主编）中的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工作人员；^②其他三名新中央委员战前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柯伦泰（她是一九一五年从孟什维克过来的，不过她是列宁四月提纲的第一个支持者），乌里茨基（他是区联派）和托洛茨基（他也是区联派，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党的新领导班子根本不是由那些守纪律的毫无主见的人所组成的。

一九一七年夏，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集团的不断充实，从人事方面为革命后爆发出来的派别斗争打下了基础。列宁为了给党灌输革命思想而把过去的一批倾向分子团结在自己身边，这个集团体现了政治思想上的左的理想主义，并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左的反对派运动，从而使党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期间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只要看一下后来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几个领袖们在革命前的政治生涯，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对列宁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正像他的敌人不厌其烦地强调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与区联派一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是一个无党派的独立者。他的忠实信徒拉柯夫斯基和越飞一直与他保

^①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二卷，第187页；第三卷，第206页。

^②参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648页，注释125。

保持着联系，并同样于一九一七年成了布尔什维克。柯伦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是工人反对派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拉林（从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是党的领导中能说会道的批评家）一九一七年才作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投入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九二三年站到托洛茨基一边）也是孟什维克，并曾是《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成员。拉狄克（在随后的时期内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国际领袖）曾作为极端的国际主义者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从事活动，战争期间才站到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布哈林（直到一九二一年还是个左派人物，后来是反斯大林的右翼反对派的领袖，而且据他自己的供认，过去曾“偏爱经验批判主义”。皮达可夫（战争期间是左派布尔什维克，后来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追随者之一）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大约在一九一〇年才成为布尔什维克。恩·奥新斯基（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是民主集中派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曾是一个区联派分子。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同样是民主集中派的骨干分子）曾与布哈林和奥新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合作过。①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后来从事反对活动是与大革命*前偏离列宁路线的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这一推论是以对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统计材料为依据的。很清楚，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反对派，一方面是与他们以前背离行径有联系，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在西欧度过的流

①参阅“布哈林”、“皮达柯夫”和“奥新斯基”条目，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附件。

*大革命指“十月革命”。——译注

亡生活有关。①三十五名左翼反对派分子中有十六名（占百分之四十六）在大革命前就是倾向分子，三十四名非反对派分子中仅有八名（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大革命前是倾向分子。

如果从文化水平的高低和流亡生活的时间长短来考虑，那差别就更大些。三十一名有文化知识的流亡者中有二十三名（占百分之七十四）是倾向分子；在非倾向分子中没有一个是左翼反对派分子；成为左翼反对派的那些人全部都是过去的倾向分子。反之，在三十名没有知识的地下工作者中仅有两名曾是倾向分子（这两个人后来也都成了反对派）；不过，非倾向分子中也有十二人成了左翼反对派。

在地下工作者中，有知识的同没有知识的一样，都以很少成为倾向分子而闻名。这一事实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促使人们成为倾向分子的主要动力是流亡生活。相反，地下生活却促使人们克制自己不犯倾向错误或者根本不让人知道这种倾向错误。无疑这也是一种解释，它说明为什么许多没有犯过倾向错误的闻名的地下工作者与没有犯过倾向错误的闻名的流亡者相反，后来却成了左翼反对派。如果一个流亡分子倾向于非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潮，那他早就会在一系列争吵过程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三十八名反对派分子中有二十二名（占百分之五十八）是知识分子，在四十八名非反对派分子中有二十五名（占百分之五十二）是知

①提供分析的材料绝大部分来自《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中有关党的领导人的介绍，全部八十五名领导人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1、反对派：（1）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三年的左翼反对派，（2）从事其他反对活动的人，（3）直到一九二八年都未从事反对列宁或斯大林活动的人。
- 2、大革命前犯过倾向错误的人。
- 3、知识分子（读过大学或受过同等教育）。
- 4、流亡分子（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

识分子。这一分析说明，那种认为在反对派领导人中知识分子较多、在非反对派分子中无产者较多的常见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不过，一九二一年以后，反对派的追随者明显地集中在知识分子队伍里。

可以肯定地说，革命胜利后的左翼反对派是革命前就与列宁的顽固追随者相对立的政治思想流派的一部分。这一情况使斯大林分子在二十年代与反对派展开斗争时提出的那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这种说法认为：他们的对手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孟什维克的观点。当时，孟什维主义就意味着背叛，而反对派也感到有必要竭尽全力地驳斥这一控告。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他们同意列宁的组织学说（这仅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斯大林的势力），在争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思想混乱，进一步掩盖了作为整体的左翼反对派运动的实质。

然而，在一九一七年年中，强硬的组织路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特征，它只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思想特征。随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大改组，一批新的领导人和代言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再加上列宁本身采取了新的路线，这批新领导人和代言人的革命热情（也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和在俄国很快就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所抱有的乌托邦式的希望）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征。一九一七年产生的这种新思想使左派共产党人精神振奋长达十年之久。

四、革命的纲领

一九一七年的这种革命理想主义的最突出的代言人就是列宁本人。当他鼓励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际，他放弃了自己通常坚持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使

党取得胜利并由这一胜利给俄国的整个文明世界带来新秩序的设想。列宁本人一方面与各种不遵守纪律的激进分子交往，只要他们准备与他一道从事革命游戏；另一方面把那些在从事地下活动和流亡时期与他共事的、但比较谨小慎微的、毫无主见的合作者抛在一边。当一九一七年列宁逃往半独立的芬兰，撰写其纲领性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时，整个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这本书就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宣言（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把《国家与革命》看作是列宁政治哲学的根本体现（像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通常所做的那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书中提出的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大革命之后从未变成苏联领导的官方政策。一九一七年的列宁主义是从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它施行不到几年就被放弃了；贯穿在苏联政治发展中的准则是重新复活的一九〇二年的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宣布的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事件的启发下产生的。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著作中曾把巴黎公社当作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个雏形。受欧洲社会主义者左倾和半无政府主义观念影响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布哈林早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就给列宁指出了这一思考方向。^①“公社国家”（即“工农民主共和国”）在一九一七年已被写进布尔什维克纲领。^②现成的国家机器应当摧毁。列宁强调指出，革命的国家形式的特征是：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和警察；由享有充分罢免权的人民来直接选举政治代表；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简言之，人民要尽可能广泛地参

^①关于列宁的“公社国家”学说的背景，参阅达尼尔斯，《国家与革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载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版的《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杂志，第25—33页。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修改党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54页。

与政治活动；①所有归咎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为镇压服务的等级制形式应当废除。列宁解释说：“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②

列宁想用以改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废除）俄国政治制度的这些机构就是苏维埃*。一九〇五年以后，列宁曾把这种自发产生的人民委员会看作是革命政权的基础，而现在他把它们夸耀为“一个无比高级的、无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③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断言说：“既然这种苏维埃存在着，既然它们多少是一种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④很自然，由此就完全可以提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但是，职能应当归政党这一思想并不明确。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政党只有一次作为革命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而提及。⑤但是，在同一年、在这本书撰写之前，列宁在许多文章中只分配给党一种角色：它应当是当时领导革命的孟什维克领袖和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的鼓励者和批评者。列宁在四月曾暗示：按照这种方式，“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不得不在一定

①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405—408页；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405—439页。

②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13页。

*即多数的意思。——译注

③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60页。

④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0页。

⑤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91—392页。

条件下去夺取政权”。^①当时所谈到的还不是少数人的专政。相反，列宁强调：“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现时既没有对群众施加暴力的事实，也就没有别的方法可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②这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民主语言的技能，但是列宁并未预料到，当他明确建议夺取政权时，他的一些追随者竟会以这一论断来反对他。

布尔什维克从国外因素中找到的为其夺取政权的努力进行论证的理由要比在国内因素中找到的理由多得多。从不断革命的思想出发，布尔什维克左翼（现在处在列宁的影响下）从欧洲以及从俄国看到了一场大革命的可能性（这两者自然是互为条件的）。欧洲革命的时机已成熟，而俄国又似乎能摇动大树。对左翼布尔什维克来说，担当这个角色，是他们的道义上的责任。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说道：“为了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一个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给其他国家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以各种（直至武装的）支持。在这方面这项任务将提上俄国的日程，如果，而且很有可能，俄国革命的新的必然的高涨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以前就掌握政权。”^③

对左翼来说，国际帝国主义就是最大的敌人，又因为临时政府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所以谈论在这种政府领导下保卫已取得的革命成果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托洛茨基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他就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他说：“只有根

^①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31页。

^②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1页。

^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目前形势和战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81—482页。

据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斗争的发展制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政党，才能跟上历史运动的步伐。”^①根据这一观点，俄国革命的唯一重要职能就是：它必须尽可能强有力地促进世界革命的开始，并孤注一掷地谋求欧洲工人的支持。

对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来说，战争状态就是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环境。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的激励下，无产者似乎要在各地同时结束战争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者坚持战争，并拒绝一个革命的俄国政府的和平建议，那么，列宁说：“……我们就自己进行革命战争，号召全世界工人同我们结成联盟。”^②布哈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声称：“我们将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我们将通过这种革命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③

尽管有这种宣扬国际主义的鼓动宣传，仍有迹象表明对立的观点也拥有它的追随者。斯大林在他的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对继续战争还是结束战争作了二者必居其一的分析，但他根本没有进一步讨论“革命战争”的可能性。由布哈林提出的关于革命战争的一项决议在讨论中作了修改，一条现实的理由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将有力量进行一场革命战争。”^④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教条观点的代表（他是左派中青云直上的理论家，赞成布哈林原先提出的

^①托洛茨基，《和平纲领》，见《托洛茨基全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73页。

^②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提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关于战争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136页。

^③布哈林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第101页。

^④同上，第192、193页。

那个决议)。后来，当斯大林宣读他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决议草案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打断他的发言，建议加上“在西方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一句话。当时，斯大林的回答就已流露出他后来提出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我反对做这样的修改。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我国工人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修正案被否决了。

尽管在一九一七年几乎对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是自明之理，但也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布尔什维克中的左派不仅坚决否认俄国革命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且也坚决否认欧洲革命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条件都还不成熟。但是，列宁的领导集团在新成员和老倾向分子的国际主义思想支持下，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并贯彻执行了一条大胆革命的方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声称：“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②

革命的国际义务似乎要求布尔什维克开始攻击俄国国内的帝国主义代表，而且这种可能性好像也已经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列宁在一封急于要求党夺取政权的信中引用了关于德国舰队叛乱的报道并补充说道：“如果在这种时候，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只是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的起义号召，我们

^①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大林的发言，见《第六次党代会文件》，第192、233—234页。（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74页。）

^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07页。

就是‘国际’的真正的叛徒。”^①在十月革命的最坚决的拥护者的眼里，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实例的威力，通过争取和平的号召和着手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发出国际起义的信号。

五、起义问题

在实际存在的世界里（避开形而上学的编造外），历史是由决定行动的人们来写的。至于他们是否能实现其目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九一七年秋，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行动还是不行动，是将革命的骚动转变为军事政变还是听其自然发展。这个决定是在列宁无情催促下作出的，但就像布尔什维克在它掌权的头几年采取任何一项重要步骤那样，这个决定是在无休止的自我检验和激烈的党团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列宁企图填平的党内裂缝又重新出现了，而布尔什维主义谨慎派几乎将无法挽回地要脱离党。

当临时政府想在由布尔什维克指挥的街头骚乱过后取缔政党时，列宁在七月事变之后就作出了首次明确的表示，他要坚决地为夺取政权和实现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而努力奋斗。他断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已经不正确了。^②对他来说，革命的未来现在不再产生于苏维埃；他不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和平地在同其他社会党合作下促使苏维埃去行动。只有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才能继续推动革命，他说：“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③

^①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写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63页。

^②列宁，《论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73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15—216页。

但在这一时刻，列宁建议要谨慎从事，认真准备。这种克制态度遭到了性急者的激烈反对。弗·沃洛达尔斯基（莫马·戈尔德施坦，一个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区联派分子）促使彼得格勒市组织拥护很少采取忍耐态度的路线。^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坚决表示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这些革命阶级的任务将是竭尽全力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然后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布尔什维克极端分子高兴的是，他们能与苏维埃决裂并能直接转向群众。莫洛托夫在三月间表露出来的激进主义是有充分理由的。莫洛托夫宣称：“只有用暴力才能夺取政权”，而且他着重把这称之为“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无产阶级和最穷苦农民的专政”。^③

不清楚的是，期望中的革命发展将对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党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不断地预料，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将团结在一个政党之内，因此，人们从未考虑如何处理两个或更多的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权称为革命者，他说：“我与斯大林同志在这一点上是不一致的，我们是否应当建立从社会革命党人直至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随着政权过渡到苏维埃手中，政权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归属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走妥协道路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被排挤出苏维埃，因为他们在群众的眼里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用。”^④

①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15—216页。

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政治形势》，《苏俄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485页。

③莫洛托夫在第六次党代会上的报告，《第六次党代会文件》，第132—133页。

④索柯里尼柯夫在第六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21页。

八月底，克伦斯基的参谋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临时政府。为了对付右派的这一威胁，政府不得不接受左派所给予的任何支持，以严厉的方式把布尔什维克排斥于社会之外的行动也停止了。九月四日，七月事变之后被捕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被释放了。与此同时，追随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比较左的流派的人急剧增多。在这危机和革命兴起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简单明了的纲领——“面包、土地与和平”，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在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败露之后，无限制地撤换和重新选举苏维埃成员的活动导致了首都的工人和卫戍部队的情绪发生转变，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一项决议首次获得了多数赞成票。^①

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化，它促使列宁立即重新提出过去他曾有过的想法，即希望在苏维埃中出现革命的多党领导。他说：“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这种妥协。”“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我们不怕什么，因为实际生活对我们有利……”^②

然而，列宁的调和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能持久。在他发表《论妥协》这篇文章之前，他加上了一个附言，其中说这种思想“已

^①参阅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五年纽约版，第一卷，第277页。

^②参阅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0—302页。

经晚了”，^①而且他又开始警告布尔什维克当心不要对和平发展抱有幻想。^②他产生合作的幻想是那么突然，丢掉它也是那么快；当然，他现在又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了。^③原因是，苏维埃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或者正要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在莫斯科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于九月五日获得了胜利，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九月九日又选出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主席团。^④

在取得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列宁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他在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在芬兰避难所里写给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⑤中声称，布尔什维克把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和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应当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夺取政权，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⑥

但列宁的党还不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立即响应他关于拿起武器的号召，当他在九月十五日发出立即行动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参加所谓的民主会议，那是一个由执政党召集的协商会议。执政党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在立宪会议选举前召集它

^①参阅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4页。

^②参阅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06—311页。

^③参阅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57—364页。

^④参阅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77—278页。

^⑤即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10页。

^⑥参阅列宁：《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3页。

们的力量。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批准政府向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人民代表机构，即所谓的共和国苏维埃，它应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之前召开。但是在此之后，布尔什维克是否应当支持临时政府通过代表制制定的计划呢？或者应当抵制它并以苏维埃的名义准备革命行动呢？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列宁提出的进行起义的建议远远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两大派（谨慎派和勇敢派）目前准备实施的范围。季诺维也夫为此写了一篇关于《不应当做些什么》的文章（斯大林于八月三十日把这篇文章发表了），文章说：巴黎公社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个试图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人。^①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应遵循客观的革命运动潮流，还没有人教过它把“起义艺术”视为获得政治上成功的关键。加米涅夫向中央委员会建议，应完全拒绝列宁关于党应领导夺权斗争的要求。对于领导者的这种公开的挑战，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是毫无准备的，但鉴于党在外省的力量薄弱，起义的建议遭到普遍的反对，这反映在—项提议中。这项提议说：根本不能接受列宁的建议，他的信也应销毁。于此，有人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把这两封信的抄本存入党的档案。右翼谨慎派的实力表现在中央委员对这种无关紧要的建议所作出的不同的反应方面：除了六票弃权外，仅以六票对四票通过决定，把信的文本保存起来。列宁根本没有得到答复。^②

这样，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回避了列宁的第一个关于起义的要求之后，又开始在彼得格勒澄清他们对民主会议和共和国苏维埃（或叫预备议会，这也是习惯称呼）的不同看法。民主会议从九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22页。

^②《俄共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64—65页；布哈林一九二一年在纪念晚会上的讲话，载于一九二二年《无产者报》第十期，第319页。

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会议，并要就建立预备议会作出决定（它事实上将于十月七日集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和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向中央委员会请示，询问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托洛茨基表示赞成抵制预备议会；中央委员会以九票对八票的多数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后来又将这个问题推委给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作最后决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中左派集团的名义向党团作了报告，这是他们两人少有的一次合作。但是，为右派说话的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却表示反对抵制。最后，用党团表决结束了讨论，代表们以七十七票对五十票拒绝了抵制。托洛茨基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外省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为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比绝大多数首都代表的估计要保守得多。^①

在这期间，列宁强行提出了激进的策略：应当抵制民主会议，应当抵制预备议会。当他获悉关于参加预备议会的决定时，他把这一决定评价为党无能的明显标志。他公然藐视自己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学说而写道：“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他只赞扬了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捍卫了革命的方针：“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抵制万岁！”^②

接着，列宁就开始以书信展开了激战，以便使他的同志们相信，夺取政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对他的迫切要求所作出的微妙反应使他怒不可遏：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70—71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27页。据另一个材料称，党团表决的结果是以七十二票对五十票通过。见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83页。

^②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40—41页。

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

列宁恳求俄国的革命者想想他们的国际义务：犹豫就是“彻底背叛德国工人。我们还是不要等待他们革命的开始吧”！^①

除了吹冲锋号外，还加上威胁。列宁说，他将退出中央委员会并直接向党提出他的主张（这与他自己提出的组织原则是相违背的）：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

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②

列宁的威胁产生了效果。由于列宁的催促和鼓动，中央委员会中较坚定的集团获得了优势。十月三日，莫斯科组织中激进分子的代表格·伊·洛莫夫竭力说服中央委员会立即起义。中央委员会仍不准备向大胆行动的主张让步，并作出了一项决定，其中要求列宁秘密地来彼得格勒，以便对夺取政权问题共同作出最后的决定。^③然后它又讨论了预备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对这个困

^①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65页。

^②同上，第67—68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7页。

体*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讲了话并要求它在预备议会的第一天就离开会场。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表示反对这样做，按他们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团应等待能为退出预备议会辩护的适当时机。这次表决的结果有利于托洛茨基。^①加米涅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中徒劳地抗议关于退出议会的决定，他请求解除他在公众面前代表党的所有职务。^②

当预备议会于十月七日开幕时，布尔什维克真正提出了挑战。托洛茨基站起来发表了一项声明，它实际上是给政府的一份宣战书：“我们与这个欺骗人民的政府和这个反动的听其自然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当我们离开临时苏维埃的时候，我们号召整个俄国的工农兵要提高警惕和鼓起勇气。彼得格勒已处在危险之中！革命已处在危险之中！人民已处在危险之中！……我们转向人民，所有政权归苏维埃！”^③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会场，并着手准备起义工作。

这时，事件接连不断发生，甚至列宁也不能跟上党前进的步伐。列宁在十月三日至七日期间还写道：“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④但是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已经着手

*指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译注

①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537、538页。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0—91页。

③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的民主会议大会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声明。见《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23页；（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九六一年法兰克福版，第558—559页。）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539—540页。

④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三一—七日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22、123页。

准备起义的工作。十月九日，由布尔什维克统治着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初，决定剥夺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军事控制权，这个司令部内部的一个社团举行了起义。^①

十月十日，事情已成定局。列宁经过化装来到了彼得格勒，这是七月事变以来他第一次亲自处理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激烈地表示赞成起义，并提出一项决议：“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项决议以十票对二票通过，反对者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②

这两个人像列宁以前一样，不愿服从他们认为是不明智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十月十一日，他们开始行动。他们向布尔什维克较大的组织寄出了信件，在信中申述了关于反对起义尝试的理由：

“我们深信，目前号召武装起义不仅是拿我们党的生命而且

^①参阅钱伯林，《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一卷，第299、300页。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9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45页。

这次秘密会议是在左派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处举行的(当时苏汉诺夫被他的布尔什维克妻子说服后在他的办公室附近过的夜)。(见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第556页。)二十一个中央委员有十一个在彼得格勒并参加了表决，表示同意的有九名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柯伦泰、布勃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加上候补委员洛莫夫。(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1页。)假如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话(其中缺席的有右派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那么反对起义的力量很可能较强大。(见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第59页。)

是拿俄国和国际革命的生命开玩笑。

毫无疑问存在这种历史状况：被压迫的阶级必须认识到，**避**着失败干比不战而降强。难道俄国工人阶级目前就处于这种状况吗？**不是，完全不是！**”

他们认为：和平政策将来会获得群众的支持，党一定能够在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过程中取得立宪会议中的统治地位。建立在起义和革命战争基础上的方针只会导致军事上的灾难：

“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由于战争的口号，而是由于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

如果工人党得到政权的话，那无疑是对威廉的一次打击。……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在里加等地发生事件之后），难道这种打击能足以击退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干涉吗？”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抱有这种希望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也不同意这种看法：“据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已经站在我们一边，可惜并不是这种情况。”但他们保证，如果时间到了，他们不怕行动：

“欧洲革命的发展使我们有义务毫不犹豫地立刻将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这是俄国无产阶级起义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它会有有的，但现在还没有。”^①

为了消除这种固执的怀疑，为了作好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列宁于十月十六日再一次来到彼得格勒，他在那里与中央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出来的党的领导人小组碰了头。这次发生的争吵要比以前任何一次更为激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主张谨慎从事和等待立宪会议选举，加米涅夫同时还援引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

^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关于目前的形势》，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2—108页。

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的观点。他说：“问题不在于要么现在，要么就永不。我相信俄国革命是比较强大的。……这里有两种对立的策略，即搞密谋叛乱的策略和相信俄国革命是推动力量的策略。”^①

十月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辩论以表决列宁关于继续准备起义的提案而告终。表决结果证实：这时，反对派的力量已比十月十日减弱——除四票弃权外，提案以十九票对二票获得通过（这两个反对者还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列宁的一些中央委员仍准备同时赞成相反的提案。当季诺维也夫提出在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以及在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进行磋商之前起义准备工作暂停的反提案时，他获得了六张赞成票、十五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加米涅夫仿效列宁九月二十八日的做法，以抗议的形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②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创建了一个所谓的军事总部，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联络组。被任命为新的总部成员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③总部从未作为单独的集团进行活动，但有关建立这一小组的决议后来却成为官方党史传奇式地把斯大林说成是起义的领导者的根据（见第十章）。

列宁回到他的避难地以后写了一封很长的批驳反对派的信，他放弃了他以前的保留态度并指出一切怀疑党是否能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思想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他说：“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现在和将来会不会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就是可耻的动

^①加米涅夫的声明：《关于目前的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8页。

^②同上，第124—125页。

^③同上，第124页。

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像他始终所强调的那样，一切犹豫不决都是不能得到宽容的：“有人在讲到群众情绪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推到群众身上，他们采取的是无可救药的立场。”^①列宁公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书信（他没有提及姓名）于十月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日连续发表在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上的这种做法。在十月二十日的一期上，该报也发表了季诺维也夫进行反驳的内容，他声明说，他的看法绝不像列宁所断言的那样悲观。该报在发表这项声明的同时还意外地附上了编辑斯大林的一个调和性的注解：“我们……希望这件事随着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说明而就此了结，……列宁同志的文章尽管语气尖锐，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观点在原则上是一致的。”^②

在这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十月十一日发表的声明已传到党外各界人士手中。十月十七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是前右派布尔什维克）巴扎罗夫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报道说：“城内散发了手抄的传单，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传单中表示反对发动。”^③加米涅夫以季诺维也夫和他本人的名义在《新生活报》上以简单的评语形式作了答复，他重申了他们的观点：起义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他们否认布尔什维克已经确定起义的日期，并企图掩盖这个事实：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不顾他们的抗议已经作出了起义的决定。^④

^①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十七日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78、192页。

^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37页。

^③转引自列宁给同志们的信的后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94页。

^④参阅尤·加米涅夫：《论“起义”》，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36—137页。

当然没有人受骗上当或者高枕无忧。对列宁来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这一公开声明是他们所犯的罪行中的最可恶的罪行。因此，列宁马上十分愤怒地指责：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二十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过的决议！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要尽力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①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谴责了这两个反对派分子，并很有远见地写道：由于开除他们，会产生一些顾虑，“工贼愈‘有名气’，就愈有必要立刻用开除来惩罚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批毫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健全工人的政党，团结革命者的队伍，同革命工人一起迎接艰巨的、万分艰巨的困难。”②

十月二十日，能及时赶到的中央委员（没有列宁和加米涅夫）举行了集会，以便讨论违反纪律的问题。③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列宁有关要求惩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托洛茨基在他忠实的朋友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他同样是当时的区联派分子，而现在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支持下最猛烈地攻击了这两个人，不过，他只满足于同意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没有像列宁那样，要求将被控告者开除出党。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斯大林、米柳亭和乌里茨基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想掩饰这件事并建议到中央委员会能举行全体会议时再讨论这件事。斯大林说道：“开除出党，这不是良药——我们要维护统一。”他想同主张开除的观点保持距离。这时，托洛茨基

①参阅列宁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97页。

②列宁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06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7—129页。

把愤怒发泄到斯大林的身上，指责他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脱。斯大林的同事、《工人之路》报的编辑索柯里尼柯夫也批评编辑部保护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这时请求辞去他的编辑职务——这是他后来多次采用的策略，并且获得了间接的信任效果：不同意他辞职。关于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问题的表决使党的领导阶层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结果也完全符合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意见分歧——五票赞成，三票反对。

会议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投入了夺权工作。列宁再三强调他的观点：成败取决于掌握起义艺术的程度，军事行动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他说：“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①托洛茨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制定了行动计划，党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这时，加米涅夫又胆怯地回来了，以便参加起义和主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第二天，武装的工人和穿着士兵制服的参加起义的农民把十月革命写入了史册。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他们很快取得胜利这一事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六、是联合还是专政

十月革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布尔什维克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并以苏维埃名义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着这一新政府。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期望外国发生事变，也就是期望西方能开始一场卓有成效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也就能很快地证明右派产生悲观主义的另一个理由也是站不住

^①列宁：《局外人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61页。

脚的。

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起义的紧急关头暂时联合起来的右翼之间又出现了裂痕，争论的问题是：苏维埃中的其他政党将会如何行事。就苏维埃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集团来说，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左翼曾全面支持十月革命，并促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对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支持。尽管如此，在苏维埃中、在一些工会和右派布尔什维克中，仍然有许多人赞成组织一个包括所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为此，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的党谈判了好几天，但他们对一党执政的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克只是指责其他的苏维埃政党，没有全力以赴地推动革命。大约在起义前的一个星期，列宁指出，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抛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立场，那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妥协的建议，但是过去他们曾拒绝了妥协建议。^①当十月二十五日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批准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时，就在布尔什维克中，这种看法也是广为流行的：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的代表都应是新政府的成员。马尔托夫提议代表会议应该立即讨论建立这样的政府的问题，这一提议受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支持，并被代表们一致通过。^②

就在这几天里，最积极主张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的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它很受人们的重视，因为它能在危急时刻使运输瘫痪。十月二十九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不在场）宣布它准备按照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意愿讨论联合执政问题。^③加米涅夫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言

^①参阅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1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72—174页。——译注）

^②参阅苏汉诺夫：《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第636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4—146页。

人，并劝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二是布尔什维克，其余的主要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准许举行这样的会议。会议真的举行了，当时的孟什维克梁赞诺夫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其最杰出的成员是加米涅夫）参加了会议。十月三十日，同样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在战场上回击克伦斯基徒劳的反攻）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同意所有社会党在已经成为新政府立法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各有一名代表。^①布尔什维克右派再次起了作用。但是，这时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又提出了几个条件：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驱逐出新内阁和不承认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这样一来，联合思想的胜利就成了问题。

在这期间，列宁把参加立法机构问题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人民委员会有权通过法令来实行暂时的统治。^②在托洛茨基驱散了克伦斯基的军队以后，为了抨击联合思想，他立即会见了列宁。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上，他们与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抨击了联合思想。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关于联合谈判的报告遭到了冷遇。托洛茨基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不享有多数，那起义就失去了意义。他和捷尔任斯基谴责了谈判代表，因为他们考虑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驱逐出政府的要求。卢那察尔斯基以布尔什维克多数是个优先条件为理由而为谈判辩护。列宁认为谈判只不过是拖延行动，这种拖延行动会使政府赢得时间而巩固它的威信；李可夫十分惊奇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认真考虑。列宁最后建议停止谈判，但以四票对十票而遭受失败。中央委员会以九票对四票（除

^①阿·伊·柳比莫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时事纪实》，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柳比莫夫全集》第六卷，第22页。

^②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147页。

一票弃权外)接受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

“允许我党党员现在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以便最终地揭露这种尝试没有根据,彻底停止建立联合政权的进一步谈判。”^①

这当然还不能使人满足,所以列宁出席了彼得格勒市党委会代表会议,并对布尔什维克右派抗拒他的行动提出了挑战,他说:“就和解来说,我不能再多说了……,如果你们要分裂,就开始吧。如果你们享有多数,那就接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并将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但我们要到水兵中去。”这显然是一种威胁,以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列宁宣布说:“我们目前的口号是:不和解,这就是说赞成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卢那察尔斯基因抗议在莫斯科战斗中轰击克里姆林宫而提出辞去他作为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时,列宁(无成效地)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并再一次控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背叛行径。^②

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下一级的领导班子中也有许多人赞成联合,列宁在彼得格勒遭到了拒绝,李可夫和诺根领导下的莫斯科市委组织公开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以左的倾向而著称的莫斯科区域局都决定同意联合,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内阁多数席位的话。^③十一月二日,联合问题接近了临界点。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坚持:列宁和托洛茨基无论如何应是内阁成员,布尔什维克至少应获得一半部长席位。整个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8—155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16页。

^②参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党委会代表会议记录》,托洛茨基,《论斯大林流派》,第107、110—112页。

^③参阅W·马克萨科夫,《十月代表会议前的莫斯科区域局》,见《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二年第十期,第476页。

布尔什维克右派拒绝这个起码的条件并投票反对党，这些人 是：加米涅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人民委员会几乎有一半的委员（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诺根、米柳亭、索奥多罗维奇）和其他一些人，其中有洛佐夫斯基和前孟什维克梁赞诺夫和尤烈涅夫。①列宁出于义愤，竭力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反对派谴责为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混乱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荒谬绝顶的以及不民主的，因为他们要求多数派要对少数派的威胁让步。列宁一方面否认他考虑过联合，而另一方面他又号召“所有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无条件地服从他。②

然后，列宁提出了最后通牒：反对派应当遵守党的纪律，停止在联合问题上对多数派的路线进行批评，要不他们就应离开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投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③他在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为这份最后通牒征集签名，他找到了九个签名者：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越飞、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穆拉诺夫。五个拒绝签名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④就像在起义问题上那样，分裂状况又出现了。

反对派没有重视这些威胁，十一月四日危机终于爆发了。为钳制非社会主义的舆论，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对报刊实行控制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代表由于担心这种独裁统治方法不

①参阅多伊奇尔：《军事预言家》，第333页。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16—518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2—164页。

④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512页，注释66，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40页。

利于那些没有直接号召造反的报刊，从而反对强制措施。拉林（当时的孟什维克、左派纲领的主要拥护者）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它以二十二票对三十一票（几票弃权）而遭否决。一个列宁分子提出了一项明显赞同对党的报刊实行控制的提案，它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只有最右的布尔什维克，像洛佐夫斯基和梁赞诺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反对。^①

报刊问题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大批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发表了原则声明，并辞退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五个批评列宁的人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五个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他们联合声明：“我们不能承担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危险政策的责任，它是违反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意志的，……。因此，我们放弃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以便我们有权向广大工人和士兵公开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号召他们赞成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政党的联合政府万岁！立刻在这种条件下达成协议！”^②

出于抗议一党统治，三名中央委员（他们也是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也辞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他们是：李可夫（内务人民委员）、米柳亭（农业人民委员）和诺根（工商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粮食人民委员）和许多低于内阁级别的委员，其中像梁赞诺夫、拉林，也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也加入了这一集团，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观点是，有必要组织一个由所有在苏维埃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我们说，否则只有一条路：以政治恐怖手段来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们认为，这……将会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建立以及导致革

^①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新生活报》的报道。

^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7页。

命和国家的毁灭。我们不能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要当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面放弃我们作为人民委员的头衔。”^①

洛佐夫斯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发表了一项与众不同的、而且还带有激昂情绪的声明：“我不能由于考虑到党的纪律而沉默，因为我不能看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地违背理智和违反自然威力而不考虑客观情况，客观情况命令我们在面临崩溃危险时应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他拒绝把列宁参加政府作为条件：“我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它会使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物是否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②

列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宣言，并对右派作了回答。在这个回答中，他对这些人的攻击达到新的顶点：“于是有几个以前负重责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凶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逃跑的同志像逃兵一样。”列宁保证说，这种背信弃义将不会使党改变自己的方针，正如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工贼行为”，但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了党，在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列宁断言说，他仍旧准备参加一个承认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多数的联合政府。他甚至批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在十月二十五日拒绝了布尔什维克请他们参加新政府的邀请。^③当时，反对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和巩固的组织，所以很快就崩溃了。

十一月七日，反对派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季诺维也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9页。

^②洛佐夫斯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工人报》上发表的声明，转引自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76页。

^③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84—287页。

夫认识到，历史并没有按他的期望发展，他低声下气地改口说：

“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时，我们有责任重新与我们的老同志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时期。提醒党当心犯错误，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义务。我们还留在党内，我们宁愿与千百万工人和士兵一道犯错误，与他们共同奋斗，而不愿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袖手旁观。我们中间可以存在意见分歧，……但在事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并采取像左派布尔什维克所采取过的态度：他们在参加预备议会问题上处于少数，他们必须在这些事务中依从多数派的路线。

“在我们党内将不会，也不允许出现分裂。”^①

季诺维也夫担心一个稳定而又民主的政府不能实现，但他更惧怕人们会把他驱逐出革命信仰者这个集体。为了获得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这种担忧“像一条红线似地”始终贯穿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反对派的整个历史之中。

季诺维也夫很快又重新作为中央委员行使其权利。其他反对一党政府的人，大多出于原则性的动机，直到十一月底还在进行反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抗议已越来越不起作用，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在联合政府问题上达成了最后协议。

在一九一七年的右翼反对派崩溃之前，还必须克服一个困难问题，这就是实行公开的一党专政的最后一个障碍——立宪会议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接管政权以前坚决支持会议的召开，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行办法，所以他们让选举按原计划于十一月份举行。选举结果犹如当头一棒——他们仅得到大约四分之一的赞成票，而社会革命党人却获得了压倒的多数。这时，

^①季诺维也夫给同志们的信，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7页。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再次出现了谨慎从事和遵守法律的主张，反对大胆和强硬的行动。

布尔什维克右派（其中有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加入了他们的集团）希望有一个半合法的解决办法。左派分子乌里茨基（他与托洛茨基一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指责说：“目前，一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胜利完成革命任务的组织。”^①形势越来越清楚，只有通过某种暴力解决办法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政府，布哈林建议开除立宪民主党人，然后由会议左翼继续任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派控制了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团。十二月二日，布尔什维克代表选出了一个常务局，它的重要成员是：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诺根、米柳亭、拉林和梁赞诺夫。中央委员会以各种理由宣布说，常务局已被右派所统治，从而有必要立即解散它。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领导。直到代表团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列宁在这个提纲中试图号召工人们用暴力来解散立宪会议），争论才告结束。^②

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最后一次反抗是通过顽固的右派分子洛佐夫斯基和梁赞诺夫表示出来的。他们顽固地坚持民主法治原则，并投票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③因为这两个人是工会领导干部，所以他们能够在第一届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这个会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份举行）继续批评政府。会议争论的问题是工会是否应独立于政府的问题——这也是随后几年

^① 乌里茨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彼得格勒市党委会上的报告，转引自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第78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81、184—185页。

^③ 参阅詹姆斯·布尼安和费舍：《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一九三四年斯坦福版，第384页。

中不断出现摩擦的问题。反对中央集权制的人在第一次较量中就失败了，会议决定：“工会将是国家政权的工具。”^①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并直到一九一九年底（受尽了凌辱）才重新回到党内。^②他作为反对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并顺利地度过了三十年代中期的大清洗，然而于一九五二年却成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犹太人运动的牺牲品。^③

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反对派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有在政治上谨慎从事的以及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一些人。他们与孟什维克具有同样的特性。它更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有组织的集团。因此，它在危机的时刻虽然从未获得成功，但另一方面它也很难由于失败而消失。列宁想在这个或那个有关问题上击溃右派，但潜伏在这一派人身上的心理特性一再迸发出来。

除了在一月份脱党的布尔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外，人们可以把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布尔什维克右派中的主要集团是由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以及后来的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集团，这些人都是拥护强硬的组织原则的老列宁主义者，但明显地具有保守主义和谨慎从事的特点。对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参加政权机关，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这一点也适用于像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在列宁返回俄国后都坚定不移地跟随他们的领袖。

第二个集团是由以前的孟什维克所组成，他们，特别是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都倾向于右翼。在他们的论

^①《第一届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决议》，见詹姆斯·布尼安和费舍：《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一九三四年斯坦顿版，第384页。

^②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第226页，注释35。

^③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五十一卷，第180页。

据中，更多的是考虑法律和民主原则。他们除了孤立地进行抗议外，在党内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一九一七年的反对派中，最后一个集团是站在党的右翼一边的、当时很小的（施略普尼柯夫是它的杰出的代言人）、但后来无疑已扩大成为一股强大的爆炸性的力量。这就是那些极其认真对待党纲声明中彻底的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厌弃专政手段不是出于小心谨慎而是出于革命的原则。

第三章 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约的争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三个月，具有传奇般的统一和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因争吵而又开始分裂了。一九一七年满腔热情支持列宁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强烈反对其领袖的阵线。直接的原因是与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但新的分歧要深刻得多，它涉及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及俄国和世界工人革命的一般前景问题。

像一九一七年的左翼反对派一样，一九一八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样不是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列宁的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中，反对派坚持的路线都是列宁本人奉行过的一种方针。改变方向的是列宁自己，并且更换了一批合作者及其思想，一九一七年春和一九一八年初的合作者及其思想正好是相对立的。可以说，列宁为了与左派共同进行革命，离开了他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主义方向，抛弃了一九一七年曾与他结成同盟，但现在坚持清教徒思想情绪的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一九一七年还是在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展开的争论中，只有很少几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站在列宁一边。在一九一七年是右派激烈反对，在和约问题上左派反对。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只有一小批信徒能掌握住方向，沿着曲折的路线前进，他们是索柯里尼柯夫（他以前和后来都不能称之为正统派），斯米尔加（中央委员，在他一九二六年加入

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前，从未出过名），斯维尔德洛夫（党的书记，于一九一九年死于伤寒病），另外一个组织工作者（他在这方面享有特别的声誉）就是斯大林。当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得病时，斯大林是政治局中唯一从未公开反对过领袖的人，这为他成为列宁的政治继承人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一、革命战争与和约

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是无可置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第一次发表的对外政策声明完全符合他们在军事政变之前宣布的纲领：“民主和平”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讲演中，托洛茨基就胜利的先决条件问题着重强调了看法：“如果欧洲人民不奋起反抗和击溃帝国主义，我们将会被击溃——这是没有疑问的。不是俄国革命引起西方斗争的风暴，就是所有国家的资本家扼杀我们的斗争。”^①

明显得到证实的是，托洛茨基按革命的观念发表的意见要比列宁的多得多。^②十月二十六日有关和平的法令带有比较温和的腔调：它号召各现存的政府开始和平谈判，并直接以革命来进行威胁。^③然而刺激性的言论也不少，十月政变后仅过一个星期，莫斯科区域党委会委员英·尼·斯土柯夫就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要求进行一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

^①《托洛茨基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86、87页。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4—33页。

^③参阅《关于和平的法令》，见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真理报》。

战争”。^①托洛茨基本人也公开宣称，尽管谈判已经开始，“真正民主的”和平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②

当与德国谈判开始时，人们就认为这不是为了和平所采取的步骤，而是向各“帝国主义”政府发起革命挑战所摆出的姿态。十一月十四日，苏维埃政府向德国军事最高当局进行试探，并明确表示准备讨论停火问题。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停战协定于十二月二日生效。停战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国战线的后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俄国人利用这一谈判作为革命的手段，托洛茨基有意践踏备忘录的惯例，企图使敌人处于窘境和唤起欧洲对革命的同情。大约在十二月底，许多布尔什维克开始对苏联谈判者的拖延策略失去忍耐。十二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区域党委会要求政府停止谈判并向德国宣战。^③党员中出现的骚乱促使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准备在一月八日与党的地方代表进行讨论。

在这一时刻，列宁施展了一项绝招：他决定放弃革命战争的计划，并与中等国家联合。这是一次方针性的转变，至于它的突然性和果断性，只有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承认杜马，一九一七年提出四月提纲和一九二一年作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才能与此相比。列宁于一月七日在他《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中突然提出反对革命战争思想的理由十分充足的论证。列宁断言说：对苏维埃政府来说，革命战争既不是道德上所必要的也不是实际中所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曾经公开答应过进行革命战争，而且已许诺着手进行这种战争的“准备”（当然已经不只一次地履行这种许诺）；但有了和平，苏维埃新政府就可赢

^①参阅雅罗斯拉夫斯基：《俄国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六章，第20页。

^②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给欧洲劳动人民、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信，《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二分册，第208页。

^③参阅弗·哥·索凌：《党和反对派》，第一章“左派共产主义者党团”，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15页。

得时间，以防止它由于缺乏革命的支持而肯定会面临的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为了德国革命是不是在最近几个星期的短时间内开始这一点，就把在俄国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的策略。我们没有权利进行这样的冒险。”^①这就使人想起了一段类似的话：“欧洲革命……将要爆发，但是现在还未爆发。……我们没有权利把整个未来作孤注一掷，……。”然而，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此对十月暴动提出怀疑时，却被指责是工贼行为。

在谨慎原则和衡量政治成果的标准方面，列宁与那些曾在一九一七年反对过他的年轻人有着相同的看法。列宁在从这些思想上转向他一边的人中挑选领导人时，着重注意的就是掺杂着实用主义的，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勇敢精神。一旦领袖指出了道路——或者说，一旦党接受了领导人提出的方针，那么谨慎派布尔什维克就要忠心耿耿地、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因此，尽管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所说的话听起来与他迄今仍不顺从的助手所说的话如此相似，但人们仍然不惜任何代价毫不动摇地拥护新的和平政策，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列宁关于缔结和约的决定在理想主义布尔什维克中引起了愤怒的反抗，这种情况就像四月提纲激怒了谨慎派布尔什维克一样。这次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对也是沸腾的感情和坚持教义的产物。在这两次事件中，列宁的行动都是与他的追随者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原则相违背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违背了民主专政的思想，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违背了不断革命的原则。

在一月八日举行的有一些党的干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①列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421页。

上，列宁的和平建议第一次正式提交讨论。^①接着，党内立刻产生了分裂，而且情况表明，列宁的新观点是多么的虚弱。列宁从大约六十名出席者中仅获得十五张赞成票，支持他有关接受德国和平条件的建议。反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列宁的新观点、坚持拥护迄今为止的路线的人）立刻找到了布哈林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在二月革命之前是站在列宁一边的、最重要的、坚定不移地相信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批评家。但是现在，他对要求放弃进行革命战争义务的这种思想大为震惊。

在一月八日举行的会议上，布哈林公开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并得到了赞同的三十二票（大约一半），支持他坚持的理想主义。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者保持中立；他们同意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妥协公式：“不战不和。”但是，托洛茨基直到争论结束时还坚持的既要适合革命原则又要适合政治上自我保存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笨拙的企图。导致托洛茨基计划失败的一个暗礁是德国军队的出现，这种形势要求人们对敌人的威胁至少应给予一次有效的回答。当时的情况同后来的一样，围绕在托洛茨基周围的、试图使理想和现实的必要性相协调的、不太走极端的左派，被谴责为是一批无能为力的动摇分子。

一月十一日，中央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会议试图就和平问题作出一项带有约束性的决议。在这次较小范围的会议上，要求发表革命战争宣言的主张失败了，只有克列斯廷斯基和洛莫夫对此主张表示赞成。列宁的一些追随者极力要求保卫崭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并呼吁把这作为民族主义赞歌来大肆宣扬。

季诺维也夫（像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样）和斯大林（像一九一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0页。

七年八月那样) 强调指出, 等待西方的革命支持是不可靠的, 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纲领已居优先地位。^① 斯大林以他通常鄙视外国人的态度说道: “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 …… , 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② 列宁迟迟不再表态, 但他还是招致(乌里茨基的) 谴责, 说他是“从俄国的观点而不是从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虑问题的。^③ 这时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 算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 它显然吸引了许多革命纯粹主义者, 他们认为, 不管人们如何说, “不和” 就是战。表决结果, 九票赞成外交人民委员的妥协方式, 七票反对它, 这七票除了来自和平拥护者外还可能来自一些极端分子。^④

为了证实自己当时的观点正确, 争论中的各派立刻在地方党组织中寻求支持。像整个一九一七年那样, 莫斯科地区仍是左派的堡垒。^⑤ 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完全控制了党的莫斯科区域局, 实际上也把它当作他们这一派的中央委员会。左派总是对传统的民族利益考虑不够, 并把和平谈判看作是与他们期待革命运动很快蔓延到西欧的思想不相容的; 他们要求德国人进行游击抵抗, 并同时积极的宣传, 以便唤起西方的革命。莫斯科地区组织会议于一月十三日决定: “民主和平…… 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反对两个交战集团的革命斗争才能得到, …… 接受德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的条件是一次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行动; 这就是说, 在内外政策中背离了国际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 并有可能导致最糟糕的机会主义。” 因为左派担心在妥协的情况下俄

^①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第204—206页。

^② 斯大林: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讲话》,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 第26页。

^③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第203页。

^④ 同上, 第207页。

^⑤ 参阅沙波罗: 《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起源》, 第132页。

国革命会从内部遭受失败，所以他们轻率地作出决定说：在最坏的情况下，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就必须牺牲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受革命英雄主义的幻想所支配的莫斯科左派，把苏维埃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与巴黎公社的形势作了比较，并宣称：“我们一致反对放弃我们迄今的要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①列宁把这种观点比作旧的波兰小贵族的唐吉珂德式的骄傲自大：“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握利刃，摆出美妙的姿态，说道：‘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②

然而，军事形势真的像列宁分子始终所描绘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吗？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德国根本不是万能的，它在同一年由于协约国插手遭到了失败。而在俄国也绝不缺少明确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的人：除了布尔什维克外，全国的所有政党都是无条件地反对和平的，对苏维埃政府来说，和平必然将比继续战争给它带来更强烈的内部震动（事实上后来的发展确是如此）。后来曾有人分析说：列宁之所以催促缔结和约主要是因为担心，在重新开战后布尔什维克不能不接纳许多同盟者，国家政权就可能因此而从他们手中失掉。^③

因为列宁的主张没有获得通过，所以苏维埃政府在一月份后半个月仍继续执行了托洛茨基的妥协政策。维持现状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尝试。拒绝与敌人达成协议，符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极左观点。但是，为了试图使德国人安静下来，公开发表革命战争宣言一事被推迟了。就此，俄国人的有关宣传明显减少，而德国的暴力强行作出了决断。德军统帅部决定结束谈判滑稽戏，并于二

^①索凌，《党和反对派》，第17页。

^②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93页。

^③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起源》，第105页。

月十七日^①将他重新开始进军的企图告诉了苏维埃政府。在讨论这一消息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完全令人难以想像的形式分裂了。^②首先，会议以八票对三票否决了无限制地进行革命战争这一主张。出席会议的列宁分子与左翼温和派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布哈林。但拥护无条件地缔结可耻的和约的人同样处于少数，因为托洛茨基集团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与极左派一道投了反对票。首先应该通过进攻使德国人在各国人民面前出丑，然后再请求和平，这是左派提出的一项建议，但它以微弱多数被否决了。最后，会议接受了这样一个提案：假如德国不发生革命，就缔结和约。托洛茨基与列宁派分子投了赞成票，而大多数左派分子则弃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德国无产阶级可能会背信弃义地置他们于不顾。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十八日，情况表明：德国人真的要进攻了，而且抵抗是不顶用的。他们可能占领彼得格勒这一看法在城内引起了一片惊慌。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安全比国际革命的暗淡理想显得越来越重要。当中央委员会就和平问题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勉强取得多数，他们是：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飞。投赞成票的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斯米

^①新历。俄国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开始采用新历，二月一日成了二月十四日。到目前为止，本书前面所说的日期都是旧历日期，以下则使用新历日期。

^②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26—229页，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05页，注释114，第607—609页，注释119，第122—124页。

在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期间举行的表决的基础上，人们可将在座的中央委员分成以下几种类别（从右向左）：列宁和他的核心部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倾向于列宁派的索柯里尼柯夫，中派（温和派左翼）托洛茨基，倾向于中派的左派克列斯廷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倾向于极端派的左派乌里茨基和越飞，极左派布哈林、洛莫夫和布勃诺夫。（右派分子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没有重新占据席位，他们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由于报刊和联合问题而放弃这一席位的。）

尔加、索柯里尼柯夫。但是，在白天结束之前，托洛茨基在形势压力下屈服了，并改变了他的表决意见；这样，天平的另一边就沉下去了，求和条件书也寄出了。^①

人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德国的答复。建立防线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到处都传遍了号召作拼死抵抗的口号。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典型的声明说到：“我们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革命成果。”^②列宁也写了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号召书，即《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之中！》。^③当敌方的条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到达时，这些条件要比预料的苛刻得多，其中包括割据大片领土的要求，而且俄国必须马上满足这些要求。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又开始分裂了。左派是否反对缔结和约，这仅取决于托洛茨基一个人。在他的领导下似乎可以动员起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力量比较强大的党团，并能达到一个在政治上获胜所必需的统一和团结。左派向他呼吁，要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④托洛茨基拒绝采取行动，同时也谢绝了能使他撰写自己历史的角色——这种放弃行动的表现显然是他意志上的一个致命缺点，这在以后的五年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当然，使他畏缩不前的是他对党内可能出现公开分裂的担心。他在向中央委员会、也是针对列宁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们是能够承担起组织防卫的任务的。……我们能够赢得和平，但我们将失去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使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38页。

② 人民委员会《告全俄劳动人民群众书》声明，见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报》（早晨版）。

③ 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之中！》，见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真理报》（早晨版）。

④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387页；一九六一年法兰克福版，第357页。

无产阶级分化瓦解。”^①

为了实现他的意愿，列宁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有效的策略：他以辞职相威胁。某些左派分子已准备让列宁离去，但捷尔任斯基感到遗憾的是，党还没有强大到能没有列宁的领导的地步。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反抗，他说：“随着党的分裂，我们将不可能领导一场革命的战争，……我不认为（列宁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我无论如何不愿党的统一被毁掉。”他对列宁的表示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同意，相反，他要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他说：“我不能再呆下去对外交政策承担个人责任。”^②

当中央委员会最终就接受德国条件问题进行表决时，列宁还仍旧处于少数——他本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斯塔索娃。四名委员——布哈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洛莫夫——表示反对和约。但托洛茨基集团——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和托洛茨基本人——则弃权，从而使列宁的观点能够成为党的法令。^③就这样，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首脑度过了他生涯中的第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机。

二、处于党分裂的边缘

在顽固的左派看来，接受德国的和约条件同样意味着背叛革命。布哈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三个追随者（皮达可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中央候补委员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柯夫列娃）立刻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们在采取这种抗议行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一项具有挑衅性的声明，他们要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8页。

^② 参阅同上，第249—251页。

^③ 参阅同上，第252页。

“为自己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党内外宣传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观点”。^①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三个追随者也加入了布哈林集团，同时他们表示要把和约问题公布于全体党员；但考虑到党内会出现分裂的前景，他们（像托洛茨基一样）不得不马上表示和解。^②

中央委员会中左派的坚强不屈的声明很快在党的莫斯科区域局极端派分子中引起了反响。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斯土柯夫作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报告之后，这个集团一致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成员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还违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公开反对党的合法领导的权威，他们说：“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在该决议的说明中，莫斯科左派还让人明白，如果革命的纯洁性得不到保持，他们对党的分裂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因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②

在这期间，列宁想劝说左派领导人不要真的辞职。在他的倡议下，中央委员会“以全党履行义务的名义和以保证我们本身队

^①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53页。

^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38页。

伍中的统一的名义”^① 号召偏离者坚守岗位，并指示全党直到即将举行的党代会召开为止要尊重和平决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即保证反对派有权在全体委员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同意为对付德国人最后反对和约的情况作好革命战争的准备。^② 除了布哈林，左派当时已经安静下来了。^③ 布哈林撰写的发自内心愤懑的评论说道：“我们要把党变成臭粪堆。”^④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达成协议之前的许多天里，即在三月二日之前，苏维埃政府不知道德国会对和约条件作出何种反应。^⑤ 这期间，为保卫彼得格勒而开始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政府的行政机关已开始向莫斯科迁移。《真理报》一天两次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并提醒人民要全力以赴地为一场新的战争进行武装准备。直到和平条约签订的那天，左的口号的洪峰才算过去，新闻界几乎不知道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吵。左派的决不妥协的态度在日益增强，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于二月二十八日激烈地拒绝了条约条件：

“这项和约宣布：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全部土地归地主，全部矿山和工厂归资本家……，

这项和约宣布：衰败和死亡属于苏维埃政权，衰败和死亡属于无产阶级和它的社会主义红军。

这项和约要求革命的俄国奴颜婢膝地沉默——它要求扼杀整个工农十月革命……。

①索茨：《党和反对派》，第20页。

②《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09页，注释124。（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39页。——译注）

③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起源》，第107—108页。

④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9页。

⑤列宁：《俄国告别了战争》，一九五六年普林斯顿版，第370、371、491页。

工人阶级必须竭尽全力地、无比热情地、凭着对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极其高度的觉悟大声呼唤：不！死亡或者胜利！

拿起武器！

各国工人联合起来！”

尽管这种革命激情在燃烧，但在暗淡的军事形势和列宁对各级党组织施加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组织成员站到了主张缔结和约的一边。事实上，条约在三月三日就签署了，但它还需要得到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批准。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列宁主义者在莫斯科市组织中获得了多数。^①在同一时间，彼得格勒的左派分子又进一步离开了党的统一标准：他们创办了一个派别机关报，即在布哈林、拉狄克和乌里茨基编辑人员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报》（日报）。* 列宁在回答“我们可怜的‘左派’”^②的论战文章中对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继续存在仅抱有很小的希望。

夺取政权后第一次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会议时间较短（三月六——八日），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主要议题是批准通过和平条约，而且几乎整个讨论时间都花在了这个问题上。列宁和布哈林代表两种对立的观点作了主要发言，每人都得到了许多各自的追随者以声明形式所给予的支持。这对党来说是一次感情危机，也是一个转折点。

列宁代表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纲领性的论据：只有缔和，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苏维埃政府必须赢得时间，直接继续战争的任何尝试都意味着摧毁革命政府。如果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革命战争

^①参阅《真理报》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载文报道。

* 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6页。——译注

^②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6—451页。

迟早成为不可避免的，列宁甚至完全准备让位。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索柯里尼柯夫的支持，但那是在条约签字后整整过了四天之后。他们两个人都强调有必要赢得准备斗争的时间。^①列宁在这三天里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提尔西特式和约”。但像在拿破仑奴役下的普鲁士一样，如果时机来到，俄国也能获得力量和意志重新奋起反抗，并赶走侵入者。列宁于党代会召开的前夜在一篇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文中曾这样写道：“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②

尽管这些言论具有民族主义的口气，但列宁丝毫没有暗示，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就可以牺牲国际革命。他拒绝承认在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他断言说，保存苏维埃国家就是人们能为欧洲无产阶级作出的最好的贡献。而俄国革命的未来也必然取决于西方：“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③但他又重复说，他并不寄希望于德国立刻爆发革命，并驳斥了俄国的榜样能引起德国革命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④只要德国革命尚未成熟，俄国必须赢得喘息时机。就此，他默不作声地攫取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曾持有过的观点。至少具有坚定性美德的季诺维也夫也只好热情地支持列宁拒绝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的立场，他说：“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所有的牌都压在这种可能的机会上。”^⑤

当围绕着和约问题发生的争论接近高潮时，列宁降低了一点

^①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6—77页。

^②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5页。

^③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62页。

^④参阅列宁：《奇谈与怪论》，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1页。

^⑤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他的要求。他在党代会上作的长篇报告基本上是一种恳求，恳求能有一个“喘息时机”，哪怕它是短暂的也好。但他对反对派分子的义愤还在日益增强。他谴责他们已经散布了幻想——德国人不可能进攻，他们已经提出了强硬的和平条件——并实际上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① 为了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路线，列宁找到了尖锐的词句：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是对事件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分估计”。^② 列宁解释说道：左派“说苏维埃政权似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没有出路，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才会写出这种怪诞的决议”。^③

列宁不愿或者说不可能很高地评价左派的国际主义动机，正是在这一动机之下，他们忽视了苏维埃国家的直接安全。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列宁已经放弃了使他直到十月革命还精神振奋的国际性内战的观点，并反对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他本人过去曾主张过这种观点。^④ 列宁现在关心的就是现有的政权，他决心为牢固掌握政权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政权价值观的怀疑。

像布哈林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反驳报告中所证实的那样，左派共产党人奋起反对，其力量来源于乌托邦主义的热情和无限的革命乐观主义。布哈林认为，革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可

^①参阅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8—449页。

^②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61页。

^③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2页。

^④参阅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第60—63页。

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并把全世界人民群众团结在单纯的反帝旗帜之下；或者，它可能走上妥协的狭窄的小道，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变质。缔结和约可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结束，他说：“随着回到有必要签订和约的立场上同时也会回到有必要坚持立宪会议和统一战线的立场上。”^①

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支持布哈林；他进一步指出，和约条件不仅会给内政措施而且也会给国有化带来危险。对托洛茨基来说，妥协同样意味着退却，但实际上革命者却不得不退却，然后他们应当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②支持布哈林的革命纯粹主义的还有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拉狄克、梁赞诺夫、奥新斯基和柯伦泰。布哈林深信，如果执行左派的政策，就可以从内部拯救革命：“最高领导迟早会采用我们的路线，……只有接受这一路线，我们才能拯救苏维埃政权和保持这一政权的社会主义内容。”^③至于是苏维埃俄国先诞生还是世界革命首先到来这个问题，左派十分明确地回答说：俄国的苏埃维政权只不过是向国际革命迈出的一步而已；人们不应害怕俄国的失败。乌里茨基说：“失败要比这个无耻的和约更能促进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④托洛茨基将苏维埃国家与巴黎公社作了比较，他认为苏维埃国家将失败，但他怀着一个希望：俄国革命，不同于一八七一年的起义，它的英勇的表现不会是徒劳的；“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不会形成像巴黎公社以后那种历史性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⑤左派只是从国际范围来理解失败或胜利的意义。布哈林说：“我们已经说过，而

①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乌里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还要说，整个事业最终将取决于国际革命是否能取得胜利。”

同样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布哈林曾这样提出论据：在这期间，俄国暂时停火要比继续进行战争更为严重地损害心理上的抵抗能力；“战斗组织会在战斗中自发地成长起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方针也会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口号下自然地形成”。^①托洛茨基断言，签订和平条约就意味着挥霍所有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长期谈判中取得的宣传成果。^②按照左派的观点来说，签订和约获得的利益很少，而付出的代价却很高。

列宁的劝说技巧在一般干部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构成了多数。在具有决定性的表决中，二十八票赞成批准条约，九票反对。^③当托洛茨基徒劳地试图促使会议发表一项革命声明，以及季诺维也夫提议否决托洛茨基的谈判报告时，相互间的指斥又一次激烈了。^④最后，只是由于害怕党发生分裂，左派共产主义者才没有采取极端的反对和约的行动。在列宁迫切要求接受德国的条件而使党内出现分裂危险时，左派踌躇了。在这一危机中，布哈林放弃了他的激情，他说：“反对列宁？这似乎是反对我们整个的过去，反对我们的纪律，反对战斗中的同志……难道我有足够的超众的才能将成为党的领袖，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宣战？不，不……我不能这样做！”^⑤类似的胆怯节制了托洛茨基的行动，他在会上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我不能对

①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39页。

④同上，第140—157页。

⑤转引自沃利尼(W·M·艾肯鲍姆)：《一九一七年：背叛了的俄国革命》，一九五四年伦敦版，第98页。

党将来出现分裂承担责任。”“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①这种被认为是讲道德的行为应该说在反对派随后的整个历史上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党代会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议程时，列宁利用机会作出了和解的姿态并同时摆出了权威人士的架势：尽管一些左派分子抗议性地辞去了在中央担任的职务，但他们仍然当选了。布哈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乌里茨基和洛莫夫为中央候补委员。^②最后党代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形式上拒绝了“左派共产党人”的辞职要求，并表示“坚信”：有不同看法的同志会以统一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来。^③由于列宁的威信和形势的压力，这一目标终于达到了，但这是在各派别之间对重要的内政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才实现的。

三、工人监督与国家资本主义

在和平条约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的直接原因，但裂痕还有其更深的根源。在批准和约之后，当左派共产党人转向内政舞台并反对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已经选择的方针时，这种意见分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在左派的眼里，内外政策上的妥协对革命来说是致命的；为了保护革命，他们自动承担起保护革命精神的角色。出生于波兰—德国的、无比出众的国际革命者拉狄克（他在十月革命前不久

^①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89—194页。

^③参阅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关于“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23页。

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警告人们当心严重的危险：“如果为了喘息时机的利益，俄国革命政府就退却……如果它在外国资本的要求面前就退缩，那它不仅会被迫停止有意识的工作，同样会不得不再次葬送已经获得的成果。”阻止这种倒退，是他给左派共产主义者指出的任务。“给无产阶级指出这种危险……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此外，在情况对俄国不利时，革命内部发生崩溃的风险可能比军事失败的风险更大。“如果俄国革命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用暴力镇压下去的话，那么它仍会像不死鸟一样再次兴起；如果它真的丧失了社会主义性质并因而使劳动群众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这种打击对俄国和国际革命来说会产生十分可怕的后果。”①

革命社会中的权威和纪律这一普遍问题，特别是有关工业组织问题，是左派共产党人和列宁主义者之间新的意见分歧的焦点。在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工业管理问题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涉及到新的社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和具体形象；另一方面它又是共产党党内各派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最大根源。这一斗争被上升到如此高度，各派都认为对方的解决办法将使革命遭受极大的危险。

有关工业管理的争论起源于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纲领提出，新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由工人阶级自发和民主管理的社会。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列宁本人曾是这种梦想的积极鼓吹者；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很快抛弃了这种幻想。然而，对左派党的领导人和许多政治上觉醒了的工人来说，

①拉狄克：《五个月之后》，《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3—4页。

在《国家与革命》中写下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就是信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都不应对这些原则产生动摇。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著作中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摧毁所有按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权力，以及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群众监督——“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①列宁曾相信，群众在这方面产生的热情会克服一切障碍；同时，他也不切实际地低估了管理工作的困难，他认为工业监督的任务能简化为“简单的统计”。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曾宣称：“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他还补充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②这段补充的话，就连一个货真价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可以同意的。

在信仰这一点的同时，列宁并没有丢掉他的现实思想。他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写道：“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③在同一时间，他又解释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④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领导人的传统权威、劳动纪律和按照技能高低和责任大小所给予的报酬看来是必要的、合理的。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66页。

②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69页。

③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13页。

④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63页。

中长期而又艰苦的思想斗争的题材。

在革命动乱（它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的时代，实践远远超出了混乱的工业理论。在实行工人监督方面起到协助作用的组织就是工厂和企业委员会或一九一七年三月出现的工厂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市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提出了它们的权力要求：“涉及到企业内部制度的所有规定，像每天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工资、职工的招收或解雇、休假等，都必须由工厂委员会作出。”^①在激进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工厂委员会很快被布尔什维克所占据，这是不足为奇的。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对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这一监督将通过“所有享有执行权的机构中的大多数工人”来保证实现。^②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只要工厂委员会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并得到地方苏维埃的支持，它们就逐个地驱赶经理并直接掌握了企业的领导权。在所有的企业中，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关系中，到处是一片混乱状态。^③本来就已在下降的生产水平明显遭到了损害。

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时，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承认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又远远超出了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思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这科学说已经上升为法律：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由列宁起草的）法令，它批准了在

^①M·L·梅勒和A·M·潘克拉托娃，《一九一七年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74、75页。

^②扎哥尔斯基，《俄国战争时期国家对工业的监督》，一九二八年纽黑文版，第174—175页。

^③参阅莫里斯·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90页；安·彼·西多罗夫，《十月经济纲领》，见一九二九年“无产者报”第六期，第46页。

整个经济中实行工人监督的做法。①一些工人的代言人认为经济权力和责任应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里，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在于此。一个工会干部曾写道：“工人阶级按照它的性质不仅在生产中而且首先在它的组织中都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来，一切生产都将是无产阶级精神和意志的反映。”②

新苏维埃政府对工会的这种要求持赞许态度，因为这种工会与那些已不受其控制的工厂委员会相比，体现了一种比较安分守己和无政府主义成分较少的力量。俄国历史上的首届工会代表会议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举行，它的大多数代表是布尔什维克，会议以压倒多数作出决定：在工业管理中，工会必须扮演主要角色。

“工会组织作为按照工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在组织生产和恢复国家被降低了的生产力过程中必须承担主要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调整生产的机构，组织工人监督工作……这些就是它的日常任务……工会组织（必须）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③只有布尔什维克极右派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他们俩是孟什维克的不坚定的倒戈者）想答应工会的无理的权力要求。④他们与孟什维克意见一致，认为对工会来说，维护独立性和全力保护工人，是较为重要的。

一九一八年初，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个问题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界线仍旧是在和平条约问题上出现的分界线，不过，经济问题一时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左派赞成事实上由工厂委员会实行的工业国

①参阅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67—368页。

②米·夫·菲力波夫：《论生产组织》，一九一八年一月《冶金工人信使报》，第40—43页。

③施略普尼柯夫：《俄国工会》，一九二〇年柔比锡版，第20—21页。

④参阅《卡尔全集》第十一卷，第105—106页。

有化，并主张建立一个最高国民经济机构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个机构将以工人监督机关为基础，并由其代表所组成。^①反之，列宁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资本主义的管理结构，并日益认为工人监督是一种暂时的、在实行直接的国家监督之前对私人企业实行监督的机构。^②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人民委员会按照左派的设想，并似乎考虑到工厂委员会在进行领导的实际情况，创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批准建立相应的地方委员会）。^③委员会起初为左派所控制，第一任主席是奥新斯基，办公室的领导成员有：布哈林、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④尽管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并未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它所体现的坚持教义的精神终于诱使列宁重述了他在一九一七年曾最后一次表达过的无政府主义言论。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地方经济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宣称：“旧国家的机关，必定灭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机关必定增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⑤

在管理政策上发生的这一转变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那时也正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领导人不是辞职就是受到了排挤，而温和派分子米

^①参阅奥新斯基：《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首届代表会议谈判》，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61—64页。

^②参阅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24—527页。

^③参阅西多罗夫：《十月经济纲领》，一九二九年《无产者报》第六期，第45—46页。

^④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二卷，第75—86页。

^⑤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68页。

柳亭和李可夫以及计划狂热者拉林接替了他们的职位。^①与此同时，人们立即采取了措施，加强企业领导人的权威，重新强调劳动纪律，以及在工会组织的监督下，在报酬方面运用物质刺激。^②特别是在一项法令中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交通人民委员部获得了“独裁的权力”，结束了铁路线上的工人监督，再次建立了有工作能力的行政机关。^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左派的名义表示反对这种措施，并预见性地警告说：“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党必将很快作出决定，把铁路和其他个别经济部门中实行的这种专政延伸到俄国共产党自己身上。”^④尽管如此，列宁主义者还在继续加强纪律，另外他们还主张继续雇用旧管理人员和技术员（“资产阶级专家”或称旧专家），并给他们以报酬。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概括了一项新的政策，这一报告经过加工于四月底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标题发表了。他在报告中说：最急迫的需要是建立有秩序的管理，不仅对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对国有化企业都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向私有制的进攻有些过分了；更重要的是实行最严格的监督和提高生产率；应当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即使由于付给他们高工资而违反了平等准则，但人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列宁断言说：没有他们，“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这“是离开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向后退了一步”。工人必须遵守纪律，科学管理企业的泰罗制应当采用；工业无政府状态只是在从旧的“奴隶”纪律向新的“自觉”纪律过渡时出现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

①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二卷，第85—87页。

②同上，第109—115页。

③同上，第394—396页。

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撰文，一九一八年五月第4期。

专政的实现要求“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不可动摇的权威是工业取得成就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样是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①

列宁的新工业政策导致左派共产主义者再次以革命纯粹主义的保卫者自居。四月初，左派领导人被邀请与中央委员会一起进行座谈讨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论断，以强硬的措词攻击了党领导的政策：“在多数共产党人中出现一种偏离倾向，这种倾向将他们引入新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航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种倾向得以贯彻，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停止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者和强有力的支柱……。在拒绝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下，工农革命的成果就会开始凝结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制度。”^②

为了使他们反对列宁对内政策的斗争获得更多人的共鸣，左派在由他们控制的莫斯科区域局的庇护下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即《共产党人》，四月、五月共发行四期，主要发行者和合作者是布哈林、奥新斯基、拉狄克和弗·米·斯米尔诺夫。

奥新斯基向列宁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最详尽的最激烈的批评。他强调应相信无产阶级，并反对劳动纪律、领导人的权威和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使用旧专家，因为这一切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危险倾向，他说：

“我们不赞成‘在托拉斯组织者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主张通过工人本身的阶级创造力而不是通过‘工业巨头’

^①参阅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01、502、519、521等页。

^②《目前形势的提纲》，载于《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7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263页，注释92。

的诏书救命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我们出于相信阶级本能和无产阶级的积极的阶级首创精神。如果无产阶级本身不知道如何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们，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这件事，强迫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对工人的大棒举起了，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掌握在一种社会力量的手中，这种社会力量不是为其他社会阶级所左右，就是受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在其他阶级（例如农民阶级）中寻求支持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也就自行毁灭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建立，或者，建立起的是别的东西，即国家资本主义。”^①

列宁把所有反对他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纲领的人都视为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者。当左派批评他的工人政策时，他说，“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怎样堕入了陷阱，中了……资本主义的其他奸细们的挑拨诡计。”^②不顾列宁的辱骂，左派共产主义者与联合起来的其他力量一道继续试图使党回到原来的社会政策方针上去。一九一八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地方经济委员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违反了原先的意图，变成了共产主义者最高领导人显示其经济政策分歧的主要论坛。

列宁主持了代表会议的开幕，并要求针对经济上的巨大困难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接着，他再次强调整顿劳动纪律和利用旧专家的必要性，并向他的听众提出了任务：“……要把资本主义

^①奥新斯基：《论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二期，第5页。

^②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53页。

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①

继列宁的发言之后，拉狄克作了关于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报告。他叙述了这项和平条约给俄国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失，但作为既成事实，他容忍了这项和约，并不再像以前一样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求竭力增多社会主义措施，以便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俄国微弱的经济潜力和克服由战争与和约造成的困难。^②拉狄克摆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预示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已经妥协了，这种妥协统治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整个时期——既讲权威和纪律又实行完全的国有化、中央控制和计划管理。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其他代表（特别是奥新斯基）坚决要求工业民主化，即他们所说的革命所期望的工业民主化。这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来发生分裂的第一个征兆。这一分裂导致那些拒绝战时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化的革命纯粹主义者退出了这一派别，并组织了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集团。奥新斯基要求“从上到下……实行工人管理”，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府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③洛莫夫为工人监督辩护并警告说：“国有化和中央集权会扼杀我国的力量。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群众会被毁掉。”^④奥新斯基抗议旨在加强纪律和赋予“人民委员”以权威的倾向，并针对列宁的插话，声称每个女佣人都必须

^①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72页。

^②参阅拉狄克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14—19页。

^③参阅奥新斯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64—65页。

^④洛莫夫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会议文件》，第75页。

学习管理国家。他建议工业企业应由这样一个集体来领导，它的三分之二成员必须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①代表大会将这一比例减少到三分之一，并按照复杂的管理等级制度建立了这样一批直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机构。^②就这样，人们小心翼翼地随后几个月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它不是按照一九一七年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而是按照集中化的形式进行的，它导致庞大的国家托拉斯的产生。

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是由列宁的实干精神和左的纲领组合而成的，但是这种组合随着这场出现于列宁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开始全面解体了。当时，左派开始攻击共产主义集中制的整个制度，并把它描绘成是一幅阴暗的景象：“官僚中央集权，形形色色的人民委员的统治，废除了地方苏维埃的独立性和实际上拒绝了自下而上地实行管理的‘国家公社’制。”^③奥新斯基警告说：“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将自行毁灭。”与其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样，他担心：如果党不能强有力地奉行一种理想的无产阶级政策，那么，革命可能会违背它本来的性质，俄国社会的未来可能会进入完全不同的航道。事实上，就苏联共产党后来的变化看，这种思想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尽管苏维埃国家形式上完全严格地保持了它原来的意识形态，但它实际上已几乎放弃了所有的革命理想。它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结构相距甚远。

当然，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够准确的。他们说那是一种具有严重官僚主义成分的、以“国家资本主

^①参阅奥新斯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65页。

^②参阅《关于国有化企业管理的规定》，见《会议文件》，第477—478页。

^③《目前形势的提纲》，《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

义”形式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重现，而没有能够进一步说明苏维埃政权具有独裁主义、官僚特权和强权政治等倾向。其错误就在于：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为了给这种前所未闻的具有威胁性的弊端取个名称，他们只好求助于他们熟悉的概念和想像。

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统一

一九一八年初解决党内争论的方式，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要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出现反对派，人们就坚持使用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是通过讨论、说服或让步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不断地“整顿”党的组织，并依靠党刊和党的领导人连珠炮似的责骂来解决争端。首先是列宁为论战定下调子，接着是他在各组织中的信徒要求全体党员接受这一观点。在这期间，列宁的个人威信起的作用最大；只有很少几个人敢于较长时间地反对他的个人权威。不过，也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即有些左派共产主义者感到，党内争吵会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整个未来。

早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批准之前，列宁派在地方组织的成员中所进行的鼓动已使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在和平条约签订的那天，列宁已在莫斯科市组织中获得了多数地位。当时，奥新斯基曾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指责说：

“目前和约的签订……就是俄国革命的自杀。”但这项决议草案遭到压倒多数的否决。大多数左派分子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但反对急于接受和约和维护党的统一。在决定缔和后，他们又没有能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多数派并作出决定，责成参加即将召开

的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莫斯科市代表，“捍卫党的统一和严厉批评过去出现的个别人分裂党的企图。”^①

党代会批准和约后不久，列宁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又获得多数的拥护。代表会议决定停办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报》，并像莫斯科组织一样宣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反对在目前困难的时刻分裂党的任何企图。代表会议要求《共产主义者报》的追随者们结束他们单独的组织活动，并建议这些同志在整个党组织中进行友好合作。”^②

至此，和约只剩下一个最后批准的问题，只要三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就可彻底解决和约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代表举行的预备会上，左派分子遭到惨败。表决结果是：四百五十三票赞成和约，三十六票反对，八票弃权。^③这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放弃了斗争，他们声明：“我们作为国际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义务迫使我们公开阐明我们的观点，但是……在这个时刻将可能损害革命的利益。”根据这一考虑，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弃了权。非布尔什维克的和约反对派（大多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下就被击败了，条约开始生效。

一九一八年春和初夏，列宁主义者不断地削弱左派组织的主要力量。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根据地就是乌拉尔地区由无产者占优势的党组织，它当时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④五月底，乌拉尔地区党组织和莫斯科区域局左派堡全都转入了追随

^①索凌，《党和反对派》，第21—22页。

^②同上，第22—23页。

^③参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红军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155页，注释65。

^④参阅《共产党人》，一九一八年五月第四期，第13、14页。

党领导的人的手中。①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和最后一期不再作为党组织的官方机关报，而只能作为派别组织私自创办的刊物发行。

在由列宁创造的党内生活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在布尔什维克纪律范围内持一种反对观点。反对派似乎不明白这一点，结果毁了自己。一旦革命已经开始，要想在旧的关系体系中偏离预期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抛弃旧的信念、纲领和组织；统一，即一个要革命的集团应当接受的先决条件，对那些企图把正在进行的革命引向另外一个方向的集团来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桎梏。左派共产主义者往往不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他们认为可怕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可以避免的，他们认为有义务支持现政府，他们说：“在出现了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党的左翼应站在积极的和负责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上，促使这些倾向得到克服。”②

当左派共产主义者被击败，并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被剥夺而感到十分义愤时，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担心党的统一遭到破坏的顾虑，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同样由于反对和平条约而退出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联盟伙伴）举行了会谈。会谈似乎是在三月底举行的，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某种方式免去列宁的职务；重新开始反对德国的战争。一九三八年，当布哈林在第三次大清洗运动中作为被告受到审讯时，人们夸大地提出了这一“密谋”。人们指控他已计划好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并用暴力来接管政府。布哈林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尽管其余的他都承认了。虽然人们对这一审讯的性质

①参阅索凌：《党和反对派》，第23、24页。

②《目前形势的提纲》，《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9页。

持怀疑态度，但他在证词中提出的不同意见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与此事件无关的某些内容似乎是可信的。

出自共产党方面的第一份有关这一“密谋”的材料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此文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它批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合作的思想。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到并否认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有关谣传，这一谣传说这两个集团曾计划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结成反列宁的联盟。^①这件事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党内发生争吵时再次被提及，领导集团想以此来破坏某些当时在反对派运动中起作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名声。人们说，他们不仅计划逮捕列宁，而且计划建立新的人民委员会。按照这种说法，密谋问题的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当时，一批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前左派共产主义者愤怒地回答道：“这件事完全被歪曲了。”当时，人们只是想到建立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而逮捕列宁的设想纯粹是无稽之谈。^②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的指责还包含了某些真实的内容，那么一九三八年的诉讼则没有提出更多的事实材料，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细节和诽谤的语言。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把列宁排挤掉的思想，似乎最先出于莫斯科区域局里的某些性急者，例如斯土柯夫。据说，在二月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刚开始时，他就主张采取暴力行动。在条约签订并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布哈林似乎向他的信徒左派共产主义者们讲过，为了使反对和约的斗争继续

^①参阅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见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的《真理报》。

^②参阅皮达可夫、斯土柯夫、雅柯夫列娃、斯米尔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舍韦尔丁和马克西莫夫斯基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的《真理报》。

进行下去，需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谈判肯定是举行了。争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合作，是没有困难的，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可能也有这种积极性。他们似乎于三月底已联合制订出一项废除内阁的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拘留列宁约二十四小时，然后宣布皮达可夫为新人民委员会主席，即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席。^①除了可能进行逮捕外，这项计划按议会制而言是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当时的苏维埃宪法。

这项计划之所以没有实行，原因在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他们在反对列宁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那么坚决；另外，他们觉得自己已在一天一天地失去支持，也就是说，当他们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失去对莫斯科区域局的控制时，他们的野心就越越来越小了。^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气馁。他们为了能推翻共产党政府，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在莫斯科策划了一次暴乱，并想通过劫持和杀害德国使节米尔巴赫迫使政府重新接受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苏维埃政府在一、两天之内就把这一骚乱平定下去了，从而避免了与德国的决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得到的只是一点：他们自己失去了从事合法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并给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以最后的推动。

回顾起来，莫斯科暴乱显然是一部分大胆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早期思想的直接结果。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来说，暴乱意味着反对列宁政治权威的努力宣告结束。左派共产主义者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明确地与迄今为止的朋友断绝往来。他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保证说：过去与反布尔什维克冒

^①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法庭审讯报告：《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维埃集团案》，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版，第30、440—445、773—774页。

^②同上，第445—446页。

险家结成的联盟已永远结束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我们将试图通过党来实现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这将更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反对共产党？不，这不是我们的道路。”^①

当时，由于组织上没有立足之地，左派分子先后又回到了列宁的周围。大约在夏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叛逆者又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②一九一八年夏，有许多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比党内关于统治方式的争论更为重要。当党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时，大多数左派分子与列宁主义者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但是一九一八年的争论问题只不过是暂时被搁置起来而已。由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断发表批评文章，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可能被人们所遗忘。当军事形势有所缓和时，左翼反对派分子又重新提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性质这一原则性问题。

^①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真理报》。

^②参阅《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60页，注释131。

第四章 战时共产主义和关于 集权化的争论

十月政变使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但这时俄国革命的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以昂贵的代价与中欧列强签订和约，这仅给新政府以暂时的喘息机会。极端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各自从孟什维克和温和的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获得了力量。他们的力量愈加强大，社会冲突就愈加剧烈，政治仇恨也就愈加深刻。一九一八年五月，政府军队与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军之间的冲突，给整个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的东南地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发出了信号。因此，十分痛苦的内战开始了。

这正是，革命引起了战争，而战争又加速了革命。通过镇压所有的反对党来巩固其专政的共产党又向左转了。在火热的斗争中，列宁主义者和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想借助于国家的暴力来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在，反对派的角色由少数极端理想主义者来承担，这些人坚持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春所赞成的观点，坚决反对独裁主义的原则。这些左派顽固分子（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坚决反对大多数领导人在战争逼迫的形势下和在革命的火热时期所肯定的官僚专制手段。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革命良心恳切地发出了声音，但这种声音在一九二一年却被以革命的名义而窒息了。

一、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和集中领导问题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普遍实行国有化的法令；根据法令规定，所有拥有一百万卢布以上资本的工业企业一律归国家所有。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信号。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说法是：“一脚已进入社会主义”）之间的均衡已经消失。为迅速在内政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断革命宣告开始。

这时，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内战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克集团（从君主政体主义者直到社会革命党人）正在为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一九一八年整个夏季是最忧郁的内战时期。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的白军，在被重新组织起来的红军部队击退之前，已经直接威胁到莫斯科。大多数边疆地区已被白军占领，或者被德国和土耳其军队所控制。主要产粮区大部分已被占领，或者被切断了同苏维埃统治的俄国中部地区的联系。协约国的干涉也开始了。（这种干涉并不是大批派遣登陆部队，因为它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很小，而是向白军提供大量的补给品和武器。）在内部，革命的竞争者，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威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准备实现社会改造这一最伟大理想。在决定生死存亡和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已加强了纪律，整顿了队伍。党内各派都清楚地懂得，这是一场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决战的斗争。因此，它们完全服从于高度集中化的领导和旨在实现党的军事化所采取的纪律性措施。

内战期间，反对派的活动与红军的战绩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苏维埃国家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共产党内的各个集团往往倾向

于和睦相处，暂时地把分歧搁置起来，停止批评政府，并将全部力量贡献于卫国战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第一次出现重大危机时，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所造成的分裂状况有所愈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彻底崩溃，军事形势显然大大地有利于红军，它们重新占领了乌克兰和伏尔加河地区，随之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恢复时期。一九一九年三月，即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对极端集权主义倾向的批评浪潮重新出现了。一九一九年年中，军事形势再次变得严重起来，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已在威胁性地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推进。这时，党内争论又逐渐缓和下来。九大期间，即在一九二〇年春季，军事天平最终倾向于苏维埃共和国一边。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反对派的活动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

在八大和九大期间，各派之间的争论重点从行动准则和重大外交政策方面转向了决议的执行情况，基层国家机关的组织建设和经济政策等问题。这种转变反映了变化的形势：红军巩固了它打败白军的胜利；国际局势日趋稳定；党已能够着手于解决国家重建和政治改组等问题。

从一九一八年年中起，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致赞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许多左派分子也热情地欢呼战时共产主义。但这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像它开始时那样，是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反对党的组织和主要思想的反对派集团，而是党内始终存在的一种流派。它时而与列宁的国际妥协政策，时而与他的国内妥协政策发生矛盾。

在内战形势的压力下，俄国经济已变成一种高度集中的准军事性质的结构。^①人们不顾个别工厂委员会追随者的反对，迅速

^①参阅多布：《苏联自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第89—90页。

地采取严厉的手段，克服由于工人监督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人们把生产下降归咎于异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一位政府代言人曾写道：“由工厂委员会执行的对工业实行的工人监督已经表明，一旦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得以实现，将会带来什么后果。”^①

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标记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实际上是强行征收）。这种强制性措施当时是必要的，因为正常贸易的中断威胁到开始闹饥荒的城市。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共产党人利用了贫农和富农之间已经开始的阶级斗争。一九一八年夏，“贫农委员会”成立了，它应协助当地的粮食机构寻找并没收富农和中农手里的余粮。这种政策表明已极其严重地背离了共产党原先的温和的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现在不再作为使全体农民赢得土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出现。它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化了的贫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开始。对此，左派分子感到欢欣鼓舞；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想强行建立集体经济。^②然而，他们马上又停止了这一行动。一九一八年年底，真正在思考的列宁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在农村中无限制地开展阶级斗争对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往往是益少害多，他们解散了贫农委员会。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有必要同中农和解，并限制在征收粮食过程中采用的暴力行动。^③很显然，他的这一实用而又明智的观点说服了全党，因为没有

^①伊·伊斯科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24页。

^②参阅布勃诺夫，《苏联共产党（布）》，《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十一卷，第453页。

^③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88页。

一个反对派声称反对这一策略改变。农民政策的这一和缓变化是战时共产主义已开始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的征兆，也是两年后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征兆。

对许多左派分子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是自然而又正确的革命方针。一位同情左派的作家列·纳·克里茨曼后来把这一时期描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迈出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革命固有的发展趋势”的开始，它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结构”的轮廓。^①布哈林特别在他的《转变时期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这一越轨现象说成是一种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布哈林为工业生产下降而欢呼，因为他把这看作是旧的社会等级制关系解体的预兆^②（代替它的是横向的联系）。克里茨曼写道：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到来，已初步实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应该承认，发展意图在最初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实现的，但这种发展意图毕竟是实现了！”^③

并不是党内的整个左翼都把战时共产主义看作是向理想王国接近。在反对党的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民主集中派”在一九一九年已作为明显与党划清界限并具有自己的明确纲领的党团分裂出来。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奥新斯基、季·弗·萨普龙诺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都曾积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而这个集团的许多成员都曾足左派莫斯科区域局的成员。

由于集中制问题，他们后来又与共产党左翼中的有政权意识的同志分手了。这一党团的名称是欺骗性的，党的领导正确地批评了民主集中主义者的极端分散主义。当然，党的领导本身同样

^①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彼得格勒一九二六年版，第71、77页。

^②参阅布哈林：《转变时期的经济学》，一九二二年汉堡版，第55—60页。

^③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129页。

也远远偏离了民主集中主义的正确平衡关系。

一九二〇年，另一个反对苏联对内政策中集权制的集团是以工会领导机关为基地的集团。他们是一批具有明显的极左理想主义的人。当一九二一年对工会问题展开争论时，他们以“工人反对派”的名义反对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结果，这一极左集团完全失败了。鉴于实际上的强行集中化，他们想在国家和经济部门中实行民主管理的目标仅是一种幻想，他们的政治影响日益被集中化的党组织的力量所排挤。极左派的历史作用在于：为了恢复一九一七年纲领中规定的民主内容，他们保持了斗争的传统，并针对性地强调指出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但任何想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权力的思想都被党的领导所置之不理。

二、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八年年中之后，列宁和以前的左翼温和派批评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中遗留下来的未能解决的理论性问题。今天，俄国革命与期望中的国际革命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人们从中能得出哪些实际的结论？像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将如何说明和处理？列宁和布哈林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所代表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左派分子把俄国革命看成是国际革命的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列宁通过他的和平政策向人们指出，他是以民族的概念来考虑俄国革命的。因此，他已坚决表示赞成自决权的原则，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有权自己决定它们的政治未来。

一九一七年四月，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开始了，其中包括由

列宁的四月提纲所引起的意见分歧。一项由斯大林提出的关于解决俄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造成了流亡在国外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捍卫自决权，乌克兰人皮达可夫和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攻击自决权。捷尔任斯基宣布：“我们不要突出民族问题，这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上转移开去。”^①决议的最终文本只是把自决说成是政治的需要，^②当布尔什维克用武力夺回沙皇帝国的大量非俄罗斯领土时，他们就是根据这种观点来对待自决问题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替左派说话的布哈林强调他的这种观点：俄国革命是唯一在世界范围内反对“金融资本”斗争的一部分。列宁抱怨说，布哈林看待问题太抽象了，他忽视了俄国作为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所存在的特殊问题。^③构成争论基础的原则问题为：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还是世界革命的利益？这一问题的争论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而激化了。列宁主义者一直主张首先考虑民族利益，左派分子都主张首先考虑国际利益。

与之有关联的民族自决问题是一个较现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显得十分重要，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将取决于能否选择一项正确的政策。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布哈林代表了左派特有的反对妥协让步的倾向，他把民族自决和各国无产者的联合描述为两者必居其一的、互相排斥的问题，并指责前者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的。他建议采用斯大林的公式：“各民族劳动阶级的

^①转引自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02、299页。

^②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民族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46—447页。

^③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39—142页。

自决。”^① 革命胜利后，显然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大多数列宁主义者，都倾向于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即自决作为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仅由各国的无产阶级来行使。^② 这种解释足以能够在通过军事手段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当地民族中的反苏维埃的反应就可以作为非无产阶级的反应而置之不理。

皮达可夫坚持极端的反民族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连布哈林也难以接受。皮达可夫不仅简单地把“民族自决权”指责为反动的口号，而且甚至反对由这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服从于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集中控制，世界革命的利益要优先于个别民族的利益。作为例子，他提到了乌克兰（他是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他断言，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苏维埃俄国必须保持它对乌克兰的统治，即使这意味着不给乌克兰的无产阶级以民族自治权。^③ 皮达可夫左派集团的这种激进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地位取决于这样一种政策；但他们得到的都是具有讽刺性的相反效果，一九二〇年，再次被选进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班子里的皮达可夫左派集团被列宁解除了职务，并由列宁的追随者接替了他们的职务。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给左派的事业带来的后果。

当列宁针对左派的民族纲领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纲领时，他揭露左派把世界局势看得过分简单，并以不妥协的外衣掩盖其主观设想。他警告人们应当心反映在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建议中的过火和鲁莽的行动。他竭力劝说人们对个别民族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之间的差别要采取忍耐

①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卷，第261、265、266页。

③参阅皮达可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和容忍的态度。指出最大的危险是在共产主义名称的掩盖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针对皮达可夫这样的超级国际主义者（他们甚至要统一各民族的教育事业）说道：“在我看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①列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谨慎政策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欢迎，其中包括像梁赞诺夫和奥新斯基那样的敌对分子。这两个人强调说，民族自治口号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有价值的。^②

然而，列宁表示说，他赞成自治并不意味着放弃真正的政治利益。他坚持维护作为结合体的共产党的利益，这个结合体包括所有处在革命者统治下的沙皇帝国的领土，甚至还要延伸到像乌克兰那样的当时名义上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政府的地区。除了芬兰（一九一七年承认它独立），列宁的自治政策实际上是虚构的。

三、乌克兰——反对派的堡垒

在乌克兰这个幅员广大、俄国最主要的非俄罗斯地区，要求实行真正自治的问题已不可避免地突出起来。但是，鉴于整个共产党内的列宁派和左翼之间的紧张关系，乌克兰的情况发展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乌克兰，争论的过程不是按照普遍的模式进行的。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乌克兰的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温和派并不像俄罗斯联邦的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温和派那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乌克兰的左派分子仍或多或少地纠集在一起，并激烈而往往又是卓有成效地反对列宁主义者，时间竟持续两年之久。

在乌克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着长期存

^①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48、168页。

^②同上，第193页。

在的大问题——乌克兰民族自治问题和乌克兰共产党组织与俄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中始终存在着磨擦：右派竭力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左派坚定不移地主张实行地区和地方自治。直到一九二〇年，政治上的分裂与地理上的分裂同时发生了：“左岸”（第聂伯河东部，集中在哈尔科夫城周围）的共产党人是集权主义者，并倾向于莫斯科；“右岸”（基辅）的是自治论者集团，并重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一分裂状况反映了俄罗斯人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工业区。

当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集会（在塔甘罗格，它与俄罗斯共和国接壤）成立形式上的“乌克兰共产党（布）”时，他们实际上已完全分裂了。^①一九一八年春德国占领了整个乌克兰，这使基辅自治论者和哈尔科夫集权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成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与此同时，乌克兰派别之间的争论也开始转向和平与战争问题。

因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对苏维埃承认的乌克兰政府无效，所以战争问题对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来说尚未解决，这一问题又与民族自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左翼来说，独立的乌克兰作为继续进行反德战争的基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而且也不会使莫斯科卷入战争；但对右翼来说，继续进行反德战争，是令人厌恶的。^②因此，在乌克兰人中，派别的划分情况完全类似俄罗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时期所出现的派别划分情况。在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领导下的左翼是稳定而又强大的一翼。左派已决心组织武装起义，反对德国占领军；而右派却指责这是冒险

^①参阅索·纳·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史》，一九二三年哈尔科夫版，第51—53页。

^②参阅埃·约·克维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意见分歧》。

行动，并强调有必要开展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以至建立一支地下组织。^①乌克兰左派的反暴激情是那么的高涨，以致于他们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莫斯科起义遭到失败后还不想与志同道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裂。^②因为他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他们在一九一八年春夏仍在继续作起义的准备。但当他们于一九一八年八月进行尝试时，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次失败加上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具体体现在加米涅夫身上）促使乌克兰组织在一九一八年秋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埃·约·克维林和叶·阿·雅柯夫列夫领导下的亲列宁主义的派别获得了政权，并实行了谨慎的中央集权制政策。^③

当德国军队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崩溃时，列宁和乌克兰右派对掌握基辅权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谨慎而又愿意和解的态度；相反，皮达可夫和左派则要求对乌克兰进行干涉，以便恢复共产党在乌克兰的统治。这一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一九一九年一月哈尔科夫新政府宣布成立时，莫斯科指定了一位政府首脑，他就是在保加利亚出生的、俄罗斯化了的罗马尼亚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拉柯夫斯基。^④

乌克兰新政府刚刚从事活动不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又出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当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各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前一年，也就是在建党时期，左派已经强行通过他们的提议，要与俄国共产党享有平等的地位。^⑤现在，右

①参阅弗·彼·扎东斯基：《乌克兰共产党（布）五周年纪念日》。

②参阅克维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意见分歧》。

③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史》，第58—64，84—86，90—96页。

④参阅伊·尼·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1929年哈尔科夫第二版，第186—187页。

⑤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55、56页。

派出于利益考虑，要将乌克兰共产党置于莫斯科的俄共中央委员会管辖之下，因为来自那里的支持就是他们在乌克兰党组织中占优势的保证。右派的主要代言人雅柯夫列夫援引极端派的观点说，乌克兰共产党作为纯粹的地方党组织不允许有特权制定自己的独立于莫斯科路线的政策。对此，他借用左派的指责反击说，正是这种态度，即笨拙地将俄国的方法强加于乌克兰的不同国情，使党难以统治乌克兰。^①

莫斯科领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农民政策问题。一九一九年初，当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在拉柯夫斯基和倾向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右派的领导下重新诞生时，就采取了一些一九一八年在俄罗斯共和国使用过的强行措施：余粮征收、贫农委员会和强迫农民加入农业公社等激进的尝试。^② 尽管俄罗斯共和国的贫农委员会正好在这个时期已被解散，但是，因为乌克兰必须把生产品提供其他苏维埃地区，并且反对乌克兰富农的阶级斗争情绪十分激昂，所以共产党领导认为有必要在乌克兰农村发起革命攻势。^③

一年前，乌克兰左派曾警告人们不要对农民实行任何极端措施。这时，雅柯夫列夫却把这种警告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乌托邦的思想。^④ 一名左派分子对此反驳道：这种态度暴露了右派的“俄罗斯的和反乌克兰的双重倾向”。^⑤ 一九一九年对乌克兰农民推行的强制政策带来的结果，像后来各方面都承认的那样，是

^①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17、118页。

^②参阅《卡尔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注释4；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190页。

^③参阅伊万·马尔琴科：《保罗季巴党：乌克兰共产主义史中的一章》，一九五四年纽约版，第120、121页。

^④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55页。

^⑤扎尔斯基：《乌克兰共产党（布）五周年纪念日》。

灾难性的。^①乌克兰农村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政府疏远了，而苏维埃政权之所以最终能在这一地区站住脚应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白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马赫诺无政府主义者）的绝望的分裂行动。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不顾俄共书记斯维尔德洛夫个人的压力（这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明显地转向争取自治的努力。在选举乌克兰新的中央委员会时，左派获得了绝对的多数，而右派领袖雅柯夫列夫没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②尽管列宁主义者在这里遭到排挤，但俄罗斯党的领导仍然声称，从今以后党内不再允许有独立的民族集团。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必须有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俄共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党的各个部分（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管辖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利，完全隶属俄共中央。”^③这样一来，尽管人们还在不断重提民族自决，但一切有关民族自决的决定权属于中央。

左派也遭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主张是矛盾的。他们的代言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自决，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偏离行动，或者他们（像奥新斯基）只想把民族自决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口号。^④但是，在乌克兰，正是这一集团，甚至正是这一批人中的部分人（例如皮达可夫）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竭尽全力地反对莫斯科对乌克兰党组织的控制，并多方避免损害乌克兰

^①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23—125页；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183、184页。

^②同上，第107—118页。

^③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67页。

^④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9—83、91—94页。

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

毫无疑问，这两个派别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产生矛盾是由于乌克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由俄罗斯人所组成。这些俄罗斯乌克兰人不懂得促使与莫斯科关系复杂化的民族主义感情；因此，他们不能像一般的俄罗斯人那样观察这个涉及到整个国家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一样，当他们一般地谈到民族主义政策时，想到的不是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而是苏维埃俄国与处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各个民族集团和政党的关系。一般说来，左派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右派则主张自决。但是当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以哈尔科夫或基辅为中心来考虑乌克兰与莫斯科的关系时，完全不同的动机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两派实际上都把乌克兰看成是俄国的一部分，关键的问题是集中化还是在—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内实行地方自治。结果是，乌克兰左派和右派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右派赞成隶属中央（因为他们在乌克兰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取决于中央的支持），而左派则要保护自治的优先权（他们坚持这一点也是为了保持他们在乌克兰组织中的地位）。

当内战转入危急状态时，乌克兰共产党人欣赏的自治在一九一九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邓尼金将军指挥的白军在英法的支持下向前推进，并在俄国南部发起了令人惊奇的有效的进攻，这一强大的攻势已严重地威胁到莫斯科。只依靠动摇不定的人民的乌克兰共产党完全垮了。六月，哈尔科夫落到了白军手中；八月，白军又占领了基辅。经过尝试，在白军背后组织一些零星的游击活动无效后，失去所有威信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被俄共领导解散了。领导成员中的许多人被调到俄国其他地方担任党的工作，而余下的乌克兰共产党党员则完全处在俄共的直接控制下。^①

^①参阅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89页。

当乌克兰在邓尼金垮台后重新归苏维埃统治时，俄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把乌克兰共产党严格控制在莫斯科手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临时政府，以拉柯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曼努伊尔斯基为首的列宁主义派统治着临时政府。俄共中央委员会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承认新成立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为一个独立的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的国家。决议还建议，要迅速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建议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努力学习乌克兰语，使用乌克兰语）。它还要求实行限制征收粮食等保护农民的政策。^①很显然，俄罗斯党的领导在邓尼金进军时期已从共产党垮台事件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在（共产党的）真正权力方面，莫斯科的控制却更加严格了。在新组成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号召所有曾在乌克兰服务过的党的工作人员返回乌克兰时，俄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告各级党组织书，其中规定：党员在没有得到莫斯科中央书记处的正式任命的情况下不允许接受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它指示“所有想去乌克兰的人”都要通过正式的途径获得职权。很显然，坚如磐石的统一还远远没有实现。

尽管莫斯科采取了预防措施，乌克兰左派在一九二〇年再次得到了新的发展。大量的左翼的新同情者涌向乌克兰：部分自愿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有更好的机会促进他们的事业；部分是因为莫斯科不重视和排挤他们。（雅柯夫列夫抱怨说：“乌克兰变成了放逐地。”^②）萨普龙诺夫领导下的民主集中主义者来

^①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通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87、588页。

^②参阅雅柯夫列夫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会议记录》，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62页。

到了哈尔科夫，并合法地占据了右派的这一堡垒。^①然后，他们又那样迫不及待地大批吸收新成员，扩充哈尔科夫党组织，以致哈尔科夫选举出的代表占一九二〇年三月乌克兰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②

这次会议是暴风雨式的。对乌克兰右派和莫斯科党领导的批评一浪高于一浪。在经济政策方面，遭到失败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他试图维护莫斯科（和托洛茨基）关于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军事化和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的政策。特别引起人们愤慨的是，在去年秋天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候莫斯科解散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一位代表愤怒地喊道：“中央委员会是全乌克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它是向代表大会负责的，任何人无权取缔它。”关于乌克兰应隶属于莫斯科的这个总原则也遭到了抨击。但是，多数代表仍然坚持了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位代表由于具有“联邦制的”倾向而被剥夺了代表资格。^③

布勃诺夫把乌克兰的反对中央集权的问题带到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会上。他向出席会议的俄国领导人声称：莫斯科在乌克兰推行的政策与其说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不如说削弱了苏维埃政权；表现较好的乌克兰的党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反对观点而被驱逐或调离；莫斯科的干涉，特别是解散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已经毁掉了党在乌克兰的核心组织；而继续推行严厉的反富农的政策已使乌克兰农民变成了反苏维埃力量的危险基础。^④但是俄罗斯族的党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深入考虑这种民族感情的发

①参阅波彼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220页；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56、158—160页。

②同上，第160—162页。

③同上，第149、150、155、156页。

④参阅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作。在乌克兰第四次党代会上，名义上为乌克兰政府首脑的拉柯夫斯基反驳了这些指责，并认为整个乌克兰共产党已蜕化变质。他断言说，受反对派和分裂主义者控制的组织实际上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害怕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然而，这种控告是无效的。左派借助于萨普龙诺夫的哈尔科夫强大代表团的压力，保证了必要的选票，从而在乌克兰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再次获得了多数。^①

人们很难期望莫斯科会愉快地接受这一结果。乌克兰右派对这一结果大为不满，党中央也采取了行动。列宁直言不讳地向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多数派表示反对拉柯夫斯基同志，并已在驱逐他，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说，我们将不承认区域代表大会的这种决议，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说，我们将不承认萨普龙诺夫主持召开的这次代表会议。”^②

左派抗议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是在莫斯科代表（斯大林）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合乎规定地通过选举产生的。但俄共中央委员会反驳了这一抗议，并宣布乌克兰党代会的选举无效。^③理由是：“代表会议尖锐地分裂成两大派，它显然已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乌克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当时，莫斯科正在批判要求两党制的苗头，在共产党上下级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还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建立乌克兰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它的组成应反映俄共（不是乌克兰共产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像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

^①参阅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第152页。

^②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给乌克兰共产党（布）各级组织的指示，见拉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附件12，第235—238页。

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它应有能力在重建乌克兰的事业中领导乌克兰工人阶级中全体真正的共产党员。”接着，它任命了一个新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所有在代表会议上落选的右派领袖又重新上了台，而左派的影响实际上被清除了。另外，俄国中央委员会宣布说：“保证乌克兰党和苏维埃工作健康地展开的基本条件是在乌克兰共产党内进行一次严格的清洗运动。”中央委员会还声称，在乌克兰共产党内隐藏着许多“不讲原则和善于冒险的同路人……蛊惑人心的分子、半马赫诺分子和分裂主义者”，这些人必须清除出去或受到惩罚。最后它要求把制造分裂的煽动分子调离乌克兰：“俄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将那些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从乌克兰调往大俄罗斯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刚结束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自己难以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同心同德地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中进行合作。”

清洗和调换的权力意味着莫斯科对乌克兰党的组织的控制是不受限制的，“俄共的意志”应是地方一切行动的准则。莫斯科提醒他们应时刻记住“依靠俄共的思想和物质援助”，这意味着乌克兰共产党人已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自治权。借助于人员调动的决定，俄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将乌克兰反对派成员分散到了整个俄国。一九二〇年秋，席卷全国的党内争论在乌克兰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军事化和工人反对派的反应），^①但乌克兰已不再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个基地，已不再构成一支威胁莫斯科领导的独立力量。

四、军事反对派

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内战并没有使共产党人中的争论走向结

^①参阅波波夫：《乌克兰共产党（布）党史梗概》，第234—235页。

束，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中央权威问题依然存在，而交战问题本身就是争论的一个主要题目。在内战爆发后的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红军还处在建设时期，党和军队的领导在组织军事行动方面应采取何种正确的组织形式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军事问题的核心是无政府理想主义和偏爱传统组织形式的实用主义的对立，这也正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工业政策和工人政策上的分歧。

当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消除后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时，他就开始在军事领域里运用列宁在经济领域中所采用的强调威信的原则。他提出胜利的公式是：“劳动、纪律和秩序。”^①然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反抗，甚至遭到了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一九一八年四月，尼·瓦·克雷连柯（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命的三名军事人民委员之一）由于讨厌托洛茨基而退出了国防领导岗位，并当了司法人民委员。^②但是，托洛茨基开始全力以赴地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武装力量——红军，以代替在革命暴乱中瓦解了的军队。不久，中央军事指挥部和参谋部成立了，并逐渐地将其权威强加到许多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员和志愿者头上，这些人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危急时期都是红军的成员。左派所赞成的通过“流动班组”来进行游击战的办法被断然拒绝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完全放弃它。军队中某些民主的组织形式，其中像选举军官，也很快被取消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底宣称：“在今日的军队体制下，选举原则看来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切

^①托洛茨基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俄共莫斯科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55页以后各页。

^②参阅克雷连柯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46页。

合实际需要的，在法令中实际上也已经被取消了。”^①在面临敌人的情况下拒不服从者应判处死刑这一规定又无情地被采用了，而这正是革命人道主义者经常攻击的目标。由于采用人民委员和“政治部”的体制，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组织与军事命令等级制统一起来了。^②此外，一个新的军官团迅速产生了，其中半数是当年的沙皇军官。这些人有的是自觉地继续服役，有的是被迫继续服役。

使用沙皇的军官（“军事专家”）是长期激烈争论的一个根源。一九一八年三月，托洛茨基提出这一办法并仿效列宁在工业领域所拥护的观点，认为应利用“一切在旧的国家机关中充满活力而又有实用价值的人力物力”。^③对此，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至左派共产主义者大为愤怒。一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抱怨说：“在军队中，不是被选出来的人，而是地道的反革命分子说了算。”^④就连列宁本人也延续几个月没有明确表示赞成使用军事“专家”的主张；而一些列宁主义者，特别是党在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人，在这件事上则积极反对托洛茨基。军内党组织的领袖米·米·拉舍维奇无视托洛茨基抚慰旧军官的努力，反而建议他的同事们要像榨取柠檬的液汁那样去“压榨他们，然后再抛弃他们”。^⑤当然这中间掺杂着个人的厌恶，因为拉舍维奇是托洛茨基的对手，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

当苏维埃政府在军事方面获得短暂的喘息时机时，关于军事

^①托洛茨基：《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71—172页。

^②参阅沙波罗：《共产党权威的由来》，第241—243页。

^③托洛茨基：《劳动、纪律和秩序》，《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七卷第一分册，第162、170—171页。

^④索波：《左派共产主义者党团》，第137页。

^⑤参阅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版，第37—98页。

组织问题的争论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已经达到了高潮。一部分党员（其中包括许多过去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托洛茨基都很反感，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军事反对派。这一集团虽然失败了，但它已给这位军事委员的政治前途以沉重的打击。军事反对派把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看作是代言人，他是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新形成的民主集中主义者集团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斯米尔诺夫承认有必要使用“专家”，^①但他反对走得过远。他要求党反对传统的军事组织所带来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已随着加强纪律和使用沙皇军官而重新发展起来了，例如：礼仪、军衔、官兵营房的分离、军官特权、传统的军事规章等。他承认：“规章是必要的，但它必须要与所积累的经验相一致，同时应防止把革命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切规章制度都加以恢复。”^②

党的领导人不愿受各种批评的干扰，不愿使他们的行动受到任何限制，因此他们的回答是大肆指责反对派，说这些思想是异端邪说：“把主张建立游击队的思想同主张建立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集中的军队的思想对立起来（……），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或轻率思想的可笑产物。”“把游击斗争作为军事纲领来宣传，就等于提倡从大工业回到手工业去。”^③托洛茨基后来强词夺理地说：“混乱的游击制是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表现。因此，反对游击制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使国家制度走下坡路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④

^①参阅弗·米·斯米尔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同上。

^③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军事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54页。

^④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01页。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内部辩论中，托洛茨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①索柯里尼柯夫（他以托洛茨基的名义）回答说，游击战争利少弊多，它最终会导致“抢劫和掠夺”这种结果，是“冒险家的堡垒”。^②尽管反对派已证明是异常强大的——有九十五票赞成斯米尔诺夫的决定，但最后的表决结果是以一百七十四票对九十五票通过了托洛茨基的计划。会议还决定给未出席会议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一项指示，指示他应更多地重视军队中党员干部的意见。这项指示是由季诺维也夫（他无疑是非常乐意地）转交给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拒绝了这一所谓的“忠告”，并尖刻地批评了当时担任游击队领导人的克·叶·伏罗希洛夫，因为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发出这项指示的主谋。^③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在某些实际问题上完全确认了托洛茨基的集中制。然而总的说来，阐述这个问题的语调显然是承认旧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决议坚持了关于未来的军队应是没有兵器的民兵这一思想，并认为在军队已经成熟和稳定的情况下应实行军官选举制。^④

反对派在军事问题上获得的一个异常重大的成果是，增强了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常有的联系，在这方面，不仅最高原则而且最轻微的诽谤都应起到其应有的一份作用。托洛茨基本身的分析无疑已接近了真理。像斯米尔诺夫那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军事反对派的基础，他们怀疑的是：“已经掌握政权的新阶级有可能统治和控制旧知识分子这一广大阶层。”除了这一十分成熟了的革命后备力量，军事反对派还有其他的成分，即“无数的党的工作人

①参阅多伊奇尔：《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31页。

②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02页。

③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会议记录。

④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军事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54—558页。

员，这些人曾秘密地进行斗争，他们看不惯在重要岗位上不可缺少的形形色色的青云直上者”。^①人们从中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他来自察里津集团的追随者所作出的评价。

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斗刚刚开始时，察里津事件已经获得了（过高的）声誉。一九一八年夏，斯大林被派往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便保证粮食向北运往俄国中部地区。在察里津（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他接受了反对白军并保卫城市的任务。那里的红军战术指挥是伏罗希洛夫，政治委员是奥尔忠尼启泽。当察里津地方领导竟敢反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军事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时，军事行动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察里津集团激烈反对使用沙皇军官。与他偏爱集中制的做法相反，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站到了反托洛茨基的地方领导一边，而且做得也太过分了，以致托洛茨基威胁着要把伏罗希洛夫提交军事法庭。双方向列宁发出了呼吁，最后斯大林被召回，并确立了托洛茨基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权威。

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获得的。当他于一九一八年年底着手整顿俄国南部的苏维埃军队时，斯大林已在莫斯科与季诺维也夫联合策划阴谋来反对他。托洛茨基受到了批评，因为他宠爱沙皇军官。季诺维也夫的朋友，即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当时强烈谴责托洛茨基没有通过法庭诉讼就让枪杀共产党员。^②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敌视托洛茨基的情绪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在以列宁为首的大多数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已成为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人。

严格地讲，托洛茨基从来就没有想在军队领导中保持一帮坚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97—298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53号；见多伊奇尔：《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25—426页。

定的信徒。在内战期间，他和指挥官以及许多高级政治委员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当一九一九年七月布哈林的对立面谢·谢·加米涅夫将军（他与党的领袖列·波·加米涅夫无血缘关系）在斯大林的活动下被任命为总司令和布哈林的大多数朋友在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过程中不得不退出委员会时，托洛茨基遭到了致命的打击；^①更有甚者（就卓越的领导艺术而言），托洛茨基仅由于他取得的成就而激怒他的同事们疯狂地反对他。敌视托洛茨基的高级军官，其中像伏罗希洛夫和米·瓦·伏龙芝（他最后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接替了托洛茨基的职务）忧虑的是，民兵组织和游击战术的争论问题不会从一般的意识中消失掉。在下级军官中，托洛茨基仍然深受欢迎；但在政治方面，军队已受党的军事机关领导，而这些军事机关已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敌人手中。^②

五、工业管理

俄国的工业和军队一样，它的传统领导形式和规章制度已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九一八年春，在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争吵过程中，关于组织工业的问题已提上了日程。人们应将工厂变为独立的、民主的公社，还是应使工人重新服从于经理的权威、劳动纪律、工资刺激和科学的企业领导——这就是说，难道人们仍应采用熟悉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形式，企业仍由原来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来领导，不同的只是国家变成了所有者？

在内战危急时期，即从一九一八年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年底，在“总管理局”掌管下，经济管理集中化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左翼革命纯粹主义者对这种倾向感到不合心意，但有两个情况还使

^①参阅多伊奇尔，《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33—436页。

^②参阅沙波罗，《共产党权威的由来》，第247—252页。

他们满意；工会或工会代表参加了工业的管理；管理工作不是由个人而是由集体来领导。当党的领导开始放弃这两个革命标准并接受所谓一长制方针时，左派开始公开反对。一九二〇年初，围绕着工业领导形式和工会作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第二个问题的争论使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作专门的论述。）有关工业问题的争论意义很重大，反对派的失败标志着人们已明显背弃了原来的社会革命纲领。

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包含了左派的管理思想：“目前在工业中出现的集体管理原则是建设工业管理机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唯一能保证广大的无党派工人群众通过工会来参加管理工作的原则。上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下至企业领导都应遵循这一原则。”^①克里茨曼称集体管理制“是符合无产阶级特点的，因而是不符合任何其他社会阶级特点的原则，……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②

党内主张集体领导的传统势力是那样的强大，以致列宁本人也觉得有必要承认这一原则，尽管他自从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展开论战以来就明显偏爱一长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曾这样说：“集体管理必须有工会参加。”但他立即又规定了界限：“……集体管理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③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照旧通过了一项决议，它批准了企业集体领导这一原则。^④然而，列宁在这一时期（在托洛茨基强有力的支持下）已准备坚持一种更加坚定的观点。一九二〇年一月，他郑重

^①托姆斯基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关于工会的任务》。

^②参阅克里茨曼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357、358页。

^④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代表大会记录》，第535页。

宣布：“集体管理制，……，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更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检查工作。”^①

左派似乎不愿理会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社会主义。工会中央理事会两次反驳了列宁关于一长制的辩护，越来越多的工会工作者和地方党组织赞同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观点。^②列宁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党和国家需要“铁的纪律”，“在劳动时间内绝对服从”和“经济管理集中化”。他概括地解释说：“要以选拔制代替选举制。”^③当列宁将这一争论问题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时，他把这种集体管理称作是“彻头彻尾的幻想、骗局、虚构”。^④

托洛茨基支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集体管理制代表着一个过了时的革命阶段，他说：“被选举出来的同事们，显然是由工人阶级最杰出的代表所组成，但他们并不掌握技术基础知识，他们不能代替上述专科学校培养的、能胜任一种专门职业的技术人员……。集体领导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的、直到前不久还是被压迫的阶级完全自然的反应，这个阶级显然拒绝昨天的主人、首领和指挥官的个人指挥……；但这在建设无产阶级国家经济过程中不是最正确的做法。”^⑤托洛茨基还说，集体领导思想实际上产生于孟什维克。^⑥

①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278页。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190页。

③参阅列宁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工会和它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36页。

④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08页。

⑤托洛茨基：《专制与民主》，1922年纽约版，第115页。

⑥同上，第161页。

民主集中派想寻求一种妥协。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莫斯科区域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把整个问题说成是一个非原则问题。决议说：“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必须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来逐步地加以确定。”^①他们认为集体领导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个“管理大学”，无产阶级能在那里学习担任负责工作，并通过这种办法使资产阶级专家成为多余的人。^②（托洛茨基把这种思想称作是向混乱发出的邀请。）^③此外，民主集中主义者还把集体管理制赞扬为“反对本位主义滋长和苏维埃机关官僚化的最强大的武器”。^④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这件事作出决定时，列宁的观点象通常一样获得了胜利。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要求：“从上到下切实执行……原则：一定的人对一定的工作切实负责。在讨论或决定问题的过程中采用集体管理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集体管理制就应当无条件地让位给一长制。”^⑤在党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后，新的政策很快被付诸实施了。^⑥

象军队一样，工业领域里有关一长制和建立等级制的争论是与使用“专家”问题紧密相联的。已经属于军事反对派的民主集中主义者急迫地建议在经济部门也要限制使用专家。萨普龙诺夫解释说：“没有人反对使用‘专家’的必要性——问题在于，人们

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571页、附件75。

②马克西莫夫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托洛茨基：《专制与民主》，第16页。

④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的提纲》，《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集》附件14，第538页。

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0页。

⑥举例来说，在彼得格勒市，实行集体管理的企业的比例一年后已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份的52%减少到17%。参阅《俄国的劳力状态》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50页。

应如何使用他们。”^①

当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从领导军事工作转为领导经济事务时，他仍坚持认为有必要使用“专家”，并给他们以充分的行动自由。他甚至还这样反驳反对派：“谁害怕这一点，谁就无意识地暴露了他内心对苏维埃政权的极大不信任。”^②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把人们对使用专家的批评和不信任专家的态度同等看待，决议谴责了“那种认为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不利用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专家，工人阶级好像也能解决自己的任务的盲目自大的态度”。决议还预示了在以后几年里将采取纪律措施来反对极左分子，决议警告说：“那些利用落后工人的这种偏见来蛊惑人心的分子，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的队伍中是不允许存在的。”^③

一九二〇年展开的工业问题讨论彻底结束了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从那以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军队和股份公司所特有的那种权威等级制和级别制也适用于苏维埃俄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了。从“工人就是在工作台边劳动”这一角度来说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呢？这是人们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战时共产主义濒于危机时，许多工人和共产党员感到震惊，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这期间，苏维埃制度的政治结构已经起了许多变化，它已能控制这种反应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六、政治权力的集中

从理论上说，布尔什维克已把地方、地区和全国苏维埃这样

①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2页。

的等级制度变为治理的俄国形式。这可以说已接近巴黎公社和一九一七年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思想，即分权制的、直接的民主（然而，它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代表比例严重不均衡而受到了限制）。实际上，离真正实现这种民主还相差很远，而坚持要求实现这种理想的反对派正处于被定为“非布尔什维克”的危险之中。在内战年代，苏维埃很快只剩下一个形式，它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批准由共产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共产党干部已作出的决定。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开除出了苏维埃（尽管这两党的残余分子一直存在到一九二〇年，有时处于半合法状态），从而使苏维埃完全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的组织问题首次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人们对苏维埃的衰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民主集中主义者对苏维埃进行辩护，并要求进行改革，以便使它重新成为有效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机关。奥新斯基建议：把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它们实际上应作为议会内阁发挥职能，而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应保留以前授予它的立法权；地方机关应按照类似的方式加以改造，并恢复它们的职责。^①

这种改革思想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太弱，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对政治组织的设想与共产党关于统治就是“作出决策”的这一基本设想是相抵触的。列宁宣称：“而用议会的办法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②与执行权交织在一起的立法权被执行机关所吞食，苏维埃代表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失去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

^①参阅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138页。

力，这些权力为人民委员会所接管。与此同时，政府机关的权力又转交给了相应的党的机关，实际上大部分的决定是由党的机关作出的。在党内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的权力又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手中，并由中央委员会转到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手中（中央政治局是由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创建的）。权力集中在一个较小的有工作能力的机构手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较大的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只不过是批准上述小委员会的决议，在共产党的严格纪律下，这种批准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自动的例行公事。这样，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发展就合乎逻辑地导致个人专制。

在理论上，共产党同苏维埃制度一样应是最民主的；所有党的负责干部要由党员选举产生，政治路线要在每年的党代表大会上确定。但是，行使权力的实际情况、独裁统治的状况和内战的困境很快使党内民主成了空洞的形式。在中央委员会这一级也很快出现了强烈地希望简化决定过程的要求。在一九一九年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期，大家一致认为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不能胜任它的任务。党的领导也觉得中央委员会担负的日常行政工作过重。担心党的民主将丧失的人认为，中央委员会太小了，以致不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反对派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真正能起作用的党的议会。乌克兰人斯克雷普尼克抱怨说：在作出最终决议之前，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通过讨论提出党的集体意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才能把它的集体意见付诸于实践。”^①

奥新斯基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了，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上升为一个真正的集体机关，并给予它实际的决定权；不过，他竭力避

^①斯克雷普尼克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开对议会制的谴责。他表示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一九二三年再度出现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必要广泛地接受工人加入中央委员会；有必要吸收足够数量的工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无产阶级化。”^①与此同时，他还建议中央委员会成员应从十五人增加到二十一人。

对此，党代表大会原则上表示同意。所以，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十九名委员和八名候补委员。在新成员中，有明显赞同托洛茨基温和的左倾思想的代表，如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和列·波·谢烈布利雅柯夫。另外几个新成员是加里宁（他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元首）和托姆斯基。在军事问题争论中已经站在对立面的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舍维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显然，想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来使普通党员获得更大监督权的试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统治就在于决策”的这种思想依然存在。扩大中央委员会就意味着降低工作效率，从形式上说，进行领导的是中央委员会，但由于它过于庞大，领导权又不得不移交给委员会内部的一个很小的核心集团。

实际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这种集中权力的作法，因为大会决定了一项重要的集中化措施——设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五名中央委员被选进政治局，他们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信徒克列斯廷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加里宁成了候补委员。^②组织局在它成立的第一年里还没有固定的成员，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它是由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成员轮换地组成。^③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局成员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还没有开始插手党的组织工作。

^①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

^③同上。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也作出了反应。曾掌管党的组织事务的斯维尔德洛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逝世了。党的档案文件大部分都在他的记忆中，随着他的去世也都丧失了。为了避免将来再出现这种问题，改组了书记处，它有一个较正式的组成和一个由组织局委员领导的技术参谋部。^① 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他因此成为当时党内最有权力的人物。^②

就技术工作而言，这些新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但它们很快成了它们当时所主管的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们确定一般政策和管理党的组织。这样，决定权限的集中因此又进了一步，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局的指示来统治的，而这些指示又是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加以公布的。按此方式苏维埃这个更大的团体也同样地失去了它们的权力，而由人民委员会来行使它们的权力。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党的最高领导是比较稳定的；它是由列宁主义者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这两个势均力敌的部所分组成。由于联合问题而在一九一七年辞去职务的右派分子逐渐地又被接受加入中央委员会（加米涅夫于一九一九年，李可夫于一九二〇年）。在一九二〇年选出的新的候补委员中还有莫洛托夫。政治局在一九二〇年以前没有什么变动，组织局的成员也最终确定了，他们是：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李可夫和斯大林。^③ 与此同时，书记处扩大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担任了克列斯廷斯基

^① 参阅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05—507页。

^②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33页。

^③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组织报告》，见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真理报》。

的副手，显然，这三个人全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一九二〇年三月，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团的威信已经提高到空前的程度。

在同一时期，类似的专制倾向已在共产党基层组织显露出来。一九一九年年底，整个党实际上已是一个事业组织，它全力以赴地领导内战。列宁坚定不移地坚持绝对的纪律，他说：“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由此得出的结论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②

“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说，“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人们像大革命前那样严格地强调了集中制：“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③在克列斯廷斯基领导下的书记处已把这项原则付诸于实践，并开始随心所欲地调动党的干部——出于各种政治原因，以便结束个人冲突和遏制反对派。^④

集中制作为战争的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被普遍地接受了，它甚至也为民主集中派所接受。战争结束后，人们再次要求使党的机关重新变成一个更多地执行分权制而很少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实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81页。

^②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01页。

^③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67、568页。

^④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际上这一点从未实现过。内战在组织方面造成的后果已成为左翼反对派希望把党建成一个民主的组织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场反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风暴。大会的第一个发言者，即当时的“区联派”分子尤烈涅夫首先指责说：“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在集中制问题上已作出了‘纸上的许诺’，但后来它执行的政策……完全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应是“一个负责的部，而不应是一个不负责的政府”。^①加米涅夫以党领导的名义用党经历了一切艰苦的斗争作为理由来解释目前出现的状况，他说：“是的，我们曾借助于专政来实行管理，但如果我们在发生非常事件期间召开中央全会并按照议会的办法来决定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无疑已经毁灭了革命……。我们不得不实行建立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的专政，正因如此，我们才贯彻了正确的路线……。”^②的确，中央委员会曾享有这种信任，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站在以列宁为领袖和以党的统一为理想的旗帜之下。

主要使左派对集中制引起反感的是按官僚制建立起来的“政治部”，它取代了至少还是按民主制建立起来的地方党委会。随着这一部机构的建立，有关企业、工业部门、地方或有关组织的全部政治活动都得服从于上面的严格控制。这种新方法来自于军队；就象从一开始让人理解的那样，政治部是一个军事专制机构，它的任务是向下作宣传，而不是向上转达各种意见。在顿涅茨盆地煤矿使用政治部是特别起作用的，它既能压制反对派，又能提高工业生产。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杰作——是他偏爱专制

^①尤烈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加米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方法的早期见证。^①

萨普龙诺夫认为，政治部的扩展是整个党内灾难性发展趋势的标志：

“它（中央委员会）要以政治部主任代替煤矿工业的党委会……省委会已被有计划地取消了……中央委员会认为（地方）党委会有资产阶级的偏见，它是保守主义的，它已达到背叛的地步；而采用新的形式就是以政治部代替党委会，政治部的领导本身可以代替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你们要使党员变成听话的留声机，并以领导人的身分命令他们：去工作吧，去鼓动吧！但他们却无权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和自己的组织。

我要向列宁提问：由谁来任命中央委员会？难道你们认为，在这里也可以实行一长制！在这里也将任命一个唯一的司令官。尽管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革命就将失败……

列宁同志……请允许我们这些愚昧者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您按这种制度行事的话，难道您认为这将是最好的革命吗？”^②

一九五六年突然想对斯大林主义弊端加以解释的共产党人，似乎可以从这里开始进行他们的研究，以便找到他们的答案。

民主集中派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以致实际存在的一大弊端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组织的基本设想。就象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以及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统一是至高无上的；党应成为阶级斗争中最坚强的先锋队；全体党员和所有地方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党的纪律，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在与党外人士保持各种关系的同时必须拥护党代

^①奥新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加米涅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会和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和列宁确定的路线。

民主集中派的改革建议是好的，但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例如他们没有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地方组织的独立性。他们只是抗议党中央不尊重地方委员会的权利，如中央指派地方领导干部或将地方党委会下级机关直接置于莫斯科党的书记处控制之下等。民主集中派的错误是：他们企图改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重新调整政治监督的形式或试图向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而不去从根本上触动滥用权力的真正发源地。

集中化的发展过程和压制反对派的做法早在内战时期党的文件中就已清楚地表露出来，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列宁的集中制是在革命任务得到解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完全实现的。早期人们能大胆地向列宁提出某些批评，这与后来笼罩全党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分子就象回顾党内民主的黄金时代一样回顾了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之前反对派的权利是为党的领导所承认的。季诺维也夫说：“每个同志只要认为有必要将党和苏维埃的航船引向另外一个方向，他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的权利。”^①接着，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民主时期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里，反对派使用他们的权利，并几乎改变了国家航船的组织方针。

七、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一九二〇年秋，共产党人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最后一次较大的战役也已接近尾声，那是一场与波兰人作战并攻克白军弗兰格

^①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尔集团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堡垒的战争。当战争压力消除时，反对派抗议共产党党内专制制度的风波重新出现。自一九一八左派共产主义者运动被击败以来，列宁的权威已不再受到严重威胁。

但是，党组织的官僚主义问题和党内“上下级”关系问题（也就是党内主要领导干部与一般党员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仍是引起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一九二〇年年中，党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和它在党的队伍中所产生的影响已流露出忧虑的心情。坚决反对破坏民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尽管他当时已是党的最高书记处书记）起草了几份有关官僚主义问题的提纲。这些提纲经过修改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通报在党内进行传阅。^①通报中承认：革命的理想被实用思想、官僚主义例行公事和追求名利的自私自利所扼杀。然而，除了这些老生常谈外，这份通报与其说是抨击了所谓的弊端，不如说是在极力为这些弊端进行辩护，因为通报中说：不要抓住一个按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问题不放。恢复平等的要求被作为一种煽动而遭到拒绝。改革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基本上被篡改为在官僚制内部进行改良的思想；它强调的是，加强对上面的监督，提高工作能力和道德水平，以及通过提拔来酬报功绩。

显然，一般党员对这一通报是不满意的。不久，设立了一个检查组织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有两名极左派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正式代表”，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工人反对派（他们自称为工会左派）的代表叶·尼·伊格纳托夫和民主集中派代表萨普龙诺夫。^②这两个人的任命是值得注意的，它表明已充分承认反对派的

^①参阅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5页。

^②参阅《中央委员会有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到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5页。

权利；对于这一点，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加以肯定；并且使人清楚地看出，极左派在一九二〇年这段时间内已是多么的强大。当一九二〇年九月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召开时，民主反对派正处在它发展的全盛时期。

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对党的机器操纵一切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与地方组织未能保持足够的联系；无计划地调动党的工作人员；没有充分注意引导人民去完成经济任务；党的教育工作缺乏集中领导（这是对书记处宣传鼓动部领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抨击）；组织机构普遍地不能适应向其提出的要求。^①已加入民主派的布勃诺夫解释说：“最近半年里，根本就没有公布组织工作政策。”然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党的领导仍能使代表大会接受一项决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例外），并承认近期在加强党机关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②

在这以后，批评的重点改变了。^③萨普龙诺夫再次重申了民主集中派有关“官僚主义集中制”的论据和工业、政治组织中一长制所具有的危险性；他还说：在党的各级机关中，“官僚主义”已盛行起来。他认为最好的药剂是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影响和加强党机关中的集体领导。尤·赫·卢托维诺夫谴责领导在对付反对派时所使用的办法。按照他的观点，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滥用中央权威，以及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已将它的职能从“领导”扩大到“管理和执行”上。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领导和反对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更多地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而不是在于基本原则有所区别。

^①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

^②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

^③参阅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的《真理报》。

双方一致的意见是：官僚主义或组织上的削弱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意见分歧仅在于哪种情况更危险。党的领导主张保持组织上的强大，以便战胜反对派；这一点明显地表现为他们后来是何等充分地利用权力。他们公开宣称：党的头号任务是反对伪称保护党的下层，反对最高领导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偏离行径”。^①这时，左派却不去反对加强党的机关，他们同多数派一样，坚决批评书记处的工作缺点，他们天真地认为组织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武器。而这种态度在逻辑上是与他们的立场相违背的。

为此目的，代表会议采取了一项具体的措施：建立了若干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省党组织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七人组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当时的两名追随者）、列宁分子穆拉诺夫和地方组织的四名代表。^②各监察委员会应当克服所有众所周知的官僚主义毛病和代表一般党员的利益。左派丝毫没有让人看出，他们不是从内心同意这种思想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发表一项空洞的民主宣言而告结束。这项宣言——关于党组织的决议——与其说象党领导的声明，不如说更象极左派的论坛。决议要求：“……必须更广泛地开展对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的批评”，必须停止由中央来任命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做法，同样“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决议特别强调的是：有必要再次引导全党重视为实现广泛的平等而斗争，第一是在党内；第二是在无产阶级内部，而主要是在劳动群众

^①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这段时期工作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八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

^②参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4页。

中；第三是在各种官员和各种干部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生活条件方面、工资数额方面，等等）。①

这是共产党自由主义的顶峰，它与一九〇二年的列宁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党不得不正式支持如此具体的民主原则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左倾思潮当时是多么的强大。很显然，党的领导认为作出这种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以便牢牢地掌握党的机关和获得喘息时机。列宁没有使用诽谤性的语言；据说，他称一九二〇年的反对派是“完全健康的、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是由努力进行军队建设向和平建设过渡的自然反应。②但目的就是统一，而让步也仅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种情况持续不久，因为有一些事件不允许让步。

①参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卷册，第40—43页。

②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第《真理报》。

第五章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尽管在一九二〇年与白军和波兰的斗争还要延续大半年的时间，但从这一年开始，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已不再受到严重威胁。共产党领袖们已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社会的建设。通常，当革命者着手解决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时，新的意见分歧就又产生了。这一次，争论是由工会问题引起的。争论的起点是工会的实际职能问题，但争论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它涉及到未来苏维埃国家的基本设想以及它与所宣布的目标的关系。在这方面出现了根本不同的看法。所以，工会问题所引起的这一场激烈的争论可与当年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所引起的骚乱相提并论。像整个七年的派别斗争时期那样，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之间的鸿沟再次出现，对立的阵线也形成了。

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像许多严重的政治纠纷一样，共产党人中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并不是在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这段时间内突然出现的。自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党内争论就始终与工会和工人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工会问题同一般的政治管理和工业管理问题一样，引起争论的根源就在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曾把其根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

邦思想。在这次争论中，左倾分子试图把工会和群众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管理说成是革命的理想。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人监督”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国有化和国家直接对工业的集中管理。工会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工团主义遗产的受益者。一九一九年三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说：“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①布哈林在他的新社会理论中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工会的首要任务是在生产关系中代替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基本组织。^②

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批准了关于未来工会的形式，即工会“国家化”，这是在随后一年的争论中形成的一句关键性的术语。工会的职能应当扩大，应当与领导和管理工业的国家机关职能融合起来。这是一个或多或少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后果必然导致工会和国家机关的紧密合作，工会并将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教育为国家机关和所有经济管理机构培养一大批能完成经济管理任务的干部”。^③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就他所管辖的这个部门的问题说道：“劳动人民委员会机构也必须建设在工会机构这一基础之上。”^④工会的行政管理权的另一个方面是负责加强劳动纪律、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阻止罢工的发生。它们的职权范围还包括发放奖金，督促和动员工业和军事战线上的新兵。^⑤

① 《俄国共产党（布）纲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41、542页。

② 参阅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81、82页。

③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速记报告》，一九一九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97页。

④ 同上。

⑤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202—209页。

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也就是在私有制被废除而真正的公有制还没有建立的间歇时期，工会在工业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①工会领导中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首领是托姆斯基，他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拥有很大的权力，并享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但是，在工会领导与一般会员关系方面，民主思想根本没有得以贯彻实现。实际上，工会承担的一般管理职能愈多，它本身就愈官僚化。②作为极右派而又始终害怕雄心勃勃的纲领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只要所有工会……不放弃参与生产管理的权利，我们就无法避免官僚主义。”③然而，有关工会未来问题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工会领导人是否具有领导生产的能力以及他们对会员应担负什么责任的问题，而是围绕着国家基本经济状况和革命纲领的前景这类更大的问题。

一九二〇年，战时共产主义已进入死胡同，经济日趋衰落，工会工作一片混乱，工人像农民一样已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时，党的高级干部已开始比较现实地看待战时共产主义。他们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但对革命政权的继续存在来说又似乎是非常必要的管理制度，而不是通向社会主义仙境的捷径。工会很快感到，在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股黎明前的冷风。

二、托洛茨基和劳动军事化

使工会问题成为共产党人政治讨论大课题的人是托洛茨

①参阅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78—93页。

②参阅瓦尔德马尔·科赫：《布尔什维克工会》，一九三二年耶拿版，第81—82页。

③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基。在战场上的危险被排除之后，他开始将他的精力和他新养成的命令习惯用到了复兴经济方面。他建议要用经过多次试验被证实是有效的集中指挥的军事方法和纪律来克服通向共产主义胜利道路上的障碍。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纳，而由此引起的讨论范围则日益扩大，直到整个党由于各派在社会组织基本原则问题上展开的争论而发生分裂为止。

一九二〇年，传统性的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物质刺激办法已被党的领导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尽管有许多工人代表对此大发牢骚。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初采用的改革措施是：把部队投入生产劳动，以完成民用生产任务，同时强调军事纪律的作用。在内战的严重阶段渡过以后，托洛茨基特别希望把他辛勤建设红军时所使用的组织手段用于和平目的。他竭力建议：在经济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要解散军队，而是要把它作为劳动大军用于经济建设。^①托洛茨基认为，从长远看劳动军事化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可以动员群众解决国家决定性的经济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中央建议的、保证实现既定目标的计划经济，如果我们要在当前发展阶段上按照经济计划来分配劳动力，那么，劳动群众就不能在整个俄国到处流动。他们必须完全像士兵那样有组织地、在统一指挥下投向所需要的地方……不这样做，我们就谈不上在崩溃和饥饿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工业基础。”^②

军事化给工会带来了许多后果：“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要工会去为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是要它们为完成生产指标去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并提高他们的纪律性……。它们应当与国家共同行使它们的权力，以便在各项经济计划范围内引

^①参阅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51—155页。

^②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导工人。”^① 简言之，应将工会与国家机关融合起来，剥夺其无限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并使之变成经济军事化的工具。

托洛茨基承认，如果把想像中的控制劳动力的体系以及复杂的国家、工会和军事领导机制运用于全体人民之中，那么，它必然会带来一些“强制措施”。按照他的观点，这些强制措施是合法的，不仅因为它们是用来克服经济危机的暂时手段，而且也因为这是在一个农民落后和工人不关心政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唯一的途径。^② 他直言不讳地解释说：“军事化的基础是国家强制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要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始终只是一句空话。”^③ 根据集中化的这一理由必然得出应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这一目标。托洛茨基（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里是所有集中主义者中头脑最发热的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抱怨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项唯一能代替竞争法则自发作用的经济计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困难就在于这一点。”^④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满意地赞同了托洛茨基关于计划问题的总结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报告列举了许多急迫而又明显的经济问题。^⑤ 到这时为止仍然有人反对实行包罗万象的计划，但这似乎是领导人中间的政治分歧的结果。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李可夫，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本能地觉得受到托洛茨基的威胁，他把托洛茨基的计划思想看作是不切实际的抽象概念而加以拒绝

^①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3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俄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劳动问题提纲》，见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③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页。

^④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参阅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页。

了。①李可夫失败了。托洛茨基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后改名为劳动国防委员会）被宣布为最高经济权力机构；犯了支持集体管理体制错误的李可夫不得不放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交出了他还掌握的工业大权。②托洛茨基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他对于那些出于怀疑或害怕原因而反对他提出的严厉措施的共产党人一点不讲宽容。关于军事化问题他说道：“这一措词在反对派中立即唤起了各种迷信想法，反对派已发出了很大的愤怒声。”③他断言说，支持反对派的主要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任务、具有资产阶级和工会偏见的人。他称孟什维克是他的敌人，他显然已准备像反对倔强的农民那样用强制的手段去反对他们。如果大多数劳动者不懂得为他们的实际利益服务，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共产党领袖不能因此而逃避责任，即使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也必须竭力选择一条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在一个落后而又得不到世界先进国家的革命支持的国家里，首先应不顾目光短浅的愿望，强迫人民接受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它的活力。

就他的经济思想来看，托洛茨基是最早的斯大林分子。他有关工会组织的纲领（它强调工会应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纪律负责）为斯大林一九二九年统一工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总的说来，托洛茨基认为政府机关在经济生活中应拥有较大的权力，强制手段是必要的，由此他为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经济政策。当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很大区别，几乎很难想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能大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托洛茨基的严格性产生于他的信念，他于一九一九年写道：“如果每个男女劳动

①李可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190、370—371页。

③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页。

者都已感觉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快活、更自由、更纯洁和更有价值了，那么，我们的革命才算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达到这一根本而又唯一的目的，我们面临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①托洛茨基的理想和斯大林的现实之间的一个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两个人都试图借用俄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建设一个工业强国。由于这一深刻的根源，在当今的世界上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军事化的工业社会诞生了。

托洛茨基用他的军事化建议捅了真正的马蜂窝。激烈的抗议来自极左派，他们出于某种思想动机拒绝托洛茨基的专制主义和集中制。弗·米·斯米尔诺夫警告人们不要对有较高觉悟的社会阶层采取过分独裁的态度：“我们不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军事化。如果在所有的经济部门实行军事化，那么它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整个面貌，并破坏现存的上下层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这种作用现在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果这样做了，党就像一个企图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拔的人一样。”^②为了避免极端的官僚主义弊端，现有的机关必须像工会那样实施严明的纪律和行使必要的权威。非常的领导方法将使民主政权机构的成员失去对领导的影响，而党的领导将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自己负责。由此可见，斯米尔诺夫具有非凡的远见。

对军事化发出的另外一些怨言来自党的右翼和经济领导中的谨慎的列宁主义者——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③列宁当时是支持托洛茨基的。这两个人都准备最大限度地采用强制措施和暴力

^①托洛茨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是科学的还是仅仅如此？》，《托洛茨基全集》第一卷，第170页。

^②弗·米·斯米尔诺夫，《义务劳动和军事化》，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③多伊奇尔，《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92页。

手段，以便保卫革命国家，并开始发展俄国的经济，这两个人还希望能利用工会来提高劳动者的纪律性，并对他们实行监督。^①后来，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列宁主义者之间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是在难以捉摸的理论问题上爆发的。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谈到工会参加工业管理时使用了“国家化”这一术语。莫洛托夫对此提出了责难，他说“国家化”这个术语令人难以理解，他认为工会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实现国家目标的工作。莫洛托夫断言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批评布哈林，“我们不应当按官僚主义的方法，而必须按民主的方法来工作，劳动群众应自己组织起来。我想，这是对工会国家化的观点提出的主要指责；通过工会来提高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这是必要的。”^②这就是列宁马上采纳的“传动带”的理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应该接受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激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为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完全符合一长制的原则。列宁让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工会应当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进行解释工作，说明必须改组工业管理机构，使它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工作效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集体的管理机构，并在直接的生产单位中逐步实行一长制。”^③在实现这一目标时，较妥当的办法是：工会形式上要与国家保持分离，并给予它一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党的监督要保证使工会服从于最高领导。

在一九二〇年春秋之间，托洛茨基已有机会将他的军事化计

^①参阅列宁：《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370页。

^②莫洛托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2页。

划贯彻到实践中去。当运输系统（它始终是俄国经济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混乱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时，托洛茨基被委派去整顿运输系统的局势。他除了继续担任军事人民委员外，又被委任为运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时，铁路职工完全被置于军事纪律之下，托洛茨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军事原则整顿政治工作。他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这是一种按军事原则把党员组织起来的、充当发号施令机构的辅助环节。^①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坚决性但又缺乏策略性的办法，使车轮又重新转了起来——即使这会引起许多个人摩擦（特别是政治管理人员与铁路工会领导人之间的摩擦）。

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波兰作战的苏维埃军队想阻止它们的失败变成无秩序的逃跑时，运输业的紧张状况也达到了它的顶点。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嘴巴，托洛茨基在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同意下断然驱逐了铁路工会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按其“国家化”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机构，即运输事业中央委员会。运输事业中央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工会和政治机关的联合体，管辖整个铁路和水路交通部门。它在托洛茨基个人领导下严格按照军事原则和官僚主义原则进行工作。正常运行的等级制的目标至少在这个领域里已成为现实。^②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由于这种制度极端的官僚化和过分的集中必然会招致严厉的批评。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原则性的批评，它主要来自极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还来自右派中的谨慎的列宁主义者；此外，这种批评还带有一些个人成见。但事实上是，托洛茨基的军事化思想和他采用的建立运输事业中央委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220页。

^②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7—78页。

员会的办法不是那么深受群众欢迎的，并为别人抨击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政治资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他很快就这样干了。^①

三、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反对派

极左派对托洛茨基的军事化计划反应最强烈。他们不仅是工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最教条的拥护者，而且在当时统治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从而也是工会独立自主主义的直接受益者。在一九二〇年整个一年里，左翼工会领导人一直在同那些想把工会置于党和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力量进行斗争。争论最后竟激烈到如此程度，工会极端分子组成了一个自称为党团的组织，为工会在国民经济领导中获得管理权而斗争。这个组织就是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工人反对派”。

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工会工作者企图在党纲的基础上实现他们的权力要求。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托姆斯基在一项声明中写道：“工会普遍感兴趣的是，恢复生产和使生产能正常运行。”^②这与托洛茨基的工会计划是完全一致的；以工会工作者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只在于：工会是独立地领导经济还是按照国家最高领导的指示去管理经济。布哈林解释说：工会“必须成为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基地，所以任何削弱工会……的企图，都是与此严重相抵触的……”然而，他马上又用比喻的方式给这句强有力的话加上了一项基本条件：“工会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单独承担这种或那种职能，而是与一般的苏维埃机关结合，来发挥

^①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257—258页。

^②托姆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工会的任务》，代表大会文件附件1.3，第534页。

其作用……”^①

因此，这种把工会置于国家之下的观点是与工会工作者的愿望完全相违背的。施略普尼柯夫明确地要求党、苏维埃和工会三家来进行“权力分配”，同时每个组织应当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里独立地工作。^②为民主集中派说话的奥新斯基支持施略普尼柯夫的思想，并谈到“多种文化的冲突”问题，像“军事苏维埃文化”，“民间苏维埃文化”和工会运动所创造的“独自的文化”。按照他的观点，强迫一种类型的组织接受另一种类型的组织的权威，或者把仅适用于一种文化的方法（例如军事化）运用到所有的“文化”中去，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③冶金工人领袖尤·赫·卢托维诺夫直截了当地说：“按照我们的观点，只有工业工会有责任领导工业部门，只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才能领导所有的工业部门，其他做法都是不行的！”^④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只是以谩骂来作出回答。列宁说：“俄国共产党决不能同意，党只应是政治领导，工会应是经济领导。这是来自破了的第二国际的观点。”^⑤党的领导人之所以对工会负责行政管理产生反感，部分原因在于有这样一种害怕心理：如果工会真的独立了，那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能重新获得影响。^⑥克列斯廷斯基谴责工会纲领是“工团主义的走私货”，并描绘了他的书记处反对“行会主义—工联主义倾向”而进行的斗争。^⑦党的权威原则与工会享有独立权力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不能

①布哈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施略普尼柯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奥新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卢托维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列宁：《关于党代表大会的议程给俄共各级党组织的信》，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附件2，第474页。

⑥参阅波利多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⑦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致的。在有关党对工会实行监督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过程中，人们已强调了这一点。

工会工作者受到党的权威领导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在党的报刊上和在大会上展开的理论性辩论，而是党的领导企图通过工会里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一个实行独立统治的中心这一行动。在派遣党员参与工会工作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之间产生了摩擦。被左翼控制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要求对各工业工会里的党员拥有直接的支配权。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强调了上述要求；它强调各个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不受地方党组织的监督，而直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的领导。^①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党中之党，即一个有半自决权的团体。如果这成为现实，这个团体将控制相当多的党员，即使不是大多数党员，但数量也相当可观。这样一来，党和无党派工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部门（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主要支柱）将掌握在这个团体的手中。这种党中之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完全违背集中制原则的；更不用说，它是一个由反对列宁领导的左翼敌对分子所控制的党中之党。民主集中派也认为工会工作者的计划有损于党的基本原则，他们在莫斯科党组织通过的决议中说：“党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于工会原则。”^②工会工作者关于党内自治权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决议提交全党组织局批准通过时，这一决议被拒绝了。

但是，工会工作者没有因此被吓倒。在左派最后一次重新掌

^①参阅《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64页，附件32。

^②《俄共莫斯科区域委员会的提纲》，《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42页，附件15。

权的乌克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南方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完全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决议一样要求给工会工作者以党内的自治权。这项提议在乌克兰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并被送呈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期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反对组织局决定时向政治局提起上诉，托姆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向政治局汇报了工会工作者的情况，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党的书记克列斯廷斯基谴责他们具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加米涅夫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比较温和的、但是很坚定的态度反对工会工作者，自治计划再一次被拒绝了。^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确认了党的领导的集中制观点：“每个〔工会中的〕党团都是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隶属于党的委员会，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则隶属于俄共中央委员会。”^②布哈林和拉狄克被派进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以便在那里代表党的领导并施加适当的影响。^③工会工作者现在只能通过向公开的反对派领导成员发出呼吁来促使他们的事业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开始结成工人反对派。

与由工人反对派引起的政治混乱相比，他们遗留下的文献是微少的。很难确定他们在一般的产业工人中究竟有多少追随者，但他们在党内却得到了明显的支持，以致党的领导感到严重的不安，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个集团包括数量可观的、真正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从事工会工作的共产党领袖。最杰出的代表有

^①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卢托维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9—20页。

^③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30页。

第一任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冶金工人领袖卢托维诺夫和梅德维捷夫；唯一与这一规则（工人加布尔什维克加地下工作者）严重不协调的例外就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流亡者和当时的孟什维克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她是施略普尼柯夫的情人（而且也是其他人的情人；她不仅鼓吹自由恋爱，而且也这样实行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工人反对派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东南地区——顿涅茨盆地、顿河和库班地区，靠近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地区。^①在萨马拉地区，工人反对派在一九二一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党组织；他们在一九二〇年布尔什维克党大发展之前已经在乌克兰获得整个共和国内的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其他的根据地是莫斯科地区（工人反对派在这里大约联合了四分之一的党内力量）和全国性的冶金工人工会。冶金工人工会与工人反对派之间的联系那么密切，以致托姆斯基（他于一九二一年初争论变得十分激烈时背弃了工会分子，转入列宁的阵营）把工会的错误归咎于“冶金工人的工业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②党的领导如此反对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比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更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冶金工人，这最能说明当时的革命采取了什么方针。^③

工人反对派在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所拥护的纲领，仅是他们前一年企图支配整个党的那种思想的详尽表述。他们在提交给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曾这样说道：按道理讲，“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它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

^①参阅舍拉温：《工人反对派》，一九三〇年莫斯科版，第26页。

^②托姆斯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版。

^③参阅弗烈杰尔：《战争年代中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4—7页。

经济”。^①阐明工人反对派思想和意图的任务主要落在柯伦泰的肩上。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她为捍卫反对派的观点写了一本题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其主要思想是充分相信无产阶级。

像左翼反对派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内所提出的批评一样，柯伦泰以人们所熟悉的对官僚主义、不平等现象和轻视无产阶级利益的批评为开始，接着她说道：“我们登上苏维埃和党的等级制度的阶梯愈高，我们反对派的追随者就愈少。我们愈广泛地深入群众，工人反对派纲领的感染力就愈大……。如果群众疏远了‘上层’分子，如果中央领导和‘下层’分子之间的分裂和裂缝已显而易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上层’分子的某些作法是错误的。”^②

在工业管理问题上，柯伦泰把各种官僚主义者与群众的创造力相对立，她说：“那么，现在要求谁去建立新的经济形式呢——是由心理上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技术人员和商人，以及由一部分党员所组成的苏维埃官员，还是由工会这一代表工人阶级的集体来建立呢？”柯伦泰相信无产阶级的自发的品德：

“党在当前危机状态下的任务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倾听广大劳动群众的有益的阶级呼声。我们要通过崛起阶级以工业工会为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创造力来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创造力，来清除党内的外来分子，来恢复党内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从而纠正党的工作。”^③

但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曾写道：“……工人群众自己决不

^①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的工人反对派关于工会的提纲，《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813页。

^②亚·米·柯伦泰：《工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第5页。

^③同上，第9页。

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柯伦泰采取的态度是直接同列宁主义的基本组织原则，即只能由党的机关来领导所有革命力量这一原则，相抵触的。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相比较，柯伦泰的思想显然来自卢森堡以下的观点：“无产阶级……必须……行使专政；但这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最积极而又自由参加的情况下，要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行使专政。”^②柯伦泰更现实地说，列宁的组织政策和经济政策损害了革命本来的目标。她警告性地指出，国家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农民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她说：“这就是招致我们苏维埃机构崩溃并在那里制造完全排斥工人阶级的气氛的因素。”^③

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完全有理由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有丧失的危险。梅德维捷夫宣称：中央委员会的“背离行径”在于“不信任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吏特权阶级实行妥协”。^④为了对付这种倾向和活跃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工人反对派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每个党员应有义务，每年要有三个月象一般无产者和农民那样去生活，并参加体力劳动。^⑤

工人反对派的根本动力来自他们的虔诚信仰，他们真诚地信守其无产阶级理想主义，并相信他们的事业必定会胜利。他们的希望在柯伦泰的结束语中表现出来：“党内所有习惯于反映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无产阶级是迅速成长起来的巨人）都将接受和领会工人反对派认为有益和健康的观点。无疑，一般工人会满怀信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

②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一九五七年哈默尔恩版，第81页。

③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第10—11页。

④梅德维捷夫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参阅工人反对派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组织决议。

心地、心平气和地说：“伊里奇会考虑并倾听我们的意见，然后他会决定，党的航船应沿着反对派指引的方向前进。伊里奇将来总有一天会与我们一致起来的。”^①然而，列宁的追随者不会不受列宁本人的影响，他们也不可能抵制列宁本人的诱惑力。

四、工会问题的讨论

一九二〇年秋，共产党内的公开讨论和反对派自由地反对领导人权威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党内官僚主义和军事化所引起的普遍骚动导致了一场关于工会作用和自治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引起人们对革命未来的深切忧虑。列宁之所以没有丧失任何威信地度过了这场风波，这主要应归功于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在反官僚主义力量的火力面前勇敢地作为射击靶子站了出来。

一九二〇年秋，反对派到处起劲地反对托洛茨基给工会戴上行政法规的枷锁。当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十一月初举行时，有关工会问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问题的争论又急剧地爆发了。托洛茨基对代表会议提出的工会和国家工业管理机关完全融合的要求表示赞赏，然后他阐明了他的理想：“使经济的行政管理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的最重要机关。”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工会和管理机关并存的现象（这是引起严重混乱的原因）。在进行这样的改组时，人们必须改变工会的名称，也就是要改变工会的概念——把工会从“职业”联合会改变为“生产”联合会。托洛茨基认为：“必须日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即经常在广泛的群众会议上讨论一切经济生产措施，对一系列经济行政岗位采取选举制……”这只是给他的药

^①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第45页。

方加上一点“工人民主”的甜味。托洛茨基把所有同他的军事化计划相抵触的指责说成是“考基茨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①

青云直上的拉脱维亚工会领袖扬·厄·鲁祖塔克提出了一项（暧昧的）反建议。鲁祖塔克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不久后成为中央委员。②他赞成这样的观点：工会在工业管理中应当保持积极的作用。③然而他的行动显然得到列宁和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的支持。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以便解决意见分歧问题，并为正在进行的工会代表会议确定一条明确的路线。八月份曾反对托洛茨基建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唯一的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再次表示了工会工作者厌恶这一机构的情绪。④这时，列宁已公开反对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以八票对七票的微弱多数否认了托洛茨基的提纲。接着，中央委员会以十票对四票（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安德烈也夫和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弃权）通过了列宁要提交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的决议草案。⑤这一文件要求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强调了军事化和集中制所具有的官僚主义危险性，并迫切建议工会“越来越扩大它在生产中的作用”。⑥这一要求是否能实

①托洛茨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附件10，第186页。

②参阅鲁祖塔克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13、222页。

③《真理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关于鲁祖塔克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

④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72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9—43页。

⑤《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5页，注释1。

⑥俄共党团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决议，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真理报》。

现，人们还不清楚，但看来列宁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推迟决定和堵住托洛茨基的嘴。

这一希望是在一个奇特的政治派别的参与下提出来的，这个政治派别在当时已经形成，即所谓的“缓冲集团”，它是中央委员中某些列宁主义者和温和的左派分子组成的联合体，这些人不是不清楚问题的核心所在，就是企图掩饰争论。在列宁的追随者中，以前的右翼反对派中的谨慎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们与谢尔盖也夫一道）加入了“缓冲集团”。左派的代表是：布哈林、拉狄克、捷尔任斯基以及两位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同样，托姆斯基也属于这一集团的成员。^①在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余下的成员又分成了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伊·尼·斯米尔诺夫、安德烈也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坚定的列宁派（起初除列宁本人外，仅有加里宁、鲁祖塔克和斯大林）。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很深的，而各派的力量又几乎是相等的。

在季诺维也夫发起下，缓冲集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调解争执和推迟决定。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中央委员都被劝告不要公开他们的意见分歧，并成立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小组委员会，以便研究工会和工业管理的所有问题。小组委员会起初的组成情况对列宁主义者有利，小组委员会中的季诺维也夫、鲁祖塔克、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反对托洛茨基一个人。^②托洛茨基不加思索地宣称，他抵制这个委员会。^③于是，洛佐夫斯基（当时是列宁分子）、安德烈也夫（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工人反

^①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5页，注释1。

^②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5页，注释1。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讲话，《关于工会的任务》，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版，第15—21页。

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又被吸收进来，但后两个人同样拒绝合作。^①

十二月，争论进入高潮。托洛茨基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会工作者发生争吵，而季诺维也夫的小组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一份反对托洛茨基的报告。这份报告毅然决然地建议中央委员会解散托洛茨基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在运输业恢复正常的党和工会的组织形式。^②托洛茨基仍坚持他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捍卫官僚主义方法（他的党内对手却更喜欢以民主的陈词来阐明这种方法）。托洛茨基说：“条件并非总是首先可以讨论的……，工人民主问题，我们在这之前早就提出了，现在我们仍主张：扩大批评、讨论和内部论战等等的范围。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也取决于一般的条件……。此外，工会军事化和运输业军事化是内心思想的军事化，是由令人不安（人们对国家的毁灭所产生的自然而又有益的忧虑）的形势决定的。”^③

像列宁的“遗嘱”所表明的那样，列宁把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事务中的行动看作是托洛茨基固执己见的最触目惊心的证据。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其中有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将他们的力量加到了以季诺维也夫为一端的天平秤盘上，但完全像在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争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并没有立即获胜。中央委员会以八票对七票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提议，而这时仅由布哈林为首的温和的左派集团所组成的“缓冲集团”提出的一项调和决议获得了通过。^④决议（以温和

^①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5页，注释1。

^②同上，第825—826页，注释1。

^③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在运输工会中央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五卷，第422—423页。

^④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6页，注释1，见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

的语调指责了托洛茨基)表示反对“自上而下”的改组工会,但强调:通过工会来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和实现“生产中的工人民主”,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这一问题本身,以及重新选举这一机构和呼吁普遍实行“民主制”的问题被简单地搁置起来了。

现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辩论不再受到制止了,而且中央委员会已宣布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二月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议变成了意见争执的主要论坛。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集会上,辩论的序幕终于引人注目地揭开了。所有的主要活动家都出席了会

国家”。列宁怀疑这个先决条件的正确性，他说：“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①

列宁的新观点集中反映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的“十人纲领”之中，这个纲领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费·安·谢尔盖也夫共同签署的。^②这个文件重复了列宁关于工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应发挥其教育作用的论点。它警告说：国家化将危害这种职能，因为它会使工会领导脱离群众。纲领反复地甚至有点使人捉摸不透地强调说服的方法，反对强制的方法，不断重复“工人民主”这个令人神往的术语。文件同时还较详尽地列举了工会在工业方面的职能：参加制定和实行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工作，监督和检查生产进程（这指的是什么，没有进一步说明），确定工人的工资和保护工人免受国家雇主的侵犯。较具体的任务是，进行“生产宣传”和维护劳动纪律。文件还强调：“俄国共产党应像过去一样通过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无条件地领导工会的全部思想工作。”这样一来，工会无疑将完全像党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在这期间，工人反对派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阐明了他提出的由工会独自领导工业的提纲。提纲认为所有管理机关应当由组织起来的工人选举产生，并对他们负责。这就是说，应使工会（类似托洛茨基所计划的那样）变成“生产工会”，整个经济管理工作将集中

^①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08页。

^②参阅《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790—800页。

在它们的手里。为了这个目的，施略普尼柯夫还建议成立一个全俄生产者代表会议。他满怀信心地说道：“按照这种方式就能达到意志统一，而这种意志统一对经济组织来说是必要的，这同时将创造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使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对组织和发展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①

在施略普尼柯夫发言后不久，工人反对派又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有关工会问题的提纲。^②他们从以前的党的文件中，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的纲领和以前的工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精心地挑选出一些引文，作为提纲的论据，而这些文件曾包含了一些工团主义的词语。与此同时，柯伦泰出版了她的著作，即《工人反对派》，并以此在理论上继续进行极左派对党的领导所发起的攻击。

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党团之间的裂痕不断地加深，炽热的斗争也随之越演越烈。当缓冲集团中的左派成员与托洛茨基分子在共同的纲领基础上聚集在一起时，缓冲集团也就最终地消失了。这样，列宁主义者与温和的左派分子随之彻底决裂，他们之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战时共产主义初期建立起来的联合解体了。

布哈林曾把工会“国家化”美化为“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工会‘国家化’和所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来源于转变过程的内部逻辑。”^③布哈林集团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之前）制定的纲领已把工会新道路的理论 with 革命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

^①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经济组织和工会任务》，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2，第789—793页。

^②参阅《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810—815页。

^③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86页。

“如果说普遍渐进的发展路线是工会与国家政权机关实行组织联合（即工会国家化）的路线，那么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就是国家‘工会化’的过程。其逻辑性的历史结果将不在于无产阶级国家吞食了工会，而是这两种范畴（工会和国家）都将会消失，并出现第三种范畴，即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①

托洛茨基集团在这以后不久提出的纲领，表达了温和左派的思想，但并不那么一模一样，它比较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但按照这个集团的观点，无产阶级民主必须从他们所主张的暂时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政策中产生。

“当我们全面地发展这种制度，并日益把工会的负责作用和生产的负责作用紧密结合起来时，我们就一定能使工会从一切方面完全掌握它所在的那个生产部门，同时通过选举和委任相结合的方法，在工人国家的监督和领导下，建立起总的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并与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实现协调一致。”^②

列宁曾这样回答了温和左派的工会纲领，他称这个纲领（完全像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一样）是不可容忍的偏离行径。在他看来，布哈林的纲领“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他就整个争论情况说道：“我们也就是这样从小的分歧‘发展成为’同共产主义完全决裂的工团主义的，……，那末这种工团主义就会使党遭到不可避免的分裂。”^③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来，这样的语言在党的报刊上已很久没有使用了。

①布哈林集团纲领，《关于工会的任务和结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16，第802页。

②《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809页。

③列宁，《党内危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6页。

与共产主义理论相比，工会问题的争论表明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一九一八年从“一脚已进入社会主义”向彻底国有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预言：在俄国，一个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府，除了推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外（尽管这个国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别无其他选择。按照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要在俄国存在下去还取决于第二种含义的革命，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发生，那么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落空。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社会变化的钟摆已摆动得远远超过现有文化和经济状况所确定的平衡点。在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期，共产党认为这种状况已不可能任其再继续下去，否则将必然导致政治灾难和大倒退。因此，工会问题的讨论采用了如此激烈的形式。每个党团在工会问题上的态度，都是以他们关于俄国革命的各自评价——俄国革命具有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它将能达到如何程度——为依据的。

在乌托邦乐观主义鼓舞下，工人反对派决定继续前进。他们提出彻底实行工人民主和由“生产者社团”领导经济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要旨就是立即采用那些社会组织形式，即革命者在一九一七年一致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将要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

托洛茨基分子认为他们提出的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更现实些。他们强调，为了克服当前过渡时期的经济困难，必须强调权威和加强纪律。这就意味着坚持从战时共产主义中产生的工作路线。这时，温和的左派却主张为建立一种机构（国家——工会合而为一的管理机构）而努力奋斗。他们认为，一旦条件允许，这一机构就可以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变成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自治的、民主而又相互联系的集体。

而列宁主义者早就放弃了这种崇高的愿望，并决心开始实行

战略性的退却。然而他们的条件是，要保住党和政府的政治基地，并通过对已被证明直接参加集体管理还太落后的居民实行等级制的统治，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渐进的革命。在这一范围内，工会的职能就是防止群众受到由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可能出现的侵犯，并作为党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联系纽带带来为党服务。

这三派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群众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党实现革命纲领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工人反对派完全受理想主义所支配，并由此而产生一种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土壤的乐观主义；他们抱有一种通过群众自发性来更新世界的神秘幻想。列宁主义者强调政权，强调通过职业革命家的有组织的活动来引导革命，教育群众，走向社会主义。这再次证明，革命前的列宁主义与俄国过去的经验具有何等紧密的联系。另外，他们还具有一种注重现实性、必要性和实用性的强烈观念。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思想中，列宁主义者是教条主义倾向最少的。他们表示在使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应形势需要方面可采取最大的灵活性；但他们同时又坚定地断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即温和的左派分子，站在上述两派的中间。他们认为应当考虑两个方面：即既要考虑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也要考虑为达到此目标以军事形式组织全国力量的必要性。他们既赞同极左派的愿望，同时也承认实现这种愿望的困难，赞同列宁主义者十分重视的官僚主义方法。^①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人陷入了困境。可以认为，这种困境早为俄国革命思想的祖先所预料到了。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十六世纪

^①人们可以发现，这三种观点的特征与通常所说的有所不同，通常的说法是，列宁主义者集团站在这两个极端党派的中間。见约翰·梅纳德：《变化中的俄国》，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228—229页；多谢尔：《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九四九年纽约—伦敦版第222—223页；《卡尔全集》第二卷，第223—224页。

德国农民战争史中已谈到这个问题，但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生中，显然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殊的可能性予以重视：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①

这段话可以说也是对苏维埃俄国所作的一种非常精辟的分析，所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代表了哪个异己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最符合实际的答案也许就是当时许多共产党人著作中所显露出来的答案，即“技术知识分子”。^②

一种革命专政，它既是工人专政，但又给予专家、行政人员和警察一种优先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发生危机的社会基础。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所发生的危机使共产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了使苏维埃政权能继续存在下去，人们付出的代价是苏维埃国家实行了一种管理人员的社会制度。因此，一般的党员开始反对党的领导，而反对派中的极左派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力量。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危险，托洛茨基分子已与列宁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处于腹背受敌（前有绝望的左派激进主义者，后有反共的叛逆者）的地位。党的领导断言，只有他们在执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方针。但是，反对派运动提出要保护工人，并攻击政府放弃了本来的革命目标，这对党的领导来说是最大的威

^①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468、469页。

^②参阅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76—81页。

胁。在此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存在来说，生死攸关的是堵死极左分子的嘴和维护所谓的工人统治。为此，列宁和党领导（包括温和左派在内）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这一目标。在一九二一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第六章 一九二一年的危机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首先是俄国革命，是几场震撼整个社会的大革命。但它们都是按各自的规律发展的。个别革命家的意志，即便是极其坚定果断，也很难控制事件的急剧发展。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后不久，就打算放慢步伐，但他们没能做到。革命激情和社会斗争的高涨把他们推向了极端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疲惫的人民在几个月之后又开始反对极端的革命，并力图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一九二一年初，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它的革命试验走得太远了，根本没有能力满足有组织的经济生活的最低要求。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了公开的农民革命。即使在处理同自己的追随者的关系方面，共产党领导也同样遇到了许多难处，因为它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实行相对的工人民主的革命愿望。其后果是激起了极左派甚至非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愤怒反抗。在一般的工人中，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感也明显地消失了。

为了保住政权，列宁不得不在左、右反对派力量之间谨慎从事。当时的困难究竟有多么大，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就是一个例证。在这场叛乱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情绪爆发为向共产党的统治联合发起公开的进攻。对此作出的回答是镇压和妥协——同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利益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多受到了损害）实行了妥协，但对左派批评家（革命最忠实的信徒）则

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初所经历的危机是由于要压制左派批评这一问题引起的。如果党领导像政治现实所要求的那样要玩弄策略，而同时又要作为革命的化身保护忠诚于自己教义的追随者，那么它必然要消灭极左翼，并使它不能再复活。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已越来越形成这样的风气：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竭力把本身的行动说成是对学说的正确运用，并压制自由的批评。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权已开始违背自己的良心。

一、压制极左派

一九二〇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纸面上的决议并没有使反对派长时间地感到满意，因为不久就已表明：党领导不想在党内民主方面实行文件上所写的较大的让步。十一月，萨普龙诺夫抱怨说，党内官僚主义仍旧在泛滥，最近代表大会决定的方针必须加以贯彻执行，只要勇敢地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就能防止“病魔继续恶化”。①

鉴于极左派的威胁，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首的温和左派分子在组织问题上已坚定地站到了列宁一边，尽管他们在工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布哈林指责莫斯科党组织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和采用了“与共产党员身份不相称的斗争方法”，布哈林并向党的中央领导发出呼吁，要求以纪律措施和调离的办法来加以干涉，他说：“必须健全莫斯科组织……，有必要……清除不安的因素，派进新的、健康的力量……并成立一个严紧而又有工作

①参阅萨普龙诺夫，《关于党的力量的分布》，见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

能力的委员会，它既能工作又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①由于苏维埃政权已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党的领袖们则以经济形势严重为理由，为加强党组织的严格性而辩护。《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只有在我们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度过这一严重时刻，重新建立起各种机构，等等……，内部的软弱动摇仍是主要危险，而防止这一危险的主要保证是掌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意志和行动的统一。”^②

领导受到威胁的一个标志是十一月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的代表选举。联合起来的极左的反对派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莫斯科地方党团，它先与工人反对派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又与工人反对派融合成一体）——获得了一百二十四代表席位，而中央委员会只比它多获得三十名追随者，即一百五十名代表。^③这种情况使人那样地激动不安，以致于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分别举行预备会议，以便统一对派议表态的口径和区域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④这一事件使党的领导人大大为震惊，他们以此作为例子一再加以引用：如果允许自由反对派为所欲为，就有可能给党的统一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当党的领导集团尽力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革命中退却下来，并为此加以辩护时，极左派的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批评使党的领导集团感到难以忍受。

极左派的中心论点仍是众所周知的抉择：要么是民主制，要么就是集中管理和官僚主义。民主集中派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的提纲曾说道：“造成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僚主义

^①布哈林，《关于莫斯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真理报》。

^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真理报》社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③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92页，注释2。

^④同上，第852页，注释60。

的、（垂直的）集权化方针的不断加强。”^①要想使普通党员“发挥主动性和加强独立自主精神”，就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得以保证：“真正给予党内各种派别在报刊上，党的集会上，党和苏维埃的负责机关中享有自由发表各自意见的权利。”工人反对派也具有同样的观点，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其中有一位发言人宣称：“官僚主义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是导致整个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的权威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出现裂痕的祸根。”^②另一位发言人受到了谴责，因为他诬蔑列宁为“最大的官吏”。^③伊格纳托夫集团的提纲建议普通党员通过群众压力迫使党的官僚尊重工人民主。^④

随着官僚制度和民主制问题而提出的挑战，党的领导集团当时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已进行了很长的时期，而且反对派已错过提出某种建议的机会。较棘手的是极左派作出的新结论：苏维埃政权正在丧失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内容”。伊格纳托夫集团说道：“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大量加入了我们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居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内战中遭到严重的损失，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阶级的单纯性，并把分裂因素带进了我们党。”工人反对派强调说，来一次清洗是必要的，以便将非无产阶级分子全部清除掉，特别是将他们清除出党。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建议采取措施，保证无产阶级在各级党委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伊格纳托夫

^①民主集中派的提纲，《党今后的任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

^②彼列钦奇科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会上，他重复了菲·库·米罗格夫的讲话内容，以沙皇官僚等级制度来影射苏维埃制度。

^④参阅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的建设的今后任务》，它是由莫斯科市各区工人积极分子提出来的；见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的《真理报》。

集团的提纲要求在各级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委员是工人。工人反对派也提出了相同含义的要求：党员必须有规律地参加体力劳动，以便与工人的生活条件保持经常的接触。所有这些建议都让人看出，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已感到自己越来越被党的领导集团所抛弃。由此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对党的领导来说已成为一种最严重的危险，这种反抗情绪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达到了顶点。

在地方党组织为准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举行的讨论中，列宁主义者确实遭遇到了反对派的直接威胁。他们竭力向党员呼吁：鉴于外来的危险和内部的困难，要维护党的统一。按照这种方式，他们在地方党代会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迅速发展的党中央机关以直接的组织压力帮助了他们的竞选活动。

（例如，柯伦泰控告说，她的《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的散发工作遭到了破坏。①）

莫斯科仍旧是反对派的一个堡垒。当一月份开始讨论党代会筹备工作时，莫斯科党委会就各个党团的提纲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明显地显示出各种观点的组织实力：列宁获得十九票，托洛茨基获得七票，布哈林获得四票，萨普龙诺夫（民主集中派）获得四票，伊格纳托夫获得三票。隶属于莫斯科党委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同时也进行表决，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列宁获得五十七票，托洛茨基获得二十票，布哈林获得一票，萨普龙诺夫获得七票，伊格纳托夫获得二十二票，施略普尼柯夫获得四票。②列宁派在两次表决中仅勉强获得比整个反对派集团稍多的票数，但温和的左派和极端的左派由于在党内和经济生活中是否实行集中领导的问题上已形成很深的裂痕，从而妨碍了他们向多

①参阅柯伦泰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的《真理报》。

数派发起联合进攻。在组织问题上，温和的左派更是真心实意地站在列宁派一边，反对极左的反对派。

彼得格勒党组织与莫斯科党组织明显不同，季诺维也夫领导下的列宁主义者在那里稳操胜券。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彼得格勒党组织开展了一场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并严厉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行动，因为托洛茨基损害了党的统一，并破坏了党和工会之间的联系。^①托洛茨基的回答是：捍卫他的工会计划，并要求通过公开讨论而不是采用彼得格勒党组织惯用的组织压力手段来解决争执问题。^②在同一时间，莫斯科党委会以十四票对十三票决定采取公开反对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态度，指责它违背了正常的辩论规则。^③莫斯科党委会也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并要求它保证无偏袒地向所有的地方组织提供资料和分配发言人名额等，从而使所有的派别都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同等机会。他们认为，一种特殊的危险就是“彼得格勒党组织自己变成筹备党代会的专门中心这一倾向”。^④这是指列宁主义者利用彼得格勒党组织作为基地，对其他党组织施加压力。

在工会问题上的激烈争吵使列宁派和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温和的左派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次，中央领导机关没有为列宁所掌握。中央委员会分成了几乎势均力敌的两大派；至于书记处，它的三名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全都坚定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几个列宁主义者（首先

^①参阅俄共彼得格勒党组织向党提出的声明。见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的《真理报》。

^②托洛茨基，《给彼得格勒同志们的答复》，《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7，第779—781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给彼得格勒同志们的答复》，见《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1，第826—827页。

^④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莫斯科党委会决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6，第779页。

是季诺维也夫)已在积极准备批评托洛茨基派的书记们,不仅指责他们无能,而且谴责他们不民主的行为。^①季诺维也夫集中进攻组织局,并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将这件事提到了中央委员会。当时组织局由五名委员组成——三名托洛茨基派的书记和李可夫及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由托洛茨基分子和李可夫组成的多数派维护组织局;尽管列宁当时不在场,但名列第五位的组织局委员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列宁主义者紧密配合行动。^②看来,这场演习对斯大林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尽管列宁主义者在党中央机关人数不多,但他们已能聚集一定的力量,保证他们取得明显的胜利。看来,他们确实利用了新的监察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太喜欢用组织压力手段来反对极左分子。于是,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被调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阿·亚·索尔茨(一名热心的机关工作人员)接替了他的职务。在争论期间,捷尔任斯基(当时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也调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③索尔茨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之后,谴责了处于分裂状态的党领导,说它太软弱以至没有力量约束极左分子,他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拒绝领导这场运动。”^④后来,列宁主义者不顾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内以八票对七票的微弱多数强行通过了一项有利于他们的决议,它允许在各种纲领的基础上分别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代表。这是共产党人从前和后来都没有的做法,它几乎使多党

^①参阅沙波罗,《共产党权威的起源》,第269—271页。

^②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见《中央委员会备忘录》,第16页。

^③参阅索尔茨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党的基本决议中有关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院委员会的论述》,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12、13页。

制在自己的队伍中合法化了。①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样会使选举成为一个对列宁信任或不信任的问题，而当时只有少数人准备采取反对列宁的态度。

在调动了所有可供使用的政治力量和最充分地利用领导威信的情况下，列宁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活动；至于它所产生的效果，地方党组织的表决结果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例证。他们采用的密集炮火战术引起了许多抗议，莫斯科党组织并因此号召人们克制：

“鉴于讨论……已变得过分激烈，并对一批同志进行了个人攻击这一事实，莫斯科党委会要求所有党组织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有争议的核心问题上，并告诫所有同志不要采用那些可能削弱党的统一和实际工作的论战方法。自由讨论和自由宣传这一种或那一种纲领，绝不允许导致党的统一的削弱，党的统一在今天和将来都不允许受到侵犯。”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特别抨击了列宁主义者的策略，说他们损害了党的统一，从而帮助了敌人，使敌人得利。“如果一种致命的危险威胁着党和工会，那么，彼得格勒党组织多数派的声明使用这样一种语调，是很自然的。但事实上，这一声明更加激起论战的热情和神经质，导致了狂暴的行动，并在地方党组织中制造了恐怖气氛。”③无疑，党团之间的斗争仍在持续地进行。

在一月十九日波罗的海舰队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主义者胜利地击退了说他们是“委员”派的这种指责，并获得了百分

①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7页，注释1。

②莫斯科党委会声明，《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的《真理报》。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怎么不应讨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

之九十的选票。^①但在第二个月，反对派的反抗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征兆，说明投票结果是相当勉强的。这样，所谓的舰队反对派就产生了，而且它已能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向领导机关提出批评：“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部不仅与群众而且与积极的政治工作人员失去了联系，它已经成为一种毫无威信官僚机构……，已完全脱离了党员群众，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已挫伤了所有的地方积极性，它已把整个政治工作降低到书记通讯联系的水平上。”^②像报告所说的那样，代表们回到舰队后说，那是一次“击败专政制的胜利”。^③感情的弹药库已装满了火药，它后来在喀琅施塔得爆炸起来。

然而列宁主义者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反对派集团能进行激烈反抗的地方党组织中也获得了明显的胜利。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图拉市党代会上获得了五百八十七票，工人反对派获得六十票。彼得格勒市党代会的代表选举结果也证明了列宁主义机关在那里是强大的，他们获得了一百七十四票，托洛茨基派获得十一票。甚至在该市的十一个行政区中的三个区里，列宁主义者的候选人一致当选。看来，列宁主义者取得的这一胜利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反对派也从来没有指责过选举中有什么欺骗。要理解这种局势，人们必须看到列宁本人的巨大影响，看到内战中形成的、要求党统一的传统有何等重要意义。此外，选举采用的不是秘密投票，而是公开表决，这是一种更巧妙地施加压力的方式，因为人们注意到党员是不大愿意抗拒地方领导的。

^①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真理报》。

^②普乔夫：《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三一年列宁格勒版，第52页。

^③参阅普乔夫：《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三一年列宁格勒版，第53页。

在一些地区，列宁的机器工作得近乎完美无缺。在伊凡诺沃—沃斯克列先斯克市党代会上，除了二十七票外，列宁主义者获得了九百张选票中的其余全部选票；而在特维尔，在总共三百五十八张选票中只有九张反对票，十张弃权票。在某些情况下，列宁主义者甚至在反对派的中心地区也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发生在莫斯科市的两个区里，它们的委员会是受托洛茨基分子控制的，但在一月举行表决时，列宁主义者在普通党员中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①

最后的、决定性的较量是二月底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的代表选举。莫斯科不仅是所有党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反对派力量的主要堡垒。它是列宁主义者多数派的巩固的阵线中一个十分薄弱的地区。假如反对派能将列宁主义者排挤出莫斯科组织领导集团，那么他们在战略上和道义上就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经住这场考验，列宁主义者不仅保持了他们迄今所保持的微弱优势，而且还使这种优势发展为三分之二的多数。^②在莫斯科区域，极左派代表的比重已从头一年十一月份的百分之四十下降到当年二月份的百分之二十。书记处高兴地说：“这种类似的过程”在所有地方组织中都发生了。^③

当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三月八日开幕时，列宁主义者已获得压倒多数。党的领导胜利地击退了温和左派和极左派的进攻，并决心要结束他们所说的党内争论。但是国家的危机在当时已经导致了党外政治的动乱，它更加直接而又严重地威胁着政府的安全，这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卫戍部队的武装起义。

^①参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真理报》。

^②参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

^③参阅中央委员会关于九大至十大期间工作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6页。

二、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在彼得格勒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爆发了一次公开叛乱，这次从示威游行开始的叛乱无疑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内政危机。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是绝望的革命者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像极左派共产党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心事，然而他们不是出于对党忠诚和维护党的纪律的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喀琅施塔得人是以前十月革命的名义反对苏维埃领导人的。

当叛乱事件传开后，莫斯科立即谴责说，喀琅施塔得人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并逮捕了岛上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一份官方公报说，它是“自卫军玩弄的一次新阴谋……；它无疑是法国反革命分子所期望的，也是由他们精心策划的”。^①当时，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关心的是，尽可能快地击溃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这种态度使许多人惊奇不已。当时在彼得格勒逗留的一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尔克曼报道说：“就连一些共产党人对政府抨击的语调也感到愤慨。他们说，把工人要求面包的呼声说成是反抗行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喀琅施塔得人对罢工的同情和提出搞真正选举的要求被季诺维也夫歪曲为反革命的阴谋……大家的一致观点是，水兵都是苏维埃最可靠的追随者；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当局实行最必要的改革。”^②

喀琅施塔得人的改革要求至少是具有合法基础的，这一点也为加里宁所证实。加里宁在叛乱爆发的前一天曾去过喀琅施塔

^①《自卫军的新阴谋》，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的《真理报》；关于叛乱情况和动机的详细论述，参阅尼·弗·丹尼尔斯，《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第241—254页。

^②亚历山大·贝尔克曼，《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300—301页。

得，但他安抚反抗者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他认为，三月一日在喀琅施塔得通过的一项要求实行自由选举直到自由贸易的各种改革的决议，“只要经过一定的修改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它也是根据共产党在组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的弊端提出的。^①毫无疑问，人们可以通过及时的改革来避免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但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似乎是十分痛苦的，而且也许会损害政府的威信。由于政府没有这样做，凶猛的罢工浪潮波及了整个彼得格勒城。据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借此开始地下活动的新篇章；但是，苏维埃当局为了稳定形势而忙碌不已。^②在这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领袖们要加强控制是很自然的。在各地人民普遍不满的情况下，如果承认喀琅施塔得人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因此，对共产党来说，首要的是窒息这种思想——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为了捍卫十月革命的原则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即“第三次革命”的思想。

这种第三次革命的思想是以喀琅施塔得人在他们的报纸^③（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阐明的纲领为基础的：

“工人农民起义的风暴已经证明，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全体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已为期不远了……喀琅施塔得已首次为全体劳动人民的第三次革命举起了起义的旗帜……独裁统治已被推翻，立宪会议已发展到受诅咒的地步，委任制已被打得粉碎。”^④

反抗者声称，“我们在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而双手沾满鲜血的托洛茨基和吃人不吐骨头的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在

^①参阅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的《真理报》。

^②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61页，注释97。

^③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完全作为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的附件发表，见《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一九二一年布拉格版。

^④《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为玷辱共产党名誉的人争夺党的权力而斗争。”^①他们控告布尔什维克政府像沙皇一样奉行镇压政策，它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使劳动成为“一种乐趣”，而使它成了“一种新的奴役”。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不成功，毋宁死！”

就他们的纲领看（除武装起义这一点外），喀琅施塔得人与共产党内极左反对派很接近。他们对工会的看法显然是工人反对派观点的反响：“由于执政党的政策是谋求所谓的‘共产主义的’集中制，我们的工会就绝对不可能成为单纯的阶级组织……。”他们把一九一七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官僚集中制对立起来：

“如果工会获得包罗万象的自治权，那么共产党人的整个集中制必然要崩溃，从而人民委员会和政治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只有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权掌握在劳动阶级（由改革了的工会所代表）的手中，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②

在普通党员中，反对官僚主义的情绪有多么强烈，可以从大量共产党人转向了起义者一边得到说明。这些共产党人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的政策已把国家引入困境——因为党已经官僚化，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不愿学，而且也不愿倾听群众的呼声。

经过整整三年，我们的党已被塞满了自私自利者和个人野心家，官僚主义也随之发展起来；更有甚者，为阻止崩溃采取了铤而走险的行动……劳动人民权利的真正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

每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必须同只用于子弹和炸弹来与工农对话的人划清界限。

^①《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②同上，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党内最高层的弊端……玷污了共产主义的好思想。”^①

就拿头几天在守卫岛上炮台的战斗中被喀琅施塔得人俘虏的政府军人来说，当他们得知“水兵和工人已经推翻了委任制政权”时，有许多人纷纷投奔了反抗者。^② 鉴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提出的问题对普通党员的影响那么大，使他们变得不那么可以信任，以致于政府既不能依靠他们进攻喀琅施塔得，也不能依靠他们维持彼得格勒的秩序（喀琅施塔得人主要希望从那里得到援助）。因此，政府使用的部队绝大部分是由捷克人和红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所组成。共产党最高干部团亲自向喀琅施塔得发起最后的冲锋——这个由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组成的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从莫斯科迅速调来的。^③

喀琅施塔得叛乱和极左派思想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对党领导来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说明：不能再长期地容忍反对派了。虽然极左反对派和喀琅施塔得运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一个反对派领袖踌躇着不马上支持党领导去反对造反者，但党内反对派和喀琅施塔得叛乱都是类似的不满情绪的表现；它们都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它损害了革命的思想，为了实际利益牺牲了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并从自身的意愿出发，发展了官僚主义的政权关系。从党的领导的观点来看，一定永远不能使这类爆发性的批评加害于党。

三、党的统一的建立

喀琅施塔得叛乱迫使党领导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便结束极

^①一九二一年三月五、七、十二和十三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②参阅《二百四十名投诚的俘虏的决定》，见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③参阅张伯伦，《俄国革命》第二卷，第443页。

左反对派的威胁。它的策略就是把共产党极左派与所谓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势力相提并论，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工人反对派这个最强大的、最具有威胁性的反对派集团。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责工人反对派是对革命安全的一种威胁。他概括地解释说：“工团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应当知道，躲藏在无产阶级背后的‘工人反对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①

党代表大会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并宣判被告是有罪的：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还没有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加入党的队伍，而更主要地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在目前灾荒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大恶化……的时候，这种自发势力显得特别厉害，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②

党领导确实知道这种控告方式是随意发明创造的。列宁本人也发现：最棘手的是工人反对派的建议——苏维埃政府首先必须集中力量克服群众的文化落后状况和他们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习气——太进步了。^③但同样出于这一原因，党领导又向工人反对派提出其控告——它在“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因素，因为它以极端的要求影响了党要消除小资产阶级势力的精力，并唤起了工人的不能满足的欲望。^④

除了说工人反对派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以及说它是极端的革

^①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86页。

^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6页。

^③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87、197、233页。

^④参阅施米尔加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命派这两种指责外，还出现了第三种指责——它不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行动的革命派，而是偏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这种观点使人想起第一国际分裂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旧争执。列宁决心击溃工人反对派，即使整个共产主义制度趋向崩溃也在所不惜。他私下说道：“即使我们将要灭亡，那么，更为重要的任务仍是要维护我们的思想路线并给我们的后来人以教训。这是决不能忘记的，即使在绝望的情况下也决不能忘记。”^①当然，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左的思潮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早已不存在。列宁本人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被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打动，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表露的具有纲领性的激进主义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极左派坚持了这种理想，而党的领导却越来越把官僚方法上升为革命的准则，背离了一九一七年的思想。当列宁放弃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时，工人反对派基本上没有随着列宁一起背离。

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于它对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疑问。就这个问题，党代表大会表明了如下的正统观点：“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具体地说是列宁主义教导说——作者）——这种教言……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方面，也就是说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不可想像的。”^②

^①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的报道：《给苏联朋友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279号。

^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7页。

无产阶级是不能自动将其觉悟提高到纯工会意识的水平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饶恕的违背，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无产者所不允许犯的错误。

如果人们承认上述的前提，那么列宁的思想则是不可侵犯的。任何违反列宁有关无产阶级特征的论述，提出工人中有独立的革命思想的言论，都自然会威胁到自称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党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思想已被解释为对党的权威的绝对忠诚，所以构成对党的威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行会”思想或者说是工人在经济崩溃的形式下思想“堕落”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学说就这样在一九二一年结束了它的徘徊过程，并重新回到了一九〇二年的最原始的列宁主义思想。

要设法使党回到旧特征的列宁主义，这是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严格的集中制和统一的不可侵犯性（这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的特征），在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党的准则，从而也成了俄国整个政治生活的准则。这次行动的直接目的是强迫人们对极左的反对派集团，首先对工人反对派进行批判。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从此以后，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从此以后，反对派都不得不竭力否认他们具有反对派的性质，并不得不遵守新的政治行动准则，这也正是以后的各次反对派运动未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有关统一问题的讨论贯穿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始终。喀琅施塔得的威胁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出现的激烈的派别争论使党领导处于有利的地位：

“代表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许多情况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更加动摇的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了解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由此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下一步骤——实施新的组织原则：

“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另外还增加了一项授予中央委员会行使纪律处分权的秘密决定：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得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①

“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条件”是三分之二多数。这项决定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它是党的组织工作史上的转折点。

这一转变在党的组织工作史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卡·伯·拉狄克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值得注意的报告已有所表述。拉狄克承认，他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获得这样的权力而感到不安：

“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因为，当中央委员会一经选举产生，多数派的同志为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就会拟定一个可靠人员的名单。每个同志都知道，这时党内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反

^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统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3—64、65—66页。

对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但尽管如此，我们赞成这一决议。”

为了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拉狄克指出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当时所处的充满危险的形势：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不管利剑可能对准谁，通过这项决议是必要的，并且让中央委员会在危急时刻采取这种最严厉的措施。如果它认为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针对最好的同志。决定性的是，中央委员会要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最好的中央委员也可能犯错误，但这总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动荡状态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些。”^①

人们发现，在大清洗运动的审讯中，反对派在供词中始终如一地宣称，他们相信党是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他们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方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后来的反对派运动从来不敢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这对他们的事业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由党代表大会确认的集中制原则并不排斥“工人民主”的思想（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决议说：这些原则“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在配备党的干部时，不允许损害选举原则，并保证可以进行自由讨论和展开批评——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决议写道：“当然，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必须最迅速而准确地执行。”现在，在和平时期，必须放弃内战时期的组织方法，这就是“**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②

^①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4、51页。

作为对地方自治的让步，党代表大会决定：“上级党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上级组织应召开相当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纠纷。在问题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解决以前，下级机关不得停止执行上级党机关的决议。”就在这一条件中，集中制倾向已十分明显。但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就此为止，它为了加强党的中央机关还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代表大会还宣布说：“严格统一各级党委员会的结构”是中央委员会的“最急迫的任务”。它决定：应按期召集省委各部部长举行会议；全俄党代表会议应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的人数要从十九人增加到二十五人，其中至少应有五人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要视察省委员会和参加省的代表会议和省委员会全体会议）。①

在某些重要观点上，党的统一标准与后来一些年的标准还不相同。尽管列宁坚持要严格保持党的统一，但他仍想要使这种统一包括所有的党员；尽管他咒骂工人反对派，但他还是号召他们进行合作：“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只要他们（指工人反对派）对工作有所帮助，只有他们不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不坚持派别活动而来帮助我们，那随便他们怎样称呼自己都可以。”②

列宁甚至还赞同工人反对派的这一观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③他以这一理由呼吁工人反对派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给予帮助。在他的倡议下，党代表大会将下面一段与禁止派别活动有关的话写进了他所作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

①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7、60—61页。

②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国（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189—190页。

③同上，第201页。

动,同时声明,在党员所特别注意的问题(这里列宁在他向大会宣读的决议中加了下面的话)例如清洗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出党、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的问题上,对任何实际的建议都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试行。”^①

禁止派别活动,也不是绝对地禁止。当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正案,即不允许各个集团在各自纲领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纠正说:“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们绝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们……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否则,一旦发生了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问题……可能,那时又得因为政见不同而召开大会了。”^②作为一种和解的姿态,施略普尼柯夫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同样,工人反对派的一位小头目,即莫斯科纺织工会主席伊·伊·库图佐夫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③

列宁在他的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对党代表大会的结果表示高兴:“我们知道,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真正结束分歧而达到绝对的统一,我们的党已经锻炼得更加坚强,它必将取得愈来愈大的国际胜利!”^④但事实上,有争议的问题正在日趋尖锐。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组织政策方面所作的巨大转变,立即反映在党的中央书记处的彻底改组上。在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

^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5页;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46页。

^②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梁赞诺夫修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47页。

^③参阅《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5页。

^④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代表大会闭幕词》,《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56、257页。

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被解除了职务，并由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瓦·米·米哈伊洛夫接替他们。

这一次更换是对托洛茨基温和的左翼党团的一次沉重打击，显然也是对他们在工会问题上持反对态度的一次报复行动；所有三位书记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而且至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在一九一八年都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尽管托洛茨基分子曾支持列宁采用组织措施来反对极左分子，但支持不够有力。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十分强调党内民主的思想。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写道：“……九月的党代表大会……应能给予较多的批评自由，这是革命取得重大的胜利之一。”^①在此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不再讲宽容了。托洛茨基的三位书记被悄悄地，但却彻底地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被下放到管理岗位，而克列斯廷斯基不久则作为苏维埃代表被派往德国。

对温和的左派分子来说，他们在一九二一年遭受的失败意味着他们在党组织内失去了无法再重新获得的权力。托洛茨基的不共戴天之敌季诺维也夫占据了克列斯廷斯基在政治局的位置。托洛茨基分子的两个工作领域，即书记处和组织局已完全从他们手中丢失了。在中央委员会中（它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基本上是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他们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当党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新的、较大的中央委员会时，有四名托洛茨基分子——三名迄今为止的书记以及安德烈也夫——落选，而另一名中央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则被降为候补委员。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已从左派中分离出来。这时，在党的领导班子里仅有托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怎么不应讨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仍作为温和的左派代表而存在着。让两名工人反对派当选为中央委员仅是一种策略手腕，通过接受九名新的组织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使选举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从整体看，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对比是二十名列宁主义者对五名反对派分子。上一届组织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和李可夫留任了，而新任命的三名书记和托姆斯基（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工会领袖尼·巴·柯马罗夫）都站在他们一边。在下级机关改组时，托洛茨基分子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彼得格勒市委书记的伊·米·斯米尔诺夫被尼·亚·乌格拉诺夫所取代。^①

对列宁、列宁主义者和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来说，一九二一年后的组织变动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这次组织变动对一个人特别有利，他就是主要在幕后活动的斯大林。他现在已成为一致公认的党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一年，任命他为总书记，这基本上只是使他实际上已掌握的权力合法化。从这时起，斯大林作为党组织机关中的统治人物的地位已不可触犯。

在三名新书记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当时刚满三十岁的莫洛托夫。自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与施略普尼柯夫一道）担任过一小段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左翼领袖这一客串角色以来，他几乎没有再登上过政治舞台。内战期间，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一九二〇年三月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他（受莫斯科委派）成了乌克兰党委书记。^②这个从外表看毫不出色的、但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的干部，确实成了斯大林的左右手，并登上了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层。他由于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危机中起了应

^①参阅，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5页；《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六年莫斯科版，成员名单。

^②参阅莫洛托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65页。

有的作用而得到了充分的赞扬，他不仅成了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三位书记之一，而且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组织局委员。^①

米哈伊洛夫在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之前，完全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从来未显示出有什么特长，而且在书记处仅呆了一年，但他却当上了中央委员和一段时期的组织局候补委员。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也就是在他加入布哈林左翼反对派之后，他被迫公开表示屈从。^②一九三〇年，他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在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中完全消失为止。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位工人，他曾在莫斯科组织内工作过。在那里，他曾是一名左派共产主义者；一九一九年，他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他一九二一年被选为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之后，他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里起着主要作用。在三十年代，他已作为党史研究所所长和无神论者战斗联盟领导而享有一定的声誉，他逃过历次清洗运动，最后于一九四三年病故。^③

一九二一年一批新人在党组织内获得晋升并掌握了权力，这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学说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表现。这种组织学说是一种强调军事纪律以及严格控制群众主动性与派别自由性的学说，一种对自由的言论争执实行独断的学说。苏维埃政权动用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前的传统潜力为自己辩护，并结束了那种由极左反对派提出的批评。它依靠布尔什维克老的组织传统，掩盖和避而不谈它已经不忠于原先的社会

^①参阅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

^②参阅亚历山德罗夫（米歇尔逊），《谁统治俄国？》，一九三三年柏林版，第380—381页。

^③参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真理报》。

理想这一事实，而是任意解释事实。一九二一年开始采用的这种方针表明了苏维埃政治生活的特征；它尤其说明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在政策方面愈远离革命理想，却愈要坚持旧的意识形态词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

第七章 列宁主义的恢复

共产党内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保持统一这一决定是克服苏维埃一九二一年危机所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革命正在降温。共产党抵挡住了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并逃脱了它的先例，即法国革命的命运，从而渡过了它自己的第九个“热月”。

一、新经济政策——是策略还是演进？

列宁一下子驱散了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冬笼罩着全党的沉沉乌云——争论、紧张关系和动乱；同时，随着党内的调整他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取消深恶痛绝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即废除在农民中强制推行的粮食征集制。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了带有具体义务规定的“实物税”办法，并不由国家完全控制粮食供应。自由粮食贸易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这一点不久就清楚了。另外，党还几乎一致决定采取标志新经济政策已开始实行的一些措施。因此，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说：“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①

^①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35页。

随着采用实物税办法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人们早已熟悉的旧机构的复活（不过往往是以新的名称出现而已）；私人贸易也逐步合法化了，它在一年之内就占了整个零售额的四分之三。^①无数小型工业企业又转到了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手中，由“那些赞成新经济政策的人”组成的臭名昭著的新阶级一夜之内破土而出。即使在收缩了的国营企业范围内，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极其臃肿的管理机构实行了分权，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国营的、但在财政上是独立的“托拉斯”。废除货币的企图已被忘却，就连国营机构之间的交易也开始运用传统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列宁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在没有遇到许多反对的情况下被采用的，它显然也为苏维埃政权展现出一幅全新的前景。当时，国际革命远未到来，这是不容变更的事实。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设想，俄国革命者在此状况下不可能保住政权和实现自己的纲领，但俄国革命者却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革命。为此，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并解释说：“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做得过分了。”“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②如果人们多少灵活一点去领会这种解释，那么人们就会发现：这里，一种制度已经产生了，它与列宁过去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旧形式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它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在普通党员中，失望情绪很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两年之内就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并出现了一个自

^①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第143页。

^②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03，204页。

杀的浪潮。^①极左集团不顾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给予它的多次打击又回到了战斗岗位上，并想从“工人国家”向富农和外国资本家求爱的事件中获得政治资本。为了讨论新的问题，各地建立了许多“争论俱乐部”，但党领导很快又将它们解散了。^②

最严重的问题是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温和左派干部开始提出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是近期计划还是远景规划？它是“策略”还是演进？拉林对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对比和评价，他说：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产阶级邪恶”。他警告性地解释说，带有对资本主义让步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成就，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事，是一种策略和退却……，其目的是使工人阶级更容易地生存下去，直到欧洲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为止”。^③

起初，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理论上展开的，因为所有党团都一致认为：必须放慢步伐，必须与农民和解。但不久就对未来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俄国工业能发展多快？中央的经济计划在多大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被排挤出党中央书记处而在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则作为加速计划性和工业化的拥护者出现。他解释说：“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周围的小资产阶级世界……不知道……将应从社会主义岛屿一方期待什么意外的礼物。”^④他在许多著作中阐述道：“在经历了两年或三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之后”，

^①参阅默尔·芬索德，《俄国是怎样统治的》，一九五三年剑桥版，第244页。

^②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83页，注释60。

^③参阅拉林，《论我们经济政策的适应能力的局限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月《红色新国》，第150—151页。

^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的前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月《红色新国》，第202页。

俄国社会主义为了它的继续存在必须全力转入进攻。为此，积极推行工业化是必要的。为了未来的国家经济利益，只有靠剥夺农民才能获得必要的资金。^①

在新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再次使列宁主义者和温和的左派分子之间出现了裂痕。一九二一年，这两个党团为了压制极左反对派曾集合在一起，但现实危机一被克服，在未来的经济方针上的分歧就又撕开了它们之间很深的裂缝。这两个集团都决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并承认，俄国革命的孤立状况给它们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它们却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一个要谨慎退却，另一个要勇敢前进。因此，它们很快就形成了对立的阵线，并在一九二三年底爆发了敌对行动。但在党内生活中，首先必须克服反对极左分子斗争所造成的影响。

二、控制工会

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决定了在工会问题上必然出现争论。列宁主义的工会纲领是建立在不很乐观的、所以也是最现实的前提之上的。如果人们同意新经济政策并承认实行退却的必要性，那么就必然应得出结论：工会必须被排除出企业的管理。

当然，要制订出新的、具体的工会政策还需要一段时间。很明显，列宁本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十分注意，而他的追随者却一直注意要坚决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一度盛行的、强调工会作用的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三百三十六票对五十票（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十八票（赞成工人反对派的观

^①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的前景》，见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月《红色新报》，第209—211页。

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会问题的长篇决议。^①它的撰写者季诺维也夫竭力想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战时共产主义的工会学说,特别是由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所解释的工会学说还完全有效。以正统的雾幕来掩饰方针的转变,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然而,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一九二一年的工会政策发出了一种新的语调:“迅速使工会国家化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像列宁主义者在争论时期已经强调的那样,工会应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应起企业领导助手的作用。它们的管理权限似乎相当大,但并不明确。党声明说它有无限的监督权利,并应将这一权利立即贯彻到实践中去:“俄国共产党无疑仍然像过去一样通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会的全部思想工作。”托洛茨基在运输部门使用的行政管理办法被指责为一度偏离了党公开宣布的“工人民主制”路线的错误作法。^②(实际上,运输部门中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半军事体制却被保留了。^③)

也就是说,方针已定:工会的职能应当减少,工会应受党的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还要将工会本身引到新的路线上来。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求在工会(工人反对派的据点)里显示党的政治威力。为了争夺工人反对派最大的工会力量中心(梅德维捷夫领导下的冶金工人工会^④)的统治权,一场前哨战开始了。当冶金工人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举行其代表大会时,党中央委员会向

^①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2—90页。

^②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7、78、79页。

^③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323页。

^④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925页。

它提交了一份工会领导候选人的提议名单。代表们否决了党提出的人员名单。但这一举动是无济于事的，党领导不久就将他们的人安插进了工会领导，反对派也分化瓦解了。为了使药丸起到更苦的作用，人们没有批准施路普尼柯夫出于抗议而提出的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要求。^①

在工会自治与党的领导问题上的最终较量很快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②在党员代表的一次集会上，托姆斯基按常规将一份关于工会任务的提纲提请会议予以接受。表决本是一种形式，但人们对提纲却提出了其中的一项漏洞，它没有提到采用“无产阶级民主方法”，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是试图以此来平息普通党员的不满情绪。当时曾跳出来指责不民主行为的梁赞诺夫提出了一份修正案，它在字面上与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章节几乎完全一致：“党应当特别慎重地采取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尤其在工会中应当如此，因为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需要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推选领导者。”^③很自然，代表们根本看不出在这一修正案中有什么背离官方路线的倾向（托姆斯基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梁赞诺夫的提案顺利地通过了——据记载，这项提案以一千五百票对三十票而获得通过。

党领导对这次计划失败的反应是，立即限制工会的自治权。托姆斯基因此被断然排斥到会议之外。看来，列宁已与布哈林和斯大林联合起来，以便使工会工作者恢复理智。令人讨厌的章节也被从工会的正式提纲中删去，而代表大会的义务就是接受正确

①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3、4页。

②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213页。

③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8页。

的文本。党的领导立刻使用了他们所要求的对工会工作者的支配权，并禁止梁赞诺夫继续领导工会活动。斯大林受委托对托姆斯基把会议引向歧途的错误进行调查，结果是：工会主席被免了职，并被降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候补委员，而且受党的委任，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的常用形式）。自一九二〇年起就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的鲁祖塔克同样被免除了职务，并与托姆斯基一道被派往边疆，担任党的中亚局领导工作。^①

当列宁主义的工会领导人（尽管他们赞成工会应发挥新的有限的作用）由于过多地允许工会实行自治而受到处罚时，过去曾拥护国家化思想的安德烈也夫却重新得到了重用。他受委托提出了一项决议提案，根据这一提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能保证党的影响得以实现的机构）可获得对地方工会组织（它们都曾曾是工人反对派实力最强大的地方）的直接支配权。这一提案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人们试图通过一项修正案使安德烈也夫的计划遭受失败。修正案的表决结果是四百五十三票赞成，五百九十三票反对。这一结果表明，要求实行自治的反对派是多么强大，言论自由的要求是多么强烈。尽管党只是以微弱的多数取得了胜利，然而问题就此已获得解决。安德烈也夫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成了托姆斯基的继承人，党对工会中共产党人的绝对统治得到了确认。^②（安德烈也夫后来成了斯大林的心腹，并开始在他的机关中飞黄腾达。他于一九二六年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二年为政治局委员。也许由于他清白的历史，他在三十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仍是党的领导人。然后，

^①参阅鲁祖塔克传记，《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22页。

^②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325—326页。

在与赫鲁晓夫就集体经济问题发生争论之后，他失宠了。他现在还活着，但显然是处于休养状态，不过他还是中央委员。）

当一九二一年行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本义越来越明显时，官方关于工会作用的设想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作愈向前发展，工会在生产中的负责使命就愈谈不上。这时，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的传统作用已更为明显地突出起来，它作为党的政治辅助集团在苏维埃中的特别职能也同样突出起来了。在这段时期内，托姆斯基和鲁祖塔克又受到了宠爱，而托姆斯基（流放显然已使他变成了服从领导的助手）又成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从形式上看，一项新的工人政策已被写入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二年一月通过的决议。^①此后，工会在经济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分子侵犯，而苏维埃政权为了重新建设经济而不得不容忍资本主义分子的存在。在形式上，已不再禁止罢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也常常出现罢工；同时，失业的威胁已成为苏维埃厂经理手中一把重要的戒尺。当然，人们也期望工会能考虑民族利益，从而为提高生产作出贡献；然而又有以下的限制：“……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有害的，不能允许的。”工会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是：使群众与党保持联系并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指从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民主’、‘平等’、‘自由’的超阶级意义”。在由新经济政策创建的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工人运动中“矛盾”和争论有可能发展，这也是许可的。然而，这仅是进一步强调党的优先地位的一种理由：“因此必须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关及时地解

^①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326—327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54—164页。

决这些纠纷。这种机关就是我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二年秋，工会问题不再是政治问题了；而且托姆斯基又担任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安德烈也夫被降为铁路工会主席，但他仍受党领导的宠爱并在中央委员会里保持一个席位，而且在一九二二年春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②直到一九二八年，工会机关一直是党领导在组织方面推行严格政策和在经济方面推行谨慎政策的一个可靠的支柱。托姆斯基于一九二二年被接受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最后几年里是党领导的主要成员。当时代发生变化和斯大林开始为国家航船开辟新的航向时，托姆斯基加入了左翼反对派，而工会又成了政治辩论和组织斗争的中心。

三、党内紧张气氛

尽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谴责了派别活动，但工人反对派仍作为民主集中派的集团而存在着。此外，在边缘地区的党组织中出现的许多零散的小集团也给党领导带来了忧虑，这些小集团是：由格·伊·米雅斯尼柯夫领导的“工人团”（工人反对派的一个直接的支派），“工人真理派”（它的鼓吹者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以及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工农党”。^③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委员会就认为有必要责成刚刚加强了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各地区工人反对派

^①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58、164、162页。

^②参阅安德烈也夫自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6页。

^③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11页。

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是乌拉尔的彼尔姆市，在那里，由于米雅斯尼柯夫的活动，党组织中出现了骚乱。在一九二一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党的机关的炮火大部分是对准这次反对派运动的，然而它实际上只是米雅斯尼柯夫一个人的问题。米雅斯尼柯夫的最大过失是主张出版自由。中央委员会针对这一主张回答说，米雅斯尼柯夫的观点是“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并禁止他在地方党代表大会上作说明——这是把地方党组织置于中央监督之下的另一种措施。^①

列宁写信给米雅斯尼柯夫，以便使他改正错误：^②“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按照列宁的观点，由于存在着反革命活动的威胁，自由仍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就是为敌人开放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列宁承认存在着许多曾引起抗议行动（如工人反对派）的弊端，但他拒绝米雅斯尼柯夫建议的解决办法：“党支部有没有同党脱节呢？有的。这是坏事，是不幸和毛病。有的。这是严重的毛病。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这个毛病。”

但米雅斯尼柯夫仍继续拒绝遵守党的纪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详尽地调查了他的活动情况。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他于一九二二年二月被开除出党。^③这是自布尔什维克党创

^①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11页。

^②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92、494—495页。

^③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1—72页。

建以来的唯一的事例：列宁事实上驱逐了一名杰出的党员（除一九一八年开除半布尔什维克分子洛佐夫斯基外）。米雅斯尼柯夫毫不气馁地潜伏下来，并开始为一场新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运动而工作着。在当时的其他工人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小集团的支持下，他于一九二三年初以“俄国共产党工人团”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宣言。这个纲领大体上就是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其重点是要通过工会来民主管理工业，并毫不妥协地拒绝新经济政策和向资本主义办法让步。^①抱着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态度（许多极左分子都具有这一特征），工人团声明说：革命应变成对“少数知识分子”的统治。它要求开展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应当保护工人免受共产党统治的寡头政治和官僚的侵犯。^②

看来，米雅斯尼柯夫集团在一九二三年掀起的罢工浪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随后，这场运动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镇压下去了。米雅斯尼柯夫于一九二七年逃离俄国，并作为一名工人居住在巴黎。一九四六年，他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返回俄国，从此也就失踪了。^③

以“工人真理派”这一名称而闻名的组织，在政治方面并不那么重要，但在思想上是比较极端的。显然，在它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多于工人，它很可能是“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表面上非政治性运动的一个新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由列宁以前的副手波格丹诺夫经过苏维埃政府允许而建立起来的。^④“工人真理派”

^①参阅索凌，《工人团，米雅斯尼柯夫运动》，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本书详细地引用了宣言内容。

^②同上，第61—62页。

^③参阅鲁特·菲舍尔，《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法兰克福版，第249—300页。

^④参阅《“工人真理派”的号召书》，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信使报》，柏林版，第14页。

的纲领所使用的毫不妥协的激进语调，使人回想起一九一四年以前由波格丹诺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

波格丹诺夫分子是从下列设想出发的：革命已以工人阶级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取代了工人，获得了政权。①“工人真理派”在它的宣言中断言，包括新经济政策拥护者在内的官僚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已在剥削工人并正在瓦解工人队伍。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通常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而已，而且因为工会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无依无靠。“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成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关和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政党以后，它必然会失去它与无产阶级的联系和合作。”（这里是直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共产党领导。）

“工人真理派”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党”，一个争取民主关系并能维护工人利益的党。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新的革命理想才能拯救无产阶级事业。②但是，苏维埃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允许这种发展，因而“工人真理派”日趋衰亡了。波格丹诺夫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并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他一九二六年逝世为止。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里，工人反对派是党内不和的主要根源。尽管列宁作了愿意和解的讲话，但党的书记处改进了技巧，它以更迭和调离的手段迫使反抗者恢复理智。这种方法首先用来对付工人反对派的追随者。③（尽管列宁劝说施略普尼柯夫和库图佐夫进中央委员会，但受列宁邀请参加商讨的三十七

①卡烈夫，《论工人真理派》，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布尔什维克》，第31章。

②参阅《“工人真理派”的号召书》，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信使报》，第12—14页。

③参阅施略普尼柯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名工人反对派的十大代表，后来仅有四人能再次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下届党代表大会。^①

列宁与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反对派代表的合作没有维持多久。在冶金工人工会事件发生后，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几乎一直没有安静过。当施略普尼柯夫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与工人为敌的”政策时，列宁公开谴责这一事件为不可容忍的破坏统一的行动，并要求中央委员会使用它开除其成员的秘密权力。^②然而，由于采取这种措施需要有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赞同，而当时按这个要求尚缺一票，因而施略普尼柯夫仅受到了一次严重警告处分。^③

因为工人反对派得到外国共产党的同情，所以它始终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时，共产国际已首次成为俄国共产党内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俄国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是相互影响的，并对双方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在左派社会主义者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倾向时，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又抬头了。在共产国际中，这种倾向的最主要的代表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它于一九二〇年脱离正统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共产党），并形成了短命的“共产工人国际”的核心。这些不妥协的革命者丝毫不隐瞒他们对俄国工人反对派的友好态度，但这却反而使明确声称忠于共产主义正统的俄国工人反对派陷入困境。^④这时，工人反对派仍在努力谋求外国正统的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①参阅沙波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326页。

②参阅舍拉文：《工人反对派》，第28—29页。

③参阅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12页。

④参阅柯伦泰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柯伦泰小心翼翼地争取人们对反对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为了与德国共产党左翼建立联系而到了德国。^①

一九二二年初，工人反对派抓住了一个机会，直接向外国共产党人求援。在没有预先通知俄国党领导人的情况下，一份由二十二名工人反对派领袖（其中有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签署的声明被提交给正在商讨“工人统一战线”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②这项声明以俄国共产党的不民主的作法为理由，揭露它有可能阻碍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并要求纠正俄国共产党的不民主的做法。就这样，“二十二人声明”提出了极左派的著名的抗议：

“我们的中央领导正展开一场无情的分裂性质的宣传运动，反对所有想作出自己判断的人（特别是无产者）；如果谁在党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对他使用各种压力手段。

那些旨在使广大无产者靠拢国家的努力却被称之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支持这种努力的人遭到迫害并被弄得声名狼藉……党和工会的官僚们……无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不想把工人民主制贯彻到实践中去。”

声明提到了梁赞诺夫被排挤出工会领导这件事，并指责说：

“来自官僚方面的监督和压力太过分了，以致于党员在开除和其他镇压手段的压力下不能选举他们想望的人，而只能选举那些无知的但又想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这就是说，这种手法导致了个人野心的发展，导致了工人党员中政治积极性的消失，并普遍地

^①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二一年汉堡版，第778—781页。

^②参阅《二十二人声明文本》，见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69—70页；《专案委员会对工人反对派问题调查报告》，《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96页。

产生了使工人统一战线思想不能得以形成的条件。“二十二人声明”最后呼吁共产国际纠正俄国领导的政策：“我们党内的状况是那样的严重，以致于这种状况迫使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将导致我们党分裂的危险。”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俄国领导立即进行了回击。代表大会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但这个专门委员会偏向于俄国领导集团，这是不奇怪的。^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时决定：

“在反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反常的斗争中，提出抗议的同志们的立场决不能支持或加强党，相反，它将削弱党的宝贵力量；同时，‘从左的方面’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孟什维克和最恶毒的白匪反革命分子——反对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武器。”^②

一个月之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人反对派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在委员会收集了证明材料和询问了集团领袖之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根据一些事实无疑能得知一个秘密的派别组织还被维持着，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同志作为鼓动者和首领站在它的最前列。”然而，这三个人拒绝承认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声明触犯了党的道德，委员会就此回答说，如果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不愿服从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那么就必須将他们开除出俄国共产党的队伍。^③党代表大会虽然只开除了两个人（米亭，他是不久前从孟什维克转过来的人；库兹涅佐夫，他似乎隐瞒了他以前曾是食品杂货商品的老板），但

^①参阅《中央委员会关于二十二人声明的通报》，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0页。

^②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关于二十二人声明》，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0页。

^③《委员会关于工人反对派案件的调查报告》，见《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94—698页。

通过了专门委员会向“二十二人集团”提出的指控：在工会中进行派别活动；与企图建立“第四国际”的集团建立联系；并有“密谋”性质的举动。反对派的活动再次受到非难。柯伦泰受到了特别谴责，决议说：“如果党不采取柯伦泰、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所持的对工人阶级有害的错误观点，那么您就认为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决议并威胁说，如果发现他们仍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们开除出党。^①

一九二二年三月底、四月初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领导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当反对派的呼声不再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时，党的领导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肆宣扬统一和纪律。然而，对党代表大会进行控制的种种做法表明，领导集团始终害怕反对派力量再次形成和出现。许多决议，特别是会议最后作出的决议，都是匆匆忙忙强行通过的，而且往往在有可能提出修正案之前，就进行表决。代表大会要选举的各级委员会的候选人的提名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中央书记处的插手。

列宁直截了当地保证说，他认为有必要用无情的手段来保证党的团结：“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因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所以必须首先维持党的队伍中的秩序：“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确的退却发生混乱时，就要下令：‘开枪！’这样作是对的。”^②

尽管列宁确认派别活动已有所减少，但他仍要求代表们为消

^①参阅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14页。

^②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48页。

除派别活动而加倍努力：“必须利用全党及各地党组织的全部威信同瓦解党组织的各种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全党今后应当把……进行这种争吵和摩擦的行为，……看做是……最严重的反党罪行。”^①

极左派发言人固执地提出了他们的众所周知的批评。奥新斯基再次指责“过分的纪律，它使中央有可能随意行动”。他要求“从军事纪律向一种严格的、但要真正符合一个党的政治路线的纪律过渡”；他还强调不要通过压制手段而要通过引导的方法来加强党的力量。^②柯伦泰指出，党内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太少了，而且他们只能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她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党内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从而使工人感觉到在党内就像‘在家里’一样，并使他们有能力推行其阶级的政策，即工人的政策”。她尖刻地要求领导坚持他们所承认的“工人民主制”（这显然是党领导感到最为痛苦的），她说：“我们赞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民主制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决议，我们要使这项决议得以实现；我们将竭尽全力，加强工人民主制，不仅使它表现在文件上、口头上，而且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我们的幸福就在于劳动群众的创造性。”^③

在讨论监察委员会（实施纪律的主要机构）问题时，反对派显示出具有惊人的强大力量。梁赞诺夫在这里最后一次利用机会以党内民主派的名义提出抗议，他要求立即解散监察委员会。^④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抱怨说：“在某些集团内存在着这种看法，即

^①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88—189页。

^②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柯伦泰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监察委员会是一定时期的产物，（或者）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一个错误。”因此，他断言说，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贯彻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索尔茨为了证明实行纪律的必要性竟引用列宁的《怎么办？》这篇文章，这说明他要回到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说：“纪律现在对我们来说要比以前更为迫切需要，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如果出现短时间的休息，那么在我们中间就会出现要摆脱党的统治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样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但它并没有到来。”^①党已从一个从事地下密谋活动者的组织变成一个执政者的组织，这一点似乎丝毫没有提及。不信任、教条主义、不容异说和军队作风等旧习惯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又重新恢复了，而且给新的苏维埃国家盖上了它的印记。

敌视监察委员会的态度，显然使党的领导深感不安。索尔茨要求进行信任投票。他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说，党代表大会“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是正确的，而且确认中央和各省的监察委员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他的决议草案另外还建议给予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来监督各省的工作，并强调，监察委员会对于把全党紧紧地团结在领导的周围具有重大的意义：“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又重要的任务，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并与之展开斗争。”^②

反对派立即提出了一项相反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解散所有地方监察委员会，让中央委员会更全面地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举手表决的结果似乎是双方获得了相等的票数，因为有人建议拟定一项新的妥协决议。但主席解释说：“我们必须首先准确地弄清楚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哪一种草案获得了多数赞同，而多数

^①索尔茨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同上。

又是多多少。”从这一意见中可以看出，赞成和反对的票数肯定是相差无几的。然而，计算票数的结果是二百二十三票赞成保衛監察委员会，仅有八十九票反对。^①因为五百二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都在场，所以对于这一有利于監察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许多代表弃权或根本没有投票。

四、作为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僚政治

为了封住自称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化身的极左分子的嘴巴，一九二一年进一步强调党的纪律和不断要求加强组织性，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组织监督机构的扩大。后来，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方面的发展。较为死板的集中制和较为严格的纪律给党的领导提供了压制党员中的反对言论的手段，如果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制止这些反对言论的话。在此以后，反对派之所以还能进行严重的挑战，那只是由于最高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控制党的机关，谁就能决定争论的结局。正因如此，斯大林控制了党的机关，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促成了这一转变之后，党的建设中的官僚化倾向也变得十分明显。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在党组织的周围就经常出现为党组织服务的庞大的机构。这种机构逐渐扩大，连它本身也蒙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而且占用了过多的（党的——作者注）人力。”^②党内生活的军事化也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那些主要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

^①索尔茨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75页。

（包括由党任命的国家干部、军队干部和工会干部）由于必须服从特殊的半军事化纪律，由于工作不断地调动，逐渐形成了特殊的观念、个人关系、影响范围和社会地位，从而在高级党员干部与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的一般党员之间形成了差别。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显与众不同的干部集团开始控制了党的生活，这些人在经济上也享有优越地位。一九二三年的四十六人声明就曾提到：“党员按其各不相同的职务在物质享受方面也有严格的差别。”^①

随着党的官僚化的发展，党的组织机构和监督机构也变得越来越细致、完善。这些机构的扩大和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员的权力的扩大远远超过了列宁关于集中化的要求，使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完全由官员控制的组织。党的组织机构是依照三种轨道发展的，也就是为满足三种最主要的组织需要发展的：1.全面领导和确定政治路线；2.监督全体党员和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和精神；3.监督地方组织和控制党员干部和专职的党的工作者。这三种职能相互联系并完全按照上述排列顺序构成一个集中的整体。

在作政治决议方面，党在一九二一年已形成一种近乎完备的军事命令式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一个由各级党的书记垒成的金字塔，这些人对各人所在的地区实行个人负责。除了列宁的个人领导地位之外，最高领导集团的确仍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集团。一九二二年以前，党内也不存在由个人独揽整个运动领导权的现象。但是到一九二二年，当中央设立了总书记职务并将这一职务交托给斯大林时，由各级书记组成的等级体系有了一个最高领导者。一九二九年，在反对派被击败和政治局充满斯大林的追随者之后，总书记终于作为无可争议的党的最高领导出现了。

^①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的《四十六人声明》，《托洛茨基文献》，T字8022号。

党的纪律职能体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身上。自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人员方面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明显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成了党领导的主要武器。古谢夫（它的新成员之一）说道：“中央委员会确定党的路线，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使所有的人都不偏离党的路线，并采取措施，以纠正偏离倾向和使背离者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像古谢夫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手段不是温存的，“威信不仅要靠工作而且要靠惧怕来保持，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现在已能令人惧怕，就这一点看，它们的威信已有所提高。”^①

新的书记处机构已考虑到党组织的第三项任务——监督地方组织和干部。^②书记处有两个重要的组织部门，即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它们是一九二〇年建立的，不过直到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才进行全面的活动。前者审查党的专职干部，并提出提拔和调动的意见；后者主要是保持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并监督它们的工作。关于它们的活动情况，斯大林于一九二三年说道：“……这些机关目前具有巨大的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党掌握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机关方面全部脉络的最实际的办法。”^③中央对地方施加影响的其他最有效办法是：派遣“负责的特派员”，由他们就此监督工作并转达中央的愿望；派有声誉的中央委员参加地方会议；一旦某个地方组织出现了严重问题，成立中央

^①古谢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路线和党的路线的任务》，《苏联经济和管理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刊，第5—6页。

^②参阅《关于书记处、书记处的地位和它对地方党组织监督权的扩大的进一步论述》，见达尼尔逊：《俄国共产党的书记处和地方党组织，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一九五七年二月号，第32—49页。

^③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90—191页。

委员会的特别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并提出建议。领导集团拥有有效的手段对他们负责管辖的地方组织施加积极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一项极为重要的实践是：地方的党组书记由上一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来任命。它以“推荐”为名，并在表面上保留了通过地方委员会的选举形式。在选拔书记时，新成立的登记分配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久，书记处推行的任命政策就遭到了猛烈抨击，人们指责说：当年的反对派分子受到蓄意的贬低，“不是因为他们是无能的组织者，不是因为他们是坏得很的共产党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各个不同的时期并以不同的方式属于这一个或那一个派别的成员，并参加了反对中央所代表的官方路线的辩论。”^①

一九二三年，也就是在托洛茨基公开加入反对派前夕，托洛茨基就已开始猛烈攻击任命书记的做法：“在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重的时刻，党内任命制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可怕程度，任命区党委书记现在已是一条常规。这必然会给书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会的地位……由于采用了书记任命制，党的机构的官僚化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②在地方上，与党委会和代表大会相比，书记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一事实实际上给予中央书记处以控制全党的绝对权力。

伏尔加河畔萨马拉区域党组织中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明显地表明了中央书记处的渗透作用。萨马拉是工人反对派掌握的唯一的一省一级组织；地方最有实力的人物，即菲·库·米罗洛夫已参加了极左派。^③中央书记处决心消灭背离者，并声称在一九二一年

^①柯秀尔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新方针：为新方针而斗争》，一九四三年纽约版，第154页。

^③参阅《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48—849页，注释48，和第925页人员名单。

萨马拉区域党委会犯有各种组织错误——“完全缺乏党的纪律，完全缺乏以负责同志为一方和以党员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党内联系”。像在一九二〇年在乌克兰所采用的那种办法一样，莫斯科使用了它的任命权，当然也采用了党的纪律的所有压制手段。萨马拉的反对派领袖被调往其他工作岗位，并任命了新的领导。为了说明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莫洛托夫说道：“要让组织长期处于这种状况是不可容忍的。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更换那里的整个党和苏维埃领导集团的唯一的一个区域组织……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毫不感到后悔。”^①

书记处通过压制、劝说和调动工作等一系列行动，在一段时间之后已将各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区域党代表大会也不例外。这些代表大会将选举俄共党代表大会（理论上的最高机构）的代表。因此，掌握中央组织局的那些人经过一番耐心地工作之后，已能给党代表大会选送自己的人，从而操纵党代表大会。斯大林从一九二三年起就开始使用这个办法。而党代表大会又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或者更现实地说，能控制代表的人就能对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施加影响。斯大林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达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从中央委员会这个基地出发，控制了政治局，清洗了他的对手，并使自己成了党的无庸置疑的统治者。

约在一九二二年底，中央书记处的活动深入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之中。列宁要求用组织手段来对付反对派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了。然而，这个机构并不单纯是党的唯命是从的执行机构和纯粹贯彻其思想的工具，它已发展成为代表某种超出普通党员和全体居民利益的集团利益的团体。

经过一段很自然的干部挑选过程后，党机关中的重要职位已

^①莫洛托夫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被那些善于适应有纪律的等级制组织的人所占据。在他们的头脑中，一九一七年所确立的布尔什维主义理想要比一九〇二年所确立的那种理想还要少得多。这一类人已成为很好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认真执行命令，坚决反对反对派的活动。这些人首先对列宁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并把这种信念强加于其他人。与那些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一九一七年所确立的理想主义的左派分子相反，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注重实际的追随者越来越赞成列宁在建党初期提出来的强硬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一九二〇年，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有人在革命胜利后首次明确地引用了列宁的文章《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强硬的组织理论。引证列宁文章最多的就是斯大林。他说：列宁在他这两篇名著中所阐述的计划“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①

早在斯大林一九二二年五月得到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之前，他就是党的主要组织者。自政治局一九一九年建立以来他就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另外，他也是工农检查院的人民委员，而工农检查院是真正主管实际工作的政府机构。由于一九二一年的组织变动，斯大林在政治局已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物，而且是新书记处幕后的掌权者；所以，他被任命为总书记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对斯大林的性格已产生了某种顾虑，列宁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组织才能。就象托洛茨基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列宁无疑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某些特征，也就是他的果断性、坚定性、大公无私和机智勇敢；”不过，他对斯大林作为候选人却持“保留和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道：‘这个厨师只会为我们煮辣

^①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75页。

汤’”。①据一份报告称，斯大林的任命是列宁临时作出的决定。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集会上，人们仔细地讨论了组织问题，莫洛托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建议免除他的书记职务，并任命伊·尼·斯米尔诺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他过去曾是托洛茨基手下的彼得格勒党组书记，当时在西伯利亚任职）。列宁当时犹豫不决，尔后回答说，斯米尔诺夫在西伯利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究竟定谁呢？他回答说：“等到明天再说。”第二天，列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设立总书记职务，并将它交托给斯大林。②显然，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任命，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被撤职的书记之一）抱怨说，竟允许一个人担任那么多的负责工作。③

在斯大林晋升为总书记的同时，党的最高机关又有了变动。原有的三位书记只剩下莫洛托夫仍保留原来的职务，新上任的一位书记担任了斯大林的另一名副手，他就是瓦·费·古比雪夫。此人自一九〇四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整整工作了十六年），他在内战期间显然已开始接近斯大林。④古比雪夫在建立斯大林专政方面可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然后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协助中央制定了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后推行的加速工业化的新路线。他死于一九三五年，据说是一次药物谋害的牺牲品，所以，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与搞谋害的医生于一九三八年一起受到了审讯，并被处决了。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3，357页。

②参阅格·杰尼克的报告。杰尼克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是从另外一个同事那里得知这件事的，这位同事当时曾参加代表团团长会议。

③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参阅古比雪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诸件，第246—248页。

按照党章的规定，斯大林属于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成员，这一点对他扩大权力是极为重要的。斯大林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代表（几乎作为书记处机器的化身）掌权的，从而为他的绝对统治打下了基础。书记们的忠诚并不是对这个人物，而是为了党的威信。不用说，斯大林尽力把他所认为是可靠的人塞进组织机构。与此同时，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并努力适应这种工作的人自然会对这个人物产生一种依附感，因为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他们才有用处，他的宠爱对他们的进步是必要的。就拿列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人名索引的著名党员来说，在党机关工作的人员中直到一九三〇年仅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成了反对派；而在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工作的人员中到同年为止已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有了这种或那种反对倾向。在这种分离倾向中，个人的偏爱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党机关中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作人员来说，威信和纪律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斯大林就是他们这一类人，从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一位三十年代的“没有返回”的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来自群众的无数新党员之所以追随斯大林集团，主要是因为他们从这个集团身上、从它的追求、它的思想和整个心理上找到了他们的最大的共同点。”^①

^① 参阅W·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斯大林》，一九三三年柏林版，第296页。

第八章 政权空白期

一九二二年，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有所缓和，问题的急迫性开始有所下降。在经济政策和苏维埃政治生活方面，党确定了某些基本原则，并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在某些方面放宽了政策，在某些方面加强了管理。人们也不再认为世界革命即将爆发。苏维埃俄国开始重新进入国际生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意见分歧也开始沉寂下来。但是，一九二一年采取的两大行动（经济上的后退和政治上的加紧控制）却普遍地被党的领导人看作是一种暂时的措施而接受。当列宁继承人危机出现后，争吵立即重新爆发。

一、继承人和“三驾马车”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五十二岁的列宁患脑溢血症。在此之后，除了一九二二年秋至一九二三年初一段较短的时间外，列宁完全离开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列宁逝世。接着，在苏联出现了七年的政治动乱，直至斯大林取得个人独断的领导地位时为止。

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对整个共产主义权力机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严格说来，列宁不是一个专制者。按党章条文看，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品格和极高的威

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荣誉、智慧和崇高的威望之上的，是以人们对他所表示的忠诚为基础的。他实际上控制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在各项事务中，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主义者”，都本能地听从他的决定。即使对顽固的反对派来说，他的言论也是有份量的。

但是，反对派依然存在。某些大胆的人还不时地攻击列宁。尽管列宁本人也同意对某些不同意见采取组织措施，但反对派并未因此而遭到人身报复。在最高层，党的事务是通过表决来决定的。在表决中，列宁曾多次失败，但他并不轻易放过那些不利于他的中央决定。例如一九二一年，他提议开除施略普尼柯夫；他不是下命令，而是进行说服，把问题提交全体党员。在这一论坛上，由于他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总是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没有感到致死的威胁时，列宁是不报复的。一九一七年他原谅了右倾反对派，一九一八年原谅了左倾反对派，一九二一年他又宽恕了工人反对派。当然，前提是他们应放弃错误立场。一九二〇年，在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时，列宁曾写道：“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对那些在苏维埃机关和党内的野心未遂而神志失常的所谓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应该建议采取关心和个别对待的态度，甚至往往采取一种给予直接医疗的态度。应该尽量安慰他们，以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问题。”^①

列宁的这种领导特点使列宁这一翼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很难行使政权。这派人缺少列宁那种迅速作出决定的力量，他们不习惯承担落在他们头上的责任，他们没有能力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没有能力与持不同看法的人打交道。在此情况下，党变成了

^①转引自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一个既是官僚主义又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列宁病重期间，党实际上不再有领导人。

列宁离开领导事务后，党的领导人固守着“集体领导”这一形式，并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列宁只是暂时的离开。按照党章规定，党和国家应由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它行使职权的政治局来领导。此外，作为理所当然的作法，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由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负责（但托洛茨基除外），这就是“三驾马车”或三人政治。他们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但是，这三人中没有一个人拥有决定权。他们都不具备国家领导人所应有的优点，而是二等政治家和热衷于向上爬的勾心斗角者。但是，列宁从来不愿把这类追随者推向反对派一边，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一点在季诺维也夫身上表现最为明显，他甚至在列宁手下还担任了很高的职务。可以说，他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平庸。他是列宁的一个驯服工具，并且是有名的不惜为领导干任何肮脏工作的人。^①此外，他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人惧怕的地步，这也是他的一个可取之处。季诺维也夫在以后的三年里就是在这样一个摇摇晃晃的基础上作为同僚中的一位长者担任了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季诺维也夫，当他担负这一重任时还不到四十岁。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二十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自一九〇七年起就是列宁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是一个善于发表长篇演说的人，具有革命鼓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形象。他很少担任管理工作，除了出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外，从未担任过国家官员职务。他那粗野的形象非常符合居民心目中的革

^①参阅巴拉巴诺娃（社会民主党人，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四年因再次采取孟什维克立场被开除出俄共（布），——译注）：《我作为叛逆者的一生》，第220—222页。

命者形象。他似乎天生就适宜担任共产国际主席这一职务。但是，人们从历史上很少能找到有利于他的记载，他有恬不知耻和胆小怕事的名声。据说，斯维尔德洛夫曾称他为“恐惧的化身”。列宁曾叹息说：“他重复我的错误。”^①无疑，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所犯的错误使他十分惊慌失措。一九二五年当他与党的领导集团决裂时，也是畏惧万分。他经常自动撤回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事他比任何人干得都多。

“三驾马车”的第二号人物是加米涅夫，他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知心人”。他们同岁，出身和革命经历都类似^②。但也有不同：他留有胡子，威风凛凛，没有风趣，尽管他担任着显赫的职务（一九一七年十月担任了第一任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主席，自一九一七年政治局建立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始终是一个非常不出色的人物。他担任着许多国家领导职务（其中包括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且一直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但他在政治上几乎只是季诺维也夫的一个影子。

关于斯大林，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他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对列宁是有用的；与其他二人不同的是，他在书记处中建立了牢固的统治。无疑，他对他的同事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手，而且由于名望不高，在政治上还构不成对他人的威胁。如果说他很早就具有野心，那么他当时隐藏了这种政治上的野心。托洛茨基曾详细地谈到斯大林的“平庸”和不知名，这一特征在当时来说是确实的，它后来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证实。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说：“假如我说，

^①参阅鲍里斯·索法林，《斯大林和对布尔什维克的评述》，一九三九年伦敦版，第249页。

^②参阅加米涅夫小传，见《百科全书》，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四十一卷附录一，第161—165页。

在座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九在一九二四年以前都很少听说或知道斯大林，这也许并不违反事实。”^①

在政治局里，除了生病的列宁、托洛茨基和三巨头外，还有两名委员。他们属于反托洛茨基一派，并由于政治上的可靠性在党内最高层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四十二岁的工会头目托姆斯基和四十一岁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②他们二人均为典型的谨小慎微的代表，他们的这种态度早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姑息政策”中已得到充分表现。托姆斯基的适应能力，也反映在他曾被严厉地撤消工会主席职务而立即又被复职这一事件上。

强有力的俄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就这样在建立四年半后落入这三名平庸人之手，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煽动家和阴谋家。这同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七年间法国大革命后的五人执政内阁很相似。

托洛茨基对新领导是一个威胁，只有他能在个人威望上与列宁相媲美。他是十月起义的领导人，内战的制胜者。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当时，尽管人们认为托洛茨基并不十全十美，但他是唯一能接替列宁领导职务的人。

列宁一派的领导人都坚决反对托洛茨基接替列宁的职位。托洛茨基在普通党员中虽受爱戴，但在党的上层并不受欢迎。人们有些害怕他。人们经常用法国革命来进行对比，并提出防止“波拿巴主义”的危险。^③事实上托洛茨基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

^①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②参阅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小传，见《百科全书》，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四十一卷附录三，第146页，和附录二，第223页。

^③参阅多伊奇尔，《斯大林》，第273页。

他的地位建立在军事功绩和对军队的指挥权上。当时他在布尔什维克里是一个有势力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曾与列宁主义者发生对抗，但他们在人员力量和纲领倾向方面并未受到多大损失。如果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取得优势，那末，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所进行的组织改造就会倒退。列宁主义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在各级组织中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后来曾写道：“三人小组越是在精神上感到虚弱，他们越是害怕我——因为他们害怕我，所以要打倒我——他们就越是加紧对党和国家的控制。一九二五年在一次同布哈林的私人谈话中，我批评了党的管理工作，布哈林回答说，‘我们是不够民主，因为我们怕您。’”^①

托洛茨基本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采取行动，他在一九二二年秋改组了军队的政治部。反对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古谢夫被解职（他后来被任命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作为斯大林的可靠支持者之一），接替他的是托洛茨基的老同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曾是十月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在乌克兰享有盛名。^②

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领导人，特别是与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敌对行动尖锐地表现为个人摩擦和个人之间的仇恨。自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成为布尔什维克之后，他就同季诺维也夫相敌对。虚荣自负的季诺维也夫怎么也不能原谅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把他从党内第二位排挤下来，使他在革命领袖中成为一个相形见绌的人物。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他们两人意见最不一致。在每次较大的党内争论中——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

^①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8页。

^②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小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附录一，第10页。

至一九二一年，他们都是相互对立的，更不用说在军事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季诺维也夫特别感到荣誉受毁是在一九一九年秋，当时托洛茨基迅速地突破了白军的包围，拯救了彼得格勒。

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争斗相比，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摩擦要小得多。人们从他们之间后来的历史性决斗出发，夸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只要列宁还在领导岗位上，斯大林就不会争着要压倒托洛茨基，贬低他的作用。托洛茨基是高傲、自信、智力过人和态度粗野的人，他特别瞧不起那些小政客，这使得他不受人欢迎，特别不为党内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组织机构中的干部所欢迎。季诺维也夫曾说：“托洛茨基是那种没有耐心的同志。他经常认为一切都错了，……托洛茨基是一个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点使他不可能组织一个固定的派别。”^①对托洛茨基的敌人来说，特别有利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老布尔什维克”，人们经常利用这一事实煽动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的元老们。

在那个时期，列宁虽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不再能供职，但他还活着，这使托洛茨基的贪图功名之心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要列宁还活着，任何人都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作为正式继承人接替列宁的职务。此外，自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的威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期间在工会问题上的反对派观点被击败了。在列宁逝世前的那一段政权空白期，托洛茨基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

二、民族问题和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

一九二二年秋，列宁的健康有很大好转，并能重新进行领导

^①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伦敦《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第二十期，第175，178页。

工作。直至十二月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政权空白期中断了三个月之久。后来，他只能偶尔地写一些东西，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三次发病，从此他就最终离开了苏联政治生活。

在他还能工作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列宁对他的学生大为不满。他了解到，一九二一年由他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党内管理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他公开与斯大林破裂，着手研究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但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的继承人很快又离开了他的轨道。

列宁和斯大林的破裂是发生在如何对待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上。当时，总书记斯大林是党内民族问题专家。问题涉及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形式，它应包括名义上是独立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虽然实际上是由统一的俄国共产党所控制，但在法律上则是通过条约形式而相互联系在一起。为了准备在形式上实现这一统一，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希望把三个小的南高加索共和国结成一个联邦，然后同另外三个共和国一同加入这个新的联盟。俄共南高加索地区局书记奥尔忠尼启泽被委托在那里成立这个联邦。但格鲁吉亚是在一九二一年初通过红军的干预才加入苏维埃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在民族独立和平等问题上非常敏感，他们激烈反对成立计划中的南高加索联邦。这就出现了一场震动了克里姆林宫的斗争。

列宁重新开始工作后，立即注意到格鲁吉亚的形势。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共的一个下级组织）通过了一个决定，其中表示反对斯大林关于南高加索的计划。这个联邦虽然于当年春天就已建立，但比较松散。^①此外，

^①参阅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一九三五年伦敦版，第177页。

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穆迪瓦尼还直接向列宁申诉。列宁的反应是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斯大林有点过急的倾向。”^①在同一天，斯大林向政治局提出申辩，他甚至以十分自信的口吻批评列宁“过急”，批评关于分别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的计划。^②据说，斯大林知道列宁病情严重后曾说过“列宁完了”。当斯大林感到不再需要讨好列宁时，他开始迅速地抓权。^③

大约一星期后，列宁尖锐地批评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他接着又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行动，批准了斯大林十月中提出的关于成立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计划。^④斯大林以胜利者的心情打电报给格鲁吉亚造反者，说他们的抗议已被中央委员会一致驳回。^⑤格鲁吉亚人在激怒之下绕过党的途径直接致电布哈林，他们以为布哈林会同情他们。^⑥这一越权行为激怒了列宁，他在一份私人回电中指责格鲁吉亚人：“我对电报中的失礼的语气感到惊讶。……我相信，在我的参与下，在穆迪瓦尼的直接参加下，中央全会所作的决定已解决了这一意见分歧。因此我坚决批判对奥尔忠尼启泽的谩骂，并坚持以正派的、诚实的口吻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商讨，以解决你们的冲突。”^⑦列宁还指出，斯大林可以凭借总书记的威信来维护党内

①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列宁给加米涅夫的信。此信内容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发表在《共产党人》，第九期。

②参阅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斯大林给列宁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55号。

③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62、65页。

④参阅列宁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4页。

⑤参阅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9页。

⑥参阅E·H·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纽约版，第四卷，第262页。

⑦贝利亚，《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9页。

的秩序和纪律。列宁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对组织工作集中化的偏爱，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是出自一种想安抚一下斯大林的愿望。^①列宁的电报充分证明，一个所谓独立的共和国的共产党是很少有独立性的。

在列宁号召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遵守纪律的同一天，这个委员会又作出了一项挑衅性的决定，决定中要求解散南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直接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进攻的信号，接着就开始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的大清洗。贝利亚在一份正式报告中曾夸耀地说：“在奥尔忠尼启泽同志领导下的南高加索组织给民族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②奥尔忠尼启泽使用了典型的集权主义的镇压手段。设立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南高加索党委会阻挠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越过它直接插手格鲁吉亚下级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鼓励“最激进的左翼激进主义”，支持政治过火行为。^③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及其追随者以列宁对他们的敌手所作的批评为掩护，强迫穆迪瓦尼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辞职，并由一批效忠于党的中央机关和容忍南高加索联邦的人来接替他们。

斗争是残酷的，奥尔忠尼启泽对许多暴力行为负有直接的责任。显然，某些痛苦的喊声也为莫斯科所闻。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派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到格鲁吉亚去，它由捷尔任斯基（波兰人）、曼努伊尔斯基（有人说他是乌克兰人）和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立陶宛—白俄罗斯人）所组成。^④调查小组说

①参阅托洛茨基，《新大林》，第357页。

②贝利亚，《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第178页。

③参阅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56—158页。

④参阅皮佩耳，《苏联的组织构成》，第153、272页。

了一些有利于奥尔忠尼启泽和中央机关、不利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话。组织局批准了调查小组的报告，并把大部分格鲁吉亚领导人召唤至莫斯科。^①只是在列宁的干涉下，格鲁吉亚反对派才得救了。在这期间，建立南高加索联邦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计划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迅速得到了实行。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使列宁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央集权化本身，只要它没有发展到使争吵复杂化的程度，就不会使他不安。例如一九二〇年他对撤换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领导人的行动无动于衷。他似乎也同意压制格鲁吉亚人。但是，使他不安的是违反民族自治的原则（尽管他在党内要求严格遵守纪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列宁完全改变了他对格鲁吉亚问题的看法，并同时以新的眼光看待斯大林。

十二月十六日，列宁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尽管那次发病不如第一次严重，但他和他周围的人已经看到，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这时，斯大林出于对个人命运的考虑，企图抓住权力的钥匙。接着就发生了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冲突，正如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列夫·包里希奇”¹

因为我在得到医生的允许以后根据列宁的口述写了一封短短的信，斯大林在昨天就对我大发雷霆。我在党内不止一天了。在三十年当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同志骂过我，在珍视党和列宁的利益方面，我也不会比斯大林差。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控

^①参阅穆迪瓦尼在俄共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50页。

¹即加米涅夫。——译注

制自己。同列宁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可以使列宁激动，什么可以不使他激动，无论如何，我比斯大林了解得更清楚。我写信给您和格里哥里耶——列宁的比较亲密的同志，并且请你们保护我，不要使我在私生活方面受到粗暴干涉，不要受到无礼的谩骂和威吓。对于遭受斯大林威胁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决议，我并不怀疑，而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用来作无谓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

克鲁普斯卡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①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宁在预见到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口授了一个被称为他的“遗嘱”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对其接班人的期望和担心：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

^①转引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①

显然，列宁希望有一个集体领导，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最有才能的同事由于个性问题妨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表述了他对几位领导人的看法之后不久，列宁得到了新的关于格鲁吉亚形势的报告。根据捷尔任斯基的个人报告以及列宁女秘书收集的补充材料，列宁形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全新的看法。他在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中详细地表述了他所感受到的恶劣情况：“如果象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末可以想像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显然，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②接着他又对联盟能否象预期的那样保护少数民族表示怀疑：“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的侵害。”此外，迫不急待地贯彻联盟计划似乎也是不必要的：

“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到高加索去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也只是表现了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的公正无私已在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

^①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6—617页。

^②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8页。

分说明。”^①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第二个口授稿中，列宁又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强调民族问题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对于无产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最大的信任……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需要这样或那样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②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一天的第三个口授稿中，列宁迫切地建议在民族法中增加一条关于保护少数民族不受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侵犯的条文，并建议纠正过去的错误：“应当处分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那里无疑已有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平的推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③对这两位被指责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口授稿当时没有发表，事情也没有按列宁所指示的那样进行。

列宁在叙述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之后，接着又谈到了党的领导问题，并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给“遗嘱”作了一个补充。他深信，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助手将危害他所设想的集体领导：

“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

^①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9、630页。

^②同上，第631、632页。

^③同上，第633页。

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似乎直到三月，列宁才具体地了解到斯大林是如何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为此，他立即口授了下面这封信：

“致斯大林同志

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粗暴地叫我妻子去听电话，并且把她痛骂了一顿。虽然，她已向他表示同意忘记已经说过的话，然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她也知道了这个事实。我不想这样容易忘记反对我的行为，不用说，反对我妻子的行为，我认为也就是反对我的行为。因此，请您斟酌一下：是同意收回您所说的话并且致歉呢，或者认为在我们之间断绝关系好呢？

顺致敬意

列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②

由于格鲁吉亚的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这次会议将批准或

^①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②转引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撤销斯大林的清洗，列宁这时也向托洛茨基求援：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想请您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为格鲁吉亚的事件进行辩护。这件事现在受到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击’。我不能信赖他们的公正。如果您准备接受这件辩护工作，我就放心了。如果您出于某个原因不能接受，那就请您把全部资料退还给我。我将把它看作是您拒绝的表示。

致以最好的同志敬礼

列宁”^①

列宁当时不能肯定托洛茨基是否支持他的立场。托洛茨基自己承认，列宁在向他表示求援之前曾让他的女秘书格利亚塞尔来打听，托洛茨基是否可能反对斯大林的行为。^②此外从列宁信件的口气中也可看出，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帮助是没有把握的。事实很快证明列宁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显然，托洛茨基当即答应了列宁的援助请求，列宁并于第二天，即三月六日，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寄给了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作了如下的叙述：

“当弗齐也娃（列宁的另一个女秘书）把列宁的那个所谓‘民族问题的信’带给我时，我建议：因为加米涅夫同一天将去格鲁吉亚参加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所以把这封信给他看一看是明智的，以便他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弗齐也娃回答说：‘我不知

^①“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口授，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党史办公室的信中重述了这封信，据称在苏共二十大上散发了这封信（参见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第23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3页。

道是否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委托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但我可以问一问他。’几分钟后，她带来下面这一消息：‘根本不能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将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斯大林会搞一个假妥协来进行欺骗。’”^①

托洛茨基在以后的叙述中还提到弗齐也娃的一个评论：“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表示公开反对斯大林。他准备了一个炸弹。”^②时间紧迫，列宁很快又决定改变他的策略。他在下列信件中宣布了他的立场：

“致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在这次事件上我全心全意地站在你们一边。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傲慢和斯大林的纵容很恼火。我准备发表一些文件和一篇演说为你们辩护。

致敬

列宁”^③

托洛茨基问弗齐也娃：“您怎么解释这一变化。”她回答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急于要做一些他能做的事。”^④

同一天晚上，托洛茨基同正准备前往第比利斯的加米涅夫谈了话。加米涅夫向他通报了列宁给斯大林的反驳信。不可理解的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党史办公室的信，《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2页。

^③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宁给穆迪瓦尼等电报，《斯大林伪造学派》，第69页。

^④托洛茨基给党史办公室的信，《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是，托洛茨基虽然清楚地知道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但他却决定不采取行动。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曾详细地说到他给加米涅夫的答复：

“……我基本上不想在代表大会上为了某个组织上的变更而进行一场斗争。我赞成维持现状。……我反对撤销斯大林的职务，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泽，反对把捷尔任斯基调离交通部门。但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力求彻底改变民族政策，停止在格鲁吉亚对斯大林的反对者进行迫害，取消对党的行政压力。……斯大林应立即就其粗暴行为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一封道歉信，并切实改正其态度，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不应走得太远。谋反活动是多余的。必须真诚地合作。但您……必须在第比利斯的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那种反对格鲁吉亚人追随列宁民族政策的路线。”^①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表示同意这些文件，但是，当列宁在三月九日第三次发病并从此离开政治舞台后，斯大林感到，他已可以放手贯彻他的路线了。

在三月中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会上，穆迪瓦尼—马哈拉泽派以一百二十四票对二十票被击败。^② 尽管加米涅夫力图把讨论主持得很公正（反对派也承认是公正的^③），但中央机关的力量在贯彻其意志和组成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方面没有遇到多大困难。格鲁吉亚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书记处如何能强迫地方组织接受它的统治。（党的机关所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的彻底，以致在二十八名参加十二大的南高加索的代表中只有一名是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5—486页。

^②参阅《十二大记录》，第185页。

^③参阅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51—152、157页。

反对派的人，即马哈拉泽。穆迪瓦尼出席了代表大会，但他只是一名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派出的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在三月的那场政变之后，他离开了格鲁吉亚。）由于列宁已瘫痪在床，斯大林孜孜不倦地准备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决定性的一战，以保证不失去他在党内享有的地位。

三月的下半月，托洛茨基作出一些姿态，以表示赞成列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但只限于提出某些口头警告：“如果我们误认为民族问题已解决了，那我们将陷入严重的自我失望。”他强调，必须使年轻党员明白，“在少数民族的共产党员中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这说明在整个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的某些部门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罪恶。”^①显然，托洛茨基只是重复了列宁的论述，而没有再向前推进一步。他没有进行指名批评；他警告了他的敌人，但没有鼓励他的朋友。几天后，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要求撤销奥尔忠尼启泽的职务，但他只是批评南高加索联邦全面地歪曲了联盟主义的思想；只是提出，格鲁吉亚少数派是受到一定抵制的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斯大林巧妙地消除了他自己所留下的踪迹，成功地把托洛茨基的建议（除了第一项外）全部从记录中删去。^②

在十二大的前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敌对状况重新在民族问题上加剧起来。托洛茨基自三月五日得到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爆炸性文章后，一直保持沉默。四月十六日，列宁女秘书弗齐也娃病愈后重新回到她的工作岗位时，向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递交了一份关于这篇文章的声明：“弗·伊里奇把他的这篇文章

^①托洛茨基：《民族问题与青年党员的教育》，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真理报》。

^②参阅托洛茨基给书记处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2号。

看作是方针性文件，认为很重要。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这篇文章送交了托洛茨基同志。弗·伊里奇委托他在代表大会上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护，因为他们两人在这件事上意见是一致的。”^①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在全党面前就变成这样一个人，要么辜负列宁的信任，要么策划对他的同志展开进攻。加米涅夫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并要求中央委员会同意发表列宁的那篇文章。^②

这期间，托洛茨基匆忙地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他只是由于同列宁的亲密关系才得到他那篇文章的抄本，而只字未闻作者的进一步意图，因此，他感到有义务保持沉默，尤其是因为这个文件包含着“对三名中央委员的严厉批评”；当弗齐也娃讲出了真正意图后，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让中央委员们知道这篇文章”，因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当时，托洛茨基更多地是考虑辩白，而不是进攻。他最后说：“如果中央委员们出于明显的党内原因不赞成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全党或代表大会公布这篇文章，那我将把它看作是一种保持沉默的决定，我对这篇文章将不负任何个人责任（包括向代表大会公布的责任）。”^③

列宁的姐姐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劝说不要公布这篇文章，她说：这篇文章尚未完成，但可以向代表大会的代表宣读。^④当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

^①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弗齐也娃给加米涅夫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793号。

^②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加米涅夫给书记处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2号。

^③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托洛茨基给斯大林和全体中央委员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4号。

^④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弗齐也娃给斯大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94号。

下列声明中假惺惺地表示了他的愤怒：

“托洛茨基同志把他在今年三月五日得到的列宁同志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作为个人秘密，不向政治局或准备十二大的中央全会介绍，扣压达一个多月之久，而且认为这是可以允许的，我对此感到很吃惊。正如党的代表们今天所告诉我的那样，这篇文章所说的问题是代表们讨论、谣传和议论的对象。如我今天所知，某些与中央委员会无关的人已经知道了，但中央委员们则不得不通过谣传和转述才得到有关的消息，而这篇文章的内容显然应首先让中央委员会知道。

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应该在报上发表。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如弗齐也娃同志的信所指出的——显然还不能发表，因为列宁同志还没有审阅。”^①

第二天，托洛茨基企图洗刷由于这一情况而造成的罪过。他强调，他只是根据他所认为的列宁的愿望行事的。接着他又写到：“我把这件事交由中央委员会处理。当我了解到，列宁没有给予任何直接的和正式的指示之后，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他最后在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出，如果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请求进行正式调查。^②在托洛茨基的追逼下，斯大林声明并答应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经过核实的情况说明。但这只是斯大林诡计的又一新例。显然，这一说明将犹如石沉大海。第二天，托洛茨基又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可以说是最后通牒的信：“如果您从我那里得不到对这封信的答复，得不到这样的通知：您将在今天向所有中央委员发出关于这一事件的明确无误的说明，我将从中得出您已改变了昨天的打算的结论。这样，我就要向冲突委员会

^①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的信。

^②参阅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的信，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2—363页。

告发，并要求作彻底的调查。”^①这等于提出了决斗的挑战。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直至四月二十五日结束。虽然斯大林差一点要遭到一场严厉的谴责，但他却仍然像往常一样不受干扰地作为民族问题专家出现，并就这一题目作了主要发言。他知道，代表们已经获悉列宁的批评，所以他特别努力针对列宁的批评为他的格鲁吉亚政策作辩解。他说：当时，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已开始“进攻”，因此有必要通过南高加索联邦纠正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斯大林认为，这一措施得到多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支持。因此，穆迪瓦尼集团在三月的代表会议上被冲垮了。^②

格鲁吉亚反对派在反驳时公开引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穆迪瓦尼宣称：“我们需要这样的政策，它是伊里奇经常教导我们的并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向我们所要求的，但这封信只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个人转告才被得知。”^③穆迪瓦尼的志同道合者马哈拉泽说，列宁过去之所以对格鲁吉亚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他听到的只是蓄意捏造的假情报：“关于我们和我们的组织，中央不断得到的是些假报告。可惜，中央相信了这些情报。因此，中央对地方同志不信任。”^④

乌克兰政府首脑、保加利亚人拉柯夫斯基明确地表示支持那些批评实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计划的人。他悲叹地说，列宁当时没有在场，否则他将指出“民族问题上的这一灾难性的错误”。他警告说：“同志们，我声明，联盟的建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

①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托洛茨基给斯大林的信，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3页。

②参阅斯大林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183—185，441—448页。

③穆迪瓦尼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454—455页。

④马哈拉泽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56页。

路。正如你们所知，这不仅是我的意见，它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①拉柯夫斯基得到了布哈林的支持，他抛弃了极端的国际主义，赞成对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敏感情绪作出让步。布哈林认为，有必要“向以前被压迫的民族赎买对我们的信任”，并打击“所有在这里已揭露出来的大俄罗斯倾向”。他提出这样一些不用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列宁同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这样大声疾呼地发出警报？为什么列宁同志在他信中只字没有说到有民族主义倾向者的错误，而集中所有言词——强烈的言词——反对迫害有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政策？”^②

只有一个人出乎意料地没有谈民族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他放弃了对斯大林展开全面进攻的机会，虽然列宁曾委托他，代表大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激烈辩论曾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往往有许多令人不解的表现，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三驾马车”的追随者们尽力贬低列宁这封信的意义，他们说那是由于错误情报造成的。尽管人们一再要求，他们坚持反对公布这封信，理由是：缺少列宁的必要指示。^③虽然事件本身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但“三驾马车”对代表大会仍有影响，甚至在民族问题上也得到了支持。事情以格鲁吉亚反对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关于格鲁吉亚的争吵说明，党内过去已有的裂痕又重新分开了。托洛茨基过去的追随者——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同情格鲁吉亚反对派，而列宁主义者则牢牢地站在维护书记处威信的这一边。这是布哈林最后一次同左翼同行，在那年年底

^①拉柯夫斯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28—534页。

^②布哈林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63页。

^③耶鲁季泽和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540—542、552页。

之前，他又摇摆到了“三驾马车”一边，去反对托洛茨基。除了托洛茨基的少有的消极态度外，这次因格鲁吉亚问题的争吵还有一个特点，即列宁的同情倾向。如同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前曾有一次出现过的那样，列宁与左翼结成了联盟，反对他自己的思想狭隘的学生。这一改组对党和国家建设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列宁的健康没有彻底毁坏，苏联的政策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格鲁吉亚事件的平息而解决。后来，还发生了乌克兰和穆斯林倾向分子的事件，但在这两个事件中斯大林拥有最后决定权。拉柯夫斯基和乌克兰人继续批评苏联的国家建设，他们认为它只有大俄罗斯统治的味道。^①他们抗议撤销他们自己的对外人民委员部。^②拉柯夫斯基与斯大林最后发生了直接冲突。^③随后不久，拉柯夫斯基突然获悉，他被任命为苏联驻英大使，而他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很快为一个不太知名的乌克兰行政专家弗·雅·邱巴尔所接替。书记处的长手伸向各地，左翼反对派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基地之一。

更为尖锐的是鞑靼族共产党领导人苏丹—加里也夫集团的事件，它也是被悄悄地清除的。苏丹—加里也夫由于激烈攻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对在苏联成立一个包括所有穆斯林在内的大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而激怒了中央。^④

斯大林在其伙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下，下令逮捕了苏丹—加里也夫，控告他犯有严重背叛罪。这是第一次使用这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一卷，第399—401页。

②参阅多伊奇尔，《斯大林》，第245页。

③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89页。

④同上，第286—287页。

种方法迫害党的领导干部。^①中央委员会指责他，从事“阴谋活动，……破坏从前被压迫民族对革命无产阶级的信任”，并决定把他开除出党。^②对联盟来说，尽管形式上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但只能有一条路线和一个最高权威。

围绕民族问题的争吵是政权空白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它导致了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以及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戏剧性决裂。但是当时关于另外一些问题的争吵，对以后的党的分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特征。对大多数党员以及对列宁本人来说，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问题。

三、官僚主义和党的改革

当党的领导想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时，他们突然发现极左派一再警告的官僚主义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此以后，声色俱厉地宣布要反对这一弊端就成了官方决议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典型的新语调是列宁一九二一年发表的声明：“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象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里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③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以俄国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和文化落后

^①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以及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参阅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决议：《苏丹—加里也夫事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0—342页。

^③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79页。

为基础的。痛苦的经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观点：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来说，俄国是不够发达的。在乌托邦的战时共产主义梦想破灭后，在冷静的新经济政策初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觉醒。

当共产党人为满足自己创立的国有化国民经济的需要而着手建立管理机构时，他们不得不使用旧人员和前人的办法。托洛茨基公开承认，苏维埃机关大部分是靠沙皇的材料建设起来的：

“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它是由我们根据手头的原料建立起来的。谁的过错？是我们大家。”^①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承认：“我们接受了旧的国家机关，这是我们的不幸。”

“……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②一九一七年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用群众直接的自治来代替它的目标完全未能实现。列宁忧伤地承认：“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人材，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③

一九二二年秋，列宁的健康情况略有好转（尤如重新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他又短期地恢复了工作，并查看了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在继续他的工作。他十分吃惊地看到，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工作方法已经泛滥成灾。为了减少官僚主义的弊端和使现行政策更多地与所宣布的党的民主理想相一致，列宁开始撰写严厉的批评文章和起草改革计划。因为他的健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在乌克兰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任务》，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4页。

②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87页。

③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页。

康状况不允许他将整个担子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只好向托洛茨基求援。

列宁公开提出建议，正式让托洛茨基成为他的副手，并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后来，托洛茨基曾这样说道^①：

“列宁让人把我叫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房间，他讲到我们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有了可怕的增长，并认为有必要寻找一种能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要求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列宁也批评了其他几个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瞿鲁巴和李可夫）的表现。列宁不在时，他们曾负责领导政府事务。他建议托洛茨基改组国家领导：

“您必须成为我的副手。局势的要求是，我们需要来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

托洛茨基向他的政治局同事解释说，他拒绝当副主席，因为一批副主席的存在必然给政府权力带来不明智的分配；因为在负责的人民委员背后（同样在他的背后）有党的机关，而一切决定都是由党的机关作出的。他回答列宁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我们在反对苏维埃官僚主义时不能忽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无论在首都、在外省、以至在地方党组织中，干部和专家的选拔是很特殊的。选拔的基础是，这些党员和非党人士必须对某个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对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某个集团无比忠诚。只要人们抨击一个很小的书记，就会触及到党的一个高级领导人。专家们都是他的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承担这一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引用他的话）：“换句话说，我建议苏维埃机关中展开一场反对官僚主义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给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声明。

的斗争，而您向我建议，要扩大这场斗争的范围，要在党的组织局内展开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使我感到十分突然，以致我不得不笑了起来，因为列宁如此完美无缺地表述了这种思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回答说：‘可以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那好吧，我建议与您结成联盟，’列宁回答说。

‘与一个正直的人结成联盟，这太好了，’我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为了反对‘普遍的’官僚主义，他将建议组织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这样我们也可以处理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问题。关于组织形式问题，他表示‘再继续’考虑考虑。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因此，这项工作始终没有着手进行。”

在列宁第二次发病和第三次发病之间，他不得不躺在床上开始草拟一项改革计划。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他口述了许多文件（其中有“遗嘱”和有关民族问题的信件）。显然，在他还能详尽地展开他的思想的时候，这些文件有些是作为粗略的改组管理机构的草案提出的；有些则是作为党内指示，指出在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的情况下党应如何行动。^①但是，他临终时已在三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和解决管理问题的建议，这三篇文章是：《论合作制》，写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写于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一月二十五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写于三月二日，发表于三月四日（这三篇文章全部刊载于《真理报》）。

这些笔记和文章所论及的主题就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纲领所面临的困难。列宁写道：“没有整个的文化

^①参阅一九五六年六月《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第16—21页。

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历史好像在意外地捉弄布尔什维克：“我们竟在文化变革，即文化革命之前先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可是，现在我们还是要进行文化革命。”^①立即改革政府机构似乎是必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②现有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监察机关似乎已经垮了，“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助手。”^③

浮现在列宁脑海里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甚至一百人，而这些人应是一般的工人，这些人与工农检查院司令部里的监察专家们共同组成一种新的能彻底清洗管理机构的力量。^④列宁在他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篇文章中已把他的建议具体化，同时也做了略微修改。他建议应当以最高监察机关代替工农检查院，而这种机关同时兼任国家和党的监督职能（它应体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身上）；这种新机关应有一百名“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出来的成员，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还希望：要使它具有威信并同基层紧密联系起来；新的委员会要克服僵化的官僚主义；另外，扩大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应与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会议，而这种全体大会应享有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的额外权力。^⑤

①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9页。

②同上。

③列宁十二月二十六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9页。

④参阅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619页。

⑤参阅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6—437页。

列宁的紧急指示和提议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感到震惊。据托洛茨基称，列宁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就将文章寄给了《真理报》，以供发表。但斯大林扣压了这篇文章，并要将它首先提交政治局审查。于是，托洛茨基坚持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还有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以及党的第三书记古比雪夫（他当时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看来已获得这个集团多数人的许可参加这一会议并参与表决）。多数人拒绝列宁的改革建议，并以六票对二票（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多数决定推迟发表这篇文章。古比雪夫甚至还建议印发一期伪造的真理报，这样，让患病的领袖能看到他的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并对此表示满意。仅由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激烈反对，认为绝不能隐瞒列宁的文章，最后才迫使多数人同意发表他的文章。^①此文发表于一月二十五日。^②

很显然，这一领导集团已经看到列宁的改革建议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实际威胁，尽管他们当时还不能知道其中一些具体的内容，如列宁在“遗嘱”中所表示的反对斯大林的内容。然而，列宁的个人威信在一般党员中是非常高的，以致任何人都不能直接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2—73页。

^②托洛茨基的敌人想用这种说法，即托洛茨基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来回击他。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托洛茨基当着中央委员会为自己辩护，并反对这种指责。他反对列宁的改革计划并主张设立党领导机关的“第二中央”。他的声明为企图扣压列宁文章这段情节提供了同时代的证明材料：“有关列宁同志的信件和我与这封信的关系的简单化的历史描绘丝毫不能使这个可恶的闹剧结束。事实正好相反，当时，即在多数政治局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同志的信的时候，我却是坚持要发表这篇文章（只有我同加米涅夫同志以及未出席会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始终这样坚持），同时也捍卫了他的基本思想，或者（更确实地说）在我看来是基本的思想。”

见托洛茨基所发表的声明《论党中央机关改组工作的计划》，参阅《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会议的记录》。

地抨击他的计划。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人们想用补充建议来冲淡他的改革内容。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处在吸收了许多党章修正案的内容后向中央委员会转交了一份改革计划。^①最重要的建议类似于列宁十二月的笔记中所提出的建议——应把中央委员人数从二十七人增加到五十人。这一扩大了集团应获得更多的权力：

“中央委员会设立由委员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它负责处理日常的政治工作，并有责任视具体情况将重大的政治问题提交中央全会的例行会议或特别全体会议作出决定。这种变革将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变革扩大中央委员会机构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如果人们按照这种计划行事，那总书记就有可能利用他的权力地位在地方组织中加强他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影响。结果，中央委员会就会塞满了不明真相的人物，表面上看都是一般党员中的纯朴代表，但实际上，由于地方组织受书记处控制，选出的这些新人物都是书记处的工具。这也正是斯大林最后建立起来的模式。如果人们要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那么就应把各级党的书记从隶属于享有过高的个人威望从而不能公开抨击的政治局委员的关系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是列宁改革计划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但在斯大林的建议中却根本未被提及。如果允许中央监察委员会独立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触及书记处的权力。显然，斯大林还没有找到一条能把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并使之服从于他的意图的办

^①参阅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部和书记处之间的职权划分问题的建议》，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776号。

法，所以他没有提及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

改组计划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激烈争论。斯大林在报告中说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①坚持反对扩大计划的一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在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说道：“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再扩大的必要……。政治局和全体会议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严重威胁和影响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根据列宁的建议，托洛茨基建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它应有七十五人组成，并由七人到九人组成的主席团来领导。^②改组后的委员会应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的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的执行情况，实现党对国家管理机构的监督，反对与新经济政策有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和“热月党人式的”势力并防止管理机关对党施加有害的影响。^③

在这期间，列宁又完成了另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革的建议，并进一步阐明了一些基本的思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发表于三月四日，载于《真理报》，它表明列宁对国内社会发展的普遍倾向深表忧虑。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传统性的官僚现象已越来越多，这主要是由俄国的文化落后所造成的。像列宁现在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工人缺乏必需的文化知识去做富有成效的管理工作。

^①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77页。

^②托洛茨基：《论党中央机关改组工作的计划》。

^③托洛茨基：《对党的设想》。

他特别指责工农检察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列宁断言说，工农检察院的官员缺乏良好的意愿。（他以此间接地批评斯大林，斯大林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之前曾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并要求认真改组工农检察院，使它成为规模很小的但能起示范作用的机关，“在这里，不彻底的决定是再有害不过了。凡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定出来的工农检察院的编制标准，实际上都是根据旧官僚式的理由，根据旧的偏见，……定出来的。”^①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与列宁在政治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发表的其他原则性的文件一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文件是：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警告当心第三国际过分的俄罗斯化）；他对托洛茨基的评论（这些评论看来基本上是真实的）；他有关民族问题的笔记；他的“遗嘱”和有关合作社和工农检察院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表明，列宁已认识到要扭转政治方向，并与他在一九一七年年年初和年底所执行的路线作了比较。当然，这仅是人们的推想，因为他于一九二三年三月第三次发病后永远地闭上了嘴。但是，无论如何，情况已表明，他再一次从“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转变到了左派的立场上。他现在已很少关心直接的实际问题，而把注意力转到了苏维埃现实和原来的革命目标之间的差距上。

但列宁对一党专政这一基本问题是丝毫不动摇的。同温和的左派一样，列宁从未停止强调共产党权力垄断和密切注视苏维埃

^①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1、446页。

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的是，他承认了这一事实，即当时所实行的单一领导和压制民主化过程等办法导致了政治组织的严重官僚化。由于他认为官僚化倾向是民族文化落后造成的，列宁开始考虑克服这种根本缺陷的办法。在某些方面，列宁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了。在他一向习惯用纯粹的组织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他已在更多地研究“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表明列宁想把暴力的统治方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那位钢铁战士却比列宁本人更加列宁主义化。

四、运转中的机器

一九二三年四月，苏联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极为紧张。列宁处在生命垂危之中，但他的同事们却在勾心斗角。许多问题还来不及进行讨论就爆发了。未来深不可测。在春天的空气中也含有使人感到极不舒适的分裂气息。

在这种气氛下，党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了。这就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它从四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举行。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它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是他逝世前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个别代表在没有准备好稿子的情况下就发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后，除了一九二五年举行的十四大外，所有的党代表大会可能都是由书记处导演的戏剧，都是统一的、一致的腔调。但是，尽管有自由（党的十二大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和有不满意情绪（它有时来自一些代表），人们还看不出有一条清晰的宗派界线，而且也没有人敢于无保留地起来反对掌握统治权的“三驾马车”。在这期间，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示其威力。

在党的十二大“筹备”时期，当各个地方党代会选举代表大

会的代表时，书记处机器在组织上所作的努力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它竭力采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手段对近两年发展的党员施加压力，把那些效忠于党的机关的人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在党代会上自吹自擂地说道：“最近六年以来中央委员会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民主。”^①一九二三年十月，左派在清醒地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在《四十六人声明》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②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选举代表的各地区党代会有一半以上都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参加。^③尽管一些成员还想提出批评意见，但他们处在党纪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人们当时还不清楚，书记处已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例如，托洛茨基在乌克兰地区党代会上按照地道的正统观点作了讲话。他强调维护党的统一和遵守党的纪律的必要性，并声称不能怀疑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改革建议的优点，以及作为新经济政策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的重要性。^④

党的十二大筹备工作使斯大林真正控制了大多数代表，或者说，至少使他比所有反对派领袖联合起来的力量都更强些。由于他控制了代表大会上的各种构成权力的因素——完全服从的代表核心、强大的组织系统、集团意识、对确定战略目标的影响，斯大林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党内决定性的人物。当确定谁向党代

①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81页。

②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的《四十六人声明》。

③参阅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三月号，第7、8页。

④参阅托洛茨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名义领导的问题出现了。过去，作主要报告始终是列宁的特权，就像后来成了斯大林的特权一样。但当时，斯大林想在幕后掌握权力，故建议托洛茨基担任这一名誉职务。而托洛茨基则又踌躇起来，他害怕在这一危急时刻做得太过分。^①当时，还有一个积极的竞争者，即季诺维也夫。就这样，在这一年和第二年里，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党的名义领袖这一角色。

书记处在组织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前民主集中派分子柯秀尔抗议日益增强的压制气氛，从而揭开了对斯大林组织报告辩论的序幕：“同志们，对我们来说，党内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妨碍进行任何实际的组织批评的情况。”但是，他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继续无理由地执行党的十大关于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他认为那个决议是一时的紧急措施。“现在，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这种特殊的法律呢？……如果党的生活在官方机关、支部、区和市委会范围内都很正常的话，在党内，就不会出现任何集团活动。”^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样直接抨击了书记处的工作，他尤其反对任命地方党的书记的倾向。他说任命地方党的书记“是极端危急形势下的产物，它给党在政治上带来危险，把这种特殊现象确立为一种制度，这是绝对错误的”。^③

关于组织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人作了发言。多年来，他的声音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已很少听到。他就是列·波·克拉辛，列宁以前的副手；他在革命胜利后又回到了党内，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各种不同的行政和外交岗位上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目前，他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毫无疑问，为了压制他的批评，他于一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6页。

^②柯秀尔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九二四年被解除职务，并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死于一九二六年，终年五十六岁。^①）克拉辛对党的领导关于组织问题的整个讲话表示不满，并断定党的发展工作自革命以来就存在普遍的缺点。他引用他自己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说道：“我们党的上层建筑完全是按照它二十年前的结构铸造的，尽管党的任务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有了变化。”

他直接警告代表们：“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不再是地下党，你们是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是在国内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和在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工作的，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统治者能克服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要求把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变成进行国务活动的党。另外，他像实际中的每一个反对派一样也承认党专政的必要性：“我认为，直到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为止，整个的国家工作必须处在党的最严格的控制之下，只有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是最后的决定机关，它必须为我们的国家决定一切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②

党的领导中有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严厉地反驳了那种反集权的批评。布哈林劝戒批评家们遵守纪律，因为他们损害了一项党组织的重要原则：“像柯秀尔那样的同志要把我们集中起来的党变成各个集团的联盟。”^③某个姓别连基的人（他后来成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说道：“在我们被小资产阶级分子包围的时期，统一更有必要，任何小集团的形成都是不许可的。要说改变这一法律，还为时过早。”^④马·尼·柳亭（他由于从事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三二年被清洗）甚至公开宣扬权威主义观点：“党不

^①参阅克拉辛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32页。

^②克拉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别连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能没有领袖……，所有的一切都应纳入组织问题。一些同志倾向于强调‘民主’，另一些同志却强调‘集中’。孟什维克和那些同我们打过架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一直是更多地讲民主主义，而我们则始终强调应将民主主义原则服从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①

对具有上述思想的人来说，斯大林关于党的设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斯大林称党是一个“机体”，作为这样一个机体要求它的成员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而书记处的工作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领导决定采取哪些方针，不需要多加说明；成员作为机体的组成部分只有一种职能，即服从。斯大林把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队”这一形象而又生动的革命概念变成了革命后政权的等级制组织的静止不变的程式。^②重新恢复一九〇二年的组织传统被搁置下来。

要保证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领导不能依靠像全体成员对执行机关实行监督那种具有爆炸性的手段。人们认为，在党的创始人的学说中可以找到（或者说已经找到了）进行正确领导的保证。加米涅夫在党代会开幕时宣布：“我们只知道一种克服各种危机和错误决定的对策，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学说，而党在困难的时刻总是采用这种对策。”^③对自称是列宁主义的领导进行批评，必然被看作是动摇正统的革命支柱。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道：“对党的路线提出的任何批评，自称是所谓的‘左派’的批评，现在从客观上看是孟什维克的批评。

^①柳亭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61页。

^③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左派’的批评具有危险性，我们必须进行抵制。”^①

斯大林的任务是，提出具体措施，以贯彻他的同事们所主张的纪律准则。现在，他决意像列宁曾建议过的那样要求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把它与工农检察院合并。同时，斯大林在报告中也提出了他独自的计划，要扩大中央委员会，并将它置于政治局领导之下。另外，他还建议为地方党的书记创办一所学校和培养新的领导人，以便“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书记处将按照它的标准来进行挑选，这当然是说不上条件的。就他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道：“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②换句话说，党的新司令部应不受其本身思想的约束，并且应摆脱反对派的干扰。

尽管有反对的意见，斯大林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了。但在改组问题上，对立双方的阵线不太分明。托洛茨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计划反对者，他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但支持建立新的监察委员会。“三驾马车”本身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很明显，季诺维也夫对改革是不热心的，并且强调要有利于现行的中央委员会。^③不过，他不直接抨击各项建议。不管怎样，“三驾马车”还没有分裂，斯大林还激烈反驳左派的批评，保护季诺维

^①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78、183页。

^③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也夫。①斯大林的改革计划明显获得了一部分左派的赞成，因为改革计划表面上是反官僚主义的。前激进左派共产主义者斯土柯夫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中央委员会需要新鲜血液，以便使“牧师特权阶层”不能为害。②更有甚者，奥新斯基也支持斯大林的建议，按他的说法，这些建议“确实能使我们党内建立起真正的统一”。③在促使代表大会采纳改革建议的力量中，闷闷不乐的左派显然是第二股力量，它仅次于斯大林书记处召唤来的人员。左派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帮助了这种权力的建立，而这种权力却最后导致了他们本身的毁灭。

党的十二大并没有更换党的最高领导——斯大林在等待时机，而且也不敢冒犯他的那些杰出的战友们的地位。患病的列宁再次被选进政治局。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变得更加孤立的托洛茨基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再次当选。候补委员有：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和一个新的人物，即工会领导人鲁祖塔克。已经牢牢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实际上没有变动。相反，中央委员会内有了很大的变动，它已从二十七人增加到四十人，通过提升和重新分派角色，又增加了十四名新的候补委员。很明显，书记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所有的新人（其中包括拉·莫·卡冈诺维奇）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都证实了他们是忠诚的斯大林分子。④

明显扩大了（从五人增加到五十人）和享有较大权力的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完全处于斯大林分

①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84页。

②斯土柯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参阅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名单。

子的统治之下，新的主席是古比雪夫，他也是九人主席团的领导。主席团的成员有权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团的成员是：索尔茨、古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马·费·什基里亚托夫（他是少数小干部中能闯过所有清洗运动的幸存者之一，后来作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死于一九五四年）。九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即伊林后来参加了左翼反对派，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① 斯大林分子原先对党的改革所产生的恐惧，后来证实是毫无根据的，除书记处外，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成了斯大林手中的可靠工具。

党的十二大的成果是，拥护真正改革的人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失败。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体制提出的深刻批评被围绕着具体的改组计划所发出的争吵声所淹没，而对官僚政权有着浓厚兴趣的书记处已越来越不可抗拒。列宁有关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除进一步加强了书记处的影响外根本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从这时起，人们几乎不再可能制止斯大林的为所欲为了。

但是，领导集团仍然面临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党的十二大对于党内温和的左派分子来说是奋起反抗组织权力的信号，而在此之前他们却把组织权力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容忍了。这种反应后来也表现在四十六人声明之中：

“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压制党内派别的制度已过时了，而且不再产生任何好处。我们当中许多同志曾经自觉地保证不反对这种制度。由于一九二一年的事件的变化，后来又由于列宁同志患病，我们当中许多同志都认为需要采取具有党内专政性质的临时措施。另一些同志（民主集中制派）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

^① 参阅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主席团名单。

种制度实行得过头了。它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党内约束开始松弛。党开始走下坡路。”^①

五、经济政策上的分裂

到一九二三年春，新经济政策已执行了两年。它的直接目标已经达到，苏维埃政权渡过了一九二一年的危机，克服了饥荒，农业经济也从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沉重打击下得到了恢复。但是，灾难一过，最初一致赞同新经济政策的同心同德的局面也随之消失；不满情绪明显增加，隐藏在列宁主义者和左翼派别之间的不和重新出现；当前政治上的必要性与长远目标之间的这一老问题的争吵重新爆发，极左的意见不愿保持沉默。绝望的极端分子发言人以半非法的方式宣布他们的观点：党的领导人背叛了工人的事业。

对党的领导来说，坚持不懈地贯彻新经济政策并非一件轻松的任务。虽然总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但国民经济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在列宁因病不能执政期间，党正处于一种所谓剪刀差的危机之中：工业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相对下跌。由于国营工业企业逐渐合并成辛迪加组织，获得了垄断利润，这种不正常的价格关系变得更加严重了。^②其后果是，国营工业在一九二三年年中陷入严重困境，产品不能按期望的价格销售出去，失业人数增加。当时，党正忙于挑选继承人这样一些棘

^①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四十六人声明》。

^②“剪刀差”这个名词首先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十二大上采用的，它形象地说明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一九二一年的饥荒虽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到战前的正常水平之上，即美国术语“平价”之上，但到一九二二年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农产品价格相对下跌。形势犹如一把张开的剪刀。一九二三年秋，这种差距达到了最大程度。

手的政治问题。一九二三年的经济形势导致了一种新的尖锐的危机气氛。人们对剪刀差危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在一场争夺个人和集团政治影响的斗争中，本属技术性的、经济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变成了政治皮球。左翼冒险主义要求在全面的计划基础上实行系统的经济发展纲领。右翼“列宁主义者”则认为，鉴于这样的经济危机，应给农民以更大的许诺和谅解，应更多地安抚农民，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城市居民的利益。党领导认为，利用党所掌握的政治工具能较容易地解决城市居民的不满。

能说明分歧的是在稳定币值问题上出现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当一个政府还继续依靠发行货币来筹措资金，并力求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时，稳定币值对它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以财政委员索柯里尼柯夫为代表的左翼，认为币值不稳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他们企图努力解决它。左翼则认为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迟迟不实行经济的计划管理而造成的后果。^①

一九二二年秋，在外贸政策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索柯里尼柯夫和右翼主张实行传统的、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类似的财政政策。为了稳定币值，他们努力争取有利的贸易结果，当消费品的进口价格有利时，他们甚至主张进口消费品。在索柯里尼柯夫的推动下，在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支持下，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作出了一个反对外贸垄断的决定。当主张经济发展应取决市场情况的观点得到加强时，左派认为，这些措施严重阻碍了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当时主管外贸的克拉辛和托洛茨基坚持他们的观点，最后列宁不得不亲自干预这件事，并重新肯定了外贸垄断。^②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再次离开了他的追随者，同左派站在

^①参瓦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1、86—87页。

^②参阅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56号。

一边。

另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工业恢复缓慢、经济收益甚微的问题。在某些工业部门，由于实行整顿政策，生产开始集中于那些最有成效的企业。一九二一年，尽管在政策上还有争执，顿涅茨煤矿盆地就这样做了。^①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皮达可夫由于违背某些领导人的意志被解除了顿涅茨煤矿的管理职务，^②这显然是斯大林的杰作。托洛茨基本人最初竭力支持整顿工业的措施，即使失业增加，也在所不惜。^③然而，当李可夫建议关闭彼得格勒著名的普季诺夫机器制造厂时，触动了一些人的政治感情。普季诺夫工厂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而且是重工业集中化的样板。尽管那里的生产能力只有百分之五被利用，^④但在党看来它仍是一个理想之物。季诺维也夫提出了抗议。无疑，关闭这个厂对他在彼得格勒的威信来说是一个打击。政治局取消了这一决定。在此期间，赞同左翼观点的经济干部提出，为加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应补贴工业，这是反对派纲领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国营工业中，党组织与管理企业的专家之间的关系也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使得这场围绕着经济政策而展开的争吵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新的共产党员企业领导人数年后产生了一种集团性的思想。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企业的经济效果有所提高，他们对此感到自豪。一九二二年辛迪加运动主要就是来自他们的创议。他们反对最高经济委员会给他们规定详细的发展路线，并指责这种做法是官僚主义的干涉。一九二三年，由于企业管理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价格定得较高，

^①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发展》，第153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给党史办公室的信。

^③参阅托洛茨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见《十二大记录》，第296—297页。

^④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第174页。

俄国的工业获得了赢利，这是革命以来的第一次。^①然而，日益壮大的党的机关开始侵犯企业领导人的领地，其后果是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和意见不一致。在党的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与管理部門中的“西方式的”知识分子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作风。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克拉辛、奥新斯基和拉林代表了管理人員的呼声。他们三人激烈反对关于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合并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将破坏党与国家机构在法律上的分离，将造成党的干部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合理的干涉。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克拉辛写道：“我认为，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員将对这些决议感到震惊。”克拉辛批评书记处的政治领导缺乏经济才能，强调“严格遵守党的路线，……不应妨碍经济发展”。指责党的领导机关出于派别原因经常不合适地解除某些经济管理人員的职务，并把一些无能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管理岗位上。^②他宣称：“为了避免这一点，只有使党的领导机关中不仅有政治家，而且要有组织家、行政管理专家和经理。”^③这位当年的老革命家揭露说，由职业革命家来管理国家，具有许多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

经理们的意见引起强烈的反对，这主要来自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方面。经理们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某些同志陷入本位主义而忘掉党的精神的表现。^④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还说，在这些意见的背后是一批企图使管理机关不受共产党监督的“资产阶级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声称：“这不仅是

^①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第160、161，171页。

^②转引自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42，204页。

^③同上，第113页。

^④萨发罗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8页。

一种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且是对整个革命的修正。”^①格·伊·萨发罗夫说，克拉辛、奥新斯基和拉林“显然已滑入孟什维克的泥坑”。^②过去用来指责工人反对派的语言，现在都自动地加到了那些威胁党组织统治的人头上。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加详细地分析了经理们的骚动：他们由于陷入“个人主义偏见”，以“眼前的企业利益代替长远的无产阶级利益，从而发展到与党的监督发生冲突的地步。眼前的经济效果与长远的计划发展是可能有矛盾的，但是人们应当从计划发展的利益出发与经理们取得谅解。中央委员会应如此地安排其工作，使那些需要谨慎从事的重大问题由那些懂行的人来决定。”^③

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定是以托洛茨基的提纲为基础的；它既对经理们作了让步，也强调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指示各级党组织要维护工厂领导的威信，对企业领导在技术方面的工作不要作不适当的干涉。另一方面，决议也强调，党应对经济进步和无产阶级路线的贯彻负完全责任。^④

党的官僚与行政管理官僚之间的鸿沟并没有通过十二大而消除。当一九二三年秋公开的宗派斗争重新爆发时，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之间的矛盾是主要摩擦之一。

左翼和右翼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观点，使另外一个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经济计划问题，以及工业发展速度和方法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全党一致同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但在新经

^①叶夫多基莫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47、148页。

^②萨发罗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9页。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31—133页。

^④参阅十二大决议：《关于工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56—276页。

济政策的头几年，计划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愿望。人们只是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在有限的范围内试图实行计划发展。虽然在一九二一年就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但它只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后几年才具有某些重要性。^①

剪刀差危机越严重，右翼多数派就越加无条件地维护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措施，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的政策。季诺维也夫驳斥那种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说它是“孟什维克”思想。^②（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这种指责的牺牲者。）加米涅夫在十二大上强行通过了一项决议，它主张为巩固“工农联盟”实行一种更加温和的税收政策。右翼的经济理论是，发展大工业的资金只能来源于对其产品的需求，这就是说，首先要让农民复元，让他们富裕起来，然后通过他们的购买力来为工业增长筹措资金。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应首先获利，然后它将促使生产资料工业蓬勃发展。^③左翼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主张依靠全面的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支出直接建立工作。

一九二二年春，托洛茨基再次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最高经济机构。据估计，他自己想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人。^④但这一提案遭到大多数人反对。但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功地赢得了列宁对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职权的支持。一九二三年三月，托洛茨基在他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工业提纲》中强调全力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政治意义：“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二十章《计划管理的开始》。

^②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见《十二大记录》，第195页。

^③参阅波格丹诺夫等人在十二大上的发言。

^④参阅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八日托洛茨基，《论关于选派代表工作的决议》，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46号。

造出不可动摇的基础。”^①他竭力主张实行“正确的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应避免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对市场作用作不明智的行政干涉（战时共产主义的后果就是这一错误的表现）；另一个则是不够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即使由上面控制更为有利。托洛茨基认为，这一有利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他在党代表大会的工业报告中说：“我希望，我也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把此时此刻宣布为协调的、集中的经济发展的起点。”^②

正如已获得的关于政治局内部讨论的材料所表明，经济计划问题已成为当时在政治上相互竞争的对手进行争斗的一个主题。托洛茨基在计划问题上有他自己的设想，目的性比较明确，而且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他的对手在经济问题上的无能。斯大林则利用经济问题使托洛茨基陷于困境，他指责托洛茨基忘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因为他没有按列宁原先的计划成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最后，政治局以托洛茨基一票反对、其他人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决定，暂不公布列宁关于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职权的文章。但是，其他领导人也不敢公开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把托洛茨基的观点作为十二大的正式意见而接受了。

在贷款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可掩饰的分裂。右翼主张，为了有利于币值稳定和企业的效益性实行一条严格的贷款政策。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工业企业不能依赖国家，而应自助。^③这件事引起了经理集团和赞成实行相反路线的工业理论家

^①托洛茨基：《关于工业提纲》，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2964号。

^②托洛茨基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321、322页。

^③参阅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第十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文件，转引自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317页。

们的不满。这时，托洛茨基又提出一个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贷款政策，即投资应取决于国家的大投资目标，而不取决于一个企业的间接资本需要。^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加激烈地表述了左翼的经济观点。他认为导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俄国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不平衡”。^②克服困难的唯一出路在于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采用了类似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为了积累迅速建设重工业所需的资本，应实行包括国家“剥削”农民（“强制交售”，“强制节约”等）的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将象剥削殖民地那样剥削农民。^③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克拉辛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思想，认为必要的资本可以从外国引入。^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了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基本组成部分。

十二大关于工业的决议似乎是托洛茨基的一个胜利。决议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加速重工业建设和实行全面计划的重要性等空洞词句，如：“国家的活动必须首先放在有计划地发展国营工业方面。”先进的工业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工作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基础。”^⑤对于这样的词句，任何人

①参阅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778号。

②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危机》。

③参阅亚力山大·艾尔里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苏维埃工业化经济》。

④参阅托洛茨基和克拉辛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321页、352—353页。

⑤俄共（布）十二大决议，《关于工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56页。

也不敢反对，但实际上这一决议只是一纸空文。虽然计划纲领印有反对派的标记，但领导集团成功地使大规模的工业化向后推迟了四年，推迟到左翼反对派被打垮之后。

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中，一个新的、半公开的极左派的抗议运动发出了危险的声音。特别使党的领导集团感到不安的是一个所谓的“匿名宣言”，它出现于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这个宣言称：“我们号召一切聚集在民主集中派、‘工人真理派’和工人反对派周围的忠诚的无产阶级分子，不管是党外的还是党内的，在‘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的宣言基础上团结起来。”^①这个宣言显然来自以米雅斯尼柯夫为首的工人团。它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

工人小组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当年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且否定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整个工业政策。他们提出，专家和厂长权威应铲除，应由工人监督来取代。“自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工业管理是在没有工人阶级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单纯靠官僚主义的任命来进行的。”^②同时在流传的另一个文件是由“工人真理派”的追随者抛出的。它尖锐批评说，普通工人仍在受剥削，他们的权利和工会职责遭到践踏，而干部们却生活得很好，政府又重新肆无忌惮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③

反对派的发言人从这些地下言论中得出结论说，真正的党的统一的最大敌人是党组织的镇压措施，它迫使人们采取危险的反对派方式。当时的工人反对派领袖卢托维诺夫宣称：

“所有这些小组的存在，所有这些传单的出现，显然是有其根源的。之所以出现了各种匿名的纲领，之所以出现了许多匿名

^①转引自加米涅夫在十二大上的报告，《十二大记录》，第145页。

^②《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宣言》，见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82页。

^③《“工人真理派”致俄共十二大呼吁书》。

人散布的传单，只是因为俄共党内不存在通过正常途径表述各种看法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凡是在俄共党内企图对政治路线的实际执行情况提出批评，而不是对政治路线本身提出批评的人，都会被扣上孟什维克、社会党人等帽子。”^①

党的领导宣称，对匿名宣言和工人小组根本不能予以让步，因为它违反党内禁止搞宗派活动的政策。季诺维也夫指责反对派曾要求取消这一禁令。他说，禁止搞宗派“不是一项可以允许例外的法令，——它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卫的武器，它将从各方面制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妄图涣散我们组织的影响。……在我们党内，有充分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但是企图涣散党的自由是不允许的”。^②

六、围绕继承问题所进行的幕后活动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大会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好像要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代表们都知道列宁已与斯大林闹翻，他们有理由认为列宁反对整个“三驾马车”，并支持托洛茨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一再出现。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惟有托洛茨基才能发起的猛烈批评，它将激励反对派力量，并导致向“三驾马车”发起冲击。^③这种力量当时确已存在，当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秋终于向“三驾马车”发起进攻时，反对派很快形成，这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这时，托洛茨基已失去了取胜的时机，“三驾马车”已不再像春天时那样经不

^①卢托维诺夫在十二大上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105页。

^②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的发言，《十二大记录》，第200页。

^③参阅《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来自莫斯科的信》，见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社会主义者报》。

起考验和易受伤害了。

托洛茨基当初犹豫不决，并不是因为缺少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经济计划和工业化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已很明显。（经济问题是一九二三年秋发生分裂的主要因素。）斯大林滥用书记处职权的问题已日益暴露。列宁的《遗嘱》和左派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批评都表明了这一点。托洛茨基本人由于列宁的改革思想已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这些都是攻击“三驾马车”的炮弹，但最有力的是民族问题。列宁的信写得很清楚，如果这些信件被某个享有足够威望的人及时加以利用的话，就能导致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毁灭。然而，当会议讨论格鲁吉亚问题时（尽管列宁——如托洛茨基后来所说——曾明确地请求他抨击斯大林），托洛茨基却小心翼翼地避免站在某一方。他尽力避免争吵，甚至指责那些在发言中保护他免遭“三驾马车”迫害的同志。^①

当然，妨碍托洛茨基采取行动的也不是因为缺乏威信。在党代会上，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照像机在他面前咔嚓咔嚓响个不停，镁光灯不断地发出耀眼的闪光。^②在列宁退出领导岗位后，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称得上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当时是托洛茨基最后一次显露自己的机会。一个普通的党员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对我们来说，谁应成为列宁的继承人，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个人有权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远远超出其他候选人，并受到我们无限的信任。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③干部们都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列在第一位。^④胜利在望，而托洛茨基却没有采取行动。

①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90页。

③亚历山大·巴尔米纳：《唯一的幸存者》，一九四五年纽约版，第212页。

④参阅彼得罗夫斯基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

托洛茨基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对此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也许在革命斗争中没有学会在幕后搞个人阴谋。麦克斯·伊斯特曼（他是当时的目击者）写道：“他懂得同他的敌人作斗争，但他不懂得同他的朋友打交道。”^①在他被驱逐出境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思想去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那么，我可能……已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间，人们还有可能通过公开的进攻，击溃迅速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后裔……取得最高领导权。”如果托洛茨基当时能像他后来回顾时那样估计形势，那么，他当时一定会很容易地决定采取行动。然而，当时他内心的一种担忧阻碍了他这样做，他担心：“我显露自己将被人理解为，更确切地说，将被人看作是为继承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而进行个人争夺。想到这一点时，我不寒而栗。”^②

托洛茨基的解释只能证明这一事实，即他没有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他缺乏政治毅力，但又非常愿意参加政治斗争。他曾鼓励反对派公开活动，但在一九二三年年底他自己却再次错过担当这一反对派领导人的机会。巴扎诺夫（当时的一位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曾经说过，托洛茨基“认为与这样的对手作斗争是不体面的”；正像巴扎诺夫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小说。^③

难道托洛茨基的沉默可以解释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错误地认为等到他享有更高的威望时成功的机会将更大？这种说

^①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7页。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2页。

^③参阅鲍里斯·捷连季耶维奇·巴扎诺夫：《斯大林——红色独裁者》，一九三一年柏林版，第61页。

法与那种认为党的纪律约束了他，从而使他沉默的观点一样，是不大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还赞成另外一种解释，说托洛茨基由于热衷于经济计划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批评他，说他由于对经济计划感兴趣而疏忽了其他责任。^①列宁的《遗嘱》也指出了托洛茨基类似的倾向。与此同时，他这样做到给他的对手以害怕的理由，认为他想成为工业独裁者并要独揽整个国民经济大权。^②

难道托洛茨基及时地抓权就能给他带来成功吗？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是否能带来深远的变化呢？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初已经掌握住所有的王牌，但他出牌出得不正确，从而输掉了。作为左翼反对派领袖，他一直在走下坡路，一直在绝望地、徒劳地企图补做已被耽误的事情。

如果托洛茨基取得了胜利，这将具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答案还取决于人们对苏维埃国家后来的发展如何评价。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是革命的俄国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实践的产物。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托洛茨基当上领导，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专政和历尽千辛万苦的工业化运动无疑仍将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但是，领导人的个性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一个极权制国家里，这种影响甚至很大）。因此，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区别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们两人除了具有类似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外，人们很难认为他们是两个比较相似的人。托洛茨基是有教养的“西方”知识分子，卓越的、有自信心和性急的人；斯大林是狡猾的、好猜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见《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第二十期，第175、176页。

^②参阅《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见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页。

疑的、根据一定方法从事地下活动的党的工作者，他是那么“粗暴”，以致列宁曾要求撤销他的职务。

斯大林在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度过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一关。这也充分证明，总书记的影响已日益扩大。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斯大林开始在党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他尽力避免公开反对他的任何一个同事。这时，一场秘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开始了，人们企图通过揭露他那段曾是孟什维克的历史来贬低他。^①斯大林的伙伴季诺维也夫（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结报告，从而占据了党的名义领导人的地位）开始感到不愉快。虽然托洛茨基仍是他所厌恶的人，但他对斯大林的权力日益加强表示担忧，并在想方设法限制总书记的影响。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夏末，季诺维也夫邀请许多同他一起在北高加索休假的党的领导人开会。人们以罕见的密谋方式在基斯洛沃得斯克疗养地附近的一个山河里会面。^②参加会见的除了季诺维也夫和他的追随者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外，还有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或者布哈林或者这两个人共同提出了一项计划：通过书记处的“政治化”，使之变成一个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加上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组成的最高领导机关，从而打破斯大林对书记处组织权力的垄断。这项改组计划后来转发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立即回电说这表明人们对他有些误解。接着，他亲自来到基斯洛沃得斯克，以便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共同讨论这件事。他成功地转移了季诺维也夫对书记处的攻

^①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97—98页。

^②基斯洛沃得斯克事件主要是通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伏罗希洛夫在一九二五年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此事作的有关说明才为人们所知。参阅《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一九二六年莫斯科版，第398—399、455—456、484、950、953页。

击，并使他们同意了另一种建议。他佯称，为了协调的目的，所有政治局领导成员应同时是组织局成员。实际上，这仅是一种姿态，表面上承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具有特别地位，但斯大林的组织权力却根本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削弱。

一九二三年十月，根据基斯洛沃得斯克协议，中央委员会选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组织局委员，同时被选为组织局委员的还有布哈林（他当时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伊·伊·科罗特科夫（他当时是一个很不出名的中央委员，后来进入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后在三十年代清洗运动中销声匿迹了）。^①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就像季诺维也夫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没有使用过一次这一增加的权力，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组织局的会议。当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新的组织局时，这一试验被正式取消了，新选出的组织局基本上完全是由斯大林的人所组成。谁不惜进行见不得人的组织工作，谁就是胜利者。

在这期间，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担忧消除了，这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已使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消失了。正在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极左集团的重新兴起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导致了一九二一年初以来党领导内部最严重的危机。结果是，托洛茨基走上了（或被迫走上了）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道路。在党领导与左翼反对派之间公开争论的帷幕拉开了，这场戏持续了四年之久。

^①《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九二三年十月一十一月刊，第21页。

第九章 围绕着新方针的争论

一九二三年秋是苏共党内反对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虽然不断存在着不同思想的暗流，但反对派小组只是偶然地出现。随着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那场争吵的爆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残酷斗争。列宁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相互对立，互不相让，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实际上以左翼被战败并遭清洗而结束的政治斗争。

一、一九二三年夏的危机

一九二三年末开始的争吵是有预兆的，它就是左翼对“三驾马车”的政治路线以及党的机关不断扩大的担忧。一九二三年夏，苏联遇到的紧张经济形势把这种担忧推向了高潮。剪刀差（不正常的价格比例关系）日益严重，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极左派的反对派小组再次蠢蠢欲动，并使领导集团感到不安。当长远的经济政策须刻不容缓地确定下来时，领导人之间的日益不和在总的经济政策方面突然加剧了。

一九二三年七、八月份，剪刀差危机突然严重，农业生产超过了需求，给工业复兴造成了困难。由于国家垄断，工业品价格人为地提得很高，出现了销售危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或不能

按期支付。^①在此情况下，政府决定对工业进行清理，把生产集中于那些最有成效的工厂，贷款只发放给国有化企业。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可能是明智的，但它的直接效果是加剧了工业危机，使许多城市工人陷于绝望的境地。

工人中的不满情绪急剧发展。工厂被各种政治鼓动弄得昏头昏脑。在一篇官方报道中称：“经济问题波及到劳动群众，……敌对分子抬头，……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一大批企业中，特别在低工资的企业里，敌人的煽动活跃起来了。”^②在工资问题上蛊惑人心的宣传迅速增多。尽管官方工会领导尽力阻止，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断干预，但八、九月份在一些城市仍然出现了罢工浪潮。^③

使党的领导集团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极左派在罢工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企图达到煽动无产者反对政府的目的。这种影响甚至在一些党组织中也可察觉到。“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他们要求取消党的工作，甚至还企图取消党的纪律。”^④

“工人团”的活动在六月份发展到使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进行镇压的程度，逮捕了米雅斯尼柯夫，但他的副手库茨涅佐夫继续领导这个组织，并与过去的一些工人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在莫斯科，人们企图建立组织和打入正统的共产党支部里去，但成果不大。八月份当罢工浪潮开始时，工人团力图领导这个运动，并鼓动进行政治性群众示威游行。这些行动使人回想起

^①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八一九月号，第7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号，第9页。

^②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八一九月号，第11—12页。

^③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93—94页。

^④参阅《中央委员会的通报》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见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七月号，第81页。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前所采用的旧策略和意图。但布尔什维克现在掌握了一套不同于沙俄时代的控制手段和警察暴力。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逮捕使工人团的活动很快停止了。^①

在危机形势下，“工人真理派”也同样在工人中活跃起来。他们宣称是不过问政治的，他们的目标只是在思想上领导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文化启蒙工作。但这样的宣称并不能使他们免遭警察的迫害。据说，就连老布尔什维克波格丹诺夫（“工人真理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也一度被捕。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宣称：“工人真理派”“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孟什维克的一个阴谋活动”，它们宣布的目标是“解散我们的党”。许多与“工人真理派”有联系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也就是被逐出政治生活。国家政治保卫局象对付“工人团”那样，很快也清除了这一运动。^②

经济形势虽然给党造成了困难，但主要受害者是普通党员。党的组织机关相反却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影响在不断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报刊不断宣传书记处（特别是书记处的登记分配局）在加强党组织、完善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和清除党和国家机关中各种倾向分子和不称职者方面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使预期的目标达到了；党日益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工具。与此同时，党本身却很快受到书记处机关的控制，斯大林的机器不断扩大了权力。

一九二三年九月，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研究克服工业危机的措施，和对极左派展开批评的问题。会议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

^①参阅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俄共(布)“工人团”的报告，见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社会主义者报》，第9—10页。

^②参阅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工人真理派”的决定，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真理报》。

工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保证工资和必要的津贴能正常支付，同时也要注意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管理费用。^①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三个专门小组：一个研究工资问题，一个研究克服剪刀差问题，一个研究党内极端主义反对派问题。^②

此后，中央委员会更加深信，改革首先是企业领导人的事。按照索柯里尼柯夫的愿望，贷款分配不与长远计划相联系，并且为了保护农民实行了固定价格。^③左翼代表对研究剪刀差问题的小组进行了联合抵制（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拒绝参加这项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专门小组在作报告时，强调了农业的优先发展和不惜一切代价安抚农民的必要性。^④剪刀差危机控制住了，但是由于在整个二十年代里存在着严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它就促进了粮食供应危机的爆发。一九二三年为“克服剪刀差”而采取的措施远远超过了一九二一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作的妥协，左翼对此大为震惊，他们不愿再克制了。

促使新反对派第一次公开进行反抗的是中央委员会审查政治形势的小组。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捷尔任斯基，他曾是警察头目，现在是交通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谈到由于极左派的威胁使得党内笼罩着一片惊慌不安和心情沉重的气氛；他说：“党的涣散、党内生活的窒息和任命日益代替选举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并使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陷于瘫痪。”^⑤

^①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号，第10页。

^②参阅《有十个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9—350页。

^③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107—112页。

^④同上，第103、113—114页。

^⑤参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关于加米涅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当调查小组作报告时，语气也有所变化。据称，只有加强镇压才能消灭对镇压的抗议。调查小组建议，所有党员应有义务向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检举那些已知的与某个地下宗派小组有联系的人。^①这样一种建议——把党的活动置于国家暴力机关之下——过去从未有过。它说明，党领导深感不稳，为了清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他们只有日益借助于组织手段和警察手段。但是问题变得更加清楚了：反对派得到了一个首领，因为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促使托洛茨基终于放弃了长期动摇不定的立场，而采取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当“三驾马车”准备把托洛茨基从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时，托洛茨基可能具有的一种顾虑，即不要发展到攻击党的地步，也消失了。人们建议加强革命军事委员会，让更多的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参加军事委员会。^②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干部称，托洛茨基以辞职来回答，他要求到外国去，参加随时可能爆发的德国革命的战斗。季诺维也夫也虚张声势地站起来要求一同前往德国完成革命使命。斯大林谨慎从事，他指出，他们二人在国内是必不可少的，并引导大家避开实际问题。骄傲的军事人民委员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愚弄，因此离开了中央委员会的会场。但是据报告称，托洛茨基的戏剧性表演没有取得效果，因为会议大厅的门太重，他未能使之在其身后重重地关上。^③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0页。

^②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0页。

^③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52—53页；斯大林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7—24页。

虽然托洛茨基阻止了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大改组，但他不得不让他的两个老对手（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进入这个机构。古比雪夫向大会作了一个坦率的说明：“我们认为同你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把你宣布为敌人，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①托洛茨基无法容忍这些对他本人的和政治上的挑衅。十月八日，他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信中对党的组织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抨击。

就这样，他进入了公开争论的沙场。在此期间，在国外，特别在德国发生了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共产国际在那里遭到的失败虽然对俄国共产党的政策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它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在那一年里，德国事件与苏联党内争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二、外国共产主义问题

——德国危机

长久以来，对世界革命的看法是布尔什维克内部理论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世界革命的学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在俄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正确的。一九一九年春建立共产国际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气氛，人们希望革命的烈火很快燃遍全球。尽管人们公认世界革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世界革命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意见分歧中只占很小的地位。但到二十年代中期，当俄国的政治生活走向稳定，共产国际的政策失败已很明显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题目对俄国内部的派别斗争开始具有决定性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的意义。

几乎与新经济政策在俄国实施的同时，出现了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以及相应调整对外政策的问题。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革命浪潮减退了，资本主义成功地实现了稳定。正如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样，列宁同样坚定地指出了这一现实，并要求共产国际转向守势。共产国际接受了一个新的战略，即所谓统一战线。它放弃了直接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作法，而是要求加强共产党人在各国的影响，争取与非共产党人结成联盟。正如新经济政策一样，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上的退却也引起了争论，即对这一行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实际意义的争论。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类似的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只不过两派的人员组成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共产国际中那些对革命前景抱有与列宁相同的谨慎估计的俄国领导人，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定程度上的布哈林，大部分属于左派。共产国际中希望很快重新采取攻势的左翼领导人，如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国内政策上却是小心翼翼的右派。一九二二年中，季诺维也夫还说：“世界革命正在全面推进。”^①

在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拉狄克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悲观情绪。他说：“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已不相信他们在可见的时间内能夺得政权。”^②拉狄克是最坚决主张与非共产主义运动结成联盟的人。就德国而言（他在共产国际主管德国），他建议共产党人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合作，甚至要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合作。^③拉狄克警告说，“无论如何，世界革命不可

^①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7、8页。

^②拉狄克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317页。

^③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九章和第十章。

能一举成功。”^①

一九二三年中，这种退却气氛突然消失了。苏联领导人认为有理由相信，德国这个被他们一向看作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工业国即将迎来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布哈林的支持下，在德国共产党人中以亨里希·布兰德勒为首的右翼领导的合作下，拉狄克在德国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布尔什维克路线。^②季诺维也夫变得有些神经质了，这不仅因为他不同意小心谨慎的路线，而且也因为他担心自己在俄国的政治地位。当时，他的不妥协路线在保加利亚的追随者们已犯了一个大错误：当一九二三年六月斯坦姆布利斯基的农民民主政府被近乎法西斯的政变所推翻时，他们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季诺维也夫为挽回自己的声誉，急需取得革命胜利。^③

一九二三年七月，德国共产党人在是否遵守政府关于禁止示威游行的规定问题上发生了争吵，苏联领导不得不对此作出裁决。季诺维也夫和当时的布哈林主张不理睬禁令，北高加索共产党人也持相同的立场。拉狄克坚决反对，并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当时在“三驾马车”中的表现日益不同于其他二人。他成功地阻止了示威游行。^④斯大林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说：“如果共产党人试图今天在德国推翻政府，夺取政权，那么，你们将同他们一起卷入失败。……我认为现在必须劝阻德国同志，而不是鼓励。”^⑤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法国人占领鲁

①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几点意见》，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②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③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05—306页。

④同上，第四章，第186—187页。

⑤斯大林一九二三年八月的这封信见路特·费舍的《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306页；此信在苏联一直未发表，但从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中央全会上与季诺维也夫辩论时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实。

尔区使得德国形势不可阻挡地走向危机。对德国政府来说，最大的耻辱是八月钞票印刷工人的罢工，它使整个财政系统陷于瘫痪，并被视为总罢工的信号。

这时，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已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施特雷泽曼新政府转向西方，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俄国人本来就具有的采取行动的愿望。九月中，大多数苏联领导人转向同意德国共产党人起义的计划，并正式表示赞同。对此最感兴趣的是托洛茨基，他突然从保守态度一变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①

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打破了过去所有阵线的格局。拉狄克（他属于俄国左翼，但支持德国的右翼）同斯大林（俄国的右翼，支持德国的左翼）一起反对起义计划。托洛茨基（接近俄国右翼，同时又站在德国右翼一边）和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右翼，站在德国左翼一边）赞成冒险。这种七拼八凑的政治阵线是超越意识形态分界线的政治上敌友关系的产物。拉狄克长久以来就同德国右翼共产党人和小心谨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在国际政策上的观点与他在俄国共产党内的态度不相一致，但他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季诺维也夫处于另一个极端，他支持德国左翼和他们对革命的期望，他的观点也是一贯的。他站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在世界革命爆发之前不能期望俄国取得很大的社会主义进步。这一看法与他在俄国内政上所持的谨慎小心的态度是一致的。托洛茨基由于同拉狄克友好，并反对季诺维也夫，从而转向德国右翼一边。斯大林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他在政治上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而偏向德国左翼，但同时由于他的谨慎小心的本性，他又低估革命的可能性。

这种混乱的宗派组成给德国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俄

^①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02—203页。

国领导在夏季决定推行起义路线时，德国共产党右翼领导人布兰德勒完全是带着害怕的心情来执行的。由于担心从领导岗位上被排挤下来，他假装向左转，并假装以乐观态度估计德国的革命形势，试图以此取得莫斯科的宠爱。他对形势的歪曲描绘加强了莫斯科推行起义路线的思想。在莫斯科的命令和援助下，人们为革命起义作了具体和细致的准备。^①

十月，危急的时刻来到。这个月对俄国人来说具有特别激动人心的意义：德国即将发生内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与国防军为首的反共和国的力量之间将发生内战；德国共产党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准备起义；他们只差一步还没有做，即号召总罢工，以保卫萨克森和图林根州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反对国防军。但布兰德勒未能争取社会民主党人同意罢工。这时，个人的考虑困扰了布兰德勒，他的起义热情逐渐消失。错误地得到攻击信号的汉堡共产党组织被血腥镇压了。清醒和分裂使德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逐渐消失，对世界革命的信心破灭了。

对俄国领导集团来说，这一打击的直接后果并不很明显，但后来托洛茨基就此而发动的争吵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莫斯科，人们一致认为布兰德勒的领导无能是这次失败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是胜利或失败的抉择。因此，布兰德勒不得不让位给德国左翼。但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俄国领导虽然显示了它的权威性，但当时的俄国领导并不能同心同德地发挥它的权威作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俄国的党领导与左翼展开公开斗争之后，双方都企图从德国的失败中获利。拉狄克宣称，托洛茨基受

^①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12—316页。

到国际共运的很大信任，这一点将在下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辩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领导集团则指责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从而间接地指责托洛茨基是造成失败的罪人。^①拉狄克继续支持德国右翼，因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受到了指责，这项决议后来又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批准。人们指责他“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的阶级力量”，犯了机会主义和不服从命令的错误。人们并警告他不要把“俄国的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②拉狄克辩解，德国的退却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表示赞同。^③托洛茨基支持拉狄克，显然是一种政治策略。后来托洛茨基又说，拉狄克的论点是错误的。^④

争吵越来越不是为了澄清问题，而是为了互相指责。在德国，一个新的左翼领导集团被任命了。这是进一步把外国共产党置于苏联统治下的重大步骤。在俄国，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主要派别之间进行的初次的、但却是重要的较量中，党的机关已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权力。

三、幕后的争论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写的信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集团。直接的原因是捷尔任斯基的肃反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有关党内问题的调查报告。捷尔任斯基显然已不再同情左派，他已不是政治反对派，而已成为公安人员；他的最重要的处方是告发被禁止的派别活动。捷尔任斯基的肃反委员会的这一行动促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02—203页。

^②参阅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国际形势》，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92页。

^③参阅拉狄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④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给特雷因特的信。

使托洛茨基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向党组织报告它们的成员已被反党分子利用，这似乎是党员的一种最基本的义务。但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六个年头并没有必要建议就这一内容作出一项特别的决议。要求作这样决议的人说：a) 党内已产生非法的反对派集团；b) 党内已存在一种能使了解这样集团的同志不向党组织报告的气氛。这两个事实都证明，自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了。”^①

托洛茨基决不是倾向于许可“非法集团”（也就是工人反对派和工人真理派）的存在，但他希望从政治上来评定它们；同时他把“非法集团”的发展归咎于党的机关的态度及其针对党内真诚批评而采取的镇压措施。他承认，他本人就曾对党内民主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他联系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写道：

“鉴于全面发展起来的工人民主制与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在我看来，当时人们所作的许多有利于工人民主制的发言是夸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煽动性。但十分清楚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强制性制度为党统管一切的制度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形成的、后来又进一步得以发展的现行制度却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的制度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已分布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的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求的形式或命令的形式传达给他们。在这些党员基本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极其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可能由于群众似乎对党组织还能施加影响（选举中央委员会、书记等等）而得以消除，而只会悄悄地积聚起来，从而导致内部的紧张。”

托洛茨基还强调说，这对他来说是关系到保护正确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关系到攻击现有领导的问题。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指出他不打算向全党公布他的观点，他说：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都知道，我虽然在中央委员会里最坚决地、最明确地反对一项错误的政策，可也坚决拒绝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提交范围很窄的少数同志去判决，特别是提交给那些在一种还算正确的党的方针存在的情况下占据着中央委员会重要位置的人来判断。”

托洛茨基相当露骨地表示应在人事上作某些变动，并以此给人以威胁。他暗示他打算在必要的情况下将问题公布于全党。

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断言说，他们只能把托洛茨基所作的这些原则性的阐述和对未来危险提出的警告看作是他放肆地要求个人权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公开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不满情绪，他的全部激情，他多年来向中央委员会发起的一切进攻，他竭力想把党搞乱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托洛茨基想叫中央委员会把他放在我们工业生活的最高领导地位上……”

托洛茨基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劳动国防人民委员，列宁还给予他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如果他真想干的话，那他完全可以在这些岗位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工作在全党面前证明，党可以把他所谋求的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实际无限的权力交给他。但托洛茨基却采用了另一种行动方式。

托洛茨基明确地拒绝做列宁的副手，他显然认为这一职务有损于他的尊严。他是按照‘要末独揽一切大权要末什么也不要’这一公式来行事的。”^①

当政治局试图压制列宁的改革计划时，托洛茨基只能以详细地列举去年的许多争论问题来给予回答，在这些问题上（例如在经济计划、外贸、民族、工农检查院和痛苦的事件等问题上），他曾支持过列宁或者得到列宁的支持而反对其他领导人。^②

在这期间，党领导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即“四十六人声明”。^③“四十六人声明”是一份秘密文件，它是由具有反对派倾向的四十六名杰出的党务干部签署的，并于十月十五日被提交给政治局。签署者们就党领导在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方面所持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能把这份文件仅仅看作是个人功名心的表现，它是党内存在的一种实际的、较为普遍的、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之上的不满情绪的征兆。更为重要的是，在签名人员名单反映了一种力量的组合。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左翼反对派中的极端派和温和派首次按统一的纲领和一致的方式行动了。杰出的左翼温和派人物（例如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人）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皮达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伊·尼·斯米尔诺夫。（拉狄克在一项独自的宣言中声称与四十六人采取一致行动。）^④一支强大的民主集中派分子的队伍代表了以前的极左派，其中有奥新斯基、萨普龙诺

^①一九二三年十月政治局致托洛茨基的信，见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43—145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致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12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8022号。大部分签署者要末赞成这一种要末赞成那一种观点，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局势是严重的。

^④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37页。

夫、布勃诺夫、弗拉基米尔·柯秀尔、马克西莫夫斯基和弗·米·斯米尔诺夫。

按照反对派的观点，经济方面和党内出现的严重局势与党领导的状况和改革的需求紧密相关。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四十六人声明说道：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量入而出，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四十六人就是这般解释剪刀差的。他们担心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任何人都懂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它决定着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他们认为领导不称职是由于党内状况所造成的，他们说：

“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发挥作用的集体，不再是真正进行生动的活动并与各项活动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集体。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等级森严的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

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

像托洛茨基一样，四十六人认为臃肿的组织机构是党内产生非法集团的根源。

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了联席全会，领导利用这一论坛着手准备反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措施。^①托洛茨基没能参加会议——神秘的病魔已开始纠缠着他，他几乎整整一个冬天都受到它的折磨。^②在这危急的时刻，一个卓越的反对派领袖却成了一个病人。反对派在全会上的主要代言人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在围绕新方针问题展开的整个争论中承担了积极领导反对派的主要重担。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提出了“工人民主”的原则：言论自由，公开讨论的自由，通过全体党员实行真正的监督和选举产生干部，结束书记处在工作中流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这也就是四十六人所要求的政治改革。^③

党的领导没有重视这些要求。相反的是，它转入了反攻，就派别活动问题提出了控告：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坚决斥责四十六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

^①参阅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状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9、350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57页。

^③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真理报》。

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①

因此，这就为即将开始的打击反对派的战役吹响了冲锋号。

一九二三年秋，党内普遍存在着不安情绪，这是由领导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所奉行的方针引起的。领导认为有必要承认：党事实上已经历了一场危机，制定一项工人民主的新方针是必要的。为制定这项新的纲领，全党展开了一次公开的、广泛的讨论。如往常一样，这种讨论在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举行。十一月七日，季诺维也夫以各种许诺（看来是纸上的冠冕堂皇的东西）宣布辩论开始：“有关党内工人民主制问题，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我们在党内更好地运用工人民主是必要的……我们的主要错误往往在于，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是在上面已作出决定后才拿到下面去讨论的。”^②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地方党组织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生动而又活泼的讨论。据《真理报》报道，这对普通党员来说首先关系到恢复党内民主的问题。一个参加讨论的人抱怨说：“党机关已经僵化了，它已开始变为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特权阶层、一个特殊的‘牧师’特权阶层，等等，等等。”^③另一方面，还常常有这种说法：机关还不够强大，还缺乏工作效率。总之，人们主要不是批评党组织的官僚主义结构，而是批评它的个别行为，人们往往认为出路在于实行一种较好的官僚制。

^①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状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50页。

^②季诺维也夫，《党的新任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

^③涅一萨姆拉约涅茨（假名），《机关保卫自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十二月以前，人们几乎没有向当时的党领导发起公开的进攻。大家都主张改革。党的基本群众（他们还不知道反对派提出的十月声明）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克服大家都憎恶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办法。当党的领导也表示赞成改革时，它实际上等于打开了不满情绪的阀门并把人们的怒气引向抽象的弊端和匿名的官僚主义者身上。大约在十一月底，讨论的语调变得尖锐起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他的批评扩大到了党的组织政策方面；他指责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没有着手对机构实行必要的改革。他说：

“必须清除党内的军事方法，应部分地按照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式样来健全党的生活，发挥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使之有可能提出和参加党内生活中各项基本问题的讨论；有必要使每个党员有可能更积极地、更自觉地参与决定党的各项基本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是在不受任何指责……和不被称之为煽动者、孟什维主义者、动摇分子、‘背离者’等情况下……”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我们处在包围之中时，党的生活却比较活跃，组织的自主权也比较大。但是当我们有了客观条件，可以给予党的生活以新的活力，并且为适应新任务出现了活跃党的生活的现实必要性时，我们却没有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状况向前迈进一步；相反，我们却更加官僚主义了，更加僵化了，由上面决定的问题反而增多了；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党内分工制（即一部分是负责决策的人们，一部分是执行党的各项决议而没有参与制定它们的权利的党员群众）今天却进一步强化了。今天非但没有实行这样的方针：发挥组织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活跃人们参与制定党的各项决议的气氛，在自觉参与制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相反，却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努

力建立一个好的机关和一支好的党的官员队伍。”①

党领导对此的反应是立即公开声称：某些反对派分子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使党变成一个“发表意见的议会”。②斯大林察觉到托洛茨基追随这种倾向，并强调说：“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斯大林推论说：“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③

同样，季诺维也夫也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真正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一项规定：党员至少有两年党龄才可以参加党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他接着说：“从抽象的工人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对‘民主’的嘲弄；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有利于革命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有必要仅给那些真正维护党的人以表决权……。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法律。每个革命者将会说：让‘纯粹的’民主的‘神圣’原则见鬼去吧！”④

正当关于“工人民主制”的讨论仍在继续进行时，党领导及其所联合的力量试图与托洛茨基达成协议，以便维护表面上的统一。因为托洛茨基正在患病，所以政治局在他的住处举行了几次时间很长的会议，以便使他能参与起草将正式结束公开争论的决议。⑤当托洛茨基拒绝人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时，斯大林和加米涅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党内状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②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彼得格勒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建设问题》，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1—22页。

③斯大林：《关于党的任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301、302页。

④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彼得格勒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建设问题》，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0页。

⑤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58页；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1页。

夫与托洛茨基一道组成了一个起草新决议的小组委员会。^①十二月五日，政治局通过了由他们三人起草的决议并发表了它，同时把它当作实行真正改革的许诺大加宣扬。^②从决议的内容看，它绝大部分源出于托洛茨基的思想。

决议开始以典型的左派观点分析了经济形势；它把危机归咎于工业基础过分薄弱，并把党内出现的弊端也归咎于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状况：

“过渡时期现阶段的客观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存在着市场关系，由于国家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必须依靠一些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客观矛盾表现为一系列的不良倾向，反对这些不良倾向在目前是极其必要的。这些不良倾向就是：由于职务不同，党员之间的物质待遇悬殊很大和存在着所谓‘无节制’现象；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的增加和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狭隘的本位主义（这应该同必要的专业化区别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工作部门中共产党员之间联系的减少；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有丧失信心的危险；……党的各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这就是党面临危机的预言，持批评态度的反对派分子对这一预言当然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决议也没有给反对派集团开绿灯：

“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

^①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7页。

^②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55、357、358—359、360页。

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但是，工人民主制绝不是以派别集团的自由为前提，派别集团对于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总是引起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党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上的自愿结合，不言而喻，党内是不能容忍在思想上反对整个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例如‘工人真理派’和‘工人集团’）存在的。”

在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托洛茨基就反对过“禁止集团”这样的词句，然而同意禁止“派别组织”。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项妥协建议，只是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托洛茨基这才表示满意。斯大林对他的巧妙的计策感到十分自豪，他后来说道：托洛茨基已经忘记，一九二一年的决议不仅禁止“集团”而且禁止“派别组织”。^①反正这种区分是人为的，反对派别组织的原则已被证实是反对派无法逾越的障碍。

决议列有一项很长的实际改革的清单，其基本思想是要改善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关系。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是：严格实施各级负责人员的选举制，特别注意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一切问题都必须交给全体党员群众讨论；迅速把新的党务工作人员提拔到负责岗位上去；更好地向全体党员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加强党的教育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每年应召开两次，以使全体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的可能性。因此，又重新宣布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它们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主制原则（如限制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按党章规定限制选举等）的党的负责人”。

表面上看，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是反对派观点获得的一次胜

^①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7—198页。

利，但党的领导同意这项决议仅仅是为准备反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的退却。（几年之后，党机关的一位代言人事实上已把这项决议说成是“向托洛茨基作出的一种错误性的让步”。^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接受这项决议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中央委员们认为，党内公开发表意见的波涛已经高涨，现在该是通过十二月五日的文件使之平息的时候了。这项决议似乎早些时候就可以作出。如果在十月份就作出这一决议，那么这种过渡就可能比现在更为顺利。但中央委员会一直等到下面发起冲击时才行动，它又一次推行了尾巴主义——如果允许这样表述的话。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讨论和整个形势变得更加恶化了。”^②

托洛茨基知道，这项决议只是在应急的情况下为掩饰对他的敌意才作出的，因此，他在二月八日致党组织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了决议主张改革的重要性。^③关于新方针的这封信热情强调并解释了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托洛茨基特别强调普通党员在实现这一决议过程中应起的作用：

“政治局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

托洛茨基警告他的读者提防公然反对新方针的敌人：

“某些思想保守的、喜欢过高估计机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首创精神的同志们，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认为中央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义务，决议只是散布了虚假的幻想，只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显然，这样看问题是对党抱着十足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中央决议所宣布的新方针就意味着：承认在实行

^①谢·伊·古谢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提交政治局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文献》，T字2998号。

^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真理报》。

^③参阅托洛茨基，《新方针》，纽约版，第89—98页。

旧方针时把工作重心放在机关上是错误的；强调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应当把工作重心移到发挥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上来，移到发展自治上来。”

托洛茨基警告人们不要单纯对这个决议寄予很高的期望，而是必须“从下面施加压力，使之贯彻执行”。他说：

“新方针决不意味着委托党机关在某一个时期内颁布和贯彻民主法令，建立民主制度。不，这种民主制度只能由党自己来实现。简单地说：党应当把自己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要始终使自己成为集中化的组织。”

总之，托洛茨基和温和左派认为，这种目标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一个均衡问题。“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使之协调起来。这种均衡在最近一个时期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上面。……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正在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决议，就要看全党即四十万党员愿意和能够使之付诸实现的程度。”

政治局官员们赞同改革的保证迫使托洛茨基不得不以尖刻的语调提请人们注意：

“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人们一提到改变党内体制的必要性，官僚化的机关的代表人物就认为那是异端邪说，是派别活动，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从形式上表示乐意‘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准备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

托洛茨基除了指责党组织不是全心全意地准备实行新方针外，还公开要求对领导层进行清洗，他说：

“革新党的机关……就在于以新人来代替庸碌之辈和官僚主

义分子。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以开除出党对批评者进行压制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清除出去。新方针必须首先使每个人都感到，现在任何人也不敢对党实行暴力统治了。”

现在，也就是当托洛茨基发表了关于新方针的信，从而公开站到反对派的领导位置上时，派别之间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已不可避免。

四、公开的分裂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立即公开号召人们把十二月五日写在纸上的改革计划变为实际的行动。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领导下，左派分子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大会上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从上到下普遍实行各级党机关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和适当更新一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已经变为党内实际的军事命令制阻碍了向新的党内结构形式实行过渡。”这些措词对领导来说是太强硬了，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其他人出现在区党组织大会上，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击退反对派的进攻。^①

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在托洛茨基关于新方针的信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天，反对派在全市代表都出席了的莫斯科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萨普龙诺夫作为反对派主要代言人回答了加米涅夫的提问。他重复了这一论断，即官僚主义是促使反对派形成的原因，并声称党必须清洗机关，而不是相反。他说：“我们不需要在‘推荐’和预先‘协商’的情况下进行表决，

^①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支部必须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办公人员。”^①所有的反对派分子都强调：他们只想改革机关，不想摧毁它；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仍在否认党有对它的成员发号施令的权力。他特别为非正式的但在某些问题上能代表不同观点的“集团”的形成进行辩护。^②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拉狄克找到一些根据，并打着列宁的权威旗号投入了战斗。^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决议案虽然没有得以通过，但领导集团的代表已被人们搞得垂头丧气；情况表明，反对派要求改革的慷慨激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会场。

事态表明，领导集团将立刻转入反攻。为了将批评的矛头引向反对派，党领导不得不作各项准备。他们果断地使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力量去攻击新方针。托洛茨基后来还提出了引起突然变化的另一种解释。^④他说，斯大林在发生公开分裂之前与托洛茨基进行的谈判引起了季诺维也夫的不安；这里似乎在进行肮脏交易；因而季诺维也夫动员他的彼得格勒机关向托洛茨基发起公开进攻并迫使斯大林也这样做。《真理报》一夜之间突然完全改变了它的腔调。十二月十二日，一篇社论谈到了人们日益对官僚主义不满和新方针将带来的改革。文章进一步说道：“……当然，一些真正的官僚主义分子会进行抵抗。但大家都清楚，这种抵抗将会被党的统一意志所挫败。”然而，人们还可从字里行间中听到一种威胁性的声音：“‘新方针’将一定按它所应实现的那样加以实现，而不能像那些不懂得维护我们集中化的和有纪律的党

^①伊普龙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的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

^②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真理报》。

^③参阅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④托洛茨基，《斯大林》，第93页。

的基础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来实现。党不仅能够保持它的统一，而且也能控制住它的机关，能纯洁它的机关，并能取得为解决当前任务所必不可少的一定的机动灵活性。”次日，即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开始公开反击反对派并斥责了它的各种罪恶：它是机会主义的，它主张摧毁党的机关，它认为“官僚主义在蔓延”——这是一种错误的“与客观地分析现象毫无共同之处”的指控；最严重的是，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

这仅是即将发起的总攻击的前奏，总攻击是以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作的一篇报告（载于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真理报》）为开始的。党的领导人控告托洛茨基在关于新方针的信件中损害了政治局的统一，说他公开反对十二月五日一致作出的决议。这实际上就是指责反对派违反了自己的纲领。

在十二月的后半个月里，在一些最重要的党组织内，出现了十分激烈的争吵。季诺维也夫后来曾对这两个星期作了如下的描绘：“我们在我们革命史上第一次（至少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碰到这种情况：在上届党代表大会到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年中，人们试图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甚至还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在中途换马……对中央委员会‘缺乏信任’……几乎是每个支部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在争取全党支持的这两个危急的星期里，反对派几乎从一开始就垮了——托洛茨基突然撤出了战斗。这一情况完全像在列宁与斯大林发生分裂的危机时期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托洛茨基起初参加了争论，而后来他又没有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次，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他生病（寒热病，它从一九二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111—112页。

三年十一月直到一九二四年底一直折磨着他)。尽管如此，他仍想写文章进行批评，并参加最高当局的讨论会，直至十二月中旬，即当人们开始抨击他关于新方针所发表的信件时。从这时起，托洛茨基看来已在政治上瘫痪了。来年一月初，他赴黑海附近的苏呼姆海滨浴场疗养。因此，领导反对派的任务就落到了托洛茨基在四十六人集团中的追随者身上，特别是落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的身上。他们都是些有能力和认真负责的人，但他们身上反列宁主义的历史污点要比托洛茨基多得多，而且也不享有那样高的个人威望。反对派不得不在他们的指挥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在竭力把反对派弄的声名狼藉的过程中，党领导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它控制着新闻工具和党的会议。党的会议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员的声音或者说是计算票数的结果，而投票结果又取决于重大代表会议的代表组成。布哈林本人就承认，“三驾马车”的信徒会在党组织内运用蒸汽滚压机的策略。他以一个党支部的生活为例解释说：“支部书记通常是由区委会任命，……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问问到会者‘谁反对’，由于人们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被提名的候选人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①

对党领导来说，不久前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及其地方分机构在争论中具有特别的价值。中央监察委员的新主席古比雪夫引以自豪的是，他的组织为“阻止意见分歧发展到有可能危害党的统一的地步”所做的工作。^②党领导享有的组织压制手段显然也通过新闻界的力量而大大加强了。按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命

^①转引自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②古比雪夫，《第一个劳动年》。

令，主张公正地让双方讲话的《真理报》工作人员不久就被解雇了。①这样一来，反对派就越来越难以公开说明他们的看法；托洛茨基的《新方针》小册子实际上已不准再扩散。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对派在大学生支部中和在莫斯科市国家管理机构中工作的党员中拥有无数的追随者。莫斯科市百分之二十五的党组织都是由大学生组成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首都反对派的实力为什么那样强大。③托洛茨基在进一步阐述关于新方针的思想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提到大学生和党员青年，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一点使党领导特别恼火。）共青团组织由于发生争论也四分五裂了，大多数认为党领导已不再可靠的团中央委员被开除了。④

但是，反对派在工人中没有得到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像当时的民主集中派分子一样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者；就他们的经济思想而言，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工业管理人员的观点。领导集团抓住一切机会表明他们有较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尽管它当时推行的偏向农民的经济政策比反对派的经济政策更为保守。当时主张统一的谢烈布利雅柯夫尖锐地指出：“在目前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占有机关。”⑤不管是领导集团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都没有注意真正的无产者因不满而发出的声音。相反，“工人集团”和“工人真理派”却试图利用这种不满。

反对派之所以在工人中一直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在于它的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见《卡尔全集》第四卷，第319、322—323页。

②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1页。

③参阅捷连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⑤谢烈布利雅柯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真理报》。

政治路线和整个气氛，而且由于组织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当无产者最容易通过组织加以操纵和控制时，党的机关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机关。^①当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进行较量时，工人支部和各省一般都几乎坚定地站在党组织一边。不管工人的自然倾向是什么，党机关的压力使他们与反对派之间不可能出现值得一提的联系。对机关提出的批评很少得到理会，而是更多地被雪崩似的宣传声所埋没。一九二三年以后，左翼反对派从未越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始终是一个由善意的但是毫无希望的处于少数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派别集团（除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与斯大林和布哈林决裂时带来了一批机关人员外）。

莫斯科是反对派的唯一真正的据点，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些自由的讨论会。但就是在首都，选举似乎也是不正常的。据一位观察家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部，大部分人表示赞成托洛茨基。但季诺维也夫为打击托洛茨基也插手搞了几次相当巧妙的幕后活动。”^②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讨论会上指出：反对派在莫斯科省的区代表会议上曾获得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但在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时只获得百分之十八的选票。“如果说反对派在区代表会议到省代表会议这段时间内失去了百分之十八的选票，那么，我要问：在区代表会议进行投票时，反对派由于党的机关对工人支部施加了压力而被夺走了多少选票呢？”^③萨普龙诺夫由此得出结论：实际上，反对派在莫斯科省是多数，但许多人似乎在机关的压力下受骗了。

党组织的干涉，这就是反对派提出抗议的主要内容。但对领

^①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4页。

^②G·S·阿加贝科夫(Agabekow)：《国家政治保卫局——苏维埃俄国的恐怖》，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38—39页。

^③萨普龙诺夫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导集团来说，党组织的干涉却是扼杀整个争论的手段。书记处使用了它拥有的调动干部的权力（这在反对乌克兰左派和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中已被证实是一种政治武器）。许多反对派的追随者被调离有影响的工作岗位，反对派大学生也被驱逐出校。^① 骇人听闻的措施是撤掉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作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理由是他拒绝执行领导在争论期间所发出的指示。^② 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称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一个“令人憎恨的敌人”，并以列宁主义的言词为撤销他的职务作解释：“作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竟容忍不支持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可能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③ 接替安东诺夫职务的是布勃诺夫，他是当时的民主集中派分子，也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之一，现在已转到机关一边。后来，直到他在三十年代清洗运动中成了牺牲品时为止，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信徒。^④

组织的力量决定了争论的结果。但反对派不仅在这方面是虚弱的，而且还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因为它直止十一月还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及时地明确他们的改革纲领。一般的党员在讨论中只认识到：反对派主张多一点工人民主和少一点官僚主义。因此，辩论似乎只是涉及寻找一种合适的办法来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境地，以及通过一些什么实际措施来达到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所提出的目标。在省里（那里的反对派还没有像莫斯科那样组织起来），一般党员只是到十二月中旬才以震惊的心情了解到这场论战

①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2页。

②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9页。

③雅罗斯拉夫斯基：《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83页。

④参阅布勃诺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49页（附件）。

的发生。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去正确理解有关的争论问题，党领导已宣布反对派是一种反列宁主义的和违背了党的改革愿望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党的机关动用一切手段贯彻其愿望的情况下），谁能违背党领导要联合一切力量来坚决反对反对派的这种愿望呢？

另外，当讨论涉及到提出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具体建议时，反对派的表现也是软弱无力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能重复机关提出的建议，而且以不自信的口气说，它（即反对派）将完善这些建议或者把它们真正付诸实践。它往往也只是简单地表示一种不能实现的愿望：中央委员会应当改正它的态度。^①此外，党领导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已把反对派提出的一切具有实际意义的医治党内弊病的设想据为己有。对一般党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结果，并且听到的只是官方的论述，因此他们不可能期望通过反对派接管政权来彻底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人们对问题的实质不清楚，由党领导故意助长的思想混乱也随着争论的深入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是，它冒充是党的统一的最好的捍卫者。一个主张统一的反对派本身就有矛盾，它所说的往往被人们用来反对它自己。但反对派有一点似乎是始终明确的，即直截了当地否定列宁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并要求在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建立两党制。因此，它不能使自己的命运再悲惨了，因为这正是人们马上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谴责的要害问题。大会作出的决议说：“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对党的这种观

^①参阅《四十六人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022号。

点是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①

党的领导在十二月的下半个月里突然激烈地向反对派发起了进攻，这就足以证明，共产党领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经过长期的积聚最后达到了爆炸程度。意见分歧、对抗和忧虑，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相互愤怒的情绪，领导集团正是带着这种愤怒情绪对反对派的挑战作出反应的。这种激烈的派别斗争一旦爆发，就证实人们已不可能维持一个表面上联合一致的领袖集团，不可能重新恢复集团内较为自由的讨论。反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战斗方法是愤怒的控告和无情的组织压力。从此以后，党始终处于戒备状态。

五、机关的胜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是俄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党的最高层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以前，党内有一个比较庞大的领导集团，当领导集团中出现意见分歧时，允许人们进行自由讨论。现在，阵线已经分明，战斗已经打响。一方是非法的，受谴责的；另一方已结合成一个有纪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不但是用一种声音说话，而且也似乎是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斗。由党的书记所领导的机关是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机关，它的化身就是斯大林，它已日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权力。

当反对派被击败，溃不成军时，人们开始向它提出系统的理论性的控诉。这项工作起初是由布哈林着手进行的。他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谈起了反对派所要求的党内民主制：“布尔什维主义始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67页。

终拒绝孟什维克的形式上的民主主义……它对党和工人阶级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党应由领袖们领导……，有觉悟者领导觉悟不高的人，觉悟不高的人和不太积极的人将越来越有觉悟和越来越积极。这种内部的力学就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主义。”^①

布哈林把托洛茨基选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他断言说：托洛茨基犯有从根本上背离列宁主义的罪过，他否认纪律原则，主张“集团”自由，从而使党变成一种联合团体。按照布哈林的看法，托洛茨基唯一的动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他说：“事实是，托洛茨基同志把‘民主’当作战略目的，以便解除‘老干部’的职务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政策。”^②

在攻击列宁主义制度的越轨行为时，温和的左派分子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过去就曾试图使革命的理想与独裁办法相协调，人们可以指责他们自己就有许多官僚主义行为，指控他们自己也违反了基本原则。人们特别可以指责托洛茨基本人对独裁的爱好，在这一点上，就连他在反对派中的某些追随者（即那些有过极左历史的人）也对他不满。^③此外，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惯也为斯大林大加利用了：

“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九月，即在他进行派别发动的前几天，在全会上还默不作声，至少并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过了两个星期却突然宣称，国家和党就要毁灭，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他需要民主，把它当作法宝，当作战略手腕。”

“从上面所讲的应该得出结论：反对派的问题与其说是拥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的愚想来损害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反对

^① 布哈林，《打倒派别组织》，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② 同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真理报》。

^③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360页。

派不是一些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①

党的领袖们并没有以这样的人身攻击为满足。出于对党史的考虑，他们已开始锻造一种论战武器——给历史以新的解释并改写历史，以便使它适应目前的政治需要。人们以难以反驳的方式试图指责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一七年前就远离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哈林完全不提自己的错误，却重新提出托洛茨基在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和工会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立场，并把这种反对行为归咎于托洛茨基的孟什维主义历史。^②他强行编造党史上的问题，并要托洛茨基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把“新方针”说成是党史上一个崭新时期的开始。按照布哈林的观点，这就是反对派非列宁主义观点的一个见证，因为这样就把党在革命后的历史分成过多的时期，并间接地贬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在革命前的工作。^③

为了反对其他反对派分子，有人又把一九一八年轻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密谋活动”的历史翻了出来，并对它加以描绘。布哈林把他以前的反对派同事所干的一些事说成是可耻的行为，而他本人也曾参与了这些事。当时，受到攻击的人还能获得机会进行反驳；因此，他们抗议说：“有人把事件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糟，这是对我们党史的歪曲。”^④然而，这仅是一个开始。后来，党史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破坏反对派的威信；最后，它终于被完全改写成一部关于英雄和叛徒的童话故事。

^①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6、27、31页。

^②参阅布哈林：《打倒派别组织》，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③同上，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④皮达可夫、斯土柯夫、拉狄克等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真理报》。

正当反对派处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时，党领导利用机会把由他们代表的经济政策宣布为正式的路线。在此之前，人们作了不少准备工作，例如把托洛茨基说成是对农民漠不关心，他在农民问题上曾与列宁有过意见分歧，等等。^①显然，这一论断在后来对反对派提出的控诉中占了突出的位置。中央委员会为研究剪刀差问题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右的亲农民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这些建议，同时在一项决议中说道：“农民经济是恢复工业的主要基础，因而也是工人阶级壮大的主要基础，因为农民市场是工业品的主要的广阔市场。……，因此，尽可能地大力扶助农民经济，不仅是苏维埃政权的总的利益所要求，而且也是最迅速地发展工业本身的利益所要求。”^②因此，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有关提高农业经济价格和促进农民福利事业的措施，其中像价格补贴、优先照顾粮食出口和新的销售办法。对右派来说，工业是不受重视的，它受到的仅是批评和指责。厂长应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降低企业费用和提高生产率的办法来解决工业方面的问题。人们故意回避这种认识：问题可能在于工业设备的严重不足。

在反对派方面，奥新斯基在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上对经济政策问题表了态。^③他重复了四十六人的批评意见——“混乱”、“没有制度”、“自发性”和政府在经济方面“缺乏远见”。奥新斯基把限制贷款和试图取消工业利润的思想指责为是最有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他提出的医治经济的药方是有计划地发展工

^①参阅托洛茨基：《关于城乡结合》，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真理报》。

^②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75页。

^③参阅奥新斯基向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业。这正是左派分子所坚持的观点。尽管他们不断因此而遭到机关的追随者们的嘲弄，但只要他们还是一种政治力量，就始终坚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这一思想，直到一九二七年，即左派分子已被开除出党并受到处罚时，才受到人们的注意。但这时，斯大林已把他们的思想用于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要求把重点放在工业上和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它没有得到重视。一九二三年再次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详尽地谈到了有关在农民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制定系统的经济计划的问题。^①直到斯大林于一九二八年改变路线为止，李可夫一直是这种观点的公开拥护者。从经济政策观点看，各派的区别是明显的：领导集团决心维护和继续奉行业已采取的谨慎方针，而反对派却认为如果不顾他们的抗议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一场灾难必将发生。无奈，有关技术、经济的辩论与派别斗争的激情搀杂在一起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至十八日，即在列宁逝世前约一个星期，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召开了，这是共产党发展史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都曾是很重要的会议。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党领导的意图都得到了贯彻，但反对派的观点不仅受到了注意，而且还得到了支持，会议尚能作出真正的决议。但是，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起直到今天，所有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是导演出来的会议，其中只有一九二五年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个例外，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组织奋起反对斯大林，但毫无结果。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是在党的机关肆无忌惮地插手下筹备

^①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见《卡尔全集》第四卷，第27，126页。

和召开的。鉴于地区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于地方组织，而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于地区代表会议，党的机关为了在代表选举时击败反对派，使尽了各种手段。斯大林在筹备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发明并部分加以采用的方法现在已完全见效了，代表会议的一百二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只有三名反对派的代表。^①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起，谁能成为代表，完全取决于党领导的意见；会议的决议是由较高层领导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再由代表们机械地确认一下。即使让反对派代言人出现，那也只是在大的战略范围内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其目的就在于为政治上清除新的无权的偏离者作好收集材料的准备。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带头向反对派发起了进攻。他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重要报告，猛烈攻击反对派并对它进行挖苦讽刺。他指责反对派背离了列宁主义，因为它相信绝对的民主；他指责反对派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因为它不相信列宁主义；反对派对党机关的批评是根据“一种否认党的工作的领导原则的轻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而提出的；反对派不能被饶恕的罪行是它的派别活动——这就是说它作为反对派而存在，而它总是以要求“集团的自由”来设法掩盖这一点；“而集团和派别组织有什么差别呢？”斯大林好像想知道这一点。“既然在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建立了以谢烈布利雅柯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分派了自己的发言人，责成他们在某些大会上发言，提出某种反对意见；既然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进程中被迫退却并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那么这当然就是集团，就是集团的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组织……”斯大林又说，这

^①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72页。

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①

斯大林强调指出，派别组织与党内所谓的官僚主义制度毫不相干；更确切地说，它是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表现，同时又是它们的鼓动者。“我认为反对派无限制地鼓吹他们……的民主，就是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我认为反对派不自主地做了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的传播者。”^②许多孟什维克同意斯大林对共产主义左派的刻画。他们欢迎反对派，认为它是打入一党专政中的一个民主楔子，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左派，因它具有独裁本能，很容易会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强硬方针上去。^③为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斯大林现在又公布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的决议中的一项条文。根据这项条文，中央委员会有权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将它的一个成员开除出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④

党代表会议采纳了斯大林给反对派所作的评述：它“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党内民主原则已经开始被任意地在党的范围以外加以解释，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唯一的合法

①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6、19、20页。

②同上，第20—23页。

③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129—131页。

④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2页。

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有时会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全党必须进行经常而坚毅的斗争去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①

这就是反对反对派的运动的结果,也是党领导从反击批评者的论证中总结出来的必然结论。

一九二四年初的情况表明,俄国共产党内的决定性力量是书记处机关及其最高领导人。尽管反对派提出了各种警告和抗议,但情况表明,它在党内出现权力斗争时是软弱无力的。还在列宁逝世之前,他的继承人要走什么道路显然已经确定了。危机的时期就是王位虚悬时期,当列宁还活着,但已不再能执政的那几个月,是一个政权空白期,也是一个危机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一场决定命运的赌博已开始发牌,但这场比赛只能有一种结局。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67、368页。

第十章 列宁逝世后的党

列宁在失去全部工作能力九个月之后，突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他的逝世在政治上没有引起多大变化，因为继承人集团已在行使它的职责；他的逝世在感情上对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它只能在得不到列宁指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向前发展了。

对反对派来说，列宁逝世后的一年是一段低潮时期。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遭受失败后，就停止了积极的反抗活动。在最高领导层，托洛茨基和他对手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时起时落，但要发起一场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尝试已经停止了。大体上说来，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二六年之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直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脱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加入左派时，反对派才获得新生。

一、统一和教条

由于列宁的逝世，形势对托洛茨基来说更为不利。托洛茨基由于难以说明的原因呆在黑海疗养地始终不采取行动，而且也没有提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要求。他甚至连列宁的葬礼也没有参加。这一点引起了法国记者罗林的注意，他说：“我的上帝啊，他竟错过这样的机会！呆在帐篷里的满腹怨恨的阿喀琉

斯*……如果他来到了莫斯科，他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①

托洛茨基后来断言说，政治局给他发去了一份使他不能及时赶到的错误通知而阻止了他的露面。除此之外，他的意志看来也已衰退了。他不能振作起来进行活动，甚至连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也不想写。他后来解释说：“但我需要单独呆在一处”，“我不能拿起笔”。② 斯大林利用了托洛茨基错过的机会，他在追悼会上扮演了主角。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举行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以党的名义宣誓，要执行列宁的遗嘱；他使用礼拜仪式上常用的迭句说道：

“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③

斯大林的演说标志着当时将要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方法：党的学说是应逐字逐句遵循的正统思想。为了从列宁手中接过稳固和可靠的领导权，为了顶住反对派的威胁和出自责任心，党领导想借助死去了的领袖的名望，借助于教条和宣誓建立起一座壁垒来保护自己。④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说：

“我们不仅需要统一，而且需要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统

*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之外，全身不受伤害。——译注

① 转引自沃尔特·杜兰蒂，《我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九三五年纽约版，第225—226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67页。

③ 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42页。

④ 据称，在如何处理列宁的遗体问题上也引起了派别争论。在列宁还没有逝世时，斯大林就曾在加里宁和李可夫的支持下主张按照“俄罗斯”习惯在尸体上涂上香料，用防腐的方式来保存列宁遗体。托洛茨基则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在这背后有建立许多新的“圣体遗骸”的企图，并要求将列宁的遗体火化。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列宁死后，斯大林不顾批评家们的类似抗议，要求保存遗体。现在的陵墓就是当时斗争的结果。

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147—152页。

一，需要建立在那种观点，即党在争论时期（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形成的观点和这次党代表大会不得不以它本身的名义明确地、逐字逐句地、完全确认的观点之上的统一。”^①“伊里奇教导我们，……”，或者“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这已成为斯大林常用的迭句。^②不久，季诺维也夫甚至把列宁的《怎么办？》这本书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圣经”。^③托洛茨基为此写道：“我们与列宁的关系是一种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被一种与一个僧侣等级制度的首领的关系所代替。”^④

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一系列课程中已着手对“列宁主义”学说作简明扼要的系统描绘。这篇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已成为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斯大林明确否认这种观点：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他认为普遍有效的理论是：“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⑤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描绘也是为了论证党的现行路线的正确性——似乎在列宁主义思想范围内要提出别的方针，是不可想像的。这一点在农民政策上表现得更加清楚。斯大林全力以赴地利用“列宁主义”的全部威信为安抚农民的和解路线辩护，反击左派的批评。

在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确实是列宁的最好的学生。斯大林和列宁一样，都认为党是政策的决定者。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他

^①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

^④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2页。

^⑤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63—64页。

一年前曾提出的关于党是一个有机的战斗组织的军事观点：“党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对斯大林来说，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没有必要改变密谋技巧和专政方法。他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工人缺乏无产阶级觉悟，这要靠党来提供，党应当“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

如果说斯大林在修正（当然他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那么他是在效法列宁。这两个人实际上把党（有觉悟的最高领导）看作是历史的推动力。“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一任务不是由社会力量或普遍的经济发展来承担，而是由党来承担。像斯大林后来用实践所说明的那样，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要按照党的命令进行。因此，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加强“铁的纪律”和“意志的统一”。“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已作为党的原则而得到了承认。这样，任何反对派都应受到判决：

“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清洗“机会主义分子”成了肯定的行动——“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①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党组织在贯彻斯大林的政治准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使党员服从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一

^①参阅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52—160页。

九二四年春开展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党大批地接受了近二十万新党员（大多是工人），使党员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给党增添了许多政治上无经验的人，而这些新兵却牢牢地被掌握在各级书记手中。虽然“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明显是一次受到控制的行动，但党的机关中的歌功颂德者后来却一再以此作为下列说法的证据：群众是信任党的，反对派抱怨官僚主义和类似的罪恶是毫无根据的。^①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要说加入党的工人完全赞同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包括官僚主义的发展……，这似乎完全是不可容忍的乐观主义。”相反，在内战时期出于真正的信仰加入党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现在却被剥夺了党员资格。^②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捞到好处，领导不得不违反章程，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曾用如下的理由来为这一行动辩护：党代表大会肯定会确认这一点的——违反规则的选举自然会得到它的受益者的承认。^③

党组织也是靠压制反对派而得到加强的，对反对派的压制在一九二四年冬春两季始终未减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抱怨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的肃反委员会在有计划地将同情反对派的同志开除出党。因为按正式规定反对态度不是开除的理由，所以就以“机会主义”或个人缺点为借口。^④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一场运动，一九二四年四月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它真正的目标是“捍卫和巩固历史

①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 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公告》，见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真理报》。

④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的布尔什维主义，反对损坏或动摇它基础的任何企图”。^①当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托洛茨基的亲密合作者）被伏龙芝替换时，反对派在军事委员会里的权力遭受了重大损失。^②一九二四年年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以便在没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情况下作出某些决定。^③

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时，书记处机器的工作做得那样的出色，以致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这一成果已被用来解释这种说法：反对派似乎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人。斯大林说道：“还在不久以前报丧说我们党要灭亡的人事实上是不了解党，同党离得很远，很像那种应当叫做党内异己分子的人。”^④

列宁的“遗嘱”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突然出现，这对许多领导人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克鲁普斯卡娅将这一文件秘密保存一年多之后，把它转交给了加米涅夫，并声明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表示，希望把他口授的记录告知他死后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⑤党领导别无其他选择，只好向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代表宣读这一“遗嘱”。^⑥由于这一口授记录要求

①社论：《我们的任务》，《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一期（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第3页。

②参阅斯克良斯基和伏龙芝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三分册附件，第45、193页。

③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的传达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6号。

④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3页。

⑤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向加米涅夫转交文件所夹带的说明信，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公报》，第3页。

⑥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30—32页；托洛茨基：《关于列宁的遗嘱》，见《受到扣压的列宁遗嘱》，一九五五年纽约版，第22页。

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地位。然而，季诺维也夫却帮他说了话；他解释说，“伊里奇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像一位同志报道的那样，他还借用“年轻姑娘有了孩子这种常见的课题，大加发挥，说她毕竟还很年轻，不值得花费气力去谈论这件事”。^①斯大林要求中央委员会进行信任表决，同时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建议进行举手表决，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公开反对党的机关的首脑，所以斯大林得到了一致的确认。他后来一直以此而感到自豪。^②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各种正式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始终不容人怀疑他们反对来自内外的一切威胁、维护党的坚如磐石的统一这一决心。会上，季诺维也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了政治报告，从而再次作为党的名义上的领袖出现；当他谈到统一问题时，简直有些歇斯底里：“大厅里，没有一个人不准备为我们党的统一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是革命和共产国际未来取得一切成就所必要的唯一重要的先决条件。”^③（他没有预感到他本人今后将要为党献出什么。）就像这位领袖一样，党代表大会的表现也有些颠狂，它的决议显示出一种在统一问题上的神经官能症：“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统一，维护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不使它产生任何偏向。在党失去了列宁同志以后，保证党的完全统一就比过去更为重要和更为必要了。极微小的派别活动，都应当受到最

^①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33页。

^②参阅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1、152页。

^③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严厉的追求。俄国共产党在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是革命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①

仅作为没有表决权的协商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得不容忍激烈的谴责和诽谤，因为他们在十二月争论中维护反对派的观点。托洛茨基引用了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也就是绝大部分是由他自己起草的那个表示和解愿望的文件），并再次警告人们当心威胁党内民主的潜在危险：“机关的官僚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官僚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家机关，……广大群众……的愚昧……”^②党的领袖们在他们的答复中强调说，反对派在十二月争论中已严重地危害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杂志称反对派为“取消派”。^③斯大林解释说：“同志们，我认为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反对派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集团的行动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结果。要知道，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④

反对派显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收回所有的说法，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统治地位。托洛茨基走了这条路，不过他尽量以尖刻的讥讽口吻说道：“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使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知道，反对党不可能

①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13—414页。

②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社论：《没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见《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第三一四期，第14页。

④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20—221页。

是正确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①托洛茨基的自我否定是徒劳的，他不承认开始反对他的力量已决心破坏他的威信，这也可以说是他信仰的公开表白。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指责他，说他太过分了。尤其是，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就此指出：把党说成是不犯错误的，这显然是荒谬的。^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思想：党的统一是不容怀疑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克鲁普斯卡娅使用了一些表示和解愿望的词句。^③季诺维也夫在结束语中对统一问题作了概括的表述：“党是统一的，……世上没有人能分裂我们的俄国共产党。（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样，也没有一个什么集团能分裂我们的党。……党将保证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有百分之百的决心。”^④

一九二四年，共产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已变得单调和令人厌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一系列代表会议一再重复老一套的论据和控诉内容，自吹自擂，掌声不息，是苏联精神生活气氛急剧变化的征兆。

在党史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列宁的逝世显然使大多数党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第二，党领导和反对派之间的争论变得冷酷无情（由此已开始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它给党机关提供了一个创立僵化的党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条件；第三，在党的实际政策和它所宣布的革命理想之间出现了日益加深的鸿沟，从而也就出现了以强加于人的正统思想来克服鸿沟的必要性。从那以后，

①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00页。

③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职责就是解释“党的路线”。

随着党的中央组织机构的日益加强，党的绝对统一的理论和实践也发展起来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批准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扩大个人控制权，建立中央党务干部学校，审查从重要岗位直到党支部的各级党员干部。书记处本身也得到了加强，而且进行了局部的改组。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合并成组织分配局，它已成为书记处最重要的执行机关。负责与地方组织联系的指导员获得了更大的职责和权限。^①

尤其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更有利于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将中央委员会从四十名委员和七名候补委员（一九二三年的状况）增加到五十三名委员和三十四名候补委员。除老的地下工作者克拉辛和克尔希沙诺夫斯基外，一大批实际上不出名的人（显然是书记处的人）进入了党的领导层。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增加了两倍（增加到一百五十一人），而它的职能（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实行纪律检查和监督）也相应地扩大了。为了“制止破坏党的统一的任何企图”，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审查和挑选党员干部，首先是国家机构和教育机构中的党员干部。^②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些部门中有许多反对派的同情者。

最高领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列宁在中央政治局的六个同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仍保持着自己的席位，直到目前为止仅是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填补了列宁的席位，成了正式委员；同时增补了三名新的候补委

^①参阅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21—426页。

^②参阅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32—438页。

员：捷尔任斯基（他现在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的前任李可夫已正式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索柯里尼柯夫（他是一个保守的财政人民委员），伏龙芝（新的副军事人民委员）。^①同样，党的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也吸收了大量的新人——组织局的人员增加了一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拉·莫·卡冈诺维奇一夜功夫就进了党的领导人行列。刚过三十岁的卡冈诺维奇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十七岁当工人时就已经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在内战时期，他已作为党的干部飞黄腾达。一九二二年六月，斯大林提拔他为书记处组织指导部部长；次年，他成了中央候补委员。^②他是由斯大林提拔到最高领导岗位上来的党的新官员的典型代表。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不仅成了中央委员，而且是政治局成员和书记处成员（其他的书记处成员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也夫和伊·阿·捷连斯基——他是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一九三八年受审讯并被枪决）。^③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卡冈诺维奇领导着乌克兰的党组织。一九三〇年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最核心集团内一直呆到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鲁晓夫向他发起突然进攻而下台时为止。在斯大林成为党的主人这一过程中，他无疑是斯大林的可靠的得力助手。

二、“十月的教训”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战役

尽管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停止了积极的反抗，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遭到党报、党刊和党组织的抨击。据一份报告说，反

^①参阅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真理报》。

^②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卷，第516—517页。

^③参阅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真理报》。

对派现在已受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面监视。^①借“重新登记”党员之名，一场清洗反对派的运动在反对派人数最多的党支部内（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的党支部内）开始了。^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不隐瞒这一政策，他仅仅解释说：将要被驱逐出党机关的个人野心家都显示出具有偏向反对派的自然倾向。^③同时，人们还在继续努力指出托洛茨基的思想错误并揭露他与列宁在理论上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现在已感觉到无法再长期沉默了，他置政治全然不顾，决心用他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即像刀一般锋利的笔来进行回击。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也刚好是德国共产党遭受惨败一周年），托洛茨基发表了题为《十月的教训》的攻击性长篇文章。^④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断是，受俄国人指导的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应归咎于一九一七年就已经反对列宁领导的同一思想。托洛茨基写道：“根本的问题是：是不是为政权而斗争？”他怒气冲冲地用党的领导通常攻击他的类似语言答复了他们：“……反对通过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分子实际上已接近孟什维克分子革命前的观点。”^⑤党领导当时在内政方面所采取的错误方针和它在国际上遭受的失败都应直接归咎于这种“右的”立场。尽管托洛茨基没有指名道姓，但《十月的教训》显然是在政治上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宣战。对此，党领导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①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20页。

^②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古比雪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托洛茨基写的这篇论文是他革命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的序言，这篇文章当时是以《一九一七年》这一标题出版的（见《托洛茨基选集》第三卷第一分册），后来又以《十月的教训》这一书名单独出版（一九三七年纽约版），（《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教训》，一九二五年柏林版）。

^⑤《十月的教训》第37、52页，见《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教训》第24、36页。

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这一行动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当这两个集团无疑正准备弥补它们之间的分歧时，托洛茨基的这一行动却促使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结合。人们曾猜想，托洛茨基实际上是想分裂领导集团；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他认错了自己的真正敌人。如果说托洛茨基有一个战略目的，那似乎就是争取斯大林对左派事业的支持（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按照另外一种理论的说法，为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窘，和使他们更加依赖于书记处并为今后解除他们的职务作准备，斯大林鼓励托洛茨基采取了轻率的行动。^①如果说托洛茨基是为了打动党心并唤起全党的革命感情来反对当时的领导，那么，他的计划是彻底失败了。他的论点已被受到控制的报刊雪崩似的文章埋没了，而他逐字逐句进行反驳的文章根本就没有给予发表。^②托洛茨基并没有试图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他解释说：“在目前讨论的气氛下，我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说明……，只会引起激烈的争论。”^③

事实上，托洛茨基的批评击中了领导集团的敏感处，反驳批评的论点绝大部分是一种出于恼怒的防守。季诺维也夫甚至想否定，一九一七年曾出现过反对列宁的“右翼”。他说：“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右翼存在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建设原则排除了左右翼产生的可能性。”他只是承认，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仅出现过“偶然的意见分歧”。^④

①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管理俄国？》，第127—128页。

②托洛茨基的声明：《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未发表的文章，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4号。

③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372页。

④参阅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132页。

斯大林突然变得宽宏大量起来，他说：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而“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斯大林宽容心大发显然与他本身历史上的污点有关。他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实际情况，但同时又想说明这是无关紧要的：“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①

至于对托洛茨基的反击，所有的控告不是纯属虚构，就是被过分地夸大了——激怒了的领袖们不是要消除思想上的错误，而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这个人。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这是党领导在围绕新方针问题的争论中第一次对他提出的谴责。^②不过，领导人显然有意不提他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反农民的暴力政策，对于这一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他们对托洛茨基提出这一控告，目的是要说明托洛茨基革命前的孟什维主义与他今天反对以牺牲工业来安抚农民的立场是有联系的。这样一来，官方的政策就直接涂上了列宁主义正统思想的色彩。

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党在一九一七年“重新武装”的概念和他关于事件已证实不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这一断言，被批驳为是对历史的阉割和对列宁的诽谤。加米涅夫说，如果这个人确实是这样，那就是说“党必须宣布与他断决关系，这就是党五十年来

^①参阅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93、289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新方针》，第59页。

所教导的做法”。^①托洛茨基最大的罪恶似乎是，他竟敢纠正列宁的观点。一九二一年，他在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样一个似乎并无恶意的看法：“我绝不认为在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中全是我不对。……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②三年之后，这封信被当作亵渎权威的证据掘了出来。为了证实他是一个异教徒，人们精心地研究托洛茨基当时所写的反对列宁的每一句话——而他确实说了许多反对列宁的话。

整个进攻都是在新的教条口号下进行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被称为阴谋家，他似乎已经损害了党的信仰的纯洁性。李可夫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带有普遍性的、旨在从布尔什维克党内消除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托洛茨基主义宣传运动”。^③在布哈林的生动而又形象化的讲话中，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埋在党的根基下的炸药”。^④人们进一步把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等同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季诺维也夫竭力抨击“臭名昭著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说：“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想把它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而这种理论早被列宁同志和所有布尔什维克视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只不过是经过推敲而得出来的巧妙的程式而已，它是根据孟什维主义的需要发展起来的。”^⑤

根据控告者的指控，反对派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是想使党在可怕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面前失去抵抗力。加米涅夫将这种

①加米涅夫：《列宁不在的一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

②托洛茨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致米·奥里明斯基的信。

③李可夫：《一次新的讨论》，《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8页。

④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372页。

⑤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126—129页。

势力与党的“最薄弱环节”联系起来，这是针对反对派的一种露骨的影射。他说：“某些已加入党的人并不愿协助党工作，他们具有一种秘密的信念……，他们比党还拥有更多的权利。”他在讲话结束时公开声称：“我这样说感到很痛心，……但必须这样说：托洛茨基同志已经成为一条渠道，小资产阶级分子已通过这条渠道涌进了我们党内。”^①斯大林赞同地说：“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②在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中间，只有一人倾向于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个例外就是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这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她说：“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激烈争论的。”^③

即使这样，在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提出的控告中，当然也有不少真实的东西。事实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产生于不同的泉源——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对立的流派，即列宁主义派和左派。如果说左翼反对派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特性和新经济政策中与农民友好的倾向，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就狭义而言）。然而，这两派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列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都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就是说在党夺取政权时，左的思想曾占了统治地位。当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企图破坏当时的党领导的威信并为左派恢复名誉时，他就是以这一事实为依据的，他认为左派与四月提纲、“重新武

^①加米涅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84—85页。

^②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09页。

^③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十月的教训的问题》，见《关于列宁主义：文集》，第153页。

装”党和胜利完成十月政变是一致的。正是为了反击这一观点，党领导更加严厉地批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并坚持认为列宁和反对派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这一过分简单的概念。

反托洛茨基运动使控告者比被控告者更为难堪。所有的党领导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都在他们自己的讲话中证明了自己是害怕托洛茨基各种挑战的懦夫，他们只是考虑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辩护。而托洛茨基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反对这种重新兴起的对列宁的崇拜，他只是表明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列宁主义者和论证他的“通向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合理性。^①这样一来，他就承认了正统思想就是最高法律，而这种做法只能给他的对手带来好处。

在托洛茨基被宣判后，党的领导又动员党组织的全部力量来消除一切怀疑。布哈林喊道：“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清除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不管怎样，要迫使全党团结在列宁主义旗帜下。”^②斯大林要求“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③季诺维也夫积极赞同这一设想，他宣布了如下的口号：“使全党布尔什维克化！”“展开思想斗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④尽管人们作出了上述种种努力，但并不能保证达到宣传战的目的。根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份的一份报告，大多数纯朴的党员仍旧“无可置疑地同情托洛茨基”。^⑤另外一位与会者指出，首先是

^①参阅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69号，第1、3、8—9页。

^②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

^③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09页。

^④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⑤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28页。

思想争论损害了托洛茨基的声誉，他说：“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很关心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不断革命论’在我看来是一种危险的理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有必要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①很显然，领导人仍不断感到害怕。

于是，反托洛茨基的行动接着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决定：“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成就的基本前提永远是钢一般的统一和铁一般的纪律，是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观点的真正一致。托洛茨基无休止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使党现在必须提出：或者是放弃这一基本前提，或者是永远制止这种言论。”“如果让事情仍然保持原状……这就意味着党开始在非布尔什维克化甚至简直是在瓦解。”^②接着，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他最后一个有实权的工作单位，即军事人民委员会。如果他再继续倔强下去，人们就会用其他的纪律措施来威胁他，并会把他打发到电气化部门担任一个较低的管理职务或把他派往驻外使、领馆去。打击是严厉的。然而，托洛茨基却企图自我欺骗，他解释说：“为了剥夺对手们诽谤我有军事企图的资本，我毫无怨言地放弃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我甚至在内心感到由衷的欣慰。”^③但是，尽管托洛茨基逃避了波拿巴主义的谴责，但这并没有改善他的政治处境。

在围绕《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中，党的历史已成为领导集团用以抗拒反对派威胁的一件重要武器。为了使历史服从于今

^①巴尔米涅：《一个幸存者》，第213—214页。

^②《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25—526、533页。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18页。

天的目的，历史被无耻地歪曲了。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本人也把历史与党内斗争扯在一起，而且他还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为了进行自卫，党领导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整理历史。这一点最能证明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虚弱。

他们除了企图掩饰一九一七年的右倾外，首先要对托洛茨基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必要的修正。在这方面，斯大林表现最为突出。他说：“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这仅是他重新解释历史的一个开始，经过一段过程后，即到一九三八年，他终于使党的历史变成一部精心加工的富于想像的作品。为了缩小托洛茨基的作用，斯大林还作了一点补充说明：他回忆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后来已成为他作为十月革命的积极的领导人取代托洛茨基的历史地位的口实。这就是关于设立由斯大林本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这段历史。尽管这个应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联系的委员会从未进行过活动，但斯大林现在却断言说：它曾负责“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①此外，斯大林还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团——俄国共产党。”^②接着，

^①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84页。

^②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91页。

他要求党制止“有关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在和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个人作用的不正确和过多的传说”。^①

这仅是一个开端。十年之后，“天才的斯大林”是除列宁外的历次布尔什维克伟大行动的首创者和鼓舞者；而且从那以后，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揭露为从一开始就是叛徒和帝国主义的间谍，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失宠。把历史置于这样一个新的重要地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做法。甚至在一九五三年，把一位领导苏联秘密警察长达四十年历史之久的人物赶下台时，人们宣称：“可以确定，拉·巴·贝利亚的犯罪和叛变活动……要一直追溯到一九一九年”；他当时似乎就已经与无所不在的英国秘密警察机构有了联系。^②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历史就是最后的审判者，但陪审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三、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展开攻击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因为它针对的是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思想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一理论曾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党的领导集团为什么决定对“不断革命论”展开攻击，这还不很清楚，但攻击的战略是非常聪明的。对这一理论的攻击实际上就是把当今的反对派同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争论混为一谈，把左派对经济政策的批评与托洛茨基的所谓轻视农民的错误联系到一起。这次攻击首先是批判这样一种思想，

^①《共产主义青年团内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澄清》，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4页。

^②苏联最高法院关于拉·巴·贝利亚和其他人问题的判决书，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即世界革命的推迟将影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

初看上去，国际革命问题在这个时刻变成了派别斗争的主题，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时反对派已被迫处于无望的守势地位，关于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幻想业已彻底破灭。一九二四年，苏联已同大多数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承认。但是，对党的领导集团来说，正是这种对外关系政策上的稳定性引起了理论上的混乱，而反对派却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一混乱形势。

对领导集团来说，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领导地位，就有必要粉碎托洛茨基理论中的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在革命俄国的最终胜利将取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加米涅夫企图证明，事实已反驳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他说：“如果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苏维埃政权早就不复存在。这种无视农民和不重视工农联盟这一决定性问题的‘不断革命’理论，将使俄国的工人政策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即爆发。”^①

但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基本思想，因此不能直接对它进行攻击。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种迂迴的办法，他们把“不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所谓错误联系起来，从而宣称托洛茨基的理论与列宁的理论是不一致的，在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有一条深刻的鸿沟。人们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间制造出一种区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这一演说中提出了这一区别。他提出，在能迅速推进俄国革命进程的动力这一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他说：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因

^①加米涅夫：《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见《论列宁主义》，第70页。

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的力量。^①党领导通过歪曲和夸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使列宁变成了反对他自己在一九一七年所主张的希望借助国际援助取得政权的思想。

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俄国革命的英雄们，以相信俄国农民的思想代替了已经消失了的国际革命的幻想。布哈林完全不再提欧洲支援的必要性，他现在认为战胜俄国落后性的基础在于工农联盟，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联合”。^②布哈林说：“列宁教导我们：我们的出路在于我们同农民取得谅解，即使西方的胜利在很长时间里还不能到来，但我们仍然有可能取得农民的谅解，并保持和巩固我们的阵地。……列宁主义告诉人们，在整个过渡时期农民应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尽管他们是一个刚愎倔强的同盟者。”^③提出这个理论，无疑是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倾向，是针对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化”理论。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俄国能继续存在的解释，从而也证明了领导集团是正确的。因此，布哈林说：“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核心问题。”^④

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右翼反对派与斯大林的斗争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布哈林甚至把工农联盟这个概念扩展到整个世界革命范围。他指

^①参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91页。

^②参阅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49—356页。

^③布哈林：《苏联经济的新发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期，第40页。

^④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67页。

出，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农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工业国的无产者，而俄国的社会状况更符合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不同于经典作家对西欧状况的设想。因此，布哈林认为：世界革命的未来取决于俄国工农联盟形式的成果；如果人们破坏了国际的工农联盟，那么，社会主义普遍胜利的前景也就因此而变得暗淡了。^①

斯大林不愿把创建新的理论公式这一工作完全交给他的右翼同伙。他借出版一九一七年文集的机会写了一个前言，即《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斯大林把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德国无产阶级不懂得应同农民结成同盟。他接着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与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②斯大林从这一理论出发（如果说这一理论不是完全从布哈林那里借用过来的，至少也是与布哈林一起提出的），开始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在一个农民国家实现。

斯大林写道：“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的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斯大林不是那种能通过对俄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指出前景的人。他研究列宁的全部著作，并从中找出能使他有可能作出光辉业绩的段落，通过他的大胆解释使之发生效用。他找到了列宁

^①参阅布哈林，《不断革命的理论》，见《论列宁主义》，第355—356页。

^②参阅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10—348页。

在一九一五年论述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言论，列宁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尽管这一公式指的不是俄国（正如列宁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明确表示的那样），但斯大林不顾这一点，他援引了这一段话作为他的权威根据，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因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而资本主义在其他一些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很发达）仍继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就是以此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以对付人们关于苏维埃政权在他的领导下背离了革命的原则和纲领的指责。针对俄国的落后性是实现党的社会主义纲领的障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现在反驳说：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可能的，因而，当前建立起来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是走在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家们依靠的是重新解释后的党的奠基人的某些言论，而不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布哈林则试图从分析政治形势入手发展他的思想，他认为今天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是国际革命而是农民。

斯大林把他的事业建立在列宁九年前在流亡瑞士时写的一句话上面，并对这句话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随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出，苏维埃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以新的解释，使之与苏维埃国家的现实发展相一致的过程开始了。列宁的话是不容怀疑的，同样斯大林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容怀疑的。事态也很快证明，斯大林是知道如何对付那些企图以他所表述的观点来加害于他的人。

第十一章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一九二五年秋，即托洛茨基主义幽灵被扼杀还不到一年，俄国共产党又陷入了派别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在“三驾马车”中的伙伴）与斯大林又发生了不和，并激烈反对在他领导下奉行的方针政策。而在相互争当大师的这几位列宁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斗争，显然是为了争夺个人在合伙中的权力地位。每当反对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时，理论——政治问题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实际上，现在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的统治权问题。尽管政策和学说问题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之间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仅是一个战场。不过，季诺维也夫运动的真正作用是在几年后才显示出来的，它为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提供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基础，这个联合反对派“从内部”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批评。

一、“三驾马车”的分裂

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担任领导之后，在这个自称是三人集体领导的内部，很快就显露出意见分歧的迹象。一九二三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组织变动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对这次组织变动并不感到欢心鼓舞，因为这一变

动使斯大林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三年夏的活动，特别是他提出的改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计划，都反映出他对他的伙伴的意图感到担忧。尽管在一九二四年底以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使季诺维也夫不安，但这似乎只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个自认为是党的领袖的人物来说，斯大林始终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帮手。

一九二三年底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严格的组织措施进一步扩大了斯大林的权力。于是，斯大林竟要纠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论观点。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说道，有一些人（当然也包括季诺维也夫）错误地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党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同一篇报告中指名批评了加米涅夫，因为这个人使用了“耐普曼*的俄国”这样的措词，好像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人掌了权。在这两处，斯大林明确反对过分开诚布公地说明现实。另外，他表示反对开展一次新的接受新党员的宣传运动，这项计划是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的，并获得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准。^①

一九二四年秋，斯大林开始采取组织措施来反对季诺维也夫。他解除了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伊·阿·捷连斯基的职务，并将他派往中亚局。尽管捷连斯基不太出名，但他当时在组织机构中担任着极其重要的职务；他不仅是莫斯科党委书记，而且还是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他自一九二二年起就在莫斯科工作，在那里，他几乎是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影子。他显

* “耐普曼”就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人”。——译注

^①参阅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22—224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55—362页。

然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斯大林大胆地以乌格拉诺夫取代了捷连斯基的地位，乌格拉诺夫在一九二一年作为彼得格勒党委书记曾与季诺维也夫发生过冲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认为，乌格拉诺夫调至莫斯科对他们似乎是很有益的，但他们的这一幻想很快破灭了。乌格拉诺夫不仅成了捷连斯基的继承人进了组织局和书记处，而且掌握了莫斯科党的机关。^①当危机到来时，加米涅夫在他自己的司令部中已得不到任何支持。这时，反对斯大林的强有力的反对派已丧失了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起进攻，并促使这两个人重新与斯大林拥抱在一起。随后对托洛茨基主义作出的一系列谴责之所以如此地严厉，是因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斯大林相互都想阻止对方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②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敌意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要求将这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斯大林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则反对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同意列宁格勒要求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只是被解除了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的策略得到了酬报，托洛茨基以实际行动报答了这一友好表示，他在领导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争吵中完全保持了中立。据斯大林在报告中称，“三驾马车”由于开除托洛茨基的问题而首次出现了公开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假惺惺地解释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

^①参阅捷连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传，《百科全书》第一卷，第142—143页；第三卷，第175—176页。

^②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90—491页。

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①

从一九二五年初起，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小冲突一再发生。一月份，季诺维也夫分子萨尔基斯指责布哈林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因为布哈林似乎赞成农民组织可以不受党组织的必要监督。但后来，萨尔基斯被迫收回了这一指责。^②二月份，斯大林开始以建议、许诺和威胁的办法打入季诺维也夫的工作领域，即共产国际。他想利用德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当列宁格勒反对中央的权威时，在共青团的控制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摩擦。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并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萨发罗夫在共青团列宁格勒组织的领导职务。季诺维也夫想创办一个他们自己的理论杂志，这一企图也被阻止了。^③

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就扶植个体积极性来说，新经济政策已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倾向使季诺维也夫分子极为不安，并使他们对列宁主义正统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里，人们就新经济政策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一九二五年夏末秋初，季诺维也夫已转向理论领域，并开始向左转，以便能向具有非列宁主义倾向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发起进攻。

这时，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一名追随者查鲁茨基（莫洛托夫在短命的一九一七年三月左翼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的同事）按季诺维也夫的暗示写了一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里使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现行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并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17页。

^②同上，第318页。

^③同上，第319页。

谈到党目前或未来发生“特米多尔式蜕化”（热月政变式的蜕化——译注）问题。领导集团对此十分恼火，并命令查鲁茨基辞去他在列宁格勒党委会的职务。但是，省委会竟以十九票对十六票反对这种做法，这显然也使季诺维也夫分子感到意外。斯大林打算继续冲刺，想让他手下的一个人，即柯马罗夫担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季诺维也夫分子团结一致，拒绝了柯马罗夫，并对中央委员会的干涉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季诺维也夫同斯大林一样开始竭力强化他的机器，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较量。^①

当中央委员会于十月举行会议时，派别之间的界限已经一目了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领导下，新反对派首次公开出现了。这四个人首先抱怨农民政策，并要求在党内展开公开的讨论。^②党代表大会（它实际上应在春季举行）也因此而推迟召开。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巩固了他对党组织的统治。到十一月份为止，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除季诺维也夫控制的列宁格勒以外的所有党的机器。在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一次击退了斯大林的进攻。他已将所有他所熟悉的莫斯科领导的追随者排挤出了地方党组织和出席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③

与此同时举行的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对列宁格勒的行为提出了

^①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柯马罗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查鲁茨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6、303、322页。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9页；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7页。

^③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2页；另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8—249页。

批评，^①这是向列宁格勒人发起公开进攻的信号。尽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写得含糊不清，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但它已十分明显地促使列宁格勒人提出了一项严厉的反声明。他们对“闻所未闻的控告”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控告无法接受，因为列宁格勒人似乎是十分坚定的“无产者”和“列宁主义者”。^②因此，莫斯科现在打开了所有的阀门，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即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直到党的党员政策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并逐个地作了批驳。反对派的行为被说成是“异化、分裂主义、歇斯底里狂吠和一味怀疑我们的胜利”。^③当列宁格勒想与莫斯科言和，以便在友好的基础上调解争端时，莫斯科拒绝了，批驳反对派的论战，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中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才结束。^④托洛茨基对这两个党组织之间的这场斗争仅是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他问道：这两个较大的工人组织都作出攻击对方的决议，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何在呢？^⑤

在这期间，军队领导中也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件。据说，新的军事人民委员伏龙芝与斯大林在军事指挥部里的最亲密的朋友伏罗希洛夫不能相容。伏罗希洛夫是一个忠诚的、但不很有才能的

^①参阅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六年列宁格勒版，第36—40页。

^②参阅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党代表会议声明，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六年列宁格勒版，第40—44页。

^③参阅莫斯科党委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致列宁格勒党组织，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44—51页。

^④参阅萨发罗夫：《怎么一回事》，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列宁格勒真理报》；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8页。

^⑤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致布哈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26号。

人。① 出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动机，人们在传说伏龙芝同情季诺维也夫派。十月底，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虽然伏龙芝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英雄人物，但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们却断言说：有人蓄意命令军事人民委员动手术，说他的心脏发育不良。② 接着，就伏龙芝的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主张让伏罗希洛夫（据另一个报告称，让奥尔忠尼启泽）担任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候选人是托洛茨基过去的老对手拉舍维奇。最后季诺维也夫妥协了。伏罗希洛夫因此成了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为他的副手。③ 这样一来，反对派保持了对军队的一定影响；但是，拉舍维奇实际上并没有给反对派帮多大忙。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斯大林为避免公开分裂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情况很清楚，如果季诺维也夫承认总书记的统治权并服从党的纪律，那么斯大林就没有理由攻击季诺维也夫；另外，这也利于斯大林回避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来的令人难堪的理论问题。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多数人的看法才应被看作是官方的正式观点；政治局委员不应在代表大会上互相攻击；季诺维也夫追随者的最突出的思想错误应受到批判；列宁格勒党组织中被撤职的多数人应恢复其职务；《列宁格勒真理报》应该有一个新的主编。作为对等，他同意吸收一名列宁格勒人参加党的书记处，以及吸收一名列宁格勒人参加《真理报》编辑委员会。④ 季诺维也夫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不是妥协，这

① 参阅埃里希·沃伦贝尔格给编辑部的信，见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86页。沃伦贝尔格，德国前共产党人，曾为红军工作过。

②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8页。

③ 参阅沃伦贝尔格给编辑部的信，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96—897页。

④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5—326页。

是要我们投降。^① 反对派显然认为：如果他们进行抵抗，他们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他们要在党代表大会的法庭面前战斗到底。

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技能回击了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挑战并使争论显露出其本来面目——它是领导人之间的一场争吵，而且仅是由一些人引起的，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还是让季诺维也夫来发表正式宣战书为好。在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反复讲了有争议的问题，但他没有指名道姓，并表示希望所有的争端能马上得以消除。但为了真正有效地刺激反对派，他补充说：“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现在我不来谈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的行动的实质……”^②

这样一来，季诺维也夫就不得不宣布与斯大林决裂。他请求给他一个特殊的权利，代表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作一报告。在地方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就一专门问题而举行的讨论会上，这种做法是常见的。但是，自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时曾这样做了以后，在全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人们要对主要的政治报告提出反驳报告已不再可能。当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一要求时，引起了潮水般的指责，这一指责浪潮直至反对派被打翻在地时才逐渐消失。

二、农民和新经济政策

农民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俄共党内的一个争论问题。当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私有利益的让步达至高潮时，农民问题更加成为激烈

^①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88页。

争论的主题。尽管农民问题并不是导致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决裂的主要原因，但双方都尽力利用这个问题，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一九二四年八月，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爆发了农民的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反对派指出，牺牲工业和城市工人的利益来安抚农民是违背无产阶级正统思想的。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托洛茨基主义……就在于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工业’，而看不到农村。这将导致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并最终毁坏无产阶级专政。”^①一九二五年一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都维护政府讨好农民的政策，并警告托洛茨基，不要低估工农联盟。^②季诺维也夫还提出了一个“面向农村”的新口号。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他还建议采取各种缓和关系的政策，如：降低工业品价格、扩大土地占有权、较自由地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在建立合作社时切实贯彻自愿原则、降低税收等。季诺维也夫甚至像一个右翼分子一样宣称，为了正确贯彻与农民言归于好的政策，全党必须绝对一致。^③

四月底，召开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农民问题。政治局曾为大会准备了一个促进农业生产的意见书。布哈林在会议之前兴高采烈地就这一意见书作了一些解释，并号召农民：“发财吧！”这一直言不讳的谈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斯大林本人也批评了这一提法。但季诺维也夫同多数人一起企图使这种指责更加扩大。^④布哈林向代表会议提出了“解放”富民这

^①布哈林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61页。

^②参阅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真理报》。

^③参阅季诺维也夫：《无产阶级和农民：“面向农村”这一口号意味着什么？》，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真理报》。

^④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样一个大胆的建议，以便使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能够利用富农的力量。^① 斯大林后来又说：“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劳动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决议和那些对农民让步的办法，就是以这个思想为依据的。”^②

会议通过的具体决议没有走得这么远。也许是为了安定激烈反对富农的批评家的情绪，决议的重点则放在促进合作社和改善党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措施方面。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并没有因为会议上出现了批评而放弃对农民在实质上的让步。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让莫洛托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有关新政策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就莫洛托夫的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一方面强调了限制富农和促进合作社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则要求“坚决消除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和“切实消除一切阻碍农民经济（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农民阶层）发展和巩固的行政上的障碍，需要采取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措施，向那些在农村中放高利贷和对贫农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进行斗争”。^③ 如果去掉决议中的冗词赘言，决议的实际内容就是鼓励富裕的个体农民发展生产；有条件地容许土地自由出租和雇佣劳动；禁止农民村社重分土地；答应发放国家贷款，增加机器供应；改善农村贸易；继续贯彻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调整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收。在一段时期里，个体农民变成了政府的宠儿。^④

^①参阅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真理报》。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73页。

^③《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39页。

^④同上，第538—548页。

季诺维也夫受骗了，因为代表大会在优待农民方面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他失掉了攻击布哈林的最好机会。但是在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却在中央委员会中通过了他们的纲领，而季诺维也夫在那里却得不到支援，无法进行反抗。就这样，亲农民的政策正式被批准了。

季诺维也夫在组织上无力与斯大林和布哈林抗衡，因此，他企图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迂回包抄。他援引列宁的论述，企图间接地证明领导人应对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思想负责。一九二五年夏，他发表了一部冗长而又枯燥的书，题为《列宁主义》。从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企图通过向左转为自己奠定一个较好的进攻基础，但同时他又拿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死老虎来开刀。为了防止新经济政策发展得过了头，他为新经济政策下了新的定义。但他却忘记了自己过去对左派的攻击，从而接过了左派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使用过的提法：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战略退却”。^①他大量援引了列宁的话之后说：“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退了下来，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了一个特殊的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②

不久，季诺维也夫又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题为《时代的哲学》。^③这篇文章谈的是围绕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而展开的论战。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中东铁路中心图书馆工作。他所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使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退回到原来的社会制度；苏维埃国家已失去了革命的性质，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季诺维也夫对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这种见解大为愤怒，但他强调：苏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223—224页。

^②同上，第226页。

^③见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二十日《真理报》。

维埃政府确实有遭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险，党应对此保持警惕；谁对这种危险置之不理，谁若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进步，那么，他就同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小资产阶级变种一样危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在消灭阶级、建立新生活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上，革命政府的未来才能得以保证。

斯大林对此作出的反应可以说是他在三十年代完全否定平等的先声，他说：“平等的口号在目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恶意宣传。只要存在着阶级……就不会有任何的平等。”“应当谈的不是模糊不清的平等，而是阶级的消灭，是社会主义。”^①对右翼领导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这种批评，即批评领导集团推行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偏向，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偏离。它既不能容忍对他们的路线正确性的怀疑，也不能容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根据进行攻击。但季诺维也夫却开始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威胁，并在随后的两年里进一步推动联合反对派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进攻。但是，当时的组织力量的处境是，反对派的论证越有效，就越促使它失去批评的机会，这只能助长忧心忡忡的掌权者的狂热性。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季诺维也夫分子就富农问题不断攻击布哈林。领导集团以让步和施加压力两手来回答季诺维也夫的批评。他们一方面开始较多地强调农民的作用，强调党的任务就是组织贫农；但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指责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说它“害怕中农”^②，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提中农。此外，他们还指责季诺维也夫不谈与中农结成同盟，而只谈中农的“中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14页。

^②参阅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

立化”。①当反对派以统计数字说明富农在增加，并在牟求暴利时，斯大林则提出了新的数字（据称是假数字）并据此来反驳批评者。②

在一九二五年的十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分子直接攻击领导集团的农民政策，指责它忽视贫农，并向资本主义分子让步。斯大林指责反对派为了伤害中农企图破坏四月决议。季诺维也夫也指责党领导破坏四月决议，只不过是為了讨好富农。③尽管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农民的决议，但争论仍激烈地在幕后进行着。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还散发了一项关于农民问题的声明，着重批评布哈林，并提起布哈林的“发财吧！”这一错误口号。④

当时，由于条件还没有成熟，斯大林和布哈林采取了容忍与和解的态度，力求把争论限制在内部。在此情况下，加米涅夫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通过了，并答应增加低工资工人的收入，强调要帮助贫苦的农民。但是，人们同时也肯定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即低估贫苦农民的倾向和低估中农的倾向。⑤

在一九二五年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季诺维也夫的看法逐步接近了左翼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与非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妥协的一个短暂时期，是降临到社会主义天空的一种污染。季诺维也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激烈攻击了布哈林和

①参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莫斯科党委会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信。

②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索法雷里：《斯大林》，第399—402页。

③参阅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参阅托姆斯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参阅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党在贫农中的工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60—65页。

那些违背列宁教导而把新经济政策当作现实社会主义来加以颂扬的人。他在引用了大量的列宁语录之后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①加米涅夫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假如说一九二五年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歪曲党的路线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是掩饰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我们认为，危险就在于过分强调了新经济政策。……”^②为了使国有化工业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季诺维也夫建议首先应实行工资平等和利润分红。^③

党领导对攻击他们搞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感到不能忍受，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已变成与革命理想不相干的一种制度。斯大林详尽地论述了为什么不能把苏维埃工业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他指出，使用这种提法就是认为苏维埃国家已失去了无产阶级性质。^④

在农民政策上，党领导坚持适应性 with 正统性是一致的观点。斯大林面对反对派关于政府向富农让步的指责给予了最严厉的驳斥，他说：“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可以肯定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党的污蔑。我可以肯定说，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这样看问题，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⑤斯大林再次表示同意右翼提出的把重点放在农业上的经济计划。但他同时也抓住机会攻击反对派过分地依靠农业。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一个成员索柯里尼柯夫（财政人民委员）主要是由于对书记处的政治方法不满而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参阅托姆斯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51—253页。

⑤同上，第295页。

倒向了季诺维也夫，但他在经济政策上却站在极右翼一边，他认为国家在逐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时还要长期地依靠农业和外贸。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经济学家沙宁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攻击目标。斯大林冷嘲热讽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说他们的观点就是主张要俄国“道威斯化”。* 斯大林宣布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即使俄国成为能自力更生生产装备的工业国，以便“保证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品”。^① 但他没有谈及如何筹集必要的资金问题。

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加米涅夫满意地认为，决议作出了一些许诺：承认了富农问题的存在，提出了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措施。^② 但是多数派的意见仍然与布哈林的同农民进行长期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相一致的。大会宣称：对中农的任何轻视客观上就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③ 在领导集团和反对派看来，农民政策问题是与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密切相关的。

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

在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之间的激烈争论中，俄国社会主义的安全和它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成了俄国派别斗争的主要争论点。这场争论表明，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与俄国革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地位这一原则性问题紧密相关。除此之外，共产国际已成

*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3—294页。——译注。

①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3页。

②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加米涅夫在十四大上的发言。

③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80页。

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实力主要应归功于他对共产国际的影响，而斯大林已决心也要在那儿向他发起进攻。

共产国际内的最主要的非俄罗斯力量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德国党还处在因一九二三年遭受失败所产生的消沉气氛之中；该党于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左派领袖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取得了它的领导权。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季诺维也夫主张严明纪律和谨慎从事，并想调节（象他所说的）右派和极左派都对之持有保留意见的方针。^①然而，倔强的德国左派不仅激烈反对俄国的最高统治，而且也激烈反对俄国的国内政策。^②斯大林最初想通过结盟来赢得德国左派，从而共同反对季诺维也夫。可是，斯大林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德国人感到这样做将会更严重地威胁他们所期望的独立自主。马斯洛夫和费舍抵制了斯大林的接近企图。这时，斯大林就给德国党的其他左派领袖，首先是恩斯特·台尔曼以帮助和支持。^③

一九二五年初，斯大林看到已有机会越过季诺维也夫去抨击马斯洛夫—费舍领导集团。当时，核心的问题是德意志帝国的总统选举。马斯洛夫主张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应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而斯大林却鼓励他的人（即台尔曼）独自作为共产党人参加竞选。季诺维也夫支持马斯洛夫的计划，但他们两个人的路线没有被共产国际采纳。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管辖的领域里战胜了季诺维也夫，并取得了一项重要的胜利。^④在实施这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共产党内事变的形势》，德文版，见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胡姆贝尔特—德罗茨文献》。

②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392、394页。

③同上，第十六、十七章。

④同上，第420—425页。

种少见的策略时，左右被颠倒了：出于利益考虑，俄国的右翼领导支持了德国的左翼革命浪漫主义者。

通常，当季诺维也夫在组织上一旦遭到攻击，他就会在理论方面发起反攻。一九二四年，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稳定化”的新阶段，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这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人们从以上看法中还会提出更严重的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能存在下去吗？季诺维也夫出于革命的愿望作出了这样的预言：“整个世界形势……存在着革命的希望。”他警告人们当心“右的毛病”，过高地评价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并急迫地建议，将新的有左的倾向的领袖提拔到共产国际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①

可以设想，季诺维也夫之所以认为世界革命是重要的，是因为他害怕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有可能失去意义。他立即拟定了一个提纲：正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化在造就新的革命力量。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极为乐观地谈到了共产国际所取得的进展。②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共产国际是国际工人阶级创造的最大价值之一。”③

在这期间，斯大林发展了与其相对立的思想。一九二五年四月，他让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看来是确认了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见《国际新闻周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十四期，第448、453—455页。

②参阅季诺维也夫：《战争和革命时期》和《国际形势的估计》，见《国际新闻周刊》，一九二五年第五十五、八十七期；另见加米涅夫：《国际形势和苏联》，见《国际新闻周刊》，第八十六期。

③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不过仅是悄悄地)他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学说。^①会后,斯大林对国际问题(像以前对农民问题一样)作出了坚定的表示:“有人反对说,我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因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反击并且驳倒了这种说法……”“要不然,就用不着在十月夺取政权,用不着举行十月革命了。因为,如果……认为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和必要,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义了。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②这里,他显然已公开承认,国际革命的理论问题是多么令人烦恼啊!如果一个党员从原先的、未经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那么他就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些绝望的结论:几十年的斗争和在艰苦的国内战争中取得的所谓胜利似乎都是徒劳的;在没有国际革命援助的情况下,共产党尽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且不顾一切辛劳,但仍不可能在俄国实现它的理想。

早在一九一八年,左翼反对派就警告人们,当心走进这一死胡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一九二一年以来之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强行贯彻党的路线的原因。无疑,使许多党员心情不能平静的问题是十月革命是否是徒劳的,现今的制度是否确实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现在,斯大林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一

^①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提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3—46页。

正如后来官方历史学家所说,代表会议在理论上作出的这种表态是不明确的。它规定了许多条件——外国的无产者必须支持俄国的社会主义;在国际革命没有到来时,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仍然存在;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消极态度和不重视俄国依赖于世界革命,都是很危险的。据称,当政治局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他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看来他们也不可能将此事公布于众。(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98、99页。

事实表明，他觉得他在党内的地位已很牢固。斯大林不顾实际存在的矛盾，以反证法论证了党的政治逻辑，也就是说首先肯定现存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它说成是公认的原理，然后再改变理论前提，以便为他所断言的社会主义能在俄国继续存在提出根据。

在左翼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则不顾俄罗斯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不理睬苏维埃外交政策的保守倾向，于一九二五年日益公开反对莫斯科。^① 马斯洛夫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以更加严厉的措词抨击苏维埃领导。说在富农的压力下，俄国共产党人正在蜕化变质，而且他们已把共产国际变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是为革命而是为俄国利益服务的。^② 作为回应这一挑战，斯大林指责德国党的领袖犯下了种种过失，即从隐瞒直到制定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然后他通过政治局决议来迫使季诺维也夫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疏远他的德国追随者。^③ 就像在农民问题的争论中所发生的一样，在季诺维也夫尚未表态和进行辩护之前，他就被赶出了战场。接着，斯大林就将他的人安插进了德国党的领导班子，并加速推进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同年，他又派刚刚接替了季诺维也夫职务而担任了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前往德国，以便监督开除左派的决议的贯彻执行。^④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里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试图以发表听起来更左的理论来拯救他自己。他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开始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⑤ 他引证了许多列宁关于

①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42—444页。

②参阅弗朗茨·博肯奥，《共产国际》，一九三八年伦敦版，第267页。

③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44—450页。

④同上，第568页。

⑤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02页。

社会主义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语录作为他这一论断的依据。^①在引证方面，季诺维也夫远远胜过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只是零星地和断章取义地加以引证。虽然，斯大林不是以严格的科学论证为基点，但他要求全党保持信念。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②但这样一来，斯大林却暴露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这种实用主义现在正控制着运动；运动正在进行，而且必须进行下去；谁若阻止它并对它的方向提出疑问，那就必须封住他的嘴巴。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企图抢先驳斥关于反对派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念”的这种指责：

“我们的意见分歧仅在于，是否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至于在一国是否有可能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足够强大，经济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总的政治状况完全有利于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还应提到的是，我们有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将在国际范围内得以完成。”^③

季诺维也夫并不缺乏信念——他纯粹是吹毛求疵。使他感到不安的显然是人们对国际革命的作用以及对他的权力中心（共产国际）的作用所持的看法。因此，他觉得有必要起来反对斯大林所理解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认为：在俄国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必须记住季诺维也夫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02—307页。

^②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170页。

^③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的共产国际同样是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要求有国际性的行动。可以认为，季诺维也夫的这种咬文嚼字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说，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扮演国际革命者这个角色。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声称：“而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时，那就可以确信这将是资本主义死亡的开端，这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最可靠的征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一定会获得国际范围的胜利。”^①布哈林承担的任务是以有力的论据来捍卫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断言说，这种思想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异端邪说所作出的唯一的选择。按此方式，他把季诺维也夫这些批评新理论的人与以前的左翼反对派看作是同一类的人，他们的罪过就在于怀疑。他说：“为什么我们当时要揭露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当时揭露它，是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反对派的错误包含着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怀疑。”^②后来，斯大林把他有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进一步撰写成一篇新的论文，题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他承认，他今天的阐述与他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的阐述有所不同，事实上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一再重复的只是普遍承认的思想：俄国的社会主义取决于国际革命的发展。但他认为，这一变化仅是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这种说法（指以前的说法——作者注）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斯大林在这里给那种后来成为标准的论证方法提供了一个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1页。

^②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范例，这种论证方法是：决不承认学说的改变；谁继续主张旧的观点，谁就会被控告歪曲了始终有效的学说。季诺维也夫指出，斯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曾否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针对季诺维也夫的这一干扰，斯大林说他的旨意就在于“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这种态度“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的斗争说成是党的一项任务。^②

斯大林不断重复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名言应该反过来说才是比较正确的：行动是某些理论的指南，而不顾不断出现的变化，这些理论却始终被当作教条。斯大林主义对待理论的态度不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而且也是不灵活的。如果经验与理论产生了矛盾，斯大林分子不会说：“这种理论不完全正确，它必须在某些方面加以修正。”虽然领导也使理论符合实际，但它却断言说：新的说法就是原来的正确的理论，而老的说法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作的一种新的曲解。在宣布有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人们首次采用了这种使意识形态适应需要的做法，从而在苏联官方的思维方法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代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对理论的新见解必然带来这样的现象：政治路线的改变总是伴随着一场清洗运动，因为必须为过去的反列宁主义理论找到一个负责人。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摆脱理论上的窘境而采取行动；而同时又能充

^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61、64页。

^②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79页。

分利用正统观念，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承认现今的政策和制度。

四、党和书记处

如果说当权者迷信权威，那么无权者可以说是民主的最热情的崇拜者。当斯大林的不可抗拒的党的机关战胜了列宁格勒人时，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人专政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开始急迫地要求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实际上，在六年之前人们就从列宁的批评者口中听到类似的责备，例如：

“列宁主义的党必须建设成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党内最大限度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党。”^①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这种要求也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处于难堪的地位，因为那里实行的也是独裁统治。斯大林分子立即也指出了这种情况。对此，季诺维也夫分子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公开谴责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组织中实行铁一般的统治。^②乌格拉诺夫比较坦率地说：“是的，我们不否认，莫斯科组织内充满着和平和安宁的气氛，这靠的是党员群众的作用，靠的是团结在莫斯科委员会周围的莫斯科组织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紧密团结。”^③

季诺维也夫分子打算通过迅速增加党员数量来拯救党的民主和确保专政的无产阶级性质。季诺维也夫的一名追随者建议立即吸收无产者入党，而且要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都是“工作台旁的工人”为止。去年，书记处已从大量吸收工人入党事件中得到了许多好处；现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似乎也认

^①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77页。

^②参阅拉舍维奇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为，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运用这种办法能加强党内民主和促进他们的事业。很显然，当权者也有这种看法，但认为在一年内使工人党员人数上升到百分之九十的这一计划是空想，是孟什维主义的。①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重申了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的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②

至于谈到书记处在党内的垄断问题，斯大林就不那么坦率了。这就迫使反对派起来直接反对党领导的权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反对派的行动促使莫斯科组织提出了抗议，反对他们“向‘党机关’发起的毫无选择的进攻，而这种攻击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所说的话”。③ 由于反对派很可能被党的机关的磨盘所碾碎，列宁格勒的同志很快地变成了谋求党内真正民主的最坚定的先锋战士。他们的一名代言人在一篇文章中虽然承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但他写道：“我们不能用在党内工人民主基础上集体制定决议的方法来代替所有的独立思考，……每个布尔什维克必须有勇气向党代表大会说出全部实情，说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而必须说的一切。”④

事实上，一些布尔什维克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勇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要求给少数派以再次说明他们观点的权利。他喊道，“回到列宁的路线上去！”并继续说：“我们反对创造

① 参阅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第39页。

②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87页。

③ 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第39页。

④ 伊发罗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的撰文，《新反对派》，第12页。

一种‘领袖’理论，我们反对一位‘领袖’的提法，^①我们反对书记处把它的政治和组织职能结合起来凌驾于所有的政治组织之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党章，它规定我们最高机关的全权应交给政治局。在政治局内，我们党的所有政治领袖应是团结一致的，政治局同时使书记处成为一个技术执行机构，贯彻执行这个较大的领导集体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在这里，速记稿中加了一个注，称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骚乱”。因为这个实际问题终于被说出来了，所以出现骚动是不奇怪的。接着，季诺维也夫又说道：“我深信，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想到统一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作用。”（骚动：列宁格勒代表团鼓掌；为斯大林高呼和鼓掌。）加米涅夫在不断的喧哗声中最后说道：“我们反对一人统治的理论，我们反对创造一位‘领袖’。”^②

索柯里尼柯夫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双重职务表示不满。在绝不允许削弱党的领导的叫喊声中，他咬牙切齿地回答道：“如果斯大林同志要想像列宁一样享有同样多的信任，那么他就应当以实际行动来赢得这种信任。”^③为了团结反对派，集体领导是一种积极的办法；意见分歧应彻底解决，但不能压制不同政见；最高层领导人应作为一个集体来接替列宁的位置。^④斯大林的追随者没有反对这种设想，但他们表示深信，斯大林决不会有搞个人独裁的企图。^⑤他们（例如像鲁祖塔克——他后来在一九三八年被斯大林

^①俄语中领袖这个名词当时已作为所宣布的集体领导的相反的概念，具有骂人的意思；但后来它已成为斯大林的常用定语。

^②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97—598页。

^③索柯里尼柯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参阅季诺维也夫和巴达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⑤参阅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所清洗)同时还声称:“我们的道路就是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①

斯大林本人也表示赞成集体领导的思想,他说:“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然后他以攻为守,回忆了一九二三年在基斯洛沃得斯克的会谈和季诺维也夫关于改组中央书记处的计划。“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说不要李可夫,不要加里宁,不要托姆斯基,不要莫洛托夫,不要布哈林来领导党。……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是无法领导党的。”在《斯大林全集》较新的版本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斯大林在这期间已经表明,他也可以不要其他人。但是在当时,他还是竭力维护他的反对派的追随者。“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他问道。“……要布哈林同志的血……你们要布哈林的血吗?我们是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鼓掌)。”斯大林后来认为这句话也是有妨碍的(他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杀害了布哈林),而且不得不把最后这几行删掉。^②

人们从以下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政治思想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他说:“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他给集体领导这一概念划了一个框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③不久以后,他又解释说,最后必须迫使进行干扰的少数派恢复理

^① 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8、324、321页。

^③ 同上,第319、327页。

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对于领导的任何其他见解都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随便说它是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说是列宁主义。”^①

五、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崩溃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失败，从一开始起就已注定。当代表大会要求代表们确认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有六十五票反对，但有五百五十九票赞成。^②

给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以毁灭性的打击不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而是在列宁格勒组织内部进行的。代表大会尚未结束，就有一批中央机关的人（在党的书记莫洛托夫这样一个较高级领导人的率领下）出现在列宁格勒，为的是接受那里的权力。党代表大会向列宁格勒党组织寄去了一份通告，通告中要求列宁格勒党组织召回它派往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违反了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项决议自然是形式上的东西）。与此同时，列宁格勒省委会也遭到了指责，说它由于压制维堡地区组织的愿望（这个组织已经投票赞成斯大林分子）而损害了党内民主。^③季诺维也夫徒劳地反驳说，列宁格勒的不满表示实际上是由于书记处的代表搞阴谋而造成的，而这些阴谋已经部分地

^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53、54页。

^②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24页。

^③参阅《给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所有党员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0—711页。

得逞。①

莫洛托夫的人马（其中有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也夫、加里宁和“其他人”）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进驻列宁格勒。②当时，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已作好斗争的准备，并要召开一次市代表会议；而领导集团的代表将在会上作报告。中央代表的战略是绕过地方机关，直接对企业党组织施加压力和在企业党组织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越过了省委会直接批准了这种做法。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高级领导干部从这个厂跑到那个厂，“解释”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制造拥护中央领导的气氛。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列宁格勒的普通党员已经开始对那儿的领导不满。据报道，那里的领导集团已在实行特别严厉的官僚统治。此外，人们在反对顽固不化的季诺维也夫的干部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种有效的组织手段：把他们调往土耳其斯坦或者远东地区。一月底，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列宁格勒各级党组织中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随着在著名的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的党组织中取得胜利，斯大林分子圆满结束了他们发起的卓有成效的运动。起初，季诺维也夫分子对普提洛夫机器制造厂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在组织上作了特别的努力，鼓励该组织继续坚持下去。但是，该厂的党员大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同意了中央的路线，并抨击了省组织的“压制行为”；它要求召开代表会议重新选举列宁格勒省党委会。当运动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分子断言说，他们在列宁格勒的企业组织中已经获得所有选票的百分之九十六。他们从上到下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并一个接一个地将地区委员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撤换了反对派的干部，并随着在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取得的

①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73页。

胜利，又牢牢地掌握了省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会的统治权。一九二六年二月，专门召开的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胜利地结束了；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布哈林在会上解释了官方的路线，然后大会如同往常一样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但它这一次却表示无保留地赞成莫斯科的领导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且批判了迄今为止的列宁格勒领导人。至此，反对派被全部排挤出省党委会，季诺维也夫也失去了他几乎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就担任的职务——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①

在反对派被驱逐出他们唯一的组织权力中心的同时，党领导已把反对派的领袖排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几乎所有负责的国家机关，或者至少是降低了他们的职务。加米涅夫失去了劳动保护委员会（最高经济政治机构）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改任内外贸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但他不久又不得不把这一职务交给了米高扬，同时又失去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索柯里尼柯夫已从财政人民委员被降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②

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季诺维也夫还保持着他的地位，但加米涅夫已从政治局委员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直到目前为止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索柯里尼柯夫不得不完全退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已从七名增加到九名——自一九二二年以来首次扩大了政治局。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填补了三个空缺的位置。^③ 斯大林已开始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安置他的新兵。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中——除了亡故的伏龙芝外——还减少了三名到目前为止的委员，即：

^①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统治俄国？》，第160页。

^②同上，第161页，见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

^③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真理报》。

查鲁茨基、哈利东诺夫和库克林，他们都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两名委员（其中有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被降为候补委员。三十四名候补委员中有十一名——几乎是三分之一——没有再次当选，他们中间仅有三名或四名委员因明确表示同情季诺维也夫而落选，其他人也可能是因无能而没有当选。十六名新的或者是被提拔上来的党员进了中央委员会，而它现在就是斯大林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可靠基础；二十三名大多是不出名的人获得了候补委员的级别，其中有一些人后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加马尔尼克和埃先将军在一九三七年成了清洗运动的牺牲品；波斯蒂舍夫在一九三八年不得不死去之前已经晋升为党的书记，并同埃先将军一样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温什里希特同样于一九三八年销声匿迹了；罗米纳泽由于参加了反对派的一次失败了行动于一九三〇年垮了台；安·亚·日丹诺夫开始青云直上，直到他于一九四八年不明不白地死去为止一直是党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①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仅是在党领导分裂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似乎与普通党员中的真正的运动毫无关系；列宁格勒人之所以跟着季诺维也夫跑，是因为这位西北的总督在他那个地区里是无庸置疑的首脑。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斯大林日益增长的组织权力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时，他们变得惊慌失措；这种情况就是列宁格勒反对派失败的实际原因。当“三驾马车”中的两巨头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们才开始寻找有争议的问题，以便由此向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发起进攻。在以往的反对派运动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运动产生的主要动机，但现在，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来说，学说问题首先是玩弄政治手腕的一种工具。

^①参阅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以前的反对派运动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亲缘关系，托洛茨基分子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持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无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但他本人在会上并没有参加辩论。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觉得不宜介入，但这却有利于斯大林！^①当多数人认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就是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的继续时，他反驳说这仅是“论战的策略”。不过，他断言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寻求支持似乎应当接受左派提出的工业化思想，尽管他们在不久前曾与其余的党组织一起拒绝了这种思想。^②

从共产党整个发展过程看，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出现反映了列宁主义派或者说意识到政权重要性的谨慎派内部的分裂。在这方面，纯粹是个人的东西也起了作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争夺党的领袖地位所进行的较量。但是，更多地主张国际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更多地倾向于俄国事业的斯大林分子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思想分歧，这首先反映在“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者注）在国外流亡期间，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比斯大林广阔得多的国际远见，但这一点并没有增强他们的地位，相反，却削弱了他们地位。因为党的方针走向了自给自足的民族发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捍卫国际观点的一点尝试却使官僚们认为，季诺维也夫等是第二种‘托洛茨基分子’。”^③

最后，不同的禀性看来在分裂过程中也起了作用。教条地和

^①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致托洛茨基的信，转引自李可夫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的撰文。

^②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笔记，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75号。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8页。

十分拘泥于字面地运用党的学说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看到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漫不经心地对待列宁确定的路线和他给党的指示，感到十分惊骇。在季诺维也夫分子身上还存在着一些左派的思想倾向。这就是季诺维也夫集团和托洛茨基集团这两个集团在一九二六年结成联盟的天然基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期间结成这种联盟的，并且是左翼反对派最后一次出征的前奏。看来，左派过去在党的基层中拥有的信徒现在大部分已站到了季诺维也夫一边。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为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反对派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炮弹。

第十二章 联合反对派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是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伟大时代。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当时在数量上空前强大。从组织方面看，反对派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是最强盛的，它对党领导的威胁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但后来的发展趋势是，反对派一次又一次地被削弱，而且轻而易举地被遏制住了。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运动的特点是派别之间的裂痕扩大和意见分歧加剧。不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反对派分子都没有如此激烈地抨击当权者，都没有如此公开地指责共产党领导背叛了革命的理想。

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形成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联合反对派的出现是由于它们在政治上的情投意合。这两个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先后被党机关征服了的集团相互联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当然，在托洛茨基集团和季诺维也夫集团走向联合之前，需要有一个相互适应的时期。首先，由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役，这段痛苦的回忆需要逐步消除。尽管结成联盟将使他们的实力大大加强，从而足以能在苏联历史上进行一场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但他们从未打消内心不愿意结盟的念头。

一九二五年，当季诺维也夫集团在斯大林的党机关的打击下陷入困境时，托洛茨基分子却在一边袖手旁观。尽管季诺维也夫分子象左翼反对派一样在某些类似的事件上公开指责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但托洛茨基分子却仍然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死对头。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不久前还诽谤不断革命论的列宁格勒人今天却遭到了这般冷遇。季诺维也夫当时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当他准备参加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他就已认识到，最好的办法似乎是让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他建议：“中央委员会应吸收我们党内的所有同志，当年各种集团的一切力量参加工作。”^①布哈林就此指责说，季诺维也夫企图建立一个由各种派别组成的“非列宁主义集团”，以挽救他本身的政治地位。^②季诺维也夫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受失败后，他向他的同伙公开提出了与托洛茨基结盟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在结盟的基础上，反对派才能获得党内的多数，才能推翻斯大林。正是怀着这一目的，联合谈判开始了。^③

托洛茨基分子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企图接近的举动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拉狄克想与斯大林结成联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因为季诺维也夫在有关德国共产党问题的争论中曾是他的死敌；谢烈布利雅柯夫则对季诺维也夫的试探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而且在联盟最终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姆拉奇科夫斯基既不愿与这个集团又不愿与那个集团谈判，他敏锐地指出：“斯大林将会欺骗我们，而季诺维也夫将会逃跑。”^④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想利用托洛茨基分子对季诺维也夫的厌恶情绪。他甚

^①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48页。

^④参阅托洛茨基在《反对派战报》上的撰文，一九三七年巴黎版，第11—12页。

至宽大为怀地对待他们，直至一九二五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几乎始终没有向托洛茨基主义发起进攻。

这时，托洛茨基认为，否认马克斯·伊斯特曼摘要发表的列宁的《遗嘱》，这对他个人来说是妥当的。^①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上通常提到的所谓‘遗嘱’，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信（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非常重视这封信，……。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党的利益。”^②（甚至克鲁普斯卡娅也想通过季诺维也夫的谨慎战略来引诱人们否认列宁信的真实内容：“信中根本没有谈到对那些多年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共事的同志不信任的问题。”^③）

托洛茨基在被开除出党之后，对他的这一行动的必要性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那个时期，即反对派还期望在不向外公开争论的情况下通过内部手段来纠正党的路线时，我们大家（其中包括我本人）都反对马克斯·伊斯特曼为保护反对派所采取的行动。一九二五年秋，政治局的多数派迫使我发表了一项由他们共同起草的严厉谴责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声明。因为反对派的整个领导集团在那个时期都认为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是不适宜的，而只能作出一些让步，所以它自然不可能由于伊斯特曼个人的事（据说，他是由

^①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28—31页。

^②托洛茨基：《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见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68页。

^③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写给伦敦《星期日工人报》编者的信，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3页。

于自发的和考虑到自身危险而采取这一行动的)而宣战。因此,我是根据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决议在关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上签名的,这项声明也是政治局的多数派迫使我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表的;我要么在那现成的声明上签名,要么就得开始一场公开的斗争。

这里,没有必要去探讨反对派在一九二五年的整个政策是否正确。我现在仍认为,在那个时期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总之,我的有关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的声明只能理解为是我们当时以和解和讲和为目标所确定的路线的组成部分。”^①

尽管托洛茨基接受这种做法是出于安抚斯大林可能对他有利这一考虑,但党组织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分子施加压力。他在军队中的另外几个追随者(其中包括陆军司令员尼·伊·穆拉洛夫)也被撤了职。^②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乌格拉诺夫领导下的莫斯科党组织,辱骂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报刊的雇佣兵;据说,它们已开始用反犹主义作为攻击反对派领袖的武器。^③每当反对派分子集会时,他们几乎总要考虑到,这又会被告发为派别活动。^④持续不断的压力是那么大,以致他们除了接受季诺维也夫的结盟建议外不存在任何更好的选择。但是,在公开宣布成立联盟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相互辱骂的问题。在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曾以辱骂的方式相互展开过攻击。斯大林分子依靠这些材料并就新的联盟者相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给穆拉洛夫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5—126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军队问题的两句话》,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2990号。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给布哈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868号。

^④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给谢烈布利雅柯夫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873号。

互攻击的问题出版了一期特刊。^①斯大林称这种联盟是“彼此‘大赦’”，是一笔“肆无忌惮的毫无原则的交易”。^②

为了安抚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他说：“如果‘不断革命论’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而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③作为回报，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分子抨击党机关是有根据的，即使在他们还是机关的捍卫者的时期，这种抨击也是有根据的。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无疑，一九二三年反对派运动的核心问题就是警告人们当心偏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当心由于政权机关日益严重臃肿而带来的威胁。”接着，季诺维也夫把矛头转向中央委员会，他说：“是的，在偏离问题上，在机关官僚主义的压制问题上，托洛茨基反对你们是合理的。”据一份报告称，季诺维也夫还承认：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整个运动是“三驾马车”制造出来的他说：“，斗争是为了争夺权力。整个艺术就在于，将旧的意见分歧与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托洛茨基主义’也就制造出来了。”^④尽管他的盟友曾流露出动摇的情绪，托洛茨基这时却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联盟是正确的，他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二三年反对他们的斗争中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政纲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拒绝与他们结盟，

^①参阅齐平：《毫无原则性的集团——相叠的反对派集团领袖》。

^②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10页。

^③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④转引自托洛茨基：《给同志们的通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见《反对派战报》，一九三〇年二——三月第九期，第32页。

更有甚者，在列宁格勒还有数千名革命工人支持他们。”^①

新的联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正式登台：在中央全会上，它作为联合阵线出现了。它竭力要求加速工业的有计划发展。^②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当时十分乐观。托洛茨基说：

“在我们第一次重逢时，加米涅夫对我说，‘您只需要与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台上出现，党就会认为你们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相反，托洛茨基本人却似乎更现实一点，他说：“我们必须看得远些……为了迎接斗争，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斗争并作好长期的准备。”^③然而，他们面临的困难马上就出现了：联合反对派刚刚向党的领导表示要进行一场斗争，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叶夫多基莫夫就被开除出书记处和组织局。^④

就许多观点而言，一九二六年的联盟与其说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继续，不如说是列宁格勒反对派的继续。季诺维也夫运动提出了许多问题（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和一九二五年发展起来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但大部分是组织问题，是联合反对派的进攻精神问题。托洛茨基自一九二一年起就不再抨击领导了；一九二三年，当他的追随者毫无成效地捍卫他的事业时，他已表现得无能为力；自那以后，他只是消极地忍受领导强加于他的各种诽谤。随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出现，反对派获得了一种明显的新的特色：这些人都是列宁主义者，而且是历史上无可指责的老布尔什维克。因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是党机关内部公开分裂的首例，所以在它的队伍中有大量主要从事党的工作的职业干部。季诺维也夫分子是谨慎的、守纪律的列宁主义者，这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9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就经济形势问题对季诺维也夫的决议草案的修正》（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3号。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9页。

④参阅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真理报》。

些人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和权力斗争因素与左的布尔什维主义继承人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联盟。可是，这个联盟从未能完全和谐相处，更没有能防止其不幸的命运。

二、斗争过程

国外的一些事件促使新反对派开始采取公开的行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党的领导在其共产国际政策方面遭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一个是受到共产党人偏爱的皮尔苏茨基元帅出乎意外地在波兰建立起一个军事专政。另一个是对与英国工人集团在斗争方面进行合作所抱有的希望（为此目的，一九二五年建立了名为“英俄统一委员会”这一奇异的组织）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英国在一九二六年举行的总罢工的失败使俄国人大为失望，这对由俄国领导指使共产国际推行的“统一战线”来说也是一次政治上的沉重打击。

托洛茨基立即指出，他早就警告过不要信赖非共产党联盟，而且，他让反对派借着这次冲击立即向领导集团指导下的党的发展倾向发起总攻，指责党内民主制度变成了“机关的专政”。^①反对派要求解散“英俄统一委员会”，因为它似乎是与改良主义叛徒结成的联盟。^②领导集团拒绝承认英俄统一委员会的思想有某些错误，尽管它没有给俄国人带来多大好处；党领导并认为对这条路线提出的批评是“奥特措夫主义”，*从而断然拒绝。^③最后，英俄统一委员会里的英国伙伴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苏英断

^①参阅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②参阅《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号。

*奥特措夫——奸细，一九〇二年起在警察司国外侦探科供职，主要负责密告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的活动。一九一七年其奸细面目被揭露。——译注

^③参阅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

绝外交关系后，他们单方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解散了这个组织。

在托洛茨基集团和季诺维也夫集团联合起来之后，反对派已在着手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保持着密谋的形式。它们派出秘密使者，出版秘密刊物，举行秘密集会，并为秘密活动布岗放哨。^①这是自沙皇被推翻以来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第一次又在密谋气氛中进行活动。反对派举行的这种集会之一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森林中举行的，在这次集会上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讲了话。^②党领导不久就获悉了这次事件，并以此作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公开攻击反对派的理由。反对派的领袖们事先预料到了这场斗争，并为全会起草了一份有关他们与党领导意见分歧的内容丰富的声明。这项“十三人声明”就是反对派到目前为止向党领导发起的最猛烈的进攻，它基本上表达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这段时期内反对派在为什么而斗争。^③

为了给他们的事业提出一个合法的基础，反对派领袖援引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政治局决议。决议中说：党内派别的形成是一种重病的症状，即“官僚主义”的症状。他们声称：这种弊病的产生是由于工业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和政府轻视工人（其后果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自尊心减弱”）。医治这种疾病的方法之一就是普遍提高工资（这是领导反对的一项措施）；但是，国家的政治复苏首先取决于一项按计划大力发展工业建设的纲领，以调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因此，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让步的政策必须中止。他们说：“在贫农和中农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实际上在政治

^①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1—183页。

^②同上，第181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号。

上仍继续服从于中农，并通过中农而继续服从于富农。”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另一面就是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分子的强大；如果说人们还要保持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么就应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在思想和政治上使国家机关处于从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继续下去；今天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已传染了党，并使工人们大失所望。

十三人声明接着说道：在共产国际内，俄国的官僚主义谨慎路线不是去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变革（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它），而是阻碍着外国战士革命主动性的发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内部的民主及其独立性的决议已受到损害，在共产国际内部以及在共产国际事务中，压制批评的做法使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成为可能。最后，反对派再次提到了派别形成的问题，它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罪责归咎于党领导，党领导对左翼批评家的压制给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施加影响开了方便之门。只有在反对派的影响下，通过党的彻底转变，才能克服灾难。反对派声称，如果党领导停止对反对派采用镇压措施，那么，“真正的”统一才能有希望出现：“我们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与党内各种力量一起重新建立一种制度，以便在符合党的一切传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的情况下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党内民主才是可能的。”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出现了长时间的十分激烈的争论。一小批反对派分子企图以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据和充满激情的誓言来松动由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掌握的领导权。人们就主要的经济问题、工业化和农民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竭力维护官方的经济政策，并以所谓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9号。

“新的弹药”攻击反对派。^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出现在讲坛上；他由于争吵而疲乏过度，以至于虚脱，这个名声不好的契卡头目几小时后就死去了。

拉舍维奇事件（所谓的“非法的秘密会议”）被中央委员会谴责为与党的一切原则相抵触的行动。决议中说道：反对派受“有时以左的词句为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情绪”驱使，支持“在专家中进行反苏维埃的鼓动”；受到谴责的米雅斯尼柯夫集团和“工人真理派”的成员曾参加过反对派的宣传活动。中央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反对派的这一切瓦解活动证明：反对派决心从合法捍卫自己的观点转向建立一个同党对立的、从而准备分裂党的队伍的全国性非法组织……”^②全会结束后，布哈林在一次讲话中断言说，事实上，反对派正在计划建立一个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第二政党。他甚至声称：它的纲领“已在不相信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完全的取消主义”。^③

就像通常那样，党的机关开始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组织压力手段来对付反对派。不久，拉舍维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的评论说：使拉舍维奇感到高兴的是，他逃过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他失去了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而且被禁止在近两年内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参加在森林中秘密集会的所有其他人也得到了禁止担任领导职务的处罚。季诺维也夫被说成是整个阴谋活动的主要首领。因为官方“认为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领导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季诺维也

^①参阅祖瓦里纳，《斯大林》，第425页。

^②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1、186、182页。

^③布哈林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全会会议结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夫被开除出政治局。^① 他仅保住了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席位，而且只是在名义上，他还是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不得不把他最后一个重要国家职务(贸易人民委员)交给米高扬；作为列宁研究所所长，他只能继续撰写一些注释。^② 直到目前为止仍是候补委员的鲁祖塔克占据了季诺维也夫政治局委员的席位。五名新提拔上来的人获得了候补委员的职务，他们是：奥尔忠尼启泽、安德烈也夫、基洛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他们能够长期担任某一职务就证明他们都是可靠的机关工作人员。^③

在这一斗争阶段，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作出的不同处理是值得注意的。领导集团大概希望将这一对盟友分离。托洛茨基逃过了直接的镇压；李可夫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没有像季诺维也夫那样干了那么糟的事：“托洛茨基同志没有作过类似的分裂尝试。”^④ 然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声调是有不祥之兆的：“党的这种不可动摇的统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为此，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就必须更加团结，更加有纪律”，不这样，“党就不能完成十月革命所交给它的历史任务……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⑤

为了给反对派制造更多的困难并就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批评制造混乱，领导集团发表了一封由前反对派领袖梅德维捷夫于一九

①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4页。

②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统治俄国》，第164页。

③参阅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

④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全会会议结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86—187页。

二四年所写的信。在这封“巴库信件”中，梅德维捷夫对国家工业底子薄这种情况深表忧虑；他同时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国外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并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列宁关于为了获得重工业建设所必要的资金可向外国提供一些租界的思想。^①领导向梅德维捷夫和谢烈布利雅柯夫发起了猛攻，把他们说成是“我们党内真正的危险”；并谴责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们计划与“我们境内的一个极右集团，一个想向国际金融寡头政治投降的人所组成的集团”结成联盟。^②

一九二六年九月，联合反对派决定不能再长期忍受党机关的压力。在一份阐明其观点的、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的冗长报告中，托洛茨基抗议“斯大林派别的人享有特殊的影响，而这些人的专长就是将一些无原则的东西上升为一种学说”。^③反对派同时还决定直接向全体党员群众求援。波波夫在他所写的、当时仍是官方的党史中谈到：“九月底，分布在全国的反对派代表同时在党支部大会上宣布开展一场运动，其目的是迫使党接受就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了的基本政策问题进行讨论。”^④反对派在莫斯科航空仪器工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拉狄克、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加（托洛茨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出席了党支部召开的一次大会，并说明了他们的观点。^⑤党领导再次毫不犹豫地给反对派定

①参阅《我们党内真正的危险》，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真理报》。

②参阅社论：《坚持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④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93页。

⑤参阅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的决议，《有关反对派派别活动的问题》，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了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从事非法活动，破坏党的统一；它威胁着党的实际工作，并恫吓党要通过一场新的更加激烈的讨论来搞垮党本身。党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它将证明，反对派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为无产阶级所陌生的阶级服务的。”^①

公开挑战的策略证明失败了。反对派无疑已在党机关的权力面前屈服了，并于十月四日要求言和。^② 尽管如此，它还继续作出了向党的普通工作人员呼吁的尝试。十月七日，季诺维也夫和他的追随者在列宁格勒访问了一些工厂，想让人们进而倾听一下反对派的意见。在普梯洛夫工厂，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忍受当时特有的冷嘲热讽和各种纠缠；根据官方的报道，那里的党组织进行表决的结果是：一千三百七十五票反对反对派，二十五票拥护反对派。政治局谴责季诺维也夫的“分裂演说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党纪”。^③

十月十六日，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彻底放弃了公开的反抗，并签署了投降书。他们承认有罪，违反了党纪，并发誓将来不再从事派别活动。^④ 他们疏远了共产国际内的左倾分子和苏联国内的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并且最后还表示诚心希望实现完全的统一。^⑤ 领袖们的投降所造成的后果已在一般的反对派分子中间引起了震惊。^⑥ 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策略性

①社论：《我们的困难和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真理报》。

②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10页。

③政治局决议：《关于破坏统一》，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真理报》。

④参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见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真理报》。

⑤参阅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真理报》。

⑥参阅安东·谢烈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一九四〇年伦敦版，第5页。

的退却给反对派的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它丝毫没有促使领导集团变得稍微温和一些。如果说组织服从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那么，这种服从在领导集团看来是没有价值的。在斗争中，斯大林绝不会疏忽这一点：“由此可见，反对派联盟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培植消沉情绪和投降主义思想，它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斯大林从俄国各派的政治流亡者所发表的所谓的同情声明中就注意到了反对派还要进行危害活动的表示。^①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谴责反对派，说反对派并没有收回它关于“官僚蜕化”的论断，他还警告性地声称，争论可以突然结束——党将越来越强大，谁若再继续叫喊“热月化”，党就打倒谁。^②

打击开始了。在十月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对派领袖受到了处罚。托洛茨基像季诺维也夫在夏天一样被开除出政治局，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已经被降为候补委员的加米涅夫也丧失了这一职务。中央委员会声称：“……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下去。”^③布哈林接替了季诺维也夫，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其他一些空缺席位不可避免地被得到晋升的斯大林分子所填补。迄今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成了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担任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成了他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继承人；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斯·维·柯秀尔和作为乌克兰

^①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182页。

^②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真理报》。

^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一些中央委员的派别活动和违反党纪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决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92页。

总理的拉柯夫斯基的后继人弗·雅·邱巴尔填补了两个空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席位。①这一对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两个人是非俄罗斯人（柯秀尔是波兰籍，邱巴尔是乌克兰人）——后来成了政治局委员，而他们俩在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中也失踪了。

在一九二六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反对派与党领导之间的斗争局限在各种派别之间的理论方面，这特别反映在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十二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这两次会议上。在这两次争论中，反对派情绪激昂地明确表示：它的批评决不是向领导发起的派别进攻；而领导同样强有力地反驳说：尽管反对派已接近全面的崩溃，但它不会放弃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反对派没有很好地顶住这种压力。小集团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收回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工人反对派最后的两名领袖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梅德维捷夫无条件地投降了。他们承认，“巴库信件”曾是一个错误；他俩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时向他们提出的批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态度，并承诺今后不再进行派别活动：“我们……谴责有组织地发表同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意见的一切行为，我们向我们的那些已经开始建立非法的派别组织的同情者呼吁，并要求他们立即解散这些组织。”②亚·米·柯伦泰（她担任大使职务长达二十五年，因而直到她逝世都享有特殊的外交豁免权，从而逃过了清洗运动）也在同一时期主动离开了反对派。

对领导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列宁的遗孀宣布与反对派断绝关

①参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和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

②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真理报》。

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闭幕词中戏剧性地宣布了她的决定。^① 克鲁普斯卡娅在一项春天发表的声明中以温和的（但与党机关的路线相协调的）措词申述了她转向的理由：“反对派……在他们的批评过程中走得太远了。”她害怕反对派向领导发起的攻击可能会使群众产生这种思想：似乎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是他们的真正代表。^②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辩论的中心问题仍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斯大林有意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先发制人，使反对派无法提出批评。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还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理论逻辑。这件事对斯大林来说是一次伟大尝试，以证明他是否能将党的学说服从于他本身的强权政治动机，服从于他从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的观点。他表明，他有能力驳斥反对派提出的、认为他的理论直接歪曲列宁本意的这一类批评，从而封住了反对派的嘴巴。就这样，他为自己继续操纵共产主义理论打开了一条通道。从此以后，他可以根据需要从列宁著作中寻找一些能证明他日常政策是正确的理由，并要求所有想证明自己是正直的共产党员都无条件地跟着他转。

如果反对派坚持它的观点，那么只会被看作是搞蛊惑人心的宣传，其目的就是要建立非列宁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第二政党。这种倾向当然是决不能容忍的。李可夫声称：“反对派必须认识到，党不能允许任何人长时间地考验它的耐性。”^③ 前左派分子拉林现在也加入了诽谤反对派的大合唱，他的行动与领导当时准备采取的行动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要么不得不将

^① 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63—284页。

^② 参阅克鲁普斯卡娅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给真理报的信。

^③ 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真理报》。

反对派开除出党，并提交法庭处理；要么就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在马路上用机关枪来解决问题。”^①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反对派再次提出他们的申诉，但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观察家谢烈加报道说，“托洛茨基在争论中表现得过于谨慎，并玩弄外交手腕。旁听者无法去正确评价反对派和多数派之间造成裂痕的悲剧……。反对派……。不了解自己的弱点，它同样低估了它遭受失败的惨重性……。当由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多数派正企图将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时，反对派还在一味地谋求妥协和以和平方式实行联合。反对派奉行的谨慎政策即使没有加速它走向失败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有助于它的反抗力量的削弱。”^②

《真理报》谴责反对派重新违反原则，因为它把争论带进了共产国际；尽管季诺维也夫确认，其他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也曾在共产国际内进行过讨论，但这仍帮不了他什么忙。^③ 斯大林为这场斗争而欢呼：“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④ 按照他的说法，反对派就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它的纲领“是集合所有一切机会主义派别来组织反党斗争、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威信的纲领”。^⑤

经过一整冬天的间歇之后，风暴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再次突然大作。共产国际内的局势如同去年一样，这种气候又使俄国派别斗争活跃起来。这一次，中国是使领导感到难堪的事件的发生地点。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遭受的失败（这对俄国人来说也

①转引自祖瓦里纳：《斯大林》，第439页。

②谢烈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一九四〇年伦敦版，第7—8页。

③社论：《反对派的新结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真理报》。

④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9页。

⑤同上，第131页。

是一次令人痛心的失望)是整个派别斗争中激烈辩论的几个主题之一。自一九二三年以来,中国已在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而且是以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党(即国民党)之间结成紧密联盟的形式。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把它当作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民族革命的支柱来加以支持。然而,莫斯科领导对俄国向国民党(它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政府)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显然要比对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的特殊革命成果更为感兴趣。^①中国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结盟越来越反感,这促使俄国反对派起来批评领导坚持联盟的态度。领导谴责反对派有“极左倾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指责领导是“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并将中国的局势与“英俄委员会”作了比较。^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为了使自己成为中华民国的主人而胜利北上的蒋介石在上海向他当时的同盟者共产党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俄国反对派抓住了这一时机;季诺维也夫同样完成了一长篇论文,其中要求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决裂,并以胜利的喜悦心情加了一句评语:“最终结果将完全证实在本文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路线。”^③反对派分子要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对中国共产主义所遭受的挫折承担个人责任。托洛茨基曾写道:“中国革命的四月失败不

^①参阅本亚明·施瓦茨:《中国共产党和毛的崛起》,一九五一年剑桥版,第44、50、58—59页。

^②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联席全会的速记稿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886号;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的提纲》,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3006号。

^③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三二年纽约版,第381页。

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且是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失败。”^①反对领导奉行的政策的请愿书、传单和讲演稿像雹子般地落下。^②这一事变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但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所奉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丝毫的错误。^③他们首先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是，在本国压制人们对其失败的批评，而同时又顽固地坚持与国民党结为联盟。

五月九日，季诺维也夫在一次就狭义来说是非党会议的集会上批评了领导所奉行的中国政策，这样一来，他就给领导提供了转移问题的适当借口。领导很快就以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和《真理报》发出冲锋信号的形式作出了回答：季诺维也夫没有履行反对派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所承担的不从事派别活动的义务，而在这一危急的时刻（时局始终是危急的），党不能容忍“在国际革命出现困难时进行这样的投机”。^④

在这时候，反对派的领袖们撰写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指责党领导的意见书。这就是联合反对派的三份重要政治文件中的第二号文件，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提交给政治局的“八十四人宣言”。^⑤从这份文件内容看，与其说它是向政治局说明问题，倒不如说是向广大读者阐述他们的观点。按照文件的说法，似乎领导采取的各项行动都是错误的。它说：“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在最近一个时期人为地剥夺了正确检查和集体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而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处

^①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三二年纽约版，第381页。

^②参阅李可夫：《给莫斯科党组织作关于中央全会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

^③参阅康拉德·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剑桥版，第115—119页。

^④参阅社论：《在困难时进行投机》，见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

^⑤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941页。

理。”^①这一宣言的基本论点是，共产国际所遭受的一连串的失败（就像“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那样）都与俄国政府在内政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所犯的错误紧密相关。困难的形势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偏颇。反对派指责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局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提出了一个不真实的、小资产阶级的‘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突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使党难以发现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反对派认为，在农民政策、工业发展、工资政策，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势力的影响和颠覆活动。

反对派觉察到他们这样做的危险，并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书记处机关对反对派施加的压力在不断增强。按照反对派的观点，叫喊统一的目的仅是掩饰党领导的错误和阻止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批评：“把有争议的问题提交全党讨论的尝试都被说成是破坏党的统一。大家只能机械地接受由上面强加的错误路线。人们正在制造一种供观看的统一和一种表面上的幸福情绪。”反对派认为：“真正的列宁主义统一”应建立在党内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它在一附言中还提到，人们切断了季诺维也夫与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这证明“那些喜欢给思想斗争颁发行政命令的人缺乏政治勇气”。反对派最后还声称：“我们作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将按照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懂得的方式来履行我们的义务。”

七月，领导集团终于就中国革命的失败发表了一项声明，而

^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政治局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955号。

这种失败随着共产党人在这期间被清除出汉口“国民党左派”政府而变得更加惨重了。声明认为，造成这一灾难的罪过是，摆错了阶级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了。不过，声明中没有说明莫斯科为什么未能较早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因如此，这种领导也被清洗了。这时，俄国反对派已遭到极大的贬低。因此，斯大林和布哈林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反对派的路线也不算太丢脸。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并预言将出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①情况表明，领导的这番言论不完全与中国的实际局势有关，而更多地是针对俄国的派别斗争。一九二七年秋，当反对派已落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法网时，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才确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命令向它发起直接的进攻。后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遭到了一系列的流血的失败，特别是广东公社在十二月悲惨地被国民党的军队击垮。^②然而，这一次事件也没有促使俄国出现言论自由，没有使不容怀疑的党领导和共产国际处于困境。

“统一战线”政策以许多无可争辩的失败而告终。至于左的革命关门主义的政策是否比较有成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事实是，党的右翼领导应在政治上负责，它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领导集团巧妙地采取了一种立场，反而使反对派在批评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反对派的攻击愈具体，领导就愈加维护它的权力和威望，就愈加激烈地辱骂反对派，并准备采取一切办法来压制反对派的批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敏锐地指出，斯大林完全可以与资产阶级力量达成妥协，但他不能忍受反对派

^①参阅施瓦茨，《中国共产党和毛的崛起》，第七章；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62—163页。

^②同上。

站在共产党立场上提出的批评。^①很显然，失败比成功更促使党领导加紧确立书记处的独裁统治。因为失败必然引起对党领导的批评，而它比失败更可怕。为了防止自己遭受批评，党领导扼杀了当时尚保留下来的一些党内言论自由。

在中国危机问题上再次爆发的派别争论，由于在政治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忧虑，而变得更加激烈了。正当八十四人向党提交他们的宣言时，英苏关系又出现了危机。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国警察局在苏联驻伦敦商务代办处进行搜捕的过程中揭露了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英国保守派政府就此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俄国，反对派像党领导一样立即得出结论：与大英帝国的战争就在眼前了，但实际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进一步认真对待这场危机。^②八十四人宣言强调了战争的威胁，并建议通过放弃“统一战线”和呼吁国际无产阶级摆脱其“叛徒”领袖的控制，赶快支援苏联等办法来对付战争威胁。此外，宣言还提出，必须更换苏维埃政府中不明智的、有抵触情绪的领导。托洛茨基还抨击党领导，谴责他们企图压制他的批评。例如，他们甚至从党代会的正式记录中删去了他的意见。^③

领导以战争逼近为借口，进一步镇压反对派的运动。克鲁普斯卡娅的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正受到战争攻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应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整体，这是非常必要的。”^④至于领导指出战争的危險是否出于真诚，托洛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给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5号b。

^②阿尔弗雷德·格·迈尔在《苏联的政策和一九二七年的战争恐慌》一书中根本没有涉及到真正的危机。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4号。

^④转引自祖瓦里纳：《斯大林》，第451页。

茨基对此表示怀疑，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某些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却仅仅由于他们同情反对派而被撤换了。①对此，党的领导暗示说，在战争情况下反对派出于私利也许会采取失败主义态度。托洛茨基称，这是“把社会主义祖国与斯大林集团混为一谈”。②

六月，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被“调往”远东一事更是火上加油。当他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里火车站上火车时，一群反对派分子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举行了公开的示威游行，托洛茨基还发表了演说。③按照党的新的政治准则，这是一次反革命行动。据一份报道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提醒人们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得不到逮捕党内反对派分子的权利，它就不可能再维持秩序了。④据报道称，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小集团确实正在准备发起革命进攻；然而，大部分反对派分子只是主张把斗争尽可能地限于合法的范围之内。⑤

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争论最激烈的战场，这也是党直到目前为止在它队伍中所看到的一次最激烈的争论。决心消除有关他散布“失败主义”的谣传的托洛茨基声称：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反对派才有能力领导国家——人们可以在反对派和特米多尔式蜕化分子之间进行选择，但决不允许掩盖意见分歧，无视错误。托洛茨基从战争时期的法国找到了一个例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发表的演说，见《斯大林 伪造学派》，第132—133页。

②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

③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6页。

④参阅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2页。

⑤参阅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页。

子，当时，克列孟梭面对灾难仍继续领导反对派反对法国政府，直到他自己有机会被证明是一个英雄的领袖为止。^①“克列孟梭提纲”立刻激起了一片怒吼声。莫洛托夫指责反对派是“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叛乱分子”；^②斯大林说苏维埃政府受到“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的威胁。^③领导在要求把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同时，还要求反对派收回克列孟梭提纲的“半失败主义”理论和特米多尔式蜕化的“诬蔑”；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直很倔强，直到全会真的决定开除他们时为止；尔后，他们又表示愿意和解，并接受了指责。^④反对派被迫发表的声明说：“我们无条件地和无保留地赞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犯。”他们收回了关于党领导已受到特米多尔倾向的传染的说法，并声称他们只是建议党对国内存在的特米多尔分子展开“更系统”的斗争。据此，有可能导致党分裂的行动受到了谴责，而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也无条件地得到了承认。^⑤

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反对派的退却并没有使压力减轻。尽管反对派认了错，但全会的决议仍谴责了反对派的这些错误。^⑥显然，只有完全解散反对派组织才能使领导感到心满意足。全会结束后，李可夫说道：反对派已降到如此无关紧要的地位，他们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信。

②参阅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b。

③多伊奇尔：《斯大林》，第710页，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282页。

④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8、309页。

⑤参阅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声明。

⑥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9页。

已不能在党内要求更多的权利。按照李可夫的说法，党重视的是运动，而不是那些想走自己道路的个别领导人：“不管季诺维也夫去或留，不管李可夫去或留——共产党将永远存在。”^①

虽然反对派拥有的追随者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反对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却仍然使派别斗争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派别斗争造成了政治敌对情绪，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结束争论。一九二七年夏，反对派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是很清楚的。对领导来说，准备舆论和挑起适当的冲突，以便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并把它作为政治力量而消灭掉，已仅是时间问题。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已暗示了这种思想，不过他是把它作为驳斥反对派的诬蔑而谈论的。^②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有关开除反对派的言论公开出现了；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已从“疲劳战”转入了“歼灭战”。^③但是，党领导作出这种强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反对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反对派是无足轻重的。迫使领导采取这种激进主义态度，更多的是由于反对派提出的某些问题，以及当时出现的严重的政治困境和由此而引起的批评。在这期间，反对派揭露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使当时已在俄国开始发展的主要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更加明朗化了。

^①李可夫：《向莫斯科党组织所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真理报》。

^②参阅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真理报》。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65号；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51号。

三、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各派争论最多的是经济问题。①从每个农民拥有几匹马直到投资额的计算等各种经济问题，无一不成为导致指责和反指责的课题。每个人都变成了经济专家。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派别考虑。

联合反对派不仅参与了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的争论，而且也从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的立场出发介入了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务。当时，争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农民政策和所谓富农威胁的问题。反对派多次指出，领导集团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犯

①关于本章叙述的各种经济争论问题的主要参考资料为：

(一) 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针对李可夫关于经济形势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意见，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3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人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号a；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号b；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and 六日《真理报》；加米涅夫在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人的政纲”（发表时的题目为《俄国的真实情况与共产党的任务》），见托洛茨基：《俄国实情》，一九二八年纽约版；反对派针对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提出的另一个提纲，见伦敦《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七十期。

(二) 领导集团的观点：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央全会决议，《论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15—116页；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央全会情况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布哈林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所作关于中央全会情况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真理报》；李可夫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所作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真理报》；李可夫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向十五大提出的提纲草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13—332页；莫洛托夫向十五大提出的提纲草案，《关于农村工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32—353页。

了“富农偏向”的错误。为了削弱日益强大的富农经济势力，反对派提出了许多建议：取消出租土地和雇用工人的许可；增加富裕农民的农业税；完全免除贫苦农民的税收；通过贷款、依靠政治组织、给合作社和集体经济单位以优惠条件、甚至强迫有余粮的富农出借粮食等办法来支授贫苦农民。反对派的这些建议都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停滞不前将促使农民中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发展，强大的农民资本主义势力的存在将威胁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治统治。

党的领导地位通过一九二四年与托洛茨基的争论和一九二五年同季诺维也夫的争论得到了加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在经济上的稳固取决于农民是否满意。为了保障工农联盟，为了使农民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来出售，政府就必须允许农民得到一定的好处和一定的商业自由。正因为如此，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提出的“剥削”农民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否认对富农采取了优惠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争论涉及的是如何划分中农和富农的问题，但实质是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与价格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二五年以来双方的阵线已很分明。党领导竭力主张使工农业生产产品的价格趋向平衡，自一九二三年剪刀差危机出现后，人们在这方面就已采取了一些措施。领导集团认为，为保证市场上的食品供应有必要使价格进一步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调整；同时，这对工业也会产生刺激作用，促使工业降低成本和保证不断增长的需求。人们把这种政策的反对者称之为失败主义者，因为他们害怕由于农民的富裕而扩大购买力。反对派认为，保持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是积累工业资本和提高工人工资的最佳办法。

降低工业成本的建议，不合反对派的胃口。因为这似乎意味

着维持或降低工资水平，意味着解雇工人。反对派认为，这等于是剥削工业工人；因此他们坚持拒绝这种措施。他们还认为，实际工资已在降低，劳动条件在不断恶化。因此，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政府的无产阶级社会基础。右翼反驳说，工资已达到了能够允许的最高水准，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资的要求纯粹是“蛊惑人心的煽动”。一九二六年春，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时，这一系列争吵变得更加尖锐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工人收入超过了战前水平，并相对高于其他居民阶层。^①这一发展是否能驳倒反对派的观点，这一发展是否是领导集团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为了使反对派无话可说而有意制造的现象，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经济计划。虽然大家都一致赞成这个思想，但是在实行真正全面的经济计划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方面意见完全不一样。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三年初就主张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四十六人声明”把缺少计划说成是导致剪刀差的原因。在一九二四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告说：“假如我们继续原地踏步，对经济不实行计划管理，这就意味着无意识地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让步。”^②领导集团则认为，首先必须尽一切努力，使现有的经济制度恢复运转，否则，实行全面计划是毫无意义的。

在有关整个经济政策的争论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个国家应如何和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实行工业化？^③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迫切，是因为俄国的工业和过去一样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商

^①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第189页；拜柯夫：《苏联经济制度的发展》，一九四七年纽约版，第148—149页。

^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艾尔里巷：《苏联工业化争论》。

品奇缺”带来了农民只向市场提供少量粮食的危险，从而也使城市供应受到威胁。从需要来看，必须迅速提高生产，但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实际上处于灾难状况。自革命以来，几乎没有增添新设备，原有设备也没有得到保养和维修，或者更新。一九二六年以前，政府主要忙于使原有工业设备充分运转起来，但后来，工业生产达到了不作新的大量投资就无法提高的地步。由于俄国工业基础薄弱，加上“恢复时期”已接近结束，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紧张状况。

左翼反对派认为，为了迅速实行工业化，必须大量进行投资，特别要向重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同时应立即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充分利用新的积累源泉。为了要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必须克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于农业的这一根本性的不平衡。反对派还宣称，为保证军事安全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在经济上迅速赶上资本主义强国。为了消除工人国家的所谓最严重的威胁，应使社会主义工业比私人经济成分获得更快的发展。

反对派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宣称，工业投资的需求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年代里应实现较高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来取得迅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投资资金。这就是他早在一九二三年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公式而提出的方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展现出组织上的优越性之前，它需要一个起步资本。在俄国的落后条件下，它只能通过政策强制性剥削来筹集。他说：“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强制征收，是不可避免的，它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完全依靠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积累，这就意味着拿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作孤注一掷的赌博。农民这个居民中的大多数是筹集必要

资本的源泉（形式是为城市工人和出口提供粮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特别是通过政府的贸易垄断来实行。”^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工业资本积累方案就是“通过价格的税收”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起资本积累主要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征收周转税的机制来完成的）。

党领导竭力主张逐步前进，拒绝左翼加快工业化速度的要求。《真理报》的社论说：“反对派的超工业、‘超无产阶级’的纲领，即牺牲农民和反农民的工业化纲领，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幻想。……是一种掩饰当代反对派右翼实质的蛊惑人心的假面具。”^②

党领导特别强调，为了排除严重的干扰和政治紧张状态，必须保障经济平衡。经济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技术和效益方面；资金应投放到少数花费较少，并能很快建成的项目上去。一九二六年，斯大林以第聂伯罗斯特罗伊水电站工程为例，说建设这样一项奢侈的工程，尤如一个农民，他的犁须修理，但他却买了一台留声机。当时，右翼的观点是：市场可以刺激工业增长，假如消费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并筹集了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那么它就会间接地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实现。个体农民的富裕是促进工业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可以通过在竞争中取得的胜利赢得农民，无论如何不要促使农民拒绝交售，拒绝向市场提供产品。如果城市的经济不能满足农民的经济愿望，上述情况就可能会出现。

几乎没有一个人企图集中这两种纲领的优点，提出一条折衷的路线。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索柯里尼柯夫。他作为财政人民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第98—99页。

^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真理报》。

委员，在经济观点上、税收政策方面是一个右翼分子，但在政治改革和党内民主问题上他又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左翼一边。

四、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特米多尔式蜕化？

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经济政治困境对国际革命这一理论问题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援助，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就经济分析而言）注定要向农民蜕化或者向官僚主义蜕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确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单独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内不可能幸存下来。这种灰暗的结论激起了敌对的各派彼此相互指责。就这样，最一般和最抽象的共产主义理论问题成了派别斗争的主题。就某种意义来说，争论者们有些像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但他们的争论确实是意义深远的。在辩论过程中，官方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共产党的党风日益接近在斯大林专政下形成的固定形式。

有关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鼓励外国的革命者起来斗争，或者说，是否应取消世界革命。反对派和党领导都欢迎外援，也没有一方准备把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作孤注一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仅是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及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这些现象在学说上的反映。反对派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逻辑观点指责领导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采用了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的方法。党领导则试图使党的理论适应于他们的方法，以便说明这种方法是无可指摘的，是符合正统的。当反对派严厉批评党领导的这种做法时，它就以疯狂地压制批评来予以回答。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政策发展得愈公开，反对派提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就愈难以忍

受。”^①

因为反对派认为，没有外国革命者的援助，任何一个俄国政府都不可能坚持一条持久不变的社会主义方针，所以它对国际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十三人声明”说：

“我们必须消除一切顾虑，必须清除那个新论断的一切影响，那个新论断说社会主义建设在我们国家内的胜利与欧洲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并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派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会受到威胁，而它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它坚信国际革命必定胜利。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派深信社会主义能在我们国家内取得胜利，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能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②

反对派在如何对待外国革命者和“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反对派对英俄委员会和国民党的态度上看出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与非共产主义运动合作就意味着暂时不需要考虑外国共产党人的利益。而在担负着国家领导的党的领袖们看来，重要的是要在敌对的世界中奉行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在内外政策方面，他们希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实现符合他们目的的愿望；然而他们又坚持要任何行动都披上列宁主义正统的外衣。他们借“资本主义的稳定”来为自己辩护，而“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季诺维也夫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抨击过的一种设想，也是托洛茨基现在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理论托词”的一种设想。^③

^①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5号。

^②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5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因为世界革命显然没有发生，所以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而集中到国际上的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会给苏维埃制度带来什么后果这一问题上。他们就“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问题（这是一个早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五年就已经讨论过的老问题）展开了辩论。双方虽然一致认为俄国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领导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自然形式；反对派则再次称这种论断为革命的退倒，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本来的理想之间有着很大区别。或者像加米涅夫所说，“将政权和所有制转让给无产阶级国家”，这与“确实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着很大差别的。^①

反对派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越来越官僚化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明显缩小；由于出现了“集权式的”领导“倾向”，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已经警告过的危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了；人们必须排除这些危险，以便阻止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政党施加压力，并防止整个制度的“官僚主义蜕化”。这时又突然出现了所谓乌斯特里亚诺夫主义幽灵*，因为这个流亡在满洲里的教授又在继续给苏维埃领导制造事端。他预言，在共产党左派遭到完全预料到的失败之后，苏联已开始向资本主义倒退。加米涅夫如雷鸣般地抨击“各种右倾倾向，……它们（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从几十年持续稳定的思想出发）迫使党走上松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②

^①参阅加米涅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 乌斯特里亚诺夫曾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主任，后领导高尔察克政府的出版局。高尔察克匪帮被粉碎后，逃往哈尔滨。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6月因进行反苏活动被捕并被判刑。——译注

^②加米涅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一个名叫奥索夫斯基的名气不大的季诺维也分子在一篇竟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项欠缺考虑的建议：党应取消共产党人对政治合法性的垄断，并允许其他党作为非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出现，只有这样，党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压力和维护自己的统一，共产党集团只有经过纯洁化之后才有充分的自由去保护工人免受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①奥索夫斯基由于他的异端邪说而立即受到开除出党的惩罚，人们并试图把他的极端看法说成是整个反对派的想法。^②

就有关特米多尔式蜕化的说法，领导反驳说：反对派已经超过政治辩论的范围了，如果它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话。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大的政治罪。自喀琅施塔得叛乱以来，政府就不容许任何人轻意怀疑这一原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志的唯一体现。布哈林愤怒地说道：“要是说，我们的国家似乎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已经是半资产阶级的，这就是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蜕化变质，这就是说，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存在。”^③

反对派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怀疑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的政治性质。当然，反对派（除奥索夫斯基外）也迟迟没有彻底肯定这种想法。使领导受到指责的最严重问题是，它没有认识到特米多尔式蜕化的危险，而且不承认向非无产阶级分子作了让步。反对派明确地表示，它认为，国家还没有丧失其无产阶级性质，但它警告人们要当心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反对派领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发表的声明就是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并不怀疑，苏联的

^①参阅奥索夫斯基，《正在筹备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党》，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9—80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给政治局成员的声明》和《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的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98号。

^③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党和无产阶级必将在贯彻列宁主义路线和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克服这些危险。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领导给这些现象及其对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以更系统的反击。我们没有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已开始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①

尽管反对派强调了这种乐观的看法，但这并不足以保护反对派免受反击，它被认为是损害了党的纪律。党的领袖们决心压制任何认为政府有可能成为特米多尔式蜕化的保护工具的思想。斯大林解释说，认为在俄国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不可能把它建设成功的思想是非列宁主义的：“……这样的立场根本推翻国际主义的原则，它削弱我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从而阻碍其他国家革命的展开。”“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能消除对苏联未来的一切怀疑。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反对派面前摆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极左的幻想”，即期望通过国际革命来实现俄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或者是悲观失望地认为苏维埃国家将蜕化变质，并要求建立一个能代表工人的反对派政党。^②斯大林把这种二难推理说得这样清楚，以致他根本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推论，而只是要求人们相信他的制度。

由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争论。整个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语录战，双方都从列宁全集中摘录了一大堆引文，并以此作为炮弹来进行恶毒的攻击。在这场斗争中，反对派已经给它的对手以一些印象极为深刻

^①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5。

^②参阅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40—241、250页。

的打击，而领导集团却把自己取得的胜利仅归功于斯大林的卓越的律师才能。

在一九二六年的进程中，领导已公开表示对它的理论要点的逻辑根据深感忧虑。出自本身的动力，斯大林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详尽地阐述了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解释为党的主要理论问题。在他的演说过程中，他竭力否认恩格斯就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必要条件所写的公式。斯大林断言说，自列宁提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来，这个公式就不再适用了。因此，当季诺维也夫批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作出某种修正时，当托洛茨基否认这种发展不平衡是列宁的新发现时，斯大林大胆地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一切还有怀疑的人，他补充说道：“……恩格斯……会尽情地祝贺我们的革命说：‘让一切旧公式见鬼去吧，苏联胜利的革命万岁！’”^①

这时，反对派（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终于指出了斯大林论据中致命的错误。反对派指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这篇重要文章根本不是针对俄国说的。加米涅夫并以列宁在同一时期所说的其他名言作为论据，这些名言充分证明列宁对俄国只期望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②反对派揭露了斯大林伪造理论，而斯大林根本就没有想以合乎逻辑的论据来加以回答。速记稿提到会场上“有反对加米涅夫的喊声”，这说明党机关难以默认这种指责。

^①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20、265、271页。

^②参阅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列宁的《几点纲要》，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381页。

托洛茨基像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以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所发挥的理论：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先进国家的合作。^①斯大林承认，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件新事物：“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中，第一次正式表述了”这件新事物；但针对有的批评他对这一点作了自我修正，他解释说：“我绝不认为自己是沒有过错的。”^②托洛茨基回击说，看来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当他否认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接着他问道：当列宁实际上已发展了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又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很显然，斯大林也曾具有这种自革命开始以来就始终为党所共有的国际主义观点，而他又从这些观点中引证出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③

斯大林特别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说他（斯大林）认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这篇文章并不很重要。他在反驳发言者时说：这篇文章包含这种“……原理，即规定我国革命和我国建设的整个路线的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原理”。至少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就等于承认斯大林的理论是以列宁这句语录为根据的。针对季诺维也夫认为这篇文章和俄国没有什么关系的说法，斯大林回答道：“这真是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这简直像是对列宁同志的公开诽谤……伪造

①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真理报》。

②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35、313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85号。

列宁学说……”^①托洛茨基引用了列宁的一段完全明确的话：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于是，斯大林即席谈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之间在理论上的新区别，并谴责托洛茨基说：他把这两点混淆起来了。^②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斯大林是如何粗暴地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的；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是不会认错的，而且很会抓住一些受到怀疑的论点不放，从而使自己摆脱困境。他获得的成功丝毫不能证明他的辩论口才；对他有利的是，在他作了总结发言之后再也没有人有回答他的机会；此外，他控制着党的舆论工具。

反对派论证说——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是没有异议的——由于国家落后，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完全实现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能够扩展到整个世界，那末，这种成功才是可能的；在这期间，俄国社会主义的生存条件会越来越不可靠，因为按照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俄国的社会主义只有靠上述情况同时发生才能实现；如果共产党政府继续掌握政权的话，那么它也许会越来越地丧失其“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米多尔式蜕化也可能在不公开破坏政治连贯性的情况下发生，苏维埃政府在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下只能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来保持政权。反对派从政府奉行的“右的”谨慎政策和镇压“无产阶级”反对派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变化的证据。反对派最后的断言显然是正确的。领

^①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84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134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另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94页。

导集团对反对派的控告感到明显的害怕，它竭力想封住批评家们的嘴巴，并越来越坚定地依靠操纵意识形态和控制各种思想的途径。这场冲突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权之间、革命目标和革命工具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旧分歧。不久，这些问题都突然得到了解决——权力原则保障了胜利。

五、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就是这样：每当出现一个反对派集团时，就必然要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即：反对派是否有生存的权利，它应怎样发表自己的意见，应如何进行斗争。在“民主集中制”这种双重含义的公式中，领导总是强调“集中”，而反对派则强调“民主”，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捍卫民主权利时，人们往往不单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虑。民主感和对过严的纪律性感到厌恶往往是参加反对派集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一九二三年，情况更是如此。另外，左派遭受的压制使它意识到民主原则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们的派别利益。托洛茨基以不太明确的、但是十分自信（这种自信使自称为列宁的追随者感到吃惊）的口吻宣称：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在革命的国家中是必要的；

“统治阶级必须有能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整顿它的队伍，但又使它不致出现内部动乱和灾难性的力量分裂。在一个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允许两个政党的存在，不允许一个统一党发生派别分裂。但是，这一专政也要求……有可能……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对所有专政机关实行监督，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指导它们，

检查它们的行动，任免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①

反对派将它的政治理想概括为一句口号，即“工人民主”；它主要是以一九二〇年九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政治局决议这两个文件为依据的。这两个声明都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和实现党内民主的必要性，但是在党内制度越来越僵化之后，这两个声明变成了僵死的字面上的东西。当反对派承认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的统一原则（和禁止派别活动的原则）从而使自身的存在产生问题时，反对派还坚持：一个统一的党仍需要有自由的讨论和容忍有理由的意见分歧。反对派梦想回到所谓列宁领导下的美好时代，当时，党内充满着同志般的统一气氛；它一再谈到，派别的形成是机关压制正常批评的后果。针对人们指责他们搞派别活动的问题，反对派反驳说，领导本身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结党营私的派别。^②

由于反对派日益以特米多尔式蜕化这种隐喻来抗议领导损害党内民主基本原则的行为，党内民主问题就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问题交织在一起了。正如反对派所说，他们遭受的压制是领导集团的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最好见证。托洛茨基说道：“党的官僚化是已经打破或将要打破社会平衡而使无产阶级处于劣势的表现。”^③按照“八十四人宣言”的

^①托洛茨基：《克列孟梭提纲和党内制度》（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四年七月《新国际》，第25页。

^②“十三人声明”曾谈到了“七人帮派”，它由除了托洛茨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以外的政治局委员组成；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它似乎在正常的政治局会议之前就先作出了有关党的政策的秘密决议。这种说法似乎应作一些修正，因为其中的两个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已经同意加入反对派的抗议行动。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的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36号。

^③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观点，迫害反对派就是便于国家听凭特米多尔反动力量摆布；

“在这种情况下，打击反对派只不过是试图在虚伪的统一誓言的幌子下……破坏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左翼的威信并毁灭它而已。”^①

在反对派看来，党内官僚主义制度的一个新征兆就是损害集体领导的理想，实行咄咄逼人的一人专政。当加米涅夫公开警告党代表大会当心斯大林个人政权的危险时，联合反对派在这一点上也采取了象列宁格勒反对派在一九二五年所采取的类似方针。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声称说：“官僚主义制度的继续发展必然导致个人统治。”^②在一九二七年年中，斯大林及其一派被指责为：“完全违法地无理要求党的最高权利。”^③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托洛茨基说道：“斯大林个人的不幸（它已越来越成为党的不幸）就是斯大林的智力才能和由党机关集中在他手中的权力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④对列宁在《遗嘱》中指出的当心斯大林的粗暴的警告，他又补充说道：光撤销一个人的职务并不能触动作为独立力量的党的机关，更无损于“官僚派别的集中制”的统治。^⑤

党的领导继续严厉谴责反对派及其言论。李可夫说：反对派已经“违反了一系列建设列宁主义的党的基本原则”。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就一直流行的论点来看，反对派只能是非无产阶级力量的代表。斯大林说道：它的这种煽动的目的就是“助长劳动者

①参阅《八十四人宣言》，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941号。

②托洛茨基：《给政治局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986号。

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就莫格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叛乱活动的演说所发表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993号b。

④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档案》，T字3904号。

⑤参阅托洛茨基：《提交给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文献》，T字3006号，第23—24页。

的落后阶层中的不满情绪，造成反党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满情绪”。①一九二六年夏，李可夫声称：必须扫除反对派，以便使党内出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坚定不移的铁的统一”。②

按共产党的观点，“左派”这一称号带有积极的色彩，因此，反对派也不能享用这一称号。斯大林说：反对派“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它的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路线，是以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倾路线”。③布哈林说，必须克服反对派的右倾失败主义，并实现党的统一，从而使反对派不能魔鬼似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党而合法存在，不能使它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汇集渠道。④这种策略是行之有效的。一个与会者写道：“由于所有这些被搅乱了的问题，人们怎能弄清情况呢？……当然，我们也十分犹豫和怀疑；但对党的忠诚感在我们作出各项决定时却始终起着决定作用。”⑤就领导的观点来说，它所提出的控告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流亡中的孟什维克就认为反对派是一种虽然不是真正民主的但是对反共产主义事业有益的力量。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写道：“‘反对派’不仅要求在劳动群众中而且在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中阐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些思想和观点经过精心培植能给社会民主党

①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316页。

②参阅李可夫：《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③参阅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01页；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的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05页。

④参阅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⑤巴尔米纳：《一个幸存者》，第216、217页。

人的事业带来丰硕的成果。”^①

具有同样预见的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解释说：党的任务是，“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向群众说明反对派联盟原则观点的错误，揭露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内容，不管这些观点是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的。”“力使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②所以，反对派的错误就成了政治罪过。

党领导用以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在一九二六年已准备好了。后来的变化仅是逐渐缩小持不同政见者享有的自由活动余地，直至完全消除。反对派的抗议雄辩地证明了党机关的权力之大，而这种权力在斗争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堡垒土崩瓦解之后，等级森严的书记制度开始不受任何阻碍地运转了。

斯大林认真地选拔了一批人，并让他们进了政治局。一九二五年，即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已经把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塞进了政治局；在排挤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不久，他又使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成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一律都是他的人。总书记终于把党的最高执行机关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某些在公众舆论中仍受到重视，从而不得不谨慎对待的著名反对派分子，则通过调往驻外机构的办法被挤出了舞台。克列斯廷斯基直至一九二七年还在柏林，他在被排挤出书记处之后于一九二一年就被派到这里。拉柯夫斯基（他已于一九二三年被免除作

^① 费·伊·唐恩：《内部斗争的新阶段》，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6页。

^②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05页。

为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曾在伦敦担任过外交职务,而现在又任驻法国大使;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柯秀尔作为商务代表也被派到了那里。加米涅夫有很长一段时间任驻意大利大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商务代表。^①无数较小的人物都遭到了类似的处理。

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的任务首先是,对已经违反组织派别禁令的违法者采取纪律措施。在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样主要是由机关人员组成的,它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反对派愤怒地控告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它支持由其他官僚机构推行的高压政策,承担了它们的工作,甚至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并压制党内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批评的呼声、对党的命运深表忧虑的任何情感和对某些党的领袖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②最为常见的措施就是开除出党;不过,在争论于一九二七年秋达到它的顶峰之前,这项措施还是很少采用的。但是,人们发展了其他的有效方法,其中包括后来运用自如的火力侦察的审讯办法。^③

最为方便的“说服”方法是经济和行政方法。每个党内同志都有义务到党组织认为适合的地方去工作。由于书记处现在控制了这种任命权力,它就能随便地利用这种任命权力来进行打击报复。反对派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工作调动已成为“党领导惯用的一种方法”;并指责说:完全出于政治原因的工作调动是违背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的。^④不管反对派如何指责,固执已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 T字3075号。

^②《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档案》, T字8802号。

^③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84页。

^④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1页。

见的反对派分子得到的却是最偏僻地区（例如土耳其斯坦或北部高原地带）的最索然无味的工作。对于不愿意失业的人来说，只有走这一条路。

一九二三年以来，党领导已能控制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舆论工具（列宁格勒的情况除外），并能预先确定选举结果（有时可能出现一点不同意见，有时根本未出现任何意见分歧）。党领导并不断加紧努力，阻止反对派向党内知识分子集团以外的广大阶层宣传他们的观点。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的政纲抱怨说，密探被派去参加党的会议，“并不是为了参加它的工作，而是为了观察同志们的态度和向中央委员会告发‘不受欢迎的人’”。^①反对派的发言往往不会被写进党机关（例如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正式记录。^②一九二七年，反对派的发言人在党的会议上确实已被人们噤得讲不下去。党的书记们总是用开除出党这一惩罚来威胁所有（在公开表态时）赞成反对派决议的人。^③一些党的书记——特别是莫斯科的柳亭——组成了冲锋队，它们阻止反对派公开活动，甚至强行解散反对派的追随者私自组织的集会。尽管反对派理直气壮地对这些“法西斯方法”，“黑色百人团”^{*}提出抗议，但都是徒劳的。^④

最后，当曲折迂回的斗争达至高潮时，党领导还利用了反犹

①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提交政治局的《十五人政纲》。

②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74号。

③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0号。

*于一九〇五年由警察、宪兵和一些保皇党团体建立的反动组织。对反派在这里把由一些党的书记所组成的冲锋队比作是“黑色百人团”。——译注

④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太主义来迫害反对派。这种策略是被官方否认的，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苏联领导在形式上也是拒绝这种策略的，因为共产党的传统反对这种民族偏见。但是，有许多传说和一些证据，说明党的各级地方领导允许把反犹太主义当作反对反对派的武器。反对派所有的三名主要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在有些地区，党团的整个争论都被看作是反犹太人的斗争。①反对派说党领导“对日益增强的反犹太主义始终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②托洛茨基保存了一本显然是真实可靠的省党委会会议记录副本，上述倾向在这本副本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了。一位演说者说道：“长期以来，托洛茨基在推行一种分裂政策。托洛茨基不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民族性已经表明，他必然支持投机分子。”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议记录写道：“他们的错误在于超越了俄罗斯的思想，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会追随这些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人。”③如托洛茨基所述，斯大林关于这件事的评论实际上是已向他的追随者暗示，他们可以利用反犹太主义，斯大林说：“我们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分子。”④

六、党的统一的心理學

在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党领导的态度最令人瞩目的

①参阅默尔·芬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新摩捷斯克》，一九五八年剑桥版，第48页。

②托洛茨基笔记：《他们是怎样反对反对派的》（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档案》，T字1001号。

③联共（布）舒孔德—契廷斯基区候选人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托洛茨基档案》，T字1006号。

④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9—400页。

是，它歇斯底里地为共产党的统一而担忧。党的统一被看作是头等重要的事；对共产党员来说，损害党的统一就是死罪。谁要想永远受到领导的宠爱，就必须以积极态度承认绝对统一的思想。党只允许有一种思想和一种意志，这一原则比任何政治问题都更为重要。把统一看作是绝对的东西，看作是不容讨论的毋庸置疑的范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党要么完全统一起来，要么完全分裂成派别。这也正符合布尔什维克要求每个人应持的要么是黑、要么是白的绝对态度（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要么对它绝对忠诚，要么完全背叛它）。

为了使本身及其追随者确信一切反对派似乎都是魔鬼的化身，党的领袖们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他们论证说，政治分裂反映了阶级分裂：反对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意志的反对派最终只能成为资产阶级。要是问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能真正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这就是极为卑劣的政治行动，而参加这种行动的人就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布哈林在论述这种怀疑时说：“这种思想的发展或早或迟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导致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产生——它不可能导致别的什么。”^①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就已经暗示，他认为一个统一的党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意志。他显然十分乐于用生物学进行比喻，因为他后来再次使用了这种比喻，以便为开除反对派而辩护：“我们党是一个活的机体。和其他任何机体一样，党内也在新陈代谢：旧的、腐朽着的东西衰亡下去，新的、成长着的东西生长和发展起来。”^②另外，党的

^①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20页。

领袖们还更喜欢军事比喻。列宁常常使用军事措词去歌颂军事道德，即纪律性。党的创始人的这种嗜好现在一再受到颂扬。李可夫在一九二六年说道：“列宁赋予党纪问题以那么重大的意义，并那么毫无保留地谴责削弱党纪的行动”，以致于任何强制措施几乎都是正当的。^①

纪律和统一不仅被党领导作为准则，而且是力量和智慧的政治源泉。党领导极其愿意以开除的办法来惩罚破坏统一的反对派，即使导致完全的分裂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逻辑上的矛盾是有目共睹的。这种以感情为基础的顽固思想只能使党的领袖们越来越害怕批评，越来越对批评怒不可遏；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了反对派的挑战。因此，必然的结论是：这种统一必须以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为前提。莫斯科党委会在一九二六年秋作出的决议最能说明问题：“对我们党来说，不仅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组织统一而且思想统一都是必不可少的。组织统一只有建立在牢固的思想统一基础之上，那它才是不可动摇的。”^②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夏说道：对反对派保持警惕和思想统一是必要的，以便使党员时刻确信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③

正象这种提法所表明的那样，理智完全服从于对党的形而上学的信仰。这种非理性主义不止一次地得到明确的宣扬。斯大林常常强调说，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对苏维埃政府的胜利前进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这种信心只有靠信仰才能获得。谁对此提出批

^①参阅李可夫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给莫斯科党组织作的报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真理报》。

^②莫斯科省党委会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的决议，《关于党内状况》，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③参阅布哈林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评并警告当心会出现许多困难，谁就要受到加倍的处罚——他就是一个叛徒；谁若使信仰者丧失信心，那么他就是在破坏这场运动的未来。斯大林警告说：“谁企图缩小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谁就是企图打消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胜利的希望。”^①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前途问题长期以来在共产党世界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过去，把怀疑的观点只看作是一种错误，但从现在起，则是一种背叛。

因为党的领袖们认为证明自己在观点上正确是必要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党的理论准则和所谓由此而得出的日常实际政策全都说成是永恒的真理。通过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思维方式而显示出来的“思想的纯洁性”，已成为是否忠诚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

《真理报》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写道：“党知道应如何保持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党不能容忍反对派破坏列宁主义的统一。”^②批评或修正官方对当前形势的评价的任何企图都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向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发起的进攻。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必须再前进一步，使反对派联盟放弃它的原则错误，这样来捍卫党和列宁主义不受攻击，不被修正。”^③“修正”这个词当然会使人回想起第二国际内激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渐进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这个词并有助于激发受到伤害的正统感。例如，当季诺维也夫企图以前辈的引文来批评“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有人就批评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相反，被季

^①参阅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48、249页。

^②社论：《为列宁主义统一和无产阶级纪律而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③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263页。

诺维也夫抨击为党的领袖们的修正主义表现却被辩解为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①

党的领袖们为详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和范畴、为忠于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花费了难以相信的气力。一个贫穷的人什么时候起不再是贫农，而是一个中农，他从什么时候起又不再是中农，而变成了一个富农呢？如何能判断哪种倾向比较严重，是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还是过高地估计富农危险的倾向？党的领袖们不顾实际世界的复杂性，坚持要由他们来安排一切，解释一切。如果有人打乱了他们的安排或者没有按正确的方式行事，那他就要被列入偏离者的队伍。

在努力忠于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方面，党的领袖们表露出了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通常与他们表面上拥护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实践中，他们把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口号和公式当作实际的东西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变成了最高的现实。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年中，当托洛茨基不得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为他的派别活动答辩时，奥尔忠尼启泽指责他“悲观主义”。托洛茨基回答说：“您的思想浸透了宿命论，您区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是与形势和政策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您的思想方法，一个人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悲观主义者’。”②党的领袖们走上了持有这样一种谬论的歧途，认为经典著作中的每句话都能为现实所印证。凡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一致的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都被看作是有缺陷的、是暂时的混合形式和过渡形式。例如，人们认为中农范畴和富农

①参阅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78、86页。

②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六月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125—129页。

范畴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质的鸿沟：一个不幸农民的命运仅取决于他被划分为哪一个等级。

一句话，党内的官方思想是经院哲学式的。在所谓的理论指导实践方面，首先不是通过重新调查和独立思考而是靠查阅圣书来解决日常问题和社会变革提出来的问题。在反对派被排除以后的年代里，早就开始形成的这种教条风俗更为盛行了。任何行动都必须找出理论根据，对著作的任何新解释都必须考虑有关的信仰标准。

共产党内热衷于统一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反对派也主张统一。虽然反对派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所有关于维护坚如磐石的团结和铁的纪律的各项规定，但它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一九二一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一直拥护党的统一设想，也就是这种设想排斥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在党内已具有独自观点的集团的存在。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一九二六年宣布暂时投降时说道：

“我们坚决摒弃‘派别和小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承认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同列宁主义的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切实贯彻党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①反对派也主张教义的纯洁性，当然，在谁应对布尔什维信仰的毁灭负责这个问题上，它有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说道：“党的思想统一的有效保证在于回到列宁主义政治路线和列宁主义党纲上来。”^②

反对派憎恶这种思想，即把他们说成是要成为一个与共产党组织对立的第二政党。每当党领导断言说，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必

^①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联合发表的声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真理报》。

^②托洛茨基：《对开除奥索夫斯基的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997号。

然导致这样一种分裂，那么，他们总是要表白自己绝不愿如此。一九二七年夏，当反对派的领袖们受到这种压力时，他们声称：“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及其中央的一切决议。”他们又愤怒地表示：“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但这些派别因素是由于在党内现行制度下出现了这种状况才形成的，即：在全国的报纸上对我们的观点作了完全不正确的解释，为此我们不得不争取让全党知道我们真正的观点。”①

在这段时期里，反对派除偶尔违背其保持沉默的诺言和坚持他们的批评态度外，也作了许多努力以表明自己忠于党的统一原则，反对派分子从未认为，他们作为反对派而存在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对党的领袖们来说，反对派的进攻却成了证实自己正确和防止自己的追随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手段。反对派是使党永远处于恐慌不安的魔鬼的化身，是冷嘲热讽的靶子，困难的替罪羊，是实行组织统治方法（领导就是以此掌管政权的）的辩护理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派不得不充当所有这一切角色。它变成了一个“铁砧”，党领导就是利用它锤炼控制机关、学说和被称为党的路线的思想体系。

人们对反对派持敌意态度的一个特殊原因来源于这样一种牢牢固扎了根的说法：反对派与党内多数派的领袖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切实际的说大话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称反对派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脱离革命、脱离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集团”。②为抗议领导的整个方针，托洛茨基写道：“这种偏向掩盖了‘流亡者’和扎根在‘国土’上的人之间

①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声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四十八期，第1078页。

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88页。

存在的截然不同的反应。”^① 莫洛托夫明目张胆地影射主要的反对派分子在革命之前就是流亡分子：“写文章、作演说还不能完全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一贯坚强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在实际斗争的烈火中、在火热的革命工作中经受锻炼。”^②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曾在警察鼻子底下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们与那些在瑞士咖啡馆就哲学问题展开辩论的流亡政论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旧有的对立。

然而，在当时内形势下，有许多老的极左分子不得不主张与政府讲和，特别是在托洛茨基还在坚决抗议它的干涉的时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许布哈林与拉林一道成了这类人；另外，当时的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看来也属于这类人；就连最坚定的奥新斯基在当时也放弃了斗争。

过去曾维护过反对派的理想主义的柯伦泰现在也开始为斯大林的组织服务了。在一九二七年选举党的十五大代表时，她把几乎一致拒绝反对派这种情况称作是“这些普通党员坚定思想不断增长，即坚定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长的结果”。这是“集体工作方法”战胜“个人主动性”的表现，它与实施“群众的基本要求，即执行纪律”密切相关。她竭力嘲笑“反对派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她认为：“作为本身意志和集体意志的结合物……，一种全新的纪律概念”已从集体劳动中产生了。^③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领导本身对以各种手段来阻止批评这种方法已感到担忧，这是很清楚的。他们害怕犯错误，而且受到其政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的压力，所以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为

^①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6页。

^②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员会区干部学校第四教程开幕式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真理报》。

^③参阅柯伦泰：《反对派和普通党员》，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真理报》。

他们的政策辩护。结果是，施加组织压力的需要变得更迫切了。托洛茨基说道：“实际的政策与决议，与党的社会成分及其传统越是不一致，就越不太可能按照党的正常途径去贯彻这种政策，任命制和镇压手段就愈加成为必要的。”^①党的领袖们终于用暴力除掉了他们的批评者。

党内的镇压手段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有效的批评不能来自反对派，而只能来自另外一些共产党人。整个国家政治领导的变更（就一般情况而言）只能在共产党范围内得以实现。所以，如果党的领袖们要想保住官职，那他们就必然要压制党内批评，并借助组织力量来镇压反对派运动。事实上，反对派也说，领袖们竭力损害党内民主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在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中，有少数人将派别纪律凌驾于党之上，这个派别的整个活动目的就在于阻止党以正常而又合法的方式来改变党机关的成分及其政策。”^②

领导集团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并用民主方法的形式进行掩饰。其中，部分要靠赤裸裸的宣传来抚慰普通的党员，但为了证明自己政策的合法性，还必须在形式上保持民主选举制，从而造成一种一致赞同的心理印象。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共产党领袖们才能庄重地宣布（这也是他们经常所做的）：党内是绝对统一的，书记处机关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事实已证明反对派力量在大多数党组织中和党的会议上已很虚弱或已不复存在。例如布哈林（他想给反对派一次最后的屈服机会）向反对派指出：鉴于它的虚弱，继续反抗是毫无希望的；并同时警告说：如果它要公开成立第二政党并使自己成为反苏分子的传声筒，那是

^①托洛茨基：《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②《十三人声明》（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档案》，T字8802号。

很危险的。^①由于反对派宣布“不忠于党”，《真理报》再次发表文章谴责反对派并激烈抨击它旨在制造分裂而散布的“有关发生‘特米多尔式蜕化’的恶毒谎言”，称反对派是以托洛茨基为“元帅”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对共产国际抱有敌意的集团”。文章最后还向它的读者保证说，反对派已被判处死刑：“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的政治反对派已象肥皂泡一样告吹了。”^②

一方面害怕反对派的强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虚弱而轻视它，这就产生了闻名的谩骂浪潮；斯大林讽刺反对派说：“它象一个腿患风湿症、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步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会有结果的。”^③一份省的党报不怀好意地引证了亚历山大·布洛克有关反对派的一段话：

“如果你们的骨头被我们的铁蹄踩裂或折断了的话，我们有责任吗？”^④

这种反对内部敌人的精神质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诉讼过程中达到了高潮。在一系列诉讼过程中，维辛斯基怒气冲冲地咒骂那些不幸的被告者，并以华丽的词藻美化一九三八年的官方党史：几乎一切困难、一切争吵和一切不幸都应归咎于“布哈林—托洛茨基集团的残无人性的罪行”，苏维埃政府自革命以来就一直遭受它的袭击。后来人们在党史中又继续说道：“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白卫军的恶棍们（人们往往可把他们的力量

^①参阅布哈林：《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见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真理报》。

^②参阅社论：《继季诺维也夫同志之后——托洛茨基同志》，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真理报》。

^③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133页。

^④转引自《萨拉托夫党机关报》。

与一帮卑鄙的恶人的力量加以比较)竟想做国家的主人……。这帮卑鄙的法西斯狗腿子已忘记,苏联人民只要一动手就将他们打得片甲不留。”^①如果不深入研究这种违背理性的心理,人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对这类无足轻重的敌人提起控诉,为什么说他们已经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并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危险。

这里不必对形形色色的共产党领袖们的个人心理特点作出说明——这样做就会离题太远,然而指出共产党内盛行的典型的独裁表现是富有启发性的。

七、左翼反对派的毁灭

党的统一理论不久就产生了实际结果。在一九二七年夏末,党的领导终于在延期六个月后宣布要召开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期(它是党代表大会的前奏),反对派作了最后的尝试,旨在让大家倾听它的意见并迫使党改变政治方针。结果是,它在全权机关的回击下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九月,反对派领袖们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纲,这是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最后的一份,内容极为丰富,联合反对派在这份文件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②政纲极为详尽地重复了反对派以前的批评,谴责了党领导在政治生活各个领域里犯下的错误(例如在工业政策方面,农民政策方面,党组织领域内,在有关官僚主义问题上,在外交政策上,在共产国际和军事政策上)。反对派指责领导恰恰犯了他们指责反对派所犯的“机会主义”罪过,说党领导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势力并偏离了列宁主义路线。和解是不再可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一九三九年),第469—470页。

^②参阅《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195页。

能了，反对派已公开号召党员帮助它去推翻现领导：“我们将及时地纠正党领导的方针。”^①

由于党组织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要想使人们了解反对派的事业已越来越困难。反对派也一再指出了这一点。组织内的日常事务、党的地方会议和舆论工具已整个地移交给党的书记掌管，至于要使党的代表大会完全唯命是从，则需要作出周密安排和一定的努力。党的领导已决心要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避免那种在一九二五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出现的、打乱了会议进程的、不和谐的声音。在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还规定了为这次大会而安排的讨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通常是三个月），在这期间将就各项问题进行辩论，并要作出决定。对此，反对派说：

“看来中央委员会就象害怕火一样害怕讨论，领导甚至不希望在党内正常的和真正的讨论中维护它的政治路线。”^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集团已决定不准进行讨论，至少是派所有的书记出席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反对派往往根本得不到机会将自己提出的批评意见提交党的最高机关；讨论轻而易举地被阻止了。^③

党领导根本不想让党员知道反对派的政纲，它把针对自己而提出的批评都称为非法的派别活动。斯大林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竭力维护政治局九月八日通过的决议（它禁止印发反对派的政纲）^④。

① 《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90页。

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彼得松和穆拉诺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给政治局等领导机关的声明，《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0号。

③ 参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给中央政治局等机关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15号b。

④ 参阅《关于中央全会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期，第1328页。

“中央为什么没有把众所周知的反对派的‘政纲’发表呢？……说党或中央害怕真理，那是愚蠢的。……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使一般派别集团合法化。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说：‘政纲’的存在就是派别活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制定了‘政纲’并要求把它发表，从而破坏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①

反对派当然不愿意俯首帖耳地容忍自己的政纲受到压制，它已采取措施来抵制政治局的命令：在托洛茨基的信徒姆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的一个秘密印刷厂立即开始大量印刷这一文件。在政治局发出禁令后的四天内，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破获了印刷厂并逮捕了该厂的工作人员。② 姆拉奇科夫斯基和他的助手立即被开除出党。③ 随他们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也很快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组织了印刷工作，是有罪的。与他们一起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莫斯科国营印刷厂的经理，因为他已流露出对反对派的同情：他允许在自己的厂里秘密印刷反对派的文献。④

党的领袖们当然想尽可能地从印刷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有关搜捕的报告断言说，此事有关一个“弗兰格尔的军官”⑤；其中反对派的一个印刷者承认他们与一个反革命组

①参阅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3—155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加和巴卡也夫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给政治局的信：《反对派和弗兰格尔军官》，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0页。

③参阅《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④参阅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见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真理报》。

⑤彼·尼·弗兰格尔是白卫分子在一九二〇年进行最后反击时的首领。

织有联系，而这个组织计划要推翻苏维埃政府。因此，有关反对派与反革命分子联系的说法立即传遍了全党，反对派也马上提出了抗议，缺少证据的领导只好回避了这件事；后来发现，这个“弗兰格尔军官”原来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① 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弄得反对派声名狼藉。反对派的领袖们说：“‘弗兰格尔军官’这一神话般的传说已传遍整个国家，它毒害了百万党员和千百万非党人士的心灵。”他们指责斯大林蓄意搞欺骗：“没有他的同意、许可和鼓动，谁也不敢在党的队伍里散发这种诬陷反对派共产党人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控告信。”^②

在这段时期内，党的领袖们对托洛茨基等人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九月二十七日，托洛茨基被传唤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他抗议说：“建立在一种错误政策基础上的官僚纪律不是促进统一，而是促进党分化瓦解。”^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把托洛茨基的这一声明看作是一种证据，说明他提出的是“政治叛徒式的论点”，并以此作为将他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理由。^④

下一阶段的斗争基本上类似于去年的事变。去年，反对派曾试图以公开集会的形式来招募信徒，唯一的结果是它受到了惩罚和凌辱；现在，它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莫斯科，由于缺少合法的集体场所，反对派分子断然拥进了一座教学大楼并占领了它。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向估计有二千人的听

^① 参阅《反对派和弗兰格尔军官》，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0页。

^② 参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也夫、彼得松和斯米尔加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给全体党员的信，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新国际》，第124页。

^③ 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托洛茨基档案》，T字3094号。

^④ 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将托洛茨基和魏奥维奇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真理报》。

众发表了演说，当然，拥挤在房前的一批人还不计算在内。^①在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工人游行示威时露了面，并当场接受了各种效忠的表示。^②但是，想利用党的会议来进行斗争的尝试彻底破产了。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试图到莫斯科组织发表演说，由于一片“愤怒声”和“喧嚷”（官方报告所称），他们不得不退场。托洛茨基称这种有组织的嚎叫声为“法西斯方法”。据报道，表决结果是：二千五百票反对反对派，一票赞成反对派。^③

党的领导既采用了有效的组织镇压手段，同时也从反对派手中剥夺了它的一张王牌。按一九一八年日历改革后确定的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给它提供了实施第二种策略的机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周年纪念日宣言”，其中宣布了政府的计划：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采用七小时工作日并完全免去贫农的纳税义务。这等于挖掉了反对派的基础，因为反对派一直断言：领导忽视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而现在反对派自己却处于这种难堪的局面：它不得不反对这种已公开宣布的、改善它的保护者处境的、但并没有多大实际价值的做法。^④托洛茨基把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向左摇摆”指责为“单一的冒险性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不可避免地要收回。按托洛茨基的观点，政策的决定者是“那些沉重地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身上的力量（官僚、工人骗子、行政管理人员、小业主、新私有者和享有特权的

①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2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6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5页。

④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18页。

城乡知识分子)”。^①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委员会集会，以便彻底清算反对派。会议建议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最后一次作为共产党的领袖的发言中尖刻地抨击了党的领袖：他们背叛了反对派中正在考虑拯救他们的广大群众。“我们公开对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危险之中。我们深信，党——无产阶级的核心，一定会听到、理解和对付这种危险。党已经深受震动。”这次“周年纪念所作的姿态……对反对派关于我国城乡生活一切根本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是最明显的庄严承认……对统治集团来说是政治上的自我否定，供认自己的破产”。^②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同一次会议上，反对派作了最后的尝试，想使总书记受窘。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公开讨论列宁的“遗嘱”，并想知道“遗嘱”中对斯大林作出的不好的评价。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顺，已经不仅是个人的品质了；它们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及其政策和制度的素质了。……现行方针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相信暴力万能，甚至对待自己的党也是如此。”^③斯大林显然已能应付这种局势：

“现在谈谈列宁的‘遗嘱’。你们都听见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过好多次，这是你们知道的。（喊声：‘几十次了。’）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次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了。（喊声：‘对！’）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0页。

^②同上，第12，15—16页。

^③同上，第7页。

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

有人说，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①让我们念一段话，尽管这段话已经在全会上反复宣读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接着，斯大林又以“遗嘱”来反击他的对手：“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也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③

总书记的律师才能再次抵挡住了一个有威胁的集团的进攻，

①前面这些话译自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的讲话原文，它与英文译文（它由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发表，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四期，第1428—1429页）基本上无区别。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中，原文中的某些段落显然已被删掉。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49、151页。

②斯大林在讲话中引用列宁“遗嘱”中的这段话在后来的版本中已被删掉。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③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151—152、153页。

而反对派由于遭到失败又变得低声下气了。

按照原计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控告这两个反对派领袖已“由反对党和反对党的统一的派别斗争发展到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组织反列宁主义的新党的地步”。^①向反对派展开斗争，这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占了突出的位置。鉴于人们一再引用斯大林的“派别阴谋”这一用语，左派领袖们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对派开除出党。斯大林采用一切手段，肆无忌惮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②

两个星期之后，苏联历史上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反对派采取了一种纯粹是绝望的步骤：它把十一月七日革命周年纪念日当作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的机会。它很好地组织了游行示威。在莫斯科，游行由托洛茨基指挥；在列宁格勒，由季诺维也夫指挥。反对派分子布置了标语，他们有的聚集在阳台上，有的开着汽车以纵队形式通过大街；然而，一切活动都是在“列宁主义”名义下进行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政府来了一次权力示威，反对派分子可耻地被驱散了。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在列宁格勒的表演以暂时的拘留而告结束，托洛茨基指挥的莫斯科队伍被警察的警告枪声所制止。托洛茨基说，警察“就象黑色百人团和反犹主义者似的大喊大叫，骂不绝口”；然而——他又断言说——绝大多数人却表示同情。反对派布置的标语被撕了，而当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出现在阳台上时，他们被赶走了，这同样是由“一帮法西斯歹徒”干的。^③

^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52页。

^②《未署名的集体声明》，由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写成。

^③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3—534页。

党领导立即对反对派的大胆行动进行了报复，批评家们被判了重刑。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项指示，要求“必须将参加反对党的政策的、非党的集会的反对派分子立即开除出党……必须以党和工人阶级的整个力量来解散由反对派召开的地下集会。”^①与中央委员会相一致，中央监察委员会宣称，反对派领袖“逾越了苏联法律规定的界限，并公开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那股力量的传声筒。”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传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但他们拒绝放弃反对派的宣传鼓动的要求，并退出了会议。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一月十五日采取了最后的措施，将他们开除出党。同时，所有其他一些杰出的反对派分子也被排挤出党的领导集团：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拉柯夫斯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和阿夫杰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属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六名反对派分子全部被免除了职务。^②托洛茨基不得不搬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房。^③就在被开除的那一天，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阿·阿·越飞怀着对他个人健康和国家安危的绝望心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葬礼为反对派分子举行最后一次集会提供了机会——据托洛茨基说，有一万人参加了葬礼。^④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旧满怀着希望，他在十一月十八日写道：还有“一半反对派分子”存在，尽管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

^①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所有组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真理报》。

^②参阅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关于反对派领袖的反党活动》，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

^③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053号。

^④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7页。

同情左派，但他们正在觉醒，并会不断壮大起来。^①当三十一名反对派分子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关于统一的自白书时，托洛茨基试图证明，这不是投降，而仅是由于暴力而被迫履行一种义务：放弃公开的示威游行。^②斯大林称这一声明是一种“欺骗”，并继续说道：“今后怎样？同志们，今后没有地方可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越出党所容许的一切范围了。决不能再同时在两个党内摇来摆去了，决不能既在原来的列宁的党（这是统一的和唯一的党）内又在新的托洛茨基的党内摇来摆去了。”^③不能再怀疑党领导的意图了。

正当反对派受到纪律制裁的时候，已在进行中的党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几乎完全是由书记处掌握、控制的。反对派为自己的候选人募集了六千名党员的选票——这是最后一次允许党内选举反对派，但领导集团已能把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记在它的名下，因而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④

当党的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日举行时，情况已表明：反对派很不牢固的联合阵线没有经受住书记处的强大压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他们当时的追随者们自一九二六年建立起来的联盟现在崩溃了。悲观失望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彻底停止了斗争并向党领导无条件投降了。加米涅夫以及还是党员的另外一百二十名季诺维也夫分子向党的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再次表示放弃一切派别活动和有可能导致第二政党形成的任何行动。^⑤

^①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笔记》，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07号。

^②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请愿书”和党内局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二十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05号。

^③斯大林：《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28页。

^④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23页。

^⑤参阅《一百二十人声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33—1335页。

正统的列宁派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行使了一种能致人于死命的权力。而这些人仅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原则性才成为反对派的，当他们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时，他们马上就完全放弃了派别活动。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

“我们正在决定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这两条道路中一条是建立第二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条道路只能导致革命的毁灭，这是政治和阶级蜕化的道路，我们整个思想体系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学说都禁止我们选择这一条道路……。所以，仅剩下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是……要我们完全服从于党。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深信：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我们党内和通过它，而不能在它之外和反对它，来取得胜利。”^①

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激烈辩论的场所，而是群氓心理的展览。代表们齐声辱骂那些敢于发表无庸置疑是偏离了领导思想的意见的左派分子。会上，斯大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总结报告（这是他第二次作为党的领袖出现），而且是以冷嘲热讽的口吻发表了这一讲话。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经济发展作了详尽的说明之后斯大林又谈到了反对派。^②他沉着地声称，反对派断言党内缺乏民主，这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让反对派代表参加会议和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拥护党的领导，这就证明党员自愿地拒绝了反对派；不能给予反对派政治权利；不要说什么，它已经许诺，在战争的情况下会支持政府，“他们这个勉强只占我们党内人数千分

^①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1—252页。

^②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91—304页。

之五的小小集团竟大发慈悲地许诺在帝国主义者侵犯我国的时候来援助我们。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援助，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的援助！”如果这样一个不重要的集团要求政治权利，那这仅意味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想成为党内“享受特权的贵族”。

斯大林再次列举了反对派的众所周知的异端邪说：否认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否认列宁主义党的统一原则——一句话，它是孟什维主义。“左翼”反对派实际上是右翼反对派：“反对派客观上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斯大林又以托洛茨基的独立思想为例像梳头发似地清理了一遍党史，以便证明托洛茨基有反对列宁主义的污点。

斯大林一开始就谈到一百二十一名季诺维也夫分子投降之事，并一口否定了他们的投降诚意；同时，他回顾了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就已经作出的不再进行派别活动的诺言的前后情况。他要求还是党员的反对派分子必须完全地、卑躬屈膝地服从，这是作为他们继续留在党内的代价：

“有人问到条件。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必须完完全全解除武装。（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在地放弃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在地痛斥他们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经成为反党罪行的错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支部交出来，使党能够把他们全部解散。（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同志们，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是这样。”*

随后的讨论主要是重新消化斯大林的论断，在这期间，只有少

*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06页，301，302页。——译注

数几个被允许发言的没有表决权的反对派分子以他们的激烈言词干扰了这一过程。不久也要被打倒的李可夫当时属于谴责反对派最严厉的人之一，他说：反对派分子比一九二一年被开除出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偏离者还要恶劣；在他们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们就像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在行动；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是很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不得不竭力标榜自己。^①起初以自己的威望支持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而后来又有别的考虑的克鲁普斯卡娅表示相信，反对派已经丧失了“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感情”，而党所代表的群众感情不能再长期地允许对不愿悔改的偏离者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②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所作的决议看来完全像它所期待的一样，指出反对派是孟什维克派的反列宁主义的第二政党，它诽谤苏联，它已经向资产阶级投降；“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③

在奥尔忠尼启泽领导下的党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受委托起草了有关最终处理反对派问题的报告，并最后一次倾听了反对派的呼声——十二月十日，特别委员会接受了二份声明。一份是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交的，一份是由以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为首的剩余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的。特别委员会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十二月三日提出的关于他们的派别形成对捍卫他们自己的列宁主义观点曾是必要的这一论断。在这以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中的其他三名重要成员又签署了一项声明，他们在这项声明中再次表示放弃任何派别活动，表示服从党所作出的有关禁止

^①参阅李可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5—256页。

^②参阅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77页。

^③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第五分册，第255页。

宣传反对派的思想的决定。^①拉柯夫斯基集团意志比较坚定，它表示同意停止派别活动，但断言说，反对派所表示的观点是与党章相一致的；它大胆地声称，正是党章损害了党的传统，党章否认了它自己的信念。^②

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奥尔忠尼启泽的委员会以控告的形式指责了反对派：它作出的停止派别活动的诺言是企图蒙骗他人的；如果它坚持自己的政纲的正确性，那它仍旧认为自己是一个第二政党。然而，就像奥尔忠尼启泽这样一个死板的机关人员对罪责的裁决也是犹豫不决的，甚至还有反对意见：“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但它迫使我们——我重复一遍：它迫使我们——开除一部分已经为我们党作了不少工作的并已在我们队伍里进行过不止一年的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③党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将七十五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其中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拉舍维奇和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拉狄克、斯米尔加、穆拉诺夫。大会确认了以前作出的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决定。同样开除了以萨普龙诺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的独立的反对派集团（但不包括奥新斯基，他已脱离了它）。^④

托洛茨基的代言人决心进行最后的抵抗。拉柯夫斯基、拉狄克、穆拉诺夫和斯米尔加就开除决议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在声

^①参阅加米涅夫、巴卡也夫、阿夫杰也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给反对派审查委员会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37页。

^②参阅穆拉诺夫、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给反对派审查委员会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38页。

^③奥尔忠尼启泽，《给审查反对派委员会的报告》，《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44—1245页。

^④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反对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19—420页。

明中再次重申了他们的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警告性地指出，开除反对派和党内继续存在的不民主的制度将引起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向右转，转向与富农友好。他们发誓否认自己搞派别活动，但立誓在他们被开除的情况下仍忠于自己的纲领。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将证实，他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的保护人。

季诺维也夫分子已不想再继续反抗了。他们接受了向他们提出的“解除思想武装”的要求，并宣布完全与反对派断绝关系。统一的原则已经导致了反抗力量的自我毁灭：“谁企图建立一个反对共产党的特殊党，就必然会反对共产国际并会不可避免地挤进敌人的阵营。”^①他们首先得到的是进一步地受凌辱。季诺维也夫分子奴隶般的服从遭到了拒绝，这些异教徒仍被驱逐出党，并得到这一指示：他们能否重新被接受入党，需要经过六个月的等待和观察。^②

作为积极的政治力量的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已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束而告终。由于领袖们被撤职和开除，左派的一般信徒马上也就各奔东西了。^③剩下的左翼反对派分子所作的也只是徒劳的抗议和无效的密谋活动，直至他们被流放、审判和处决，从而结束了他们的悲惨历史。随着左翼反对派的毁灭，俄国共产党也就丧失了它的二重性。俄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东西方的、片面强调理智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消失了，由列宁塑造起来的、在俄国土生土长的、实用的、以政权为目标的运动已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革命的手段终于成了自身的目的。

^①参阅《二十三人声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66—1267页。

^②参阅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声明作出的决议，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67、1268页。

^③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27页附件2。

但是，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历史的最后篇章还没有写成：潜伏在列宁派内部的危机爆发了。当左派被消灭和列宁主义者成为无可非议的主人时，制度的实质问题又出现了，并在党的领袖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然而只是短暂的冲突。列宁派本身又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谨慎的实用主义者，而另一派成了极权主义的创始人。

第十三章 右翼反对派

尽管人们一再明确地论述了坚如磐石的统一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但布尔什维克党仍需要继续对付反对派。当斯大林和布哈林刚刚互相祝贺过他们战胜托洛茨基分子所取得的胜利，党内新的分裂又开始了。斯大林在政治局里共事时间最长的同事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久前还竭力拥护对付左派分子的政治策略，而短短的几个月后，却又成了这一政治策略的牺牲品。

由这三个人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左翼反对派分子体现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前后延续多年的思想传统，而且他们与列宁主义领导的意见分歧主要根源于深刻的知识和社会的差别。与此相反，右翼反对派几乎是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没有作为偏离者这样的历史；它的历史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在作为反对派表演之前，从它的成员成分和它的纲领来看都曾领导集团本身的毫无差异的组成部分。就它的组织性质来说，它与一九一八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很相似。这两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直都行之有效的党的路线，只不过党的领导人突然偏离了这条路线。在这两次情形中出现的分裂是深刻的，而且事先很难看清这种党内危机将以什么方式结束。

一、粮食危机和斯大林的向左转

党的右翼领导和左翼反对派之间的辩论长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原则和目标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一致的。左翼反对派愈是接近崩溃，领导中的一些成员就愈加明确地指出这些原则：实行国家经济计划，把个体农业改造为集体化的大农业，以及将俄国改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在这些基本的目标方面不存在分歧。但在如何，首先是应以什么速度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托洛茨基曾预见到在左派失败之后会爆发一场新的派别斗争，至少他已预感到这一点。一九二六年秋，他断言说，统治集团内存在三个集团——一个“占有者”（也就是说与农民友好的）集团、一个工会工作人员集团和一个“纯机关工作人员”集团。^①他在一九二七年整个的一年中始终坚持这种认为即将分裂的思想。他还补充说，这些集团之间的斗争将是镇压左派的必然结果。^②最后，他说出了各个集团成员的名字，而且是那么的准确：“中央”集团的领导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和（被误解的）乌格拉诺夫；由工会领袖构成的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与农民友好的集团的领袖是李可夫和亚·彼·斯米尔诺夫，另外还有加里宁（当时盛传着一些有关他右倾的、但尚未得到证实的谣言）。^③

^①托洛茨基：《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起草的提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006号。

^②托洛茨基：《俄国反对派：问题与答复》（一九二七年），见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国际》，第156页。

^③《十三人政纲》（一九二七年九月），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122—123页。

随着国家的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最低点逐步得到恢复，除了日常问题外，最终目标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这样，党领导在一九二七年底一致表示赞成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这反映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全会作出的两项决议之中，它们于十二月被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批准。这两项声明的起草者是李可夫（有关经济计划问题）和莫洛托夫（有关农业问题）。这两个人都主张采取谨慎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但莫洛托夫的讲话显得更坚强有力些。李可夫再次攻击了主张“超工业化”的反对派，并强调经济计划必须是谨慎的、注意平衡的，他一再重复说，“必须力求使下列各因素达到最后的结合”^①；不要搞过多的重工业，速度不要太快，要有足够的储备，等等。他始终认为整顿工业是万应灵药，从而有可能降低成本并以便宜的消费品来满足农民的需求。莫洛托夫满怀希望地说：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地增长，中农必将战胜富农；他称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首先强调应实行一条有效的农业集体化路线——逐步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那么地不明确，后来的情况证明，人们可以对它作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迹象也说明，斯大林分子对他们马上要改变方针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而且也不是从促使这种转变的现时经济政治问题来考虑的。像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通常情况一样，每当人们不得想办法来对付突然出现的危机时，就开始出现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倾向，出现党内新的分裂。

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农民和食品供应问题。在党的第十五次代

^①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78页。

表大会正式宣布开除整个左翼反对派之前，党领导就对粮食收购问题表示忧虑。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组织发出了两项指示，其中指出：农民上交的粮食在减少。一九二八年一月，它又作出了一项规定：地方党的干部如果不能制止这种粮食减少状况，将受到党纪处分。^①二月份，突然逼近的粮食危机引起了全党的忧虑。

造成供应困难的原因当然不是才出现的。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农业对工业经济来说就是一个薄弱的基础，那些曾支持党领导反对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就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性。十月革命后，实行了土地重新分配，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掌握在贫农手中，而这些人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吃光他们的产品而不愿出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长期存在的剪刀差问题。^②因此，销售到市场上的粮食仅相当于革命前的一半。尽管城市居民没有直接遭受饥饿，但他们的食品供应却没有保障，扩大粮食供应受到了限制。粮食出口几乎停止了，而当时，苏维埃政府正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工业建设计划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但还不能说已使党领导感到惊慌失措。由于粮食价格压得较低，而人们又盼望价格会上涨，越来越多的农民保留了他们原应投入市场的产品。这种情况与地方欠收一道造成了这种后果：一九二八年一月

^①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2页。

^②根据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列举的数字（《在粮食战线上》，载于一九二八年元月二日《真理报》），全国销售到市场上的用以供应城市和出口的粮食占总产量的比例已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三。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整个粮食生产几乎没有减少多少，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是由贫农和中农生产出来的；而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三九年，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只占百分之五十。集体化运动结束后，进入市场或者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量为总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五。（参阅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销售到市场上的粮食又比一九二七年初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①党立即把罪责推到富农身上，因为一般说来，富裕农民可以比其他的农民拿出更多的粮食投入市场。所以，这种谴责无疑也有一定的道理。

外国观察家们都清楚，党对粮食危机采取既快而又有力的措施是斯大林的杰作。^②当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亲自到没有遭受旱灾的唯一有余粮的地区西西伯利亚时，^③严重的危机几乎还没有显露出来。就像斯大林一贯采取的方式一样，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迫交售、提高税收以及一些纯经济措施，例如制止国家粮食收购部门互相竞争和迅速调运农民所需要的消费品等。然而，最重要的措施是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它规定：没收“投机商”的财产，而且还把有余粮的富农也划为这类人。为了较容易地发现囤有余粮的人，政府从依法没收的余粮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来奖励“贫农”。^④对此，托洛茨基说道：《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它实际上是斯大林在二月十三日写给全党的信）读起来几乎像是反对派的政纲。^⑤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指责大批地方党政干部，说他们对粮食危机也负有责任——由于他们的无能，问题才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斯大林在他的二月十三日声明中说道：“最近在我们的各种组织中，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

^①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1页。

^②沃尔特·杜兰蒂：《有关俄国的报导》，一九三四年纽约版，第155—156页。

^③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的《年表》，第317页。

^④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6—17页。

^⑤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一九二八年七月），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74—275页。

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①这样一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企图与富农“讲和”、主张“和平发展”和反映“富农思想”影响的人会带来什么危险。这些问题很快成了党内讨论的中心。

托洛茨基认为，这一切证实了他曾提出的警告。他讽刺挖苦地问道：尽管拼命地实行“布尔什维克化”，为什么这些富农分子还能钻进党内呢？“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他们在努力推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②

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他的名字与党领导当时一直奉行的温和的农民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因具有所谓“农民倾向”而被解除了职务。^③斯大林在四月中央全会之后宣称，在一些产粮区的收购机关和地方党组织中进行了清洗。被开除的人都是“……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④然而，与赋予“右倾危险”新的含义之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这次的惩罚应该说还是很温和的。

尽管党的领导一致认为粮食危机是严重的，采取有效的反措施是必要的，但在幕后马上就对所奉行的方针产生了严重的意见

^①参阅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3—14页。

^②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57—307页。

^③参阅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页。

^④参阅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41页。

分歧。据报道，当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返回并提出有关在这一地区开展广泛的清洗运动的计划时，斯大林和李可夫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可夫辱骂了总书记，并退出了政治局会议。后来，他在托姆斯基和加里宁的支持下成功地阻止了斯大林的计划的贯彻执行。^①看来，李可夫是所有反对斯大林改变经济政策的人的集中代表。一九二八年七月，托洛茨基称整个右翼派别是“李可夫派”。^②当斯大林在四月谈到他的努力（开除富农的朋友）遭到抵抗时，他指的就是李可夫。他说：“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谁认为……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③

当时，人们还可听到这样一些不满的意见：新经济政策已让位于重新再版的战时共产主义。斯大林就此严厉地反驳说：“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如此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谣言，……。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④（这样的说法表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预见到后来所要采取的政策。）布哈林则竭力反驳那种认为党的反对富农的新政策与左翼反对派的政纲相一致的说法。^⑤李可夫承认，粮食危机和富农的威胁已使党感到惊异，这是符合实际的——人们只要回忆一下，左翼反

^①参阅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5页。

^②托洛茨基：《四月全会和右倾危险》（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26号。

^③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41、42页。

^④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5页。

^⑤参阅布哈林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粮食收购和沙赫特事件中的教训以及党的任务》，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真理报》。

对派以前提出的警告是怎样被驳回的。①

四月，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方面还是采取了妥协态度：它批评了一些“过火行为”，例如不依照苏维埃法律第一百零七条而强制收购和没收的行为。托洛茨基私下里说：全会上的多数人在来自省的党务干部的激励下迫使斯大林作了退让。②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也强调了斯大林以前所表述过的思想：党应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这是一再重复的话）“向富农展开进攻”。中央委员会并重复了有关改善经济组织和计划的其他要求，但是以一种新的腔调号召说：“在总的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确立绝对的革命纪律”和“在无产阶级国家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③

五月，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日趋紧张起来。顿涅茨盆地的一些矿山工程师由于所谓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而受到了审讯（即所谓的沙赫特事件）。新闻界大谈惯于搞“阴谋”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威胁，煽动恐慌情绪，长达两个月之久。人们传说，斯大林利用这个事件，给作为政府首脑的李可夫制造困难。④

在党内，一场广泛的宣传和鼓动运动开始了，它号称旨在促进“自我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委员会以慷慨激昂的语气证实，有“撤销任何书记、任何局和任何委员会的可能

①参阅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真理报》。

②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③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28、432页。

④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页。

性”。^①正像所期望的那样，运动的结果是，那些已经引起党组织的统治者不满的“官僚主义者”受到了批评并被免除了职务。

“自我批评”已经成了一种把已出现的反对派倾向扼杀在萌芽状况之中的有效办法。斯大林本人在一项使人感到惊异的开诚布公的声明中概述了这场运动：“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②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对国家官吏所作的结论相比，人们可以从这番话中看出在这十年中的发展。

四月底，粮食危机在各地重新爆发。由斯大林分子雅罗斯拉夫斯基掌管的《真理报》编辑部^③发出了警报：粮食收购明显减少应归咎于一种“涣散”的倾向，社论说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允许减轻对富裕的富农阶层所施加的阶级压力。”^④两星期后，《真理报》还在不断地强调粮食问题。^⑤它把冬季粮食收购取得的成就归诸于当时所作出的特别努力，并得出教训：要想克服各地出现的供应困难，“有力的措施制度”是必要的。它向积极分子呼吁：“主要的事业取决于我们本身，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处理问题的智慧和纪律性。”斯大林后来承认：人们再次采取了非常措施，并通过暴力来征收粮食。但他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归之为“我们党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够镇静和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和工人发出的号召书》，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报》。

^②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8、29页。

^③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④社论：《关于粮食收购问题》，见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⑤社论：《关于收购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真理报》。

坚定，不能清醒地、毫不夸大地估计当时的情况”。^①实际上，斯大林对粮食危机所作出的粗暴反应只能证实那些担心战时共产主义幽灵可能再现的人是有道理的。

尽管党的许多干部日益担心，但斯大林却在继续宣扬一项基本上是新的农业政策。不过，他否认这是一种新的政策，而把它说成是“执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五月底，他在向共产党的经济学家们作演讲时宣布了他自己的一种新观点：“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为了做出点姿态，他说：只要个体经济还存在，就一定要去促进它的发展。但是，他的观点更多地体现在有关工业问题的论述之中。他说：“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②斯大林以这些话为来年的经济讨论和争论提出了一个主要的课题。他已决定立即实行急剧的工业化，而这种工业化的急剧程度甚至超过了同左翼反对派争论时受到谴责的那种工业化，因为它既超出了这个国家对重工业的需要，而且也超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能力。^③

^①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79页。

^②参阅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77、80页。

^③后来，共产党在描绘自己的历史时有一项沉重的任务：抹掉斯大林于一九二八年在经济上突然转向的内容，并要求不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在这之前与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紧密关系和他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的依附性。如果说斯大林集团早就有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而迟迟没有拿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斯大林与党的其他领袖一起反复谴责过反对派的纲领，而且从未指出，它也许在将来是可以采用的。也没有证据能说明，斯大林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以前真正怀疑过右派提出的逐步发展工业的观点。就国民经济来说，当时也不是推行急剧工业化的“正确时刻”。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形势之所以变得那般严重，之所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速工业化，其主要原因在于逐步建设工业的工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严重缺点。

布哈林对新的集体化运动的最初反应是赞扬，说它是一场能结束“城乡之间的矛盾”的“文化革命”；^①但他不久就改变了看法。六月一日，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攻击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代表；^②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坚决反对斯大林农业政策的一个派别的代言人，这一派别只不过当时还在幕后活动。

六月底，乌云密布。在许多地区，首先是在粮食充裕的北高加索，出现了农民骚乱。^③城市工人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其原因部分是由于食品供应不足，部分是由于还有许多城市与农村保持着个人联系。^④在这种危机的刺激和鼓励下，批评家们开始抨击斯大林的暴力政策。莫斯科党组书记乌格拉诺夫向他的基层组织宣布：斯大林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而且依靠的是错误的统计数字。^⑤在基洛夫管辖下的列宁格勒充满着不满情绪，基洛夫本人也已受到布哈林的信徒斯列普科夫的公开攻击。^⑥据说，托姆斯基正在准备在工会中进行一场斗争，并邀请已感到后悔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一起讨论有关问题。^⑦基层干部已获悉，政治局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⑧托洛茨基曾写道：“显然，李可夫派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外交领域里正在形成。”^⑨当时，党报

①布哈林：《关于日常的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②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③布哈林和安德烈也夫（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引自《会议记录》，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901号和1834号。

④乌格拉诺夫和李可夫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35号。

⑤《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⑥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⑦《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⑧利丁：《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十九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14号。

⑨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和政府官僚机关看来已坚定地站在批评斯大林的人一边，不过，在红色教授学院里作过报告的斯大林在他的自我批评运动的幌子下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①

在这期间，斯大林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为了使他的主要对手暂时不作公开反抗，斯大林对他们采取了和解的态度。财政人民委员莫·伊·弗鲁姆金写了一封信，抗议在粮食收购运动中采用的强制手段。斯大林把这封信当作与富农友好倾向的证据。他断言说，弗鲁姆金在恐慌中已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上退回到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从而放弃了向富农进攻和集体化运动。^②斯大林对这种偏向发表了苛刻的意见：只有坚决“进行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和中农建立联盟”。他同时也不忘记托洛茨基的异端邪说，并说道：在采取反对富农的措施时，中农不能受损害。^③如何在盟友和敌人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分界线，他没有加以说明。斯大林方式的特点是，使用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公式，并要求人们把这个公式运用到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去。

在中央七月全会期间，有关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内意见分歧的谣言已迅速传遍全国。^④托洛茨基谈到“机关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但他并不完全清楚右翼的组成情况。^⑤斯大林显然重视强有力的行动，但他似乎也不能肯定这一行动应对准谁。

此时，追随斯大林和批评斯大林的阵线还没有最终形成。莫

^①《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②参阅斯大林：《致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02—105页。

^③参阅斯大林：《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90—92页。

^④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3页和第14页。

^⑤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89页。

洛托夫在六月三十日的讲话是极其慎重的，他提出了俄国农业落后的问题，并警告当心个别人过分地信赖计划。^①在同一次会议上，正准备去引导右翼反对派的莫斯科组织的乌格拉诺夫同样对计划持一种非乐观的态度。^②据称，卡冈诺维奇最初也是动摇的。^③据传说，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烈也夫、奥尔忠尼启泽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副手亚哥达以及其他一些人，也曾同情斯大林的对手。据说，他们不敢行动，或者在斯大林的恫吓和威胁下只好持保留态度。^④例如，伏罗希洛夫显然害怕他以前的爱国主义热情会被揭露出来，这种热情曾促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报名参加了沙皇的军队。^⑤

七月四日，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例会。讨论的中心仍是农民问题；七月九日和十日，辩论达到了高潮。^⑥加里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分别作了关于国营农场、集体经济和粮食收购情况的报告，他们的讲话口气比较温和，而且重点放在和中农建立联盟的问题上。米高扬起草的主要决议草案是一份妥协的文件：

^①参阅莫洛托夫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党委会上的讲话：《党的路线和经济实践》，见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真理报》。

^②参阅乌格拉诺夫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党委会上的讲话：《经济建设问题》，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真理报》。

^③参阅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七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8号。

^④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⑤参阅埃里希·沃伦贝格：《致编辑部》，见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95页。

^⑥这里叙述的一九二八年七月全会的过程是根据托洛茨基档案中收录的未经加工、但是逐字逐句记载的记录副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32—1836号和1900—1901号）和《亲爱的同志》这封信中的报道（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它的作者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仔细地读过原来的记录）复述的。斯大林在全会上的报告已发表在他的全集第十一卷上。与T字1900号中有关他在七月九日讲话记录比较表明，公开发表的文章已经加以修改和补充。更不用说，大部分专门涉及反对派领袖的地方都被删掉了。

它认为有必要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强调了非常措施的暂时性，而且甚至承认，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相适应必须提高粮食价格。^①这基本上都是布哈林的主张，正如布哈林所说，那是“从我的声明中偷去的”。^②

在米高扬宣读了决议草案之后，许多右派分子就此表示了态；奥新斯基、安德烈也夫、阿伊·斯特茨基和索柯里尼柯夫说道：农业经济状况仍很严重，要继续向中农让步（首先是提高价格）。紧接着，乌格拉诺夫和李可夫也发了言，他们指出人民中间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并警告人们不要把非常措施制度化。然后，卡冈诺维奇开始发言，他声称：对非常措施的批评太过分了，并认为仅仅依靠价格政策同样也是不对的。他在整个全会上持一种最严厉的腔调：“富农与我们的斗争将是残酷的……，我们对此必须有所准备。我们必须加快粮食收购运动的速度。”李可夫激动地反驳他说：“把非常措施和‘过火行为’区别开来，是错误的。人们往往认为‘过火行为’就是个别人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所犯的刑事和半刑事的罪过，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犯罪就是犯罪。整个一系列‘过火行为’就是我们在一月份采用的粮食收购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按照李可夫的说法，暴力在卡冈诺维奇看来就是本身的目的：“卡冈诺维奇的整个演说只有一个宗旨，就是为非常措施辩护，把它说成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正象索柯里尼柯夫所说，卡冈诺维奇已被“驳得体无完肤”。^③

^①参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48—449页。

^②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③参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七月九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①他从奥新斯基和索柯里尼柯夫关于提高粮食价格的建议说起，他说：这意味着“阻碍国家工业化”……当他把火力集中对准极右观点的代表时（李可夫本人拒绝承认有极右观点），他竭力把他们的异端邪说与整个反对派反对他本人的观点等同起来。他报告的核心在于给予新经济政策以新的含义——它不是退却，而是包括反对富农的暴力措施和其他农民集体化内容在内的进攻。斯大林就是这样以他常用的方式，在推行一项新政策时，却始终以至正统派的老权威人士面目出现。他先谈到人们反对加速进行集体化的问题，然后他又把反对加速进行集体化说成是反对派从根本上反对集体化：“谁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向后看不向前看的‘农民哲学家’。”^②

斯大林致力于把他的新政策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区别开，但就其本质来说，二者是相同的。^③实际上，他已迅速接近了左派的观点，而且主张马上采用暴力手段迅速而又普遍地实行农民集体化；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反对派的观点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右派曾希望斯大林分子由于害怕必须承认左派观点的正确性，而不要再摇摆不定了。^④但是，斯大林在理论方面似乎显得非常笨拙，而且缺乏教养。当然，理论之所以使他感兴趣，首先在于它可作为反对他的敌人的武器。他

^①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40页。

^②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84页。

^③参阅《关于斯大林在七月九日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900号。

^④参阅托洛茨基：《现在怎么办？》，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九三六年纽约版，第257—307页。

也能巧妙地运用这一武器。这就像布哈林私下对加米涅夫所说的：“斯大林……是一个无耻的阴谋家，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把持着一切。他的主张是根据排斥异己的需要而变化不定的。”^①

一九二八年夏，斯大林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采用对农民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左的政策的同时，又不造成他已接受托洛茨基异端邪说的印象。斯大林玩弄手法，把那些坚持原来的官方政策的人说成是要改变方针的人。布哈林抱怨说：“他的诡计不过是要把我们弄成宗派主义者。”^②为了施展魔术师的一整套政治法术，斯大林采用了他通常使用的战略：利用经过精心选择的列宁语录，对党过去作出的一些定论作出新的解释，并给人们普遍承认的思想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与此同时，他宣称要忠于党的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议；谁要是敢于指出这些决议的真正含义与实际的运用存在着矛盾，那他会立即被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因此，那些抱怨说农民政策的实际倾向违背了新经济政策精神的人，都遭受了这种指责，他们的思想被看作是“富农倾向”而遭到拒绝。

七月十日，当各派在中央全会上越来越激烈地相互指责时，布哈林起来就自己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当时的局势是相当严重的；他也确实在为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担忧，他担心在富农的带领下可能会发生群众起义。尽管他的讲话常常被斯大林分子的辱骂声所打断，但他仍声称：“在农村，哪怕是采取最小的攻势，都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激励富农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中产阶级分子……等来反对我们。这股力量是很强大

^①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②同上。

的。而且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出现微小的摇摆也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影响。”

布哈林还说，粮食危机是经济基础薄弱的表现。我们缺少储备，在农业、工业和满足消费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在他发言期间，伏罗希洛夫喊道：“您给我们开一付万应灵药吧！”他不断打断布哈林的发言，竭力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坚定地站在斯大林分子一边的。

布哈林回答说：“我不想给您开一付万应灵药，但请您不要寻开心。”尽管他的讲话时时被喊声打断，但他显然还不能理解批评他的人的派别成见。紧接着，他批评了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曾说过，工业的发展必然威胁工农联盟。布哈林说：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把相信价格措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加以抨击，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政府来说，价格是对个体农民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计划不周和价格规定的错误导致了要求采取非常措施的危机；非常措施倾向于变成一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它的经济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而其政治影响无疑是很坏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中农的支持，而且有必要允许其个体经济继续发展；可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但只能按照这种形式进行：通过税收来剥夺他们的生产能力；只有当中农决定不再听从富农时，富农才没有任何危险性；与农民达成谅解是通往未来的关键，“我们绝不能让‘联盟’受到威胁”。

辩论结束后，一份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妥协决议在七月十日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许多人从中获得的印象是，斯大林分子和李可夫—布哈林集团之间的意见分歧似乎消除了。^①然而，双方的力量已在发生变化，其表现是：决议驳斥了右派的最主要

^①参阅托洛茨基：《右派和中派集团的危机及其前途》（一九二八年秋），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43号。

的怨言，即非常措施正在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政策；“虽然如此，还是有人把这些措施解释成是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这只是说明党内一部分人直到现在还是处在与党敌对的思想影响之下。”^①右派领袖们不会看不到，他们的阵线已变得七零八落。原来他们以为可以指望的人，其中像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古比雪夫，已经站到斯大林一边去了。^②因此，斯大林在七月十一日，即全会的最后一天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总书记坚决反对对农民继续采取宽容态度的建议。^③

直到现在，斯大林的对手才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的感情变化是不难理解的——起初，热心于与一个能干的、机智的同志合作；接着，矛盾日益增多；无休止的争吵和气急败坏，不可靠的朋友变成了一心想报复的敌人；更为痛苦的是，在公开场合相会时要竭力压制恼火；最后，惊奇地认识到，老战友原来却是个贪权无厌的阴谋家，他现在手中握有许多王牌，而且什么都不可能阻止他消灭他以前的联盟者。当到处流传说右派准备免去斯大林的职务时，^④布哈林迈出了十分危险的一步：他与当年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建立了联系。索柯里尼柯夫安排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会见。^⑤布哈林无疑害怕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

^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决议：《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49—450页。

^②参阅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预备会谈纪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897号。

^③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69页。

^④参阅谢烈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见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三日《社会主义者通讯》。

^⑤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8页。

重新接近，因此他急忙去会见老反对派人物并恳求他们与他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似乎代表着一个共同的事业。

七月十一日上午，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没有按门铃就进入了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住房。感到绝望的布哈林立即承认了他的忧虑：“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毁灭。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经常发生的分歧要严重得多。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都同意对局势作这样的估计，‘如果在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会好得多。’……我和斯大林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说话了。……他曾用过……‘你撒谎’等等最尖锐的字眼。现在他作出让步，是为了置我们于死地。”加米涅夫在他和布哈林的会谈纪要上加了一个批注：“斯大林只知道用一种办法——给人背后一刀。”

七月全会以后，右派分子奉行的战略是，把他们的失败看成是一种胜利，并掩盖领导内部深刻的分裂状况。这正合斯大林之意，因为斯大林似乎还拿不出一个纲领，同时，在组织上他的地位还没有牢固到足以保证他在公开的较量中取得胜利的程度。仍受右派分子控制的《真理报》对农民使用了极其温和的语言，七月十四日的社论夸大了中央委员会对非常措施的批评，而有关“向富农展开进攻”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及。^①

七月十三日，李可夫以一种胜利者的口气向莫斯科党组织报告了全会的情况，说人们不得不容许印发他的报告。他向人们暗示：二月的向“左转”已终于回头了，并警告当心重新采取非常措施：“这将是新经济政策的尽头。……此外，军队中肯定会出现叛乱，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意见。”托洛茨基却预言右派分子将获胜，“特米多尔式蜕化将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这正是

^①参阅社论：《粮食收购和非常措施的取缔》，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真理报》。

斯大林早就等待的时刻。^①

这时，有关最高层分裂的谣传已经传遍了全党。当时，人们对争议问题和参与者并不清楚，众说不一。抱怨声越来越大，抱怨让党员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②特别动荡不安的是莫斯科党组织，因为斯大林打算在那里免去乌格拉诺夫的职务。在全会之后，普通党员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③有人问，“斯大林与布哈林在全会上的争吵究竟有多激烈，争论的结果是什么？”也有人天真地问道，“李可夫的偏向和斯大林的偏向，那种偏向更严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党要回到托洛茨基的农民政策上去吗？政治局内真有两大阵营吗？政治局委员对未公布的文件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是什么？李可夫为什么说他的发言仅代表他自己？李可夫和斯大林在评价农民个体经济问题上究竟有哪些意见分歧？

两派领袖坚决否认有关分裂的一切谣传，但同时又在准备一场有组织的斗争。已获得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斯大林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他剥夺了右派分子对《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控制权。^④布哈林派的编辑斯列普科夫被调往雅库茨克，负责那里的宣传鼓动工作。^⑤斯大林也不否认，他有撤掉乌格拉诺夫的职务的意图；而乌格拉诺夫却向他的一位莫斯科知己人说：“斯大林已骑到了党的脖子上，我们要把他拉下来。”^⑥七月

^①李可夫：《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26号。

^②斯维谢多夫：《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6号。

^③《消息通告》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结果的消息通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021、2167号。

^④参阅《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⑤托洛茨基：《亲爱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583号。

^⑥《亲爱的同志》（一九二八年九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底，各派别之间已不可能再和解了，这是很清楚的。政策上的分歧已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因此，公开解决问题的时刻已不可能再拖延。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共产国际的代表举行了第六次世界性会议。会上，相互争斗的俄国领袖们扮演了主要角色。

二、共产国际和“右倾危险”

当党内经济政治争论越演越烈时，人们却丝毫未公开透露党内的分裂。然而，有一个论坛，即共产国际，可供斯大林指出这种分裂的危险，而同时又可避免在不适当的时刻去攻击那些还深受欢迎的右翼对手。在共产国际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条件下，人们可以不必首先向斯大林的俄国右翼批评家提出应有的责备。就可以谈论新的派别倾向的危险。例如在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中，共产国际内就呈现出一幅清晰的、放大的、俄国领导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的写照。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给双方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使它们在俄国进行较量之前就可以检验出哪方的观点能获胜。

早在托洛茨基的左翼信徒遭受谴责并被开除出党之前，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和中派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他一些党，特别像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口号下已经接受了一种极其温和的右的观点。^①苏联领导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完成了他们的责任之后，这些人于一九二八年初又开始在共产国际内反对右倾分子。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实行的所谓向“左转”的起源。这一向左

^①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八年）。

转确定了共产国际今后六年期间的攻击性策略。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具有一直都是由左翼反对派所代表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已日趋结束，“我们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①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更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新方针。他发展了革命危机“第三时期”（战后混乱和稳定时期）的思想，并正在探索一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他可以在以后向他的政治对手开火。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会议结束时，“统一战线”政策显然已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已确认一种新的革命路线，到处都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凶恶的敌人。^②对于共产主义的偏离者，人们的主要忧虑还在于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详尽地论述道，尽管他们在俄国党内遭受了失败，但仍旧要对他们留神，他始终认为左派与社会民主党是一路货色。“人们常常讲到共产国际内的各种左的和右的倾向，……依我看，真正的危险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③对左派和右派哪一个比较危险的评价，后来成了评定苏联国内右倾的可靠标准。

一九二八年七月，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四年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最后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时，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内相互争斗的派别公开对俄国党内甚至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已秘密存在的分裂现象表示了他们的各自同情倾向。布哈林遭到了一些人

^①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243页。

^②参阅波尔肯奥，《共产国际》，第533、534页。

^③布哈林，《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见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十期，第218页。

的指责，因为他夸大了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内扩张的可能性；针对这种批评，他的美国和德国的追随者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保护他。^①

为了给布哈林制造困难，俄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各种尝试行动。布哈林曾直接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斯大林分子就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修正案，并要求非得公开接受它们不可。正像斯大林后来所说：“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②很明显，这一切只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布哈林不是时代的顶峰，或者他也是有错误的。其中一个修正是关于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人们指出，布哈林忘记了应特别强调与社会民主党‘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在涉及共产国际各党党内的右倾问题的一节中，人们指责布哈林忘记了应与右倾“调和态度”作必要斗争的问题。此外，人们还指责他忘记了反右倾的最重要的手段——“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实际上，他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一原则。）但在所有这些指责中最主要的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在它战后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稳定性。

在代表会议期间，布哈林自己也声称右倾要比托洛茨基分子更危险，但他对“右倾危险”的概念构成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了。当他谈起右倾危险时，他指的不是某些人或某些派别，而只是一般党员犯右倾错误的可能性，例如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过分的合作或过分相信象蒋介石那样的人。^③他认为，这种右倾错误是一种必然要反对的实际存在着的危险。在共产国际代表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见《文件汇编》第一卷，第159、745页。

^②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20页。

^③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一次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他声称：“代表会议……规定共产国际所有成员有义务同右翼反对派作斗争，同时要在各国共产党内坚决克服低估这种危险的倾向。”^①然而，布哈林在背后却表示了与他对右倾危险所持有的正式看法相矛盾的观点。他在一封写给当时已被指责为右倾分子的瑞士共产国际领袖茹·安贝尔—德罗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同情；他在信中说，按照他的观点，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去反对法西斯是非常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的。但他请求原谅，他不能公开表示这一观点，因为他在俄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不稳的。^②

更为危险的是，布哈林在继续坚持调和态度方面竟敢要求在维护共产国际统一的同时必须“谨慎”从事和向所有承认领导威信的人开放大门。他说：“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和使用一切手段联合所有赞成共产国际决议并发誓同右倾危险作无情斗争的同志。这里，我们就要在代表大会上创造不可能使未来的领导机关发生分裂的条件。”^③布哈林要求在执行党的纪律时应采取谨慎态度，这是根据列宁以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提出来的：

“如果你们要继续开除所有不那么顺从、但是聪明能干的人并只保留顺从听话的傻瓜，那你们一定会毁灭党。”^④但是，布哈林对一件事总是作两种解释。当他第二次引用这句名言时，他又作出了如下的评价：“然而，这条规章……不允许变成无休止地容忍各种偏向的借口，必须与各种偏向作斗争并克服它们。”^⑤

^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作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②参阅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九月致茹·安贝尔—德罗的信，见《安贝尔—德罗文献》。

^③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同上。

^⑤布哈林给莫斯科党组织作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尽管人们以前曾多次表示反对党领导轻视富农威胁的态度，但一九二八年夏出现的反对“右倾危险”的怒火并不是指向俄国共产党的。在共产国际讨论的问题中，唯一涉及俄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不久前遭受失败一事。为了制止有关俄国领导中存在意见分歧的谣传，斯大林敦促政治局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交了一项声明，其中说到：“坚决抗议散布任何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间存在意见分歧的谣言。”^①布哈林十分天真地以为，如果他对党员隐瞒自己的顾虑，他就能更多地获得取胜的机会。

对斯大林分子来说，共产国际是可以利用的。共产国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创造危急气氛的机会，而同时又不必冒在俄国不得不仓促发起进攻的危险。他们在共产国际首先使用了一个纯属政治罪的新术语，即所有俄国领袖们所公认的“右倾机会主义”。此外，正如布哈林所说，他们还发明了另一个几乎同样恶劣的罪名：“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②起初，这两个范畴只是用来指非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倾向。因此，它原则上根本没有涉及俄国人中的意见分歧。然而，当这种偏向一旦形成固定的概念之后，斯大林分子就很容易地将他们想要贬低的所有俄国的领袖们划入这一范畴，主要是划分“调和分子”。（在俄国，人们甚至还进一步谴责对“调和分子”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在布哈林无意识的帮助下，斯大林已巧妙地将右派分子定为一种政治案件。

^① 《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2页。

^②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三、莫斯科党组织的危机

一九二八年夏末，斯大林分子与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分歧已进入急剧严重的阶段。最高层的紧张气氛已开始影响到底层，而右翼反对派作为党组织内的一场运动也已初步形成。最后短兵相接的激战终于爆发了，它以斯大林分子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告结束。

斯大林与右派分子之间的组织斗争的战场是莫斯科。莫斯科省党组织机关是右派分子唯一较大的组织据点，因而它享有战略意义。与一九二三年和以前的莫斯科共产主义者的自发而又比较民主的反对派运动相反，一九二八年的莫斯科反对派是机关内的事件，它可与一九二五年的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相提并论。乌格拉诺夫的莫斯科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党中央机关都同样算不上是一场民主的抗议运动。乌格拉诺夫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家。他已在一九二四年获得莫斯科的重要职位，由于他忠诚于总书记，一九二五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也是斯大林对他的酬报。

像乌格拉诺夫这样一个人倒向布哈林集团，表明斯大林与右派分子之间的争论像一个楔子一样已深深打进了党的干部队伍。尽管个人动机好像也在起作用，但乌格拉诺夫在七月全会上及以后的态度不容怀疑地表明：他真地在为经济政策而担忧，而且是从内心赞同布哈林分子提出的警告。像其他右派领袖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共产主义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担心斯大林的进攻路线会引起社会冲突。

当收成不好的消息传来并由此而对粮食危机问题展开新的激烈争论时，各种顾虑（布哈林分子与斯大林分子之间的分裂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已越来越强烈。这时，莫斯科党委会的例行全体

会议正在举行（九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从会上摆出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乌格拉诺夫的组织中，布哈林的观点占优势。针对粮食问题、“商品短缺”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乌格拉诺夫回忆了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警告。他引证了七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的几句话，即提高个体农民的生产率、坚持集体化的自愿性和遵循“革命纪律”。^①为了在不违反纪律的情况下批评目前奉行的政策，右派分子利用了这样一种巧妙的方法：在斯大林分子已开始修订政策和重新解释声明的含义之前，他们着重引用党在以前发表过的声明。

双方都称自己是最严格的正统派，但是否有人同情右派分子，人们可以从他们对党内出现的各种偏离思潮所采取的态度中看出。乌格拉诺夫对这个题目所发表的言论后来引起了最激烈的反对。由于当时各种顾虑已那么强烈，以致《真理报》推迟了十天才发表他的讲话。乌格拉诺夫虽然也批评了各个党组织内反对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党员，但他的主要火力是射向托洛茨基分子的。他和他的莫斯科委员会竭力驳斥关于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之间已分裂的说法，并把它说成是企图给党制造困难的“托洛茨基分裂集团”的诬蔑。^②

斯大林分子对莫斯科委员会的右倾迅速作出了反应，尽管这种反应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九月十五日，《真理报》社论宣布了“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首次公开指出：不仅在共产国际内而且在俄国已经存在右倾，它与托洛茨基分子一样危险。《真理报》几天后写道：“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表现就是它不懂得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党的决议所提出的、加强对富农的

^①参阅乌格拉诺夫：《关于莫斯科党组织今后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②参阅莫斯科党委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决议：《莫斯科组织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真理报》。

斗争和推行集体化的任务……”^①

斯大林分子从未放弃在思想上逐字逐句地忠于主义和严格执行党的正式决议的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为执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采取的必要而又正确的行动。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经济政策到一九二九年已成为历史，但党的领袖们仍一如既往地断言说：他们遵循一九二七年的决议，这是他们行动的依据。任何关于斯大林分子已经违背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路线的说法都被公开谴责为“曲解”。斯大林分子为取得政治成功所使用的办法就是：积极采取行动，把实际上是领导所犯的错误强加到批评者身上，并紧紧依靠他们对党组织、宣传机关和报刊的垄断权力向批评者提起控诉。

古比雪夫在九月十九日的一次演说中向布哈林派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古比雪夫当时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作为斯大林分子的新经济政策的代言人出场的。古比雪夫说，加紧工业化建设的纲领已经遇到了不满和抵触情绪：

“类似的不满情绪甚至已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我们苏维埃机关的某些部门。由此产生了各种怀疑：是否能完成这样大的任务？给我们确定整个经济工业化这样艰难的目标是否明智？由于这样的情绪侵入我们苏维埃机关，因而它们至少也会在我们党内找到入口，党要采用一切可供使用的办法，以便将这类悲观主义或不信任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②

值得注意的是，古比雪夫指责了《真理报》新闻工作中避重就轻的毛病，因为它过分地强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而“对

^①社论：《共产国际关于反对右倾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真理报》。

^②古比雪夫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关于苏联的经济形势》，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我们党组织某些堕落了部门中出现的悲观主义倾向只字不提”。这是“目光短浅的标志，也是对上述倾向和不执行七月全会关于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指示的行为作过分宽恕的标志”。事实上，这恰恰是《真理报》所持的观点。

接着，党的中央领导准备以惯用的组织手段来了结莫斯科反对派一事。斯大林分子利用了正在开展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民主”运动以及即将重新选举各党支部领导的机会，越过莫斯科委员会直接向名义上属委员会管辖的区组织施加压力，并在那里招募追随者。中央委员会声称：“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区的领导，不久以前在反对偏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右倾斗争中已经表露出某些出尔反尔和动摇不定的情感，同时他们容忍对这些偏离者采取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接受的调和态度。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党组织中一部分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希望纠正这一错误。”^①这就是类似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反对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所采用的有效策略。最高领导证明自己有能力离开官僚机关的正常轨道，并利用民主方式将中间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中央的压力立即显示出效果。莫斯科的一些区组织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接受了中央反对俄国党内“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新路线。其他一些区仅局限于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警告，并表示要将“两条战线斗争”进行下去。像官方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区委书记部分是乌格拉诺夫的信徒，部分是中央领导的追随者。莫斯科大学党组织坚定地站在右派分子一边，这是知识分子通常在感情上易为反对派所吸引这一事实的一种体现。^②

为了使中央领导安静下来，乌格拉诺夫在十月初向莫斯科

^① 《中央委员会致莫斯科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见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② 《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3号。

全体党员发出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既强调了右倾的危险性，也严肃地指出了左倾的危险性。^①但他仍旧容忍右的观点在自己的组织内存在下去，一个软弱无力的理由是，他和他的其他二位书记“生病了”。^②布哈林经过苦思冥想向斯大林的经济纲领提出的批评（即《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于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显然增强了乌格拉诺夫的决心。十月三日，他公开警告当心苏联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严重局势，这不但会给工业而且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失。^③同一天，乌格拉诺夫的一位区委书记彭柯夫就同样的内容（《首先是农业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急迫地建议研究布哈林的文章。但他得到的是一个不祥之兆的反应：在紧接着发表的社论中，他手下的人也反驳了他的意见。^④

十月十一日或者十月十一日前后，中央领导发动了一场始终还是不点名的、反对“右倾”的、激烈政论性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同时它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莫斯科反对派。乌格拉诺夫突然发现他对本组织内的人事变动问题已不能参与决定了。^⑤在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下（即使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已被迫同意），两名不愿服从的莫斯科区委书记彭柯夫和柳亭已被免除职务，其理由是，他们“在最近一个时期容忍某些人偏离党的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⑥中央领导即将取得迅速而又全面的胜利，这在莫斯科委员

①参阅《给莫斯科党组织的通知》，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②参阅乌格拉诺夫在克拉斯那亚—普列斯尼亚区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③参阅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真理报》。

④参阅彭柯夫在罗戈施斯科—锡莫诺夫斯基区党组织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⑤参阅乌格拉诺夫在罗戈施斯科—锡莫诺夫斯基区党组织大会上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真理报》。

⑥《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会于十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业已证实。象通常一样，乌格拉诺夫作了工作报告，但他即将垮台的预兆已表现出来了——委员会成员没有象以往那样给他喝采。^① 乌格拉诺夫显然已感到是什么力量在反对他，所以他以讽刺的口吻说：如果他被撤销职务的确是党员们所期望的，那这是合法的。他承认他的组织所存在的弱点；他含糊其辞地供认“在评价经济形势时缺乏清醒的头脑”。但他仍在顽强地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自己辩护并反对各种诬陷。”他十分小心地回忆了列宁就斯大林的性格所提出的警告。^②

乌格拉诺夫的自卫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莫斯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显然已经转向了斯大林分子。代表大会讨论的题目几乎全是批判乌格拉诺夫的错误、抨击右倾、要求遵守纪律和展开自我批评一类的。人们谴责反对派分子企图“自行其事”，并密谋反对中央委员会。^③ 乌格拉诺夫的许多追随者（其中包括已被解除职务的区委书记彭柯夫和柳亭）都坦白认错，并想加入多数派。^④ 区委书记萨弗罗诺夫声称：“唯独党是正确的，我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⑤ 与此相反，被解除职务的鼓动宣传头目马·尼·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仍顽固不化；他谴责他的朋友们没有一点自尊心，因为他们象回避一个党的路线的叛

^① 齐弗里诺维奇，《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一九二八年十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2号。

^② 参阅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80号。

^③ 参阅波隆斯基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01号。

^④ 参阅彭柯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2号。

^⑤ 萨弗罗诺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7号。

徒那样避开他。①

十月十九日，斯大林亲自出席了莫斯科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反对右倾的长篇演说，但他仍旧没有进行点名攻击。他确认：俄国共产党内同样象共产国际内一样存在着右倾倾向，并称它“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这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它现在已明显地反映为一种“动摇”，这种动摇已造成了新的经济困难。更有甚者，斯大林把右派竭力捍卫党的旧路线的行动都说成是有其他的用意，并以此制造了一个反无产阶级的替罪羊：“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倾危险……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斯大林在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就告诫那些口头上表示反对右倾而实际上毫无行动表现的人：“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②就像为准备再次出击而让老鼠休息片刻的猫一样，他不久之后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趋向。”他承认：“组织斗争是有过的……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人们理解为他在说笑话：会议记录已在这句话的后面注上了“笑声”。③在总书记的进攻下，乌格拉诺夫的反抗彻底失败

①马·尼·利亚多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798号。

②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195、201、202页。

③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46、247页。

了。莫斯科委员会承认它的工作中“有错误”，并毫无保留地赞同由中央委员会安排的人事变动。^①当乌格拉诺夫的部下当面对他说，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时，他失去了大家的宠爱已十分明显了。^②

这时，莫斯科的一般党员公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属于右倾是不是符合事实。^③斯大林作了这样的“承认”：在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组织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但他否认政治局内有右倾及调和态度的存在，他说：“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④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为止，斯大林仍一直否认他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右倾有关系。在此之后，那些不是“党的敌人”的人被告知，这三个人早在莫斯科危机前几个月就已经参与反对派活动了。

莫斯科的大灾难使布哈林大吃一惊。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帮乌格拉诺夫讲一句话，只是看着他垮台；同时他也担心，李可夫可能会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斯大林作不适当的让步。因此，他决心向斯大林直接发起挑战。据称，为了给反对派设置障碍，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由它来阻止布哈林飞回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时，右派领袖已开始发起“进攻”，他们坚持要举行政治局会议并要求进行组织变动。想赢得时间的

^①参阅《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

^②参阅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③莫斯科党委会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报告：《关于党组织内与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有关连的情绪》，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2号。

^④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03页。

斯大林宣布准备成立一个政治局下属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一问题，这一委员会由他本人、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和李可夫组成。但是，尽管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审查委员会始终没有能集会。布哈林为此气炸了并离开了政治局会议，以此表示抗议。^①

布哈林的这一举动招致了右派分子的联合行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去了他们作为共产国际书记和《真理报》主编、政府总理以及工会主席的职务——他们以此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权力地位及其政策的怀疑。^②据报道，斯大林当时面对辞职声明脸色苍白，并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辞职声明。^③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一时期除了右派领袖公开进行反抗活动外没有任何办法能打乱斯大林的计划。斯大林匆忙但又非常巧妙地表示愿意和解，并以此达到了这一目的：政治局一致赞同了应由中央委员会于十一月通过的经济政策的决议。^④皮达可夫就此评论说：“斯大林向各方让步，不管这涉及什么问题，只要保证意见一致即可。”就斯大林一方来说，要取得意见一致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根据托洛茨基分子的报告，如果斯大林向右派作出策略性的让步，他有可能失去他的顽固追随者。^⑤会

^①参阅托洛茨基，《在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联盟内部》，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79号。这报告是根据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九年一月在皮达可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谈内容写成的。

^②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8—511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在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联盟内部》，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179号。

^④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0页。

^⑤参阅未著名的《给朋友们的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议通过的决议具有妥协的各种迹象，更有甚者，它本身在农业或重工业是否享有优先地位这个问题上就自相矛盾。^①然而，它又不得不要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收回他们的辞职申请书。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强行通过了一项关于政治局完全统一的一致声明，保证说（在李可夫表示忠于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党的最高领导中决没有意见分歧。^②

在最高层的分歧一直秘而不宣之时，在党刊和党组织内开展的、依然是不点名的、反对右倾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后半月里，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它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右倾危险。斯大林表示他对两个集团完全一视同仁，并以此向全会说明了在同一时期反对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错综复杂的两条战线斗争：“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就是右派，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真正“没有引号”的左派是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分子的命运问题，以此来提请所有觉得自己已被右派吸引住的人注意：如果他们非试图组织自己的派别，那目前开展的反对他们的“思想”斗争还要通过“组织”措施来加以补充。^③

按照斯大林的口径，中央委员会不仅把右派分子和采取调和态度的人，而且把对调和分子采取调和态度的倾向都加在上述人员头上，他指出：“不言而喻，要克服这些倾向，就必须不断进

^①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2—479页。

^②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11页。

^③参阅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38、240、246页。

行斗争来反对对这种倾向的庸俗的无原则的容忍态度（调和主义）。”然而，它再一次保证说：如此危险的偏向必然要失败，因为它已无能力来抵挡“全党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击”。^①

党机关为“党内民主”而开展的虚伪的运动也是为消灭事实上或有可能出现的反对派分子服务的；按照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这场运动应能“根据组织的真正意志来撤换任何一个书记和解散任何一个党的领导机关……”。^②从当时的党的发展情况看，党在地方各级组织中贯彻的意图始终与最高领导的愿望相一致，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民主”是通过全会所决定的清洗运动来得以实现的。从外表看，它的目的是解放没有享受充分自由的党员，但实际上它已被用来反对有不满情绪的人。这场运动整整经历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而且有许多普通的右翼反对派的追随者成了它的牺牲品。^③

党的所有领袖，其中也包括后来被“揭露”为右倾分子的那些人，都为这场反对右倾和调和倾向的斗争助了一臂之力。绝不愿被盖上反对派集团的印记并竭力想维护党领导表面上统一的布哈林分子，显然无条件地支持了这场反对他们自己的追随者的组织运动。在寄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一份关于十一月全会的报告中，李可夫完全像斯大林一样，把右倾说成是对富农的压力所产生的一种动摇；他明确地声称，政治局是一致的，并且说有可能采用思想斗争之外的方法：“就思想斗争而论，如果右倾已具有轮廓并脱离了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轨道，那么将

^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78页。

^②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整顿党的发展》，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84页。

^③参阅波沃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76页。

来就要采取其他斗争手段来对付它。”^①

中央委员会十一月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委员会立即集会，以便在它的家里建立正常的秩序。现在，由莫洛托夫主持会议；他表扬了莫斯科组织，因为它毫不动摇地抵制了右倾。^②会议接受了乌格拉诺夫、他的另一位书记柯托夫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两名委员的“辞职申请书”——这是当时流行的婉转措词。莫洛托夫和其他四个人被确认为常务局的新成员。莫洛托夫、尼·厄·鲍曼和康·瓦·乌汉诺夫（加米涅夫在莫斯科苏维埃里的继承人）组成了新的莫斯科委员会秘书处。在这同时，基层组织也作了相应的变动；换岗是完全彻底的，而且进行得很顺利。^③

四、工会中的右翼反对派

在莫斯科反对派遭受失败之后，反对派还剩下一个组织据点：托姆斯基领导下的工会官僚机构。尽管托姆斯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地位，但这里也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斯大林是党的主人，党外违反他意志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持久存在下去。

自托姆斯基一九二二年保住他的职位以来，工会的政治地位和它们在工业方面所享有的职能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它们的活动已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条件，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的活动相似。虽然它们作为保证对非党产业工人施加党的影响的“传动装置”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当然也尊重国家的利益，使生产过程

^①李可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关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见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

^②参阅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③参阅《莫斯科委员会会议决议》，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不受干扰——但它们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并在社会政策的许多领域里从事活动。同等报酬的理想仍一直在产生影响，托姆斯基在一九二六年曾以“阶级基本平等”的名义主张取消工资差别。^①

仅因为存在许多幻想，工会机构自然可以说是民主的。只要托姆斯基本身没有失去党的宠爱，有党组织整个权力支持的托姆斯基在他的领导地位上就是不可侵犯的。但是，托姆斯基的公开演说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一般水平的令人厌倦的党务干部。他主张工会自治无疑与个人的许多权力利益有关。因此，他为斯大林分子提供了攻击面，他们用“反官僚主义的”策略对他展开了进攻。

托姆斯基公开与右翼反对派来往，这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目的，倒不如说是出于斯大林的压力；斯大林的压力显然在于：如果一个党的领导人不把他获得一定地位这一点归功于斯大林，那么，斯大林就要用迫使他加入反对派的办法来破坏他的名誉。斯大林的超工业化纲领已证明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它不仅把那些由于经济理论原因或政治原则问题而产生顾虑的人推到灾难深重的反对派一边，而且还挑动工会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抵抗。加速建设的政策，尤其是加速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必然要迅速改变工会与工人和国家的关系。工会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自一九二一年的工会问题争论结束以来这一直是工会的主要职能）现在已停止，工会今后的主要使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托姆斯基决心反对在苏联社会中实行这样一种根本的变革；他一再写道：只要一种新方针还没有确定下来，工会的主

^①参阅托姆斯基在全苏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速记报告》，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51页。

^②参阅米·雅库勃松：《俄国工会及其发展、既定目标和对国家的态度》，一九二三年柏林版，第138—139页。

要使命仍旧是代表与国家和个体的资本家相对立的工人利益。^①他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计划经济和控制工会活动的新制度推行三年之后，苏联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降低了百分之四十，或者百分之四十以上。^②

尽管托姆斯基于七月在政治局内已公开站到右派分子一边，但直到一九二八年秋人们还没有感觉到对工会领导施加了任何直接的压力。虽然他由于“投降主义行为和信心不足”而惹起了斯大林的恼怒，^③但七月份进行的下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完全是在右翼工会领袖的影响下完成的。洛佐夫斯基（他是当时工会中央理事会里为数不多的斯大林分子之一）建议重新讨论和选举代表，但多数人反对他的建议。^④为此，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被推迟到十二月份举行。这对斯大林分子是极为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他们还没有摧毁右翼反对派在党机关中的组织据点之前，避免在工会中进行一场较量。在这期间，工会和其他一些组织之间发生了小摩擦，预示着冲突即将到来。

早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就着重谈到工会中的“民主”受到损害的问题和在这些组织内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必要性。这项任务将由工会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承担，这就是说，掌握在右派分子手中的工会的正常组织渠道应当改道。^⑤因此，工会和经济当局之间的意见分歧周期性地出现了；工会抱怨说：根本没有真正的集体协定。^⑥经济计划人员企图掩

①参阅托姆斯基：《俄国工会的新使命》，一九二八年莫斯科版，第12—13页。

②参阅索洛蒙·施瓦尔茨：《苏维埃俄国的劳动力》，第319页。

③参阅《亲爱的同志》，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442号。

④参阅《朋友们》，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⑤参阅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和工人发出的号召，见一九二八年元月三日《真理报》。

⑥参阅迈纳德：《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俄国》，第357—358页。

饰他们本身的问题，并开始把经济困难推到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个原因上去；这显然是一种推诿，这更加激怒了工会工作人员。^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之前，工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发生过最激烈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公开辩论中还具有强烈的余波。争论的问题是：谁主管青年工人，谁负责对他们进行教育。《共青团真理报》和工会的报纸《劳动报》相互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工会中官僚主义盛行的指责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场争论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点。在这里，首次作为较重要的政治角色出现的安·亚·日丹诺夫支持了共青团并暗示：必须撤销包括托姆斯基在内的整个工会领导人的职务。^②

在斯大林分子击败了莫斯科组织内的反对派之后，他们立即就把目标转向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编辑部内的无声无息的人事变动首先使托姆斯基的力量不再可能对无理指摘进行回击。^③接着，正当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和解决莫斯科偏离者之际，《真理报》开始向工会工作人员发起进攻。在一篇题为《加强党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文章中，中央机关报直言不讳地对工会限制“自我批评”和“民主”以及工会组织与它的成员间缺乏联系的现象提出了抗议。《真理报》暗示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将要产生的后果。它写道，必须向工人说明，提高工资必须与提高生产率摆正关系。^④三天之后，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要求

①参阅托姆斯基等人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速记报告》，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180、201、411页。

②参阅托姆斯基等人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110—113、116、130、177—178、189—195页。

③参阅《朋友们》（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50号。

④参阅《加强党在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对工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公开的讨论，并抱怨在自我批评问题和工会中的官僚主义等重要问题上出现的“沉默的阴谋”。^①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已在强调对工会问题予以重视；它突然发现：为完成工业建设的新任务，工会已不能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它们确实患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毛病。^②

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这些日子里，即在人们为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最后准备之时，报刊和党组织已处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之中。它们在积极鼓动“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正确签订集体合同。《真理报》以“团结”、“积极性”和“战斗精神”这些口号将运动引向了高潮。^③尽管这场运动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清楚它是指向谁的。斯大林分子借助必要的组织压力获得了工会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大多数，从而为决定性的较量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除了共青团问题外，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并未公开出现其他的意见分歧。就当时党内的状况来看，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这一点可以从发言人支持或批评托姆斯基领导集团的言论中，从发言的字里行间揣摩出来。一部分人说对“缺点”给予了“过多的注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过分地强调了所谓的成果。托姆斯基在官僚主义问题上不得不作一些让步，他在他的报告中承认，工会已脱离了工人，而且也很少关心他们个人的疾苦。然而，他提出的改善工厂状况的药方对斯大林分子来说同样是无法接受的。他建议，应当迫使企业领导履行自己的义务，付给令人满意的工资。^④一个富有启发性的

^①参阅伊·尼·尤尔恩贝格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上的撰文。

^②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整顿党的发展》，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82页。

^③参阅社论：《工会与群众》，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

^④参阅《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4—54页。

插曲表明，一个要求按原则办事的共产党领袖会处于什么状况。这个插曲是：工会中央理事会中一位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试图提出一份决议草案，结果被叫喊声阻止了。为此，托姆斯基谴责了与会代表们，说他们拒绝一个按照传统有权发表自己正式观点的人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就此事，大会进行了表决，结果托姆斯基失败了：大会以压倒的多数（四票反对、二票弃权）决定不让偏离者发言。^①

一些重要的事情不是由整个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共产党党团的代表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举行的秘密集会上决定的。在党的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具有一种与正常代表大会讨论中出现的截然不同的语调：它是斯大林主义的新的粗暴的声音。决议支持加速工业化并公开谴责了“制造恐慌气氛的、关于农业衰落的说法”。它要求每个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批驳了工会“只管工人”的意见：“克服恢复时期的困难这一任务要求工会更多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部门的工作，为积极完成社会主义的当前任务，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求更大范围地发动工人群众和农村中的劳动人民。”^②

共产党党团会议规定的人事变动符合新的路线。五名斯大林主义的党领袖（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被选进了工会中央理事会。^③托姆斯基的追随者首先竭力破坏卡冈诺维奇的当选，因为他是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显然也是斯大林主要助手中的最不令人喜欢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④托姆斯基抱怨说，由于接受卡冈诺维奇进

^①参阅《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206—207页。

^②参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关于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见《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04—505页。

^③同上，第573页。

^④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77页。

入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内就形成了“两个中心”。他不断发泄自己的怨气，并一再以辞去理事会主席职务进行恐吓，在十一月份，他以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辞职没有被批准，但托姆斯基这一次坚决拒绝继续参与理事会的工作。^①右翼领袖白费气力地对党机关侵入工会组织提出了抗议：这似乎是“工会中托洛茨基主义的变革”。人们以不完全是无理的指责回答了托姆斯基，说他想把他的工会组织（像布哈林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封建王国”。^②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委员会要求撤掉托姆斯基形式上作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他和他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工会中央理事会。^③一个可靠的斯大林分子，即尼·米·什维尔尼克，成了托姆斯基的继承人。他只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没有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当时他名义上是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这之后，他又继续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直到他于一九五六年三月退休为止，他一直是全苏工会最高领导人。^④

随着斯大林分子在组织上获得胜利，工会的生产率职能已成为无可非议的理论。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委员会交给工会一项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组织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方面，以及对无产阶级的新的阶层进行阶级教育方面应该起决定性作用

^①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9页。

^②同上，第506页。

^③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8页。

^④参阅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真理报》。

……。”^① 工会在新时期的口号是“面向生产”，以及“同工会运动中的工联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② 新经济政策显然已经结束了。

五、经济计划问题

在斯大林摧毁右翼反对派在党组织内和工会中的支柱这一过程中，他的力量与右派之间的政治裂痕已越来越深。双方的意见分歧已从富农和粮食这些专门问题上扩展到经济生活和国家前途方面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争论的问题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问题和最棘手的哲学主题。

如果人们注意一下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辩论，那么斯大林分子在一九二八年底制定的工业化路线无疑在政策上是有根源的。现今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是当年的问题，不同的只是斯大林分子现在取代了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位置，并且反对一直坚持官方立场的右翼。斯大林竭力否认他在两年后的今天简单地抄袭了托洛茨基的路线，但他愈是激烈否认，却愈能说明他已趋向于不惜牺牲农民利益而实行加速工业化的左翼纲领。^③

（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份，托洛茨基分子已被辱骂为“超工业化分子”。^④）一些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发现斯大林的纲领与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5页。

^② 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86—187页。

^③ 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1—60页。

^④ 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78页。

他们的纲领极为相似，于是他们“投降”了；这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理解新路线的（参见第十四章）。斯大林接受了左的纲领，这就部分地证实了左翼反对派的这种说法：国家在经济上已进入死胡同。但他之所以对工业化直接感兴趣，主要是出于他的政治动机。总之，他这样做仅是诱使右派分子提出抗议的一种手段；因为，人们可以把这种抗议行动说成是偏离行径。

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当右派分子和左派分子围绕工业化速度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时，职业经济学家之间也产生了类似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两种有本质区别的计划方案已经制定出来了，一种是以“进化论者”为代表的，一种是以“目的论者”为代表的。进化论者强调经济趋势的不可影响性，要求使计划适应情况；目的论者断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制造经济规律。目的论者的主要职业代表斯·古·斯特卢米林把马克思的一句话略加修改后这样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经济而是改革经济。”

“我们不受规律的束缚。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下的堡垒（斯大林后来剽窃了这一口号）。”“速度问题要由人来决定。”^①

面对斯大林分子的坚持，进化论者也没有完全拒绝上述目的论者的观点。他们和党内的布哈林派准备尽力支持国家按计划发展经济的努力，只要这些努力不超出确实可行的范围。一九二八年以前还在负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弗·亚·巴扎罗夫，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指出：国营工业可以而且必须按照目的论者的方案进行计划管理；然而，在国有化经济领域外，首先是在农业方面，人们必须按进化论的观点不断地注视经济发展的

^①斯·古·斯特卢米林：《苏联工业化和民间的死板模仿者》，一九二七年《计划经济》第七期，第11页。

前景。^①在平衡法则下，这就意味着：俄国工业的增长率也是有一定的自然限度的。进化论者在辩论过程中声称：“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但我们认为，经济规律也适用于苏维埃俄国。在制定计划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考虑实际情况及其规律性。”^②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人们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从农业出发设想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极限，并在这一极限范围内提出了“控制数字”。一九二八年，人们实际上就是借助于这些指标来指导当年的全国经济活动的。人们还曾经从较长远的观点出发，制定过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所谓远景计划，虽然这些远景计划没有实际意义。^③但是，制定长远计划，这就证明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在把他们把托洛茨基分子作为超工业化分子来加以抨击时，在脑子里已有一项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经济发展的纲领。

原则上讲，当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李可夫提出的提纲时，一个有关五年发展计划的想法已获得党的承认。然而，人们还在更多地强调谨慎从事和保持平衡。李可夫特别指出：在组织上和结算方面存在的缺点以及收成和外贸方面的不稳因素必然将使经济计划受到限制。^④

当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已考虑到各种限制和意外情况的计划时，在计划工作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与国家计委相竞争的机构，这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实际上行使的是工业委员会

^①参阅弗·亚·巴扎罗夫：《关于远景计划的方法学》，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8页。

^②《五年计划》，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版，第26页。

^③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230—234、320—334页。

^④参阅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377、378页。

的职能)。它自一九二六年起由从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一个忠诚但并不出色的斯大林分子古比雪夫领导。^①在古比雪夫的带领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着手起草他们的五年计划,它更多地强调重工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科学家们嘲笑地称这个计划是“空中楼阁”。^②一九二八年五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它的计划,其中规定五年内工业增长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国家计划委员会立即提出指责,声称这项建议忽视了所有的自然、技术和社会的局限性。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也提出了它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具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保守的,一种是最佳的。最佳方案预计在五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约为百分之九十。^③由于党领导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事实,也就不再能从经济角度,而完全是从其他方面来考虑如何解决错综复杂的计划问题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以后,经济政策问题由于与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之间的党内权力之争联系在一起而一直悬而未决。斯大林分子开始暗示,他们赞成激进的经济办法——他们显然希望以此来挑动右派分子起来反抗并使他们成为攻击的靶子。卡冈诺维奇在七月全会上就限制对价格的操纵和向富农展开进攻问题所作的说明就是这类策略之一。在斯大林分子改善了其组织地位之后,他们于八月份开始强化自己的路线,着重强调把贫农组织起来和加强集体化。^④莫洛托夫警告说,不允许任何有利于富农的措施存在,有利于富农的政策“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是‘与农民友好的’政策,这种政策按其

① 参阅德米特里也夫斯基:《苏联的肖像》,一九二七年柏林版,第188—189页。

② 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232—233页。

③ 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计划经济》第四期,第126—130页。

④ 参阅社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真理报》。

本质来说必然会否定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①八月中旬，在对暧昧态度提出警告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不完全是无意之中）新的粮食危机。当斯大林分子在阐述他们的新的经济政治路线和清除莫斯科右派分子的时候，他们从此时起已清醒地看到农业局势不稳。不管是真是假，粮食问题显然已被绘影绘声地描绘成是潜在的危險，而这种危險的存在（如果说人们相信党领导的话）正是还没有具体下定义的右翼的观点。

尽管双方进行了政治交火，但在农业政策上，党在一段时期内仍继续保持着一直为右翼所捍卫的、正统的观点。在一九二八年的整个秋季，官方的许多声明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把它当作加速工业化纲领的基础。例如，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体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虽然驳斥了弗鲁姆金关于农业实际上在倒退的指责，但它承认农业停滞是国家经济的中心问题。^②不过，现在特别受到重视的是，提高农业水平的新手段，尤其是加速建立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人们声称，它们应成为宣传现代技术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中心，是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的支柱。这虽然不是路线的突然改变，但它预示着具有威胁性的风暴就要来临。

工业政策的变化是较为明显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仍被置之不理。像古比雪夫后来所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八月份提出的计划之所以没有被采用，是因为它“不完善”，而且它“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力量源泉”。因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责成它的计划人员修订此项计划。^③与此同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又在它五月份提出的高速度发展计划的基础

^①莫洛托夫：《关于目前的形势》，见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真理报》。

^②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4—469页。

^③参阅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上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经济年度提出了详尽的控制数字。好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已得到党的正式批准，古比雪夫要求所有企业都来参与修订最终计划。^①在此之前，对高速工业化提出的批评受到了谴责。

古比雪夫九月十九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是到目前为止一个最为明显的信号，它说明斯大林分子已决心发起进攻，并排挤所有那些不适应新方针的人。古比雪夫说道：“我们必须明瞭，减慢工业化的速度，从各方面看，都是错误的……。有人说，我们在推行‘超工业化’，是‘不量力而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警告所说的。古比雪夫为打消这种异议又说：“我敢肯定，凡是认真研究了我国经济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最严重的不平衡……就是我国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的不平衡。”^②很显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不可能得以确认。但是要想区分新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与左翼反对派多年来提出的主张，则需要作出极其辩证的、十分细致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古比雪夫的声明并没有立即引起攻击大合唱，人们只能由此得出这样的推论：它首先仅是一个试探性气球。人们从古比雪夫一九二八年秋一再主张加速工业化的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股热情中可以认为，他已被真正的“超工业化”的热情占据了全部心灵，而且那项计划也许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对他的计划深感满意，因为这项计划为他给右派分子盖上偏离者的印记提供了一种手段。

从古比雪夫在九月份的说明中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斯大林

^①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计划经济》第四期，第126—130页。

^②古比雪夫：《论苏联的经济形势》，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分子有关加速工业化的愿望已遭到了反对。最为戏剧性的是，布哈林本人就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该文章于九月三十日发表于《真理报》——表示了这种反对意见。布哈林写道：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违反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精神——它没有考虑储备的必要性，没有设法消除消费品短缺现象，而提出了一个高得可怕的投资额。他警告说：“投资过多，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①

政治局内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立即谴责布哈林，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显然党机关也接到指示，要劝阻党员阅读这篇文章。^②不久之后，即当莫斯科的组织斗争已达至高潮时，官方回答了布哈林关于维护经济平衡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就经济性质问题、经济活动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种全新的观点：“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不充分利用国家的人力物力、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就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来发展工业：它不是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跛足，而是要赶上和超过它们。”^③按照这种新的经济理论，计划当局当然不能只简单地分配现有的资金，而要通过说服或暴力手段取得成果；制度的要旨是通过采用军事纪律来创造经济资源，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里，我们看到了依靠国家权力支撑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的核心；人们不应低估这种发展经济的办法。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办法，苏联的经济体制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并使苏联在今天成为决定世界

^①参阅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②参阅格列沙罗夫一九二八年十月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812号。

^③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致莫斯科党组织的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命运的竞争力量之一。

斯大林分子清楚地预见到，以强制办法求得发展的思想必然会立即引起反抗，他们也采取了措施，利用人们对右倾孕育着的不安情绪，来反对可能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

“按照这种办法所带来的困难（物质资源的紧张、商品短缺等等）无疑会引起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我们党内一部分人的摇摆。在这种基础上，许多倾向有时就会显露出来，具有这类倾向的人就会修正党的方针，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就会阻碍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他们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去克服困难，而是逃避困难。”^①

为了说明新的路线的正确性，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民族主义情绪。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全会上提出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结束“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这一目标。^②对斯大林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使落后于西方工业国的国家强行加速发展的一种抉择、一种制度。

在这段时间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人员拟定了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草案，但这项草案还是不能符合斯大林领导集团日益增大的野心。^③据古比雪夫说，十月份制定出来的新计划已收回了，“因为它没有能正确地给全体劳动群众、党、工会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指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④正当经济学家们重新修订计划草案，使之更符合要求时，中央委员会在十一月

^①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致莫斯科党组织的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真理报》。

^②参阅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15页。

^③参阅金兹堡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八月份提出的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计划草案。^①奇怪的是，这一决议后来却被看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而当时完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还没有制定，更谈不上批准了。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批准通过，但人们却毫无道理地把这项计划的签发日期写成一九二八年十月。

当右翼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一九二八年秋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政策改革时，他们无疑是以一些原则为依据的。布哈林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错误，天真幼稚，但就理论方面来说，他还是一名正直而又严肃的思想家。他和他的哲学信徒们都是苏维埃俄国最后剩下的真正讲究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坚持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观点只能更有利于斯大林分子完成这一使命，即把右派都说成是具有明显偏离思想的集团。

就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而言，机会主义和谨慎已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这两个人自入党那天起就算是党的右翼，这也许是他们两人的本性问题。他们的软弱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李可夫害怕出现反农民的过分行动，而托姆斯基考虑工人的福利显然是真诚的。当然，他们也想摆脱产生谨慎态度的根源，但他们的谨慎态度已使他们与新经济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他们似乎已不可能采取政治机会主义的方针，即加入斯大林的阵营。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一样，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布哈林暂时除外）之所以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新的革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场革命将会失败。

^①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62—479页。

布哈林对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的忧虑产生于他在一九二五年与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争论时形成的一种思想：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俄国的现实，但只有当农民始终不渝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它才能获得成功。布哈林在他垮台前发表的一篇预见性的文章中重复了这一论断：“如果失去这种特别有利的阶级力量的结合，那末在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基础就要丧失。”^①使他不安的另外一些因素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又逐渐在他身上重现。按照他革命之前的观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力和官僚组织至少是一种祸害。他在一九一六年写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一文中就对欧洲普遍走向“军事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他认为“军事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济生活和其他各种活动都要受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官僚组织和“一个新的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想像的国家制度与它相比就好像是儿童玩具）”的直接控制。布哈林热情地希望社会主义革命将结束这种趋势。^②

布哈林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看法。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之前还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思想中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或垄断的控制将使私人企业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克服；然而，如果人们全面地考虑一下这种官僚化的社会的设想，那么人们就会把它也看作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一种可能出现的可怕的局面。像托洛茨基一样，布哈林也为他的反对派逻辑所驱使，提出了社会主义官僚主义蜕变的理论。早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哈林和他的意见相同者（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已经表示了这种忧虑，即革命在一

^①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②参阅布哈林：《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见《法律革命》第一卷，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21、30页。（利维坦为圣经中的巨大怪物的名字。一译注）

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这一看法又周期性地布哈林的思想中再现。这首先反映在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又再次引用了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这也许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是一贯正统的）。他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在改革社会和领导经济方面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允许使用组织手段：

“如果无产阶级过多地承担这种职能，那它就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为了利用小生产者和小农等人的经济作用，就需要大批的职员和管理人员。要想以国家官员（不管你们怎么称呼，事实上这就是国家官员）取代所有这些小人物，这就必然要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机构；而维持这个机构所需要的费用将远远超过小生产在自发状况下所出现的非生产性开支。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管理形式，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仅不能加速，却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它将走向预期目标的反面。因此，这一铁的必然规律将迫使无产阶级去粉碎这一机构……。如果无产阶级不这样做，那么其他力量就要推翻它的统治。”^①

当布哈林与斯大林的争论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接近高潮时，布哈林重复了他的反官僚主义的论断。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他在讲话结束时提到了这一问题，并着重指出要防止过分集中，认为过分集中将窒息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制造地方主义。^②后来，他又在三篇载于《真理报》的文章中以谨慎的措词表示了他的这一顾虑。第一篇内容极为深刻的作品是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撰写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强调维持经

^①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真理报》。

^②参阅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1号。

济平衡外，还再次提出了他的反官僚主义的论断：“我们是过分集中化了。我们必须提出问题：我们能否朝着列宁的公社国家的方向采取一些步骤呢？”像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一样，《国家与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现在对布哈林产生了新的吸引力。这时，他已不能插手领导工作了，他看到革命的纲领有被篡改的危险。

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布哈林提供了又一次发出警告的机会。出于这一动机，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①布哈林在谈到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和其中包含的警告时写道，促进人民群众的文化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但不能倒退到采用官僚主义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改造。“列宁……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建立各式各样的工人团体同时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布哈林声称，无产阶级国家应是“向公社国家过渡的一定阶段，可惜我们距离这种公社国家还很远很远。同志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是这个样子，那末用什么办法处理它呢？我们应当从哪里去寻求依靠呢？我们应当抓住什么样的杠杆？列宁以出色的阐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我们应当依靠专政的最深刻的泉源；而这个最深刻的泉源是‘先进的工人’。”很显然，布哈林援引列宁的话是为了加强他要求改变政策的力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比总书记更懂得运用专政的“最深刻的泉源”。对总书记来说，“先进的工人”从来就是一支最可靠的有纪律的后备部队。

布哈林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意思非常隐晦。他把这篇文章伪装为一个名叫本特的不太出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所写的一个书评（本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的发展

^①参阅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见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持有与布哈林对过分官僚化和集体化弊病的分析极其相似的看法)。①“是人民为官员服务，而不是官员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布哈林要与之奋战的弊端。布哈林的拯救社会主义的万应灵药是“群众参加管理”和“反对干部队伍官僚化的基本保证”。但是，正是在布哈林的容忍下，书记处已掌握了控制群众的艺术，并使它发展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从而使群众参与实际上失去了任何作用。极权制国家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像以前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一样，布哈林反对斯大林分子的新的经济政治路线的基础是他的平衡论，他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极其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平衡不是静止的思想，在布哈林看来，平衡是一种从长远观点看能保障经济取得更轻松和更迅速发展的条件。平衡也不会自然产生。布哈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是因为它不能保持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最主要任务是确定应做些什么，以便保持平衡；他说：“规定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致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确定动的经济平衡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这样一个自觉地提出的计划既是一种预测，又是一种指示。”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计划人员要像医生对待他的病人那样对待这一问题：他应诊断病情，寻找处方，并努力缩短自然疗程。布哈林认为，这里存在着某些严酷无情的事实（或者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称之为“客观情况”），即“平衡条件”。经济问题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承认这些障碍的存在。在布哈林看来，经济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不尊重国家物质状况的极限。他认为，经济计划就是有效地尊重平衡条件，而不是

①参阅布哈林：《有组织的经济不善的理论》，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

违背它：“如果有人认为，计划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一种按我们意愿行事的可能性，那他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起码常识。”

具体就俄国而言，平衡首先意味着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一种正确关系。农业是工业迅速扩大的基础，要想实现顺利的增长，必须特别重视发展农业。布哈林写道：“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工业，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我们才能持续地保持最高的速度。……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布哈林批评了那种认为要为工业筹集资金就只有剥夺农民的观点。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反驳说：“长期以来，布哈林已忘记了一个列宁主义者应该怎样想、怎样写……二十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布哈林不是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像一个真正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反动分子的后裔那样提出论据。”^①然而，布哈林对农民让步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对经济生活本质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类似进化论的经济科学家在进行计划工作时所遵循的观点。

就经济观点而言，布哈林是一种自由主义者。他的分析是以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原理为出发点的。按照这一原理，社会是由许多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它们的经济作用是不能靠直接的强制手段来发挥的。俄国的农业显然是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经济法则，如供求规律，无疑占据着支配地位，国家只能通过间接的手段（例如价格政策措施）对农业的发展施加影响。同样，斯大林分子虽然也认识到这种状况，但这只能使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此外，布哈林还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认为国营工业发展也具有同样的问题。右派观

^①斯米尔加：《联共（布）右翼纲领》（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档案》，T字2825号。

点的核心是，工业必须按货币对产品的需求量来发展；消费工业首先会对富裕农民的需求作出反应；而对重工业的增长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用来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设备的需求。

布哈林并不反对集体化目标，但他主张通过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来接近这一目标。他坚决拒绝以强制办法来代替经济成果和经济报酬的平衡，认为这只能给经济带来灾难：“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某个生产部门不能有计划地收回生产费用，而且还要另外付出一定的附加税（它相当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那末这个部门就会停滞或后退。”^①

布哈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并同时把人类的福利看作是主要的愿望。这种经济思想与当时领导集团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大林分子不承认自然局限性，而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打破自然局限性。在布哈林分子公开遭到攻击之前，莫洛托夫就右倾观点说道：“右倾思想将会导致把一切都降低到‘薄弱环节’的水平，而不是动员工人阶级去克服工业化道路上出现的困难。”新方针的精神就是通过目标明确的政治行动从社会中榨取国家为实现其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当这一做法付诸实施时，右派分子称这种新政策为“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②这种政策与其说是符合卡尔·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倒不如说是符合伊凡雷帝的经济思想。

在一九二八年冬，党内的分裂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计划的制定，并出现了危机。右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愿放弃它的想法，而且多次没有按党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不断发展它的乐观主义想像，并匆匆忙忙提出它的方案。最高

^①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表的声明，转引自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页。

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计划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预测，不仅揭示了经济规律，而且还要创造性地、自觉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①这完全是按照“目的论”来考虑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就中央委员会应对此作出决定来说，这已是太晚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人员才最终提出一份领导可以接受的最理想的五年计划。这项草案是在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以致古比雪夫未能遵守他所作的诺言，即事先要通过“有群众参加”的讨论来研制计划。^②这一新文件不仅为工业确定了很高的投资率，而且规定国民收入的投资部分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应逐年提高。^③党领导立刻将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利用为自己的论坛。古比雪夫在会上详尽地说明了新计划的好处，它使以前提出来的所有方案都成为多余的了：“只有这一计划方可考虑。”^④在党的压力下，工会工作人员同意了这项计划，^⑤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对此持批评态度。巴扎罗夫后来鼓足勇气警告说：“最严重的后果可能会由此而产生，它将导致对资金的明显不理智的分配，将使整个工业化理想丧失信誉。”^⑥

在一九二九年头几个月中，人们已看到党领导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之间的激烈争吵。斯大林分子一直是比较坚定地坚持尽量加速发展经济的思想，他们之所以这样，似乎也仅仅是

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经济计划方法的讨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引自《俄国经济战线》，第6页。

②参阅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金兹堡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古比雪夫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⑤参阅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第四期《计划经济》，第132页。

⑥转引自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一九三五年第四期《计划经济》，第136页。

为了能够将右派分子指责为胆怯的偏离者。与此同时，他们还控告右翼批评家，说他们推行一项私有经济政策，把他们对经济平衡的忧虑说成是“一种好听的借口，以便发起一场不是关系到方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的进攻”。^①

在这期间，一些拒不服从的经济科学家被清除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被无声无息地但却是干净彻底地撤销了，进化论派别的所有追随者也被解雇了。他们在计划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因“阶级性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党领导把“目标明确的目的论的方法”说成是唯一正统的方法。^②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的许多工作人员，首先是以前曾是孟什维克的工作人员在一九三〇年“工业党”的案件中和一九三一年反对孟什维克“破坏活动”的案件中都遭到了控告。^③但是，清洗并没有就此停止。斯大林分子对发展重工业的渴望甚至超过了目的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达到的地步，因此，他们也被调往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岗位上去。^④

如果回顾一下有关计划问题的争论，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事情并非关系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内部的进化论经济学家和目的论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他们的意见分歧根本不那么大，争论也不那么激烈。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以所有经济学家和右翼反对派领袖支持下的整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一方，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政治家和党中央书记处的政治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它是经济科学和专政艺术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未出现过有关经济计划方法的学术性争论。争论只是隐蔽地缓慢

①格·费·格林柯，《苏联的五年计划》，一九三〇年纽约版，第281页。

②阿龙·尤戈夫，《五年计划》，一九三九年柏林版，第10页。

③参阅雅斯涅，《一个苏联计划人员——弗·古·格罗曼》，见《俄国评论》，一九五四年一月刊，第53—58页。

④同上，第54页。

地展开。在进化论理论被拒绝之后，也没有任何能代替它的理论出现。就是在今天，苏联还是没有完整的经济计划理论。^①在苏联，有关计划方法问题的讨论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一直局限于详尽地解释政治领导发布的指令。^②但这完全是靠愿望和命令来进行管理。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党的决定及其有力的贯彻要比极其精确的科学计划更为重要。^③

一九二九年三月，重新改组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终于提出了一项包含两套方案的计划。然而，时代发生了迅速变化。古比雪夫现在声称：“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④右派分子对此提出抗议并徒劳地提出了另外两种抉择——李可夫赞同“平均数的方法”和一个附加的发展农业的二年计划；因此，他受到了指责，说他反对五年计划并保护富农。^⑤

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获得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批准并在五月得到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会议的确认，这时它才正式成为党的路线。决议声称，这项新的最佳计划从前一年的十月起开始生效。^⑥后来，那些从事烦琐的经济事务工作的人（如从事统计工作或研究平衡规律的人）都被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下列口号就反映了新的精神：“不存在客观障碍，障碍

①这一点也将得到同情者的承认。参阅多布：《苏联一九一七年后的经济发展》，第332、334页。

②参阅哈里·施瓦茨：《俄国的苏维埃经济》，一九五〇年纽约版，第五章。

③参阅斯特卢米林：《苏联的计划问题》，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第16—21页。

④转引自格拉德科夫：《关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见《计划经济》，一九三五年第四期，第134—135页。

⑤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74、76页。

⑥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9页。

一定要排除。”^①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道：不能再说“客观条件”会限制苏维埃政府的愿望。^②从那以后，失败是不能宽恕的，它只能被解释为背叛。

六、哲学上的争论

正当斯大林的追随者在制定新的经济计划时，苏维埃哲学家们也在讨论新路线的思想必然性。党领导适时地找到了称心如意的解释，正式对它们表示赞同，并把它们作为继续反对布哈林分子的武器而加以运用。然而，哲学上的争论不仅作为反对右翼反对派的一个思想战场是重要的，而且它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气质，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作了新的阐述。一种理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传统的决定论观点，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为依据的，但它强调个人意愿与国家强制手段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强调这种力量可以不管物质状况和历史“规律”而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这种思想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在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暴风骤雨时期是苏维埃政府的指导思想。此后，它就赋予苏联的思想和苏联的政治实践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截然不同于革命时代的思想。

哲学上的争论是以苏联哲学界自二十年代中期出现危机时开始的一场非政治性但却是很激烈的争论为背景的。这场被双方称之为“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是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占主导地

^①尤戈夫，《五年计划》，第12—13页。

^②参阅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343页。

位。机械论者（他们的观点起初是盛行的，而且还得到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强调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各种现象（自然现象、生物现象、精神现象等等）的联系。辩证论者却强调发展中的辩证的飞跃和各种现象的不一致性；他们断言：在较高的自然组织形式中，出现了全新的规律。按他们的说法，例如精神现象就不能完全产生于物质现象，而且不能把它作为物质现象来解释。同样，人们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间，以阿·莫·德波林和亚·萨·马尔丁诺夫这两名前孟什维克为首的辩证论者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他们对斯大林分子一直持保留态度，党没有决定赞成他们的观点。就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一位作者在《真理报》上还以完全中立的口吻抱怨说，两派都未向群众解释清楚他们的哲学。^①随着斯大林分子和右翼反对派之间争论的爆发，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在寻机反对右派分子并企图为其新政策作理论上论证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已把辩证论哲学家的理论说成是合理的思想。事实上，经济学界的进化论者和目的论者之间的争论完全类似于哲学界的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之间的争论。辩证地向规律的新水平“飞跃”的思想正好可以用来为违反规律的经济计划作辩护（而谨慎的经济科学家则强调这些规律不能违反）。此外，关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辩证观点也强调了领导人物在这种过渡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完全符合斯大林的计划。最后，人们还可以把哲学上的争论问题扯进党派斗争，因为布哈林在他的理论性著作中已明确地接受了机械论的观点。

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方面，两种观点之间的裂痕应

^①参阅克·德米特里也夫，《深入人心的辩证唯物主义》，见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真理报》。

归诸于一种基本的矛盾心理。①这就是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合二为一的矛盾。决定论声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唯意志论则又激励人们竭尽全力为胜利而斗争。直到二十年代中期，决定论在官方还占优势；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唯意志论又越来越占优势。辩证论者指责人们以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发展，并对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作了解释；他们强调不仅在大自然中而且在历史发展中也会出现非连续性的飞跃。新的哲学提出了人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作用，并认为意志的力量（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意志的力量）可以超越决定论者所分析的社会关系。

一九二九年四月（这时党领导已使右翼反对派不能为害，但还没有将它公开排斥于社会之外），党领导开始向哲学战线发起进攻。辩证论派得到了正式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义不容辞地批判了机械论者“明显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的行径”。②辩证的观点已成为所有忠诚的共产党员必须接受的东西。此外，辩证的观点尤其被用于消除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影响。斯大林主义思想控制的大厦很快地建成了。

通过哲学作出的这种概述给斯大林分子带来了一种直接的好处；他们现在也可以把罪恶倾向这个概念运用于哲学领域。一九二九年八月公开批判布哈林之后，这种概念立即被用到右翼反对派领袖的身上。当时，党的理论刊物对布哈林提出的控告主要是他的平衡论，它不仅被当作一般的哲学思想问题加以批判，而且

①参阅雷蒙德·A·鲍尔，《苏联心理学家的新人物》，一九五二年坎布里奇版，第二章。

②全苏马列主义科学研究所第二次会议决议，《马列主义哲学目前存在的问题》，见一九二九年五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7页。

也批判了它在经济问题上的运用。①一切超越斯大林主义的新解释的理论都被谴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布哈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稳定的行为都被归诸于平衡论。党的理论刊物控告说，平衡论引诱布哈林忽视阶级斗争，并相信能使富农接受社会主义。斯大林说：“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②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就是：不是维护平衡，而是强行改变现有的平衡。

由于把哲学争论用于政治目的，在学术上持保留态度和谨慎态度的迹象都消失了。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作为一个集团的辩证论者都是一些追求功名的平庸之辈，他们力求获得党的支持；而当党给了他们支持后，他们就以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和侮辱右翼观点和机械论的拥护者。从多数有关争论问题的独立自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官方路线的代表几乎没有提出多少哲学观点，逻辑性也差。像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辩证论哲学家未公开说出的一个原则就是：盲目轻视符合理性的分析，只要这种分析不利于党。他们本身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政治压力。但是，苏联的司法是公正的：在一年之内，辩证论者自己也被谴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者，代替他们的是只知道颂扬领袖而根本不知道别的目标的雇员。

在哲学问题的争论中，两种同时进行的过程达到了顶点：用党的政策来对学说作新的阐述和借助于学说的新解释来追求政治

①参阅盖森和彼德沃洛茨基，《右翼反对派的哲学来源》，见一九二九年九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29页。

②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212页。

目标。随着所有反对派分子的彻底失败，斯大林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从此，他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并能把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解释成是合乎逻辑地符合马列主义的。从这时起，对真理的疑虑和批评声已无碍于对意识形态作出新的解释。随着右派分子的垮台，通向斯大林专政道路上的最后的政治和精神障碍也消除了。

七、公开的分裂和右派的毁灭

右翼反对派的历史展现了一个政治集团先被打倒尔后再遭到批判的独特的场面。斯大林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最高层进行公开争论，直到他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解除了他的未来敌人的武装为止。即使在一九二八年秋末反对右倾的斗争已激烈展开时，他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在莫斯科组织的内部斗争中涉及到的人则是个例外）。尽管许多知情人完全清楚这一时期的问题和各派的阵线，但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还是尽最大努力维持表面上的稳定性和党的最高领导内部的一致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斯大林几乎还否认了所有右派分子有派别意图：“联共（布）党内的右派还没有定形，还不是一个集团或派别组织，还没有一次违反过或不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①

右派分子的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同斯大林展开公开的斗争。反对派在开始时享有很高的威信，斯大林对他们的辞职威胁那样害怕，这就是一个证明。但他们由于受列宁主义的教育而尽量地避免使争论公开化，他们是正统思想和尊重党的统一的俘虏。他们认为公众（或党内）舆论不是起诉的场合，而公众（或

^①斯大林：《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64页。

党内)的舆论是可以被歪曲的。在斯大林暂时保护右派领导之际,他已挖好一口捉拿他们的陷阱。斯大林一面否认有关右派领袖不可靠的报道,一面又在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是作为继续贯彻公认的路线而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当布哈林及其追随者后来愤怒地起来反对时,他们却变成了攻击党的公认的路线的人,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反对过党的这一路线。

对布哈林集团进行正式批判是逐步开始的。首先,右派领袖在越来越多的群众面前被加上了偏离路线的标记。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斯大林第一次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非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四月,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但在五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还是维持了领导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揭开了批判右派分子的公开秘密;然而在八月底,当布哈林被撤掉作为共产国际领袖的职务这一消息公布时,公众才知道三名右派领袖失宠了。斯大林分子的战略是,尽可能地隐瞒一切分歧,直到在纪律约束下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右派已完全没有希望在组织中重新获得地位,而且不再有可能通过向党员发出一项号召而使领导面临危险时为止。

托洛茨基分子发表关于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谈的、到目前为止仍是秘密的纪要,这是促使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攻击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原因。奥尔忠尼启泽(他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直接主管这类违反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的案件)要求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说明。据透露,他们确认了关于会谈的报导。^①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全会上(会

^①参阅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74—279页。

上讨论了这一事件),布哈林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严厉地批评了党领导的政策。①他驳斥了有关建立派别组织(反对派通常被加上这样的罪过)的指责,并反对违反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他说,在党组织中,没有一个省委书记是合法选举产生的。但是,这样一来却使他变成了公开向往资产阶级自由的先锋战士。这几乎是所有受打击的列宁主义者所不可逃脱的命运,即使那些曾竭力参与了围攻托洛茨基的人也不能幸免。布哈林也激烈谴责了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说它借助于税收政策(它与“贡税”完全是一个意思)推行一条“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说国家外汇资源被严重浪费,说官僚主义已在泛滥,而反对派却遭到了“斥责”。②

为此,政治局设立了一个下属委员会,它负责起草一份批判布哈林“政治错误”的文稿。后来,它提出了一项“和解方案”:如果布哈林发誓放弃自己的错误并收回他辞去《真理报》总编辑和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威胁——这就是说,他不再给领导找麻烦并进行自我批评,那末它就收回指责性的决议。③布哈林没有屈服,对他的批评被作为政治局的决议收入了档案。④这份文件以异常的腔调列举了布哈林的罪恶,说他诽谤党;他假装尊重党的统一,而同时又组织派别活动;他与加米涅夫秘密策划,而当敌

①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3—96页。

②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0—511页。

③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8页。

④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9—513页。

人把他们的会谈纪要公布于众时，他实际上就是支持了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它还回忆了布哈林过去的错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表现和他的“发财吧”的口号（当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反对斯大林时，斯大林曾把这一口号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很显然，右派领袖已再次公开以辞职来进行威胁；因此，这就给他们招惹来更严厉的指责，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号召，叫党内不满分子……给党和共产国际的统一造成严重的威胁”。^①这就是右派领袖使斯大林害怕的例证。

还未认输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时已制定了一项纲领，同一天，即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他们将这项纲领提交给政治局。^②在这一纲领中，右翼反对派的批评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三个人再次指控斯大林分子“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培植官僚主义”和“使共产国际各支部瓦解、涣散、分裂”等等；右派领袖在对新经济政策作出的“自由的”解释中（斯大林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要求降低工业化速度和保持自由市场；他们再次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提出了抗议。

这一冲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真理报》首次指责了还未点名的右派，认为他们已与列宁主义决裂。^③为了从思想上批判右翼反对派，莫洛托夫找到了当时最为有力的语言：“在我们向富农发起进攻的政策和富农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之间已形成了一条鸿沟……在这个问题上，党不能容忍有任何动摇……”

^①参阅《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509—511页。

^②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二卷，第5页。

^③参阅《反右倾的斗争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见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真理报》。

富农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放弃向富农进攻，这种理论将导致资本主义因素到处泛滥，最终将导致资产阶级政权的重新建立。”^①这里，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二重性又流露出来了：谁不在思想上无条件地适应运动，他基本上就反对它。谁批评“无产阶级”路线，谁就有可能“在客观上”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传声筒。而谁与调和分子和解，他必然要受到谴责，并不许说话。

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点名批判。为了逃避组织压力，右派分子声明原则上同意加速工业化的斯大林主义路线。然而，他们始终还是想采取某种必要的谨慎态度，他们要求在五年计划时期内应有两年的时间着重促进农业的发展，并警告当心“废除新经济政策”。他们为避免直接的反抗活动所采取的策略是那么的成功，以致于党领导为始终保持强烈的战斗气氛而不得不谴责右派“掩饰其真实立场”，并“对最佳计划作了反宣传”。党领导要求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伪善的反对派。^②

由于反对派抱怨他们在党内遭受压制，人们就把他们的这种怨言与托洛茨基主义等同起来了。中央委员会谴责右派（完全像当年指责左派那样），说他们不断破坏纪律，并指责他们与当年的左派一样，代表“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中那些最容易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最有蜕化危险、最不稳定的分子，以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起来在右倾倾向最严重的和以隐蔽的方式出现的地方“揭露”右倾倾向。它强调拥护党内民

^①莫洛托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困难》，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②参阅社论：《为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见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主，但又加上了使这一概念失去其内容的限制条件：“列宁的党坚决反对这种使党内各种倾向和派别集团合法化的‘民主’。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和团结。”^①

斯大林利用中央委员会会议首次系统地说明了他与布哈林的“分歧”所在。他在长时间的演说过程中指责并证实布哈林在各方面犯有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不抨击共产国际中的“调和分子”；面对富农的威胁，他抛出了“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他看不见过多的自由贸易对新经济政策来说是多么危险；他不认识集体农庄中出现的一种工农联盟的“新形式”；他以表面上无条件地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来鼓吹一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他搞派别活动，破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不完全是毫无道理地）把布哈林关于缺乏民主的怨言说成是“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一种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慌话……”斯大林最后喊道：“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呢？”^②

党领导似乎对农民政策还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它首先把集体化说成是技术援助的泉源，是个体农民的榜样，而个体农民在今后几十年中应当继续作为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存在。^③李可夫显然还是作为这种官方的和解方案的代言人出场，他说：“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我们对农民的援助、为扩大农业中社会主义成

^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事件》，《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6页。

^②参阅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112—142页。

^③参阅政治局对加里宁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命题：《农业的发展和减轻对中农的税收》，见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十九期，第401页。

分而进行的斗争和为市场进行生产的个体农民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巩固工人阶级和主要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与此同时，我们要以此来改善各种可能性，从而迅速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在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迅速改造农业和向富农（资本主义因素）发起卓有成效的进攻。”^①

李可夫的这一言论，加上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有关五年计划的主要报告这一事实，人们似乎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是右翼反对派十分坚定的成员。虽然他的名字在有关斯大林与右派之间公开发生摩擦的报告中首先被提到，但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的这次事件中更多的是涉及他的个性问题；由斯大林造成的政治上的意见分歧在当时还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右翼反对派被迫形成。许多迹象表明，李可夫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远不如布哈林那样坚决。按照斯大林的报告来判断，李可夫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就突破了右派的统一阵线，还在斯大林主义领袖采取行动之前，他就收回了辞职恫吓书。^②李可夫也许在一九二九年春还坚信，他不属于已被预定为处罚对象的右派；他把自己的名字借给斯大林，以便他们能把自己的政策当作是老的正统政策的继续。当人们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公开谴责布哈林时，他得到了宽恕（这是对他的酬报）。和布哈林相比，过了好久他才被免除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

四月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它们涉及右派领袖的个人问题）当时没有发表；然而，中央委员会显然已采取了一些实际的处罚措施来反对右派领袖：它建议撤销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

^①李可夫，《在莫斯科省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

^②参阅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274—279页。

席的职务；这项决议直到七月份才执行。接着，布哈林第一次遭到了猛烈的公开攻击。尽管在四月份人们无疑都在私下里议论斯大林分子与布哈林分子之间的敌对问题，但是在紧接着中央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人们还是竭力维持最高层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①布哈林分子为斯大林分子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不让广大追随者知道最高领导层分裂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其实质。这种做法实际上起了促进他们走向灭亡的作用。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五年计划，确定了进行清党运动，并继续不指名地批评右的摇摆是“在阶级敌人的压力下公然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放弃列宁主义立场”。^②李可夫像一个最忠实的斯大林分子一样坚决拥护五年计划，他说：“必须使五年计划的各个基本要点深入到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思想中去，以便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努力与他们努力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坦白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曾错误地认为，随着从所谓的恢复时期向重建时期过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工业发展速度，似乎会明显地减慢。”^③另外，人们还可以从古比雪夫（他主要负责制定斯大林主义的工业政策）的报告中听到一种预示不祥的声音：“我们中间有一些党的工作者十分怀疑我们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对失败主义的情绪，缺乏信念和从小资产阶级分

^①会议甚至通过了一项简短的决议，这项决议（它与四月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反右派斗争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点了布哈林的名，但这项决议并没有与其他会议文件一道发表。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90—513页和第四分册，第53—54页。

^②参阅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9页。

^③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子身上带入我们队伍的各种倾向作丝毫的让步。”接着，一场似乎是为了保护新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清洗运动开始了。古比雪夫按斯大林主义的习惯把新的正统路线看作是旧的正统路线的真正体现：“五年经济计划严格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即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①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乌格拉诺夫（他在前一年的秋天不幸卷入了公开的争论）被免除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鲍曼替补了他的位置，同时也接替了乌格拉诺夫作为莫斯科省党组书记的职务。鲍曼在向选民作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时，首次公开向右派发起了最激烈的进攻，并毫不掩饰地对右派领袖进行了人身攻击。他指责右派领袖“在莫斯科组织内搞残酷斗争，企图与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不讲原则的联盟，破坏党的决议和政策”。^②这时，离公开把右翼反对派槟斥于社会之外的日子已不远了。

托姆斯基，作为右翼三巨头中的第一个，不得不离开他长期保持的位置。六月间，他正式被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位置上撤下来。接在他后面的是布哈林。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乐意地满足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愿望，剥夺了布哈林主持工作的权利和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资格。^③起初，布哈林被解除职务一事没有公开宣布，但反右倾的诽谤性运动仍在进一步展开，右派过高地评价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能力这种异端邪说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右翼反

^①古比雪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

^②鲍曼向莫斯科党组织作的报告：《关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中央全会和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

^③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见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对派最后残存的一批追随者被驱逐出共产国际。①例如，经济学家欧根·瓦尔加不得不容忍对他进行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稳定化发表过意见，而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右倾的味道。②（瓦尔加侥幸地度过了三十年代的清洗运动，但在一九四七年，他又一次被指控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没有预见资本主义就要崩溃。）

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公开谴责布哈林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踌躇；但是当右倾倾向在某些党组织内再次明显活跃起来时，这一奇特的踌躇也随之消失了。③从《真理报》发表文章攻击右派分子施泰因和萨兹金，到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判布哈林和宣布他同意撤销其职务的决议（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相隔了一个星期。接着又过了三天之后，《真理报》才在一篇专门社论中展开了对布哈林的进攻。这是要在报刊和党的会议上进行一连串公开的、有充分准备的指控的信号，这一指控运动直到作为政治家的布哈林被彻底消灭时，才告结束。

这出戏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结束的。右倾领袖中的第二等人物（以乌格拉诺夫为首）屈服了，并赞同了一份关于批判布哈林运动的宣言。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声称：党的官方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只是想以自己认为正确的办法来追求相同的目的。⑤人们对此愤怒地回答说：布哈林

①参阅社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成果》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提纲，《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②参阅奥·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今后的任务》，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③参阅斯·维·柯秀尔，《论联共（布）党内的状况》，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国际新闻通讯》第六十四期，第1376—1377页。

④参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⑤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398页。

集团在诽谤党，他们在无理要求不受限制地从事派别活动的权利，并拒绝改正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的屈服被驳斥为纯粹的“派别活动手腕”，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完全相似。布哈林立即被开除出政治局，这正好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宣布托洛茨基垮台整整三周年之后。对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如果他们企图继续反对”，那么他们就会得到类似的处罚。^①从这时起，右派领袖的处境不比一个有休假的囚犯好多少。《真理报》宣布：党所期望的是，他们不要重新犯罪，不要再回到老问题上去，只有老实认罪，才会得到宽恕。^②

右派领袖终于不得不公开收回他们的错误说法，想以此来拯救自己，但这已为时太晚了。由他们三个人联合签署的供认自己错误的自白书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于《真理报》，自白书说：

“在最近的一年半时间里，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问题上，我们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已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和其他会议的文件和声明中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声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这场争论中是正确的。我们在大家知道的一些文件中提出的意见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承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与全党同志一道同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首先是同右倾和对右倾采取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以便克服一切困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完全的、最迅速的胜利。”

苏维埃俄国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①参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布哈林集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11页。

^②参阅社论：《总结与展望》，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第十四章 “人民的敌人”

随着右派在一九二九年的垮台，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作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已不再存在了。一九二九年以后，虽然共产党内也出现过反对派活动，但它仅代表一些个别人，而且具有偶然事件的性质，还是在幕后进行的；它与以前的派别斗争的历史现象几乎毫无关系。这种后起的反对派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组织或纲领。它从未严重威胁斯大林的最高领导地位，而且在斯大林独揽大权并控制了党的整个生活和全部言论之后，一直隐藏在（与斯大林）意见一致的烟幕中。重大的意识形态或原则性的争论问题已不再通过派别争论来决定。反对派作为活跃的、反映苏维埃制度内部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发展的力量已不再存在。随着一切真正的反对派分子的消亡，苏维埃国家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已在它的政治结构、纲领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具备了那种能表明其特征的面貌。

部分是由于上述原因，部分是因为在收集一九二九年以后的资料和对它加以解释方面存在着困难，所以本章不可能像前面几章那样作出完整的历史性的描绘。按照一种跋的要求，还需要探讨在斗争中遭受失败的老反对派们的后来命运，这自然是一部使人感到惊异的衰亡史。

当斯大林成为握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时，人们还没有预见到他有一天会给他所有被击败的对手以同样的命运。左翼反对派的

领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右派领袖则保住了他们的党证，有些人甚至还保住了官职。在一段时期内，左派和右派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到了后来，所有遭到不幸的人都被“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所概括了，而这些人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有的和斯大林处于相同的地位，有的在地位上还高于他。“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所有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押上了刑场。

一、流放中的左派

在左翼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唯一进行合法政治活动的舞台）之后，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不长。一九二八年一月，人们得知，托洛茨基一方指责公开表示后悔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不坚定性。这被看作是一种证明，说明反对派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集团。^①党领导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它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把托洛茨基和大约三十名其他左派领袖（其中有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斯米尔加、谢烈布利雅柯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流放到各个偏僻的地区去，以此作为行政处分。托洛茨基扣人心弦地详细描述了他被遣送出莫斯科的情景。为了阻止反对派的追随者在他上车的火车站举行有计划的示威游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最后时刻将他带到另一个火车站，他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送出了首都。^②

托洛茨基被遣送的居留地是阿拉木图，它是中亚最边缘的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托洛茨基在偏僻地区的流放生活并不完全苦闷。他有一座住房，可以让他的家属，甚至秘书留在身边。他可以与他的意见相同者进行广泛的信件往来（部分是公开的，部分

^①参阅祖瓦里纳：《斯大林》，第471—472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95—497页。

是秘密的），而这些人也被流放到国家的其他角落。^①

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立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收回了他们的错误言论（这是在他们被开除出党以前）。但这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他们还是被开除了。此后，季诺维也夫分子继续明确地声称他们是正统派，并向反对派表明这样一种思想：“在联共（布）党外，我们的列宁主义思想只能遭到一种命运——蜕化和衰亡！”^②最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屈服终于得到酬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们又被接受重新入党。然而，这几乎可以说仅是进行再考验；他们不再能得到任何重要的职位；而且最后的结果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能逃脱作为牺牲品这一下场。

像季诺维也夫集团一样，有几个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也逃脱了被流放的命运。党领导无疑也认为，可以用压力或者劝说的办法来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宣布与反对派决裂；其理由是：反对派实际上是政治上最受诅咒的第二政党。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设想，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以及许多二等的反对派分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到五月间收回了他们的错误言论。

皮达可夫是在一九二七年秋最严重的时刻开始动摇的。他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反对派问题所成立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说，他虽然认为反对派的纲领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反对派违反党的命令而发表它和宣传它。^③正像列宁已在一九二二年所指出的那样，皮达可夫首先感兴趣的是工业管理，他更多考虑的是一项

^①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04页。

^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③参阅奥尔忠尼启泽：《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43页。

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党内民主。因此，当斯大林开始积极推行工业化时，他主动地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二月，他请求重新入党。他声称，他不再提特米多尔式蜕化，而且觉得有义务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党的统一事业（事实上，他后来也以优异的成绩证实了这一点）。^①他又被接受加入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被任命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他在这一地位上获得了声誉，被称作是“苏联新型重工业建设的真正领导人和指导者”。^②尽管如此，他在一九三七年的审讯运动中还是坐上了被告席，并被判处了死刑。

克列斯廷斯基自称，他从来就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个积极成员。如果这是指一九二一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那是对的。在那段时间里，他已作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而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并被调往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他被任命为苏驻德大使，这是一项重要的但又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职务）。一九二八年，也就是在他真正表示忏悔之后，他被提升为季诺维也夫领导下的副外交人民委员。一九三八年对他的审讯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当时使苏联的司法公开出了故障。在法庭上，克列斯廷斯基收回了他在通常的“预审”期间已交代的供词，这使出席者诧异不已。法庭立即中断了审理，并将克列斯廷斯基交给警察进行再处理。第二天，他再次向检察院承认了自己的证词。然后他被枪决了。^③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宣布与反对派彻底决裂。他承认，斯大林自一九二三年以来对反对派的批评，即反对派极力要成为第二政

^①参阅皮达可夫请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见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②F·贝克和W·哥丁：《俄国的清洗与逼供》，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112页。

^③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法庭审讯记录报告：《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集团案》，第36、157—158页。

党并违反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顾了一九一五年，那时他已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并且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断言说，他在当时实际上已站在列宁一边。更有趣的是，他向总书记明确表示不再提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作出的批评：“您……已让人看出，您已将列宁个人对您提出的意见铭记在心”——斯大林已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①但不知是党的利益所需要还是由于斯大林的“粗暴”性格，安东诺夫于一九三八年被处决了，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曾是苏联政府在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这也是他一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②

一九二八年，托洛茨基派中的“投降主义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左翼反对派分子仍坚持他们的原则，而且只要情况允许，就继续宣传他们的观点。很明显，当斯大林与布哈林分子的斗争日趋尖锐时，左翼反对派在党内还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致于这种状况已成为斯大林十分惧怕的原因。^③因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决心采取严厉措施，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让他流亡异国。另外，托洛茨基的一篇批评性文章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借口（这篇文章后来通过某种途径弄到国外并在那儿发表了）。托洛茨基关于波拿巴式的政变已开始的说法，和他向工人提出以罢工来反对政府的要求，被说成是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好见证。^④为

^①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致斯大林》（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真理报》。

^②《工业工会》杂志也证实了这一材料。参阅《工业工会》，一九五八年第二版，第四十卷，第20页。

^③参阅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15页。

^④参阅《真理报》攻击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指令性信件》所发表的社论，见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了寻找一个准备接受托洛茨基的外国政府，会谈开始了；最后，苏联与土耳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托洛茨基永远地离开了他曾在那里组织过革命的国家。^①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一事，事后是很难加以解释的。让托洛茨基生活自由，这显然是一种危险；除此以外，逮捕他，并在适当的时候处死他，这似乎应更符合斯大林制度的特性。在国外，托洛茨基变成了共产主义反苏批评运动（那种使斯大林最为讨厌的反对派运动）的中心。在国外追随者的协助下，他很快开始建立组织；不久，他已能与他在苏联的力量建立秘密的联系。这个集团创办了一份刊物，即《反对派通报》，而且已成功地将它偷运进苏联境内。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党内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人结合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托洛茨基分子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即无保留地与正式的共产党决裂并最终地摆脱了只能有一个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一教条。这样，他们就成立了第四国际（一个很成功的第三国际的仿制品），其任务是干扰它的祖源——第三国际运动——的工作。

难道驱逐托洛茨基出境能给苏联领导带来任何一种好处，这种好处能抵销由此而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外部压力吗？对一个不太巩固的政府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取的出路，因为除此之外，要么就得允许托洛茨基作为他的追随者的聚集点在国内生存下去，要么就得以共产党员政治罪将他判处死刑。然而，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很快出现了第一次处决一个反对派信徒的事件。这个受害者就是秘密警察的官员勃柳姆金（他于一九一八年作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枪杀了德国驻苏大使），因为他轻率地访问了居住

^①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1页。

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①总之，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也许是出于错综复杂的考虑。不过，就某种意义来说，它的敌人生活在国外，这对政府是有一定好处的。托洛茨基是一个替罪羊，斯大林在托洛茨基的周围布下了所谓的密谋活动网，他从一九三四年就开始用它来捕捉牺牲品。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三起最大的有关反对派问题的公审案中一个主题就是，反对派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背叛性的联系。

作为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的预言家托洛茨基，他的艰辛而又多歧路的历程持续了十一个年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他还是一个孤独的政治流亡者。他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从土耳其的普林西比岛移居到了法国，又从法国去了挪威。一九三六年，苏联对这一国家开始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托洛茨基不得不再次寻求新的避难处，最后他去了墨西哥。

在他所有的所谓帮凶被消灭之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来说已不再有利可图了。因此，托洛茨基遭受了两次暗杀。第一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他遭到不知名的谋杀者的机枪扫射，但未击中。在这同时，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共产党分子，弄清了通向托洛茨基住处的入口；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这是第二次），拉蒙·梅尔卡德用凿冰斧砍进了托洛茨基的头颅。^②苏联政府一直否认它对此负有任何责任；但在斯大林看来，长期受其迫害的人得到这种可怕的结局似乎不是一场悲剧。

斯大林与右派的决裂和一项激进的新经济政策的宣布，对击溃处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反抗起了明显的作用。斯大林

^①参阅约翰·杜威：《列昂·托洛茨基案：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审讯报告——调查预审委员会》，见一九三七年《纽约报》，第105—108页。

^②参阅伊萨克·唐·莱文：《暗杀者的心腹》，一九五九年纽约版。

的农民政策和工业政策显然是建立在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所代表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主要区别是，他以更高的激情来推行快速工业化的纲领。在一些流放者看来，斯大林本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左派分子；他们开始自问：究竟为什么还要长期地反对党的领导集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写道，斯大林集团和左派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必须得出基本而又全面的结论，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奉行的政策不是（像反对派所称的）一种右倾……而是相反；就某些重要的观点来说，它已明显转向正确的路线。”他将领导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称之为“反对派在道义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号召反对派及其领导赶快放弃各种敌意。^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证表明，左翼反对派的思想明显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一种制度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这是一项原则。他们不可能想像还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重视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使这些左派分子看不到斯大林的政策与他们本身的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别；例如，他们忽视了斯大林分子以什么样的狂热性在推行强制性的集体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展计划的设想完全相反，斯大林分子采用的是国家压力的手段。

一九二九年年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眼罩与斯大林的超工业主义一起在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造成了一股投降浪潮。拉狄克热情颂扬这场正在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并竭力要求重返岗位和参加斗争。^② 在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反对派中的所有同志》（一九二九年四月），见《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阅拉狄克，《致斯米尔加》（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转引自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一梦想落空了》，见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真理报》。

领导下的一个小集团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支持五年计划和反对右翼反对派的斗争，谴责派别活动并拒绝参与托洛茨基想在海外组织反对派运动这一尝试。这些当年的反对派认为托洛茨基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但却是变了质的党。他们请求批准重新接收他们入党，并建议其余的左派分子也这样做。^①痛心疾首地发誓要放弃以前派别活动的人马上被重新接收入党。拉狄克又找到了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阶层的通道，虽然不能代表官方态度，但已作为斯大林最重要的代言人和宣传者。从表面上看，他与布哈林一道起草了一九三六年的宪法。^②为了酬报他，他在一九三七年的重大叛徒案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仅坐了十年牢。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详细情况；据谣传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为党刊撰写文章。可以确定，他在那个时期或后来死于狱中。

在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中也有极少数人继续坚决反抗斯大林政府，他们宁愿接受流放处罚而不愿忍受低头认罪の耻辱。在这些顽固分子中，拉柯夫斯基尤为突出。他凭以很大的独创性竭力从理论上剖析苏维埃制度。拉柯夫斯基在进行分析时从这一观察出发：俄国的经济贫困落后排挤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扩大了经济差别，并在无产者统治阶级的内部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这种思想后来已由托洛茨基作了详尽的说明，并把它公布于世。这种思想构成了托洛茨基在他的《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控告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基本论调。^③（近年来，南斯拉夫人密洛

^①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前领导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和伊·帖·斯米尔加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与反对派决裂的声明》，见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真理报》。

^②见多伊奇尔：《斯大林》，第359、370页。

^③参阅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凡·吉拉斯已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新阶级的理论。^①)

从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显然早已开始。值得注意的只是，左翼反对派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使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察觉到这场深刻而又持久的演变。除了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曾一度产生恐惧心理外，直到被流放的拉柯夫斯基从理论上解释他为什么不支持斯大林的残酷的革命之前，反对派领袖根本就看不到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反革命以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拉柯夫斯基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就其性质来说已变成了官僚主义社会制度，因为最积极的工人被换进了党和国家机关，而他们在这些机关中享有经济特权地位。^②当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开始对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提出抗议时，它似乎已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的反对派预见到，党的制度的变质必然要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事态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言：敌人已通过官僚主义门窗潜入党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变成了官僚权威主义的信条，“集中化领导已把命令和强制……方法上升为共产主义教条，并以一种精湛技艺美化并完善了它，使它在官僚史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③拉柯夫斯基认为这些官僚基于强制性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是可恶的。他徒劳地指责他以前的反对派朋友（斯大林政府取得的物质成果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俄国，要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缺乏经济和文化的先决条件。尽管这种思想

①参阅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一九五七年纽约版。

②参阅拉柯夫斯基，《论党和国家机关变质的原因》，见一九二九年十月《反对派通讯》第六期，第14—20页。

③拉柯夫斯基、维·维·柯秀尔和M·奥库策哈娃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草的《提纲》，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七期，第9页。

长期以来已被指责为孟什维克的异端邪说，但它应该受到重视；同样，拉柯夫斯基从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政治原则的重要性也应受到重视。他抱怨说，投降主义者对国家取得的单纯的经济进步表示满意：“（他们）并未想到，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倒塌。”^①

二、不幸中的右派

斯大林分子采取的新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使右翼反对派提出来的问题不再值得考虑了。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恰恰引起了右派所担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从表面上看，国家日益增多的困难引起了新的正当的怀疑，甚至使那些一直与右翼反对派毫无关系的人也产生了忧虑。但这样的怀疑仅增强了斯大林坚持他的方针的决心，他认为右翼反对派的警告没有任何正确性。他日益担心反对派领导可能成为一种新倾向的潜在核心，随着这种担心，他采取了无情的预防措施。这几乎可以说成是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动力。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这一冬季，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开始了。在四个月期间，苏维埃政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整个国家已有一半以上的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而在俄国欧洲部分有余粮的东南地区百分比还要高。使用暴力推行集体化所带来的后果不久也显露出来了。斯大林就此说道：党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由此引起了退却现象，并使冬季的一半工作不进只退。^②然后，新的进军又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开始了；一九三一年，又有一半的乡村实行了集体化；到一九三六年，所有的农民基本上被纳入了

^①拉柯夫斯基、维·维·柯秀尔和M·奥库策哈娃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草的《提纲》，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七期，第5页。

^②参阅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239页。

这一新的制度。^①

为了给自己在这一危机时期进行辩护，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充分利用了后悔的右派领袖。两年半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作了这种忏悔。现在收回自己错误的做法已出现了新的形式，托姆斯基证实自己在这方面具有真正的精湛技艺。他对自己从事反对派活动的经历作了全面的自我批评。他特别谈到了工会反对派问题。他承认：工会反对派“把民主化带进了工会工作人员的队伍，把无组织现象带进了工会工作并迫使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唯一正确的措施……撤除工会运动的整个领导。”^②代表们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向托姆斯基表示了某种友好的宽恕。始终是政府首脑的李可夫试图以这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他实际上根本不曾是真正的反对派分子。不过，党代表大会对他的演说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③受到攻击最激烈和被处罚最重的布哈林没有抓住（或者得到）这一为自己减轻罪过的机会，他没有出席会议。最侮辱性的考验不是落在反对派最高领导人身上而是落在被开除出机关的最为不幸的追随者乌格拉诺夫身上。尽管他明确承认自己有过错（他的讲话一再被听众的辱骂声所打断），代表大会似乎对他还不满意，因此他还得提交一份补充声明（他在这一声明中还要进一步表示收回自己的错误言论）。他说他自己“偏离了列宁主义，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采用了“与党敌对的派别斗争方法”。^④基洛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对右派进行谩骂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每取得的一点进展，每建立一个集体

①参阅贝科夫：《苏联经济体制的发展》，第327页。

②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参阅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④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农庄，都不仅是在与我国的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取得的，而且也是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等同志的斗争中取得的。”^①

最后要说的一点（这也是领导集团在这一时刻所盼望的）就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根本没有反对意见。对右派分子来说，坦白承认错误根本无济于事，它只会引起新的控告：

“代表大会要求全党注意，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右倾分子正采用新的手腕，他们形式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意党的总路线，但是不用实际工作，不为总路线进行斗争来证实自己的诺言，这实际上不过是从公开的反党斗争转到隐蔽的反党斗争，或者说是等待良机向党进攻。

党必须对这种两面派作法和欺骗行为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要求所有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以积极捍卫党的总路线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否则，必定会遭到组织处分。”^②

从鲁祖塔克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情况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他先摘引右派领袖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提交给政治局的声明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反对一人决定涉及到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反对个别人代替集体的领导，不管这个人享有多高的威信。”接着，鲁祖塔克说道：这是“直接诬蔑党，直接诽谤斯大林同志；他们以此指责斯大林同志想以个人领导我们的党”。^③但是，到一九三八年，鲁祖塔克却被受到诽谤的斯大林同志清洗了。

^①基洛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35页。

^③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右派分子再一次降级。^① 乌格拉诺夫和他的莫斯科伙伴（柯托夫、库利科夫和柳亭）没有被再次选入中央委员会。托姆斯基的工会干部（施米特、多加多夫和瓦·米·米哈伊洛夫）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托姆斯基丧失了他在政治局的席位，而三名忠于斯大林的候补委员（基洛夫、柯秀尔和卡冈诺维奇）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于一九三四年被暗杀了，柯秀尔于一九三八年被清洗了，卡冈诺维奇于一九五七年被一位新领袖推翻了。）斯大林现在已牢固地掌握了最高决策机关，而他这时已经不信任他自己的追随者了。

与托洛茨基分子相比或者按照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标准来衡量，右派显然还是受到了宽大。李可夫仍呆在政治局内，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还留在中央委员会。前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和工会工作者多加多夫保住了他们在组织局内的席位，不过只是候补委员而已。这种挽留做法，使人想起了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对工人反对派作出的让步，和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容许季诺维也夫分子保留其职位的情景。向垂头丧气的反对派作出的让步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再听到它有干扰性的悲叹声。

认为反抗斯大林的一切希望都已成泡影的布哈林看来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能起些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被任命为《消息报》总编后，就理论和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然而，他在这些作品中放弃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原来的思想，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传声筒。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底，紧张气氛又开始显露。十一月，对所谓的工业党的审讯又开始了；许多被称作为“资产阶级专家”的人，被指责为搞破坏和从事“危害工作”。他们都慷慨地承认了

^①参阅《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9页。

自己的过错。从此以后，寻找替罪羊已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困难作出的重要反应。

接着，在十二月初，又突然宣布撤销两名党务干部（谢·伊·司尔佐夫和W·W·罗米纳泽）的职务，其理由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左派’和右派的反党联盟”。^①司尔佐夫—罗米纳泽事件一直是个谜。这两个所谓的领袖没有一个属于杰出的政治人物，即使司尔佐夫曾担任过较高的管理职务。司尔佐夫自一九二四年起为中央候补委员，自一九二七年起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九年五月，他接替了李可夫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首脑，并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分子称他是自私自利的“两面派人物”，他一方面秘密地同情右翼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冒充是忠实的斯大林分子。^②罗米纳泽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二七年是斯大林在中国贯彻耽误了的和毫无成效的革命政策的秘密使者之一，他是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至于他搞所谓阴谋已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显然已取得不少成绩的党务干部怀有什么目的，这些始终是个秘密。据一份报告称，受到清洗威胁的罗米纳泽在一九三六年自杀了。司尔佐夫大约也在同一时期消失了。^③“密谋”实际上为党的领导集团效了劳，使领导集团进一步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了压制措施。紧接着司尔佐夫—罗米纳泽事件之后，李可夫彻底丧失了他在政治局内的席位和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奥尔忠尼启泽从中央监察委员会进了政治局；斯大林的头号追随者、一直可靠的莫洛托夫担任了政府首脑。^④

^①参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第6页；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24—26页。

^②参阅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③参阅祖瓦里纳，《斯大林》，第625页。

^④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二十八卷，第153页；第三十一卷，第173页。

一九三一年初，另外一出戏又上演了，即审讯孟什维克“危害者”。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批评过工业化速度问题）作为被告人或证人出场；被牵连进这一案件的还有梁赞诺夫（他是最后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党的思想理论家，这时也被撤掉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领导职务）。①

一九三〇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采取的纪律措施一度保持了政治稳定。然而，在可怕的饥荒（它是集体化的结果）的影响下，局势在一九三二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又变得严重起来。许多事件又完全像上次那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阴谋被揭露，危害者受到了审判，同时政府竭力隐瞒经济危机的程度。所谓的密谋就是柳亭（乌格拉诺夫和右派当时在莫斯科的追随者）的作品。柳亭虽然在一九三〇年没有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他显然保住了他在鼓动宣传部的地位。他于一九三二年被捕。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即把柳亭集团开除出党的决议）称柳亭集团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它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企图以非法的手段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恢复资本主义而特别是要在苏联恢复富农阶级”。②柳亭的秘密纲领就是一份含有典型的右倾思想的文件，它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和完全解散集体农庄。除此之外，它还触及了一个实际问题：它要求撤掉斯大林的职务。③托洛茨基分子也表示了同样的希望，希望来一次转变。投降分子伊·尼·斯米尔诺夫现在又有了别的想法：“鉴于目前领导的无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要走出经济和政治的死胡同，有必要更换党的领导。”④

①参阅托洛茨基，《梁赞诺夫同志的垮台》，见一九三一年五——六月《反对派通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第19—23页。

②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真理报》。

③参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④引自多伊奇尔，《斯大林》，第349页。

斯大林对此作出了强烈的神经质的反应。柳亭被判处有期徒刑。据称，仅是由于政治局提出了抗议才使他免受处决。^①柳亭轻率地公布了他掌握的同情者的人员名单，而政府就利用这一机会使一大批反对派分子卷入这一案件。乌格拉诺夫和许多其他的右派分子因此而被捕，受审讯，并被迫重复自我指责的仪式。^②同样，不幸的前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牵连进了柳亭事件，并再次被开除出党。^③六个月之后，他们经过卑躬屈节的自我侮辱后第二次被重新接收入党，但他们的安宁日子已不长久了。

对斯大林来说，这段时期是他整个政治生涯最不顺利的时期之一。就连他的夫人也奋起反抗，结果也不免惨遭一死。（据谣传，她不是自杀就是被她的男人害死的。^④）据报导，斯大林有一次差点儿神经失常：为了迫使他的政治局进行信任投票，他冒险地提出了辞职请求。^⑤

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外一个地下的反对派支部被揭露了，这个支部是由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和另外两个右派分子（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组织的。他们被控告组织“资产阶级蜕化分子”，具有与柳亭集团相似的“恢复资本主义、富农阶级”的目的。斯米尔诺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他两个人被开除出党。这一偶然的事件又使当时的右派领袖挨了一顿辱骂，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攻击，因为他们没有与斯米尔诺夫

①参阅谢烈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第279页。

②参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③参阅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的决议，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真理报》。

④还有谣传说，斯大林枪毙了她的夫人（见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纽约时报》），我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得到证实，到处都在流传这一传说。

⑤参阅巴尔米纳：《一个幸存者》，第264页。

的倾向作斗争，“同时由于自己全部的行为而使一切反党分子指望获得过去右倾反对派首领们的支持”。①

柳亭和斯米尔诺夫的密谋以及一九三三年一月对“危害者”提起的新的诉讼(这是针对英国梅特罗非克尔公司的工程师的)，为改变方针提供了借口。斯大林开始作战略性的退却，并要克服饥荒。向农民作出的重大让步(主要就是分给农民一至二俄亩*的自留地)改变了一点集体农庄制的最糟糕的特征，使俄国的集体农业获得了一点能稳固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同时，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也更多地考虑到消费者的需要，尽管它仍旧强调重工业。

为了加强他的地位，斯大林再次运用他的清党技巧(它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九年就已经被采用过)。这次行动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其明确的目的是：“保证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把一切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混进党内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②这一次清洗的规模较大，进行了三年，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告结束，接着就进入了大量逮捕和杀害的火山时代。在一九三三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这一期间，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从近三百五十万减少到二百五十万以下。③在一九三三年被开除出党的这些人中，有工人反对派最后剩下的积极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④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清洗运动的特别目的是清除那些过分重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党员。这里所涉及到的最杰

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爱斯 戴维、托尔马切夫、阿·普·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352—353页。

*这里的一俄亩相当于2500—3400平方米。——译注。

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清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352页。

③参阅芬索德：《俄国怎样被统治着》，第223—224页。

④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450、456页。

出的人物是斯克雷普尼克，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他受尽了漫骂，最后自杀了。^①

难道政治危机（由于集体化而引起的危险）避免了吗？当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时，有人至少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宣称，党的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巩固、更毋庸置疑。^②右派领袖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移，他们同时又再次进行了通常的自我诽谤；拉柯夫斯基（他是一直坚持到此时的唯一的托洛茨基分子）经过六年流放生活的磨炼终于放弃了斗争，并为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大唱赞歌。^③因此，斯大林慈悲地放弃了他在代表大会上做结论的权利。他在《代替结论的话》中说：

“同志们！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表明，我们党的领导者们的观点……在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总结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就表明，我们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异乎寻常的。”反对派“被击溃、被驱散了”。斯大林说。^④五年之后，曾参加过这次思想一致的列宁主义党的会议的代表，有一半以上的人失踪，成了清洗运动的牺牲品。^⑤

不幸已经临头。一九三四年着手进行的改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很能说明领导集团中所谓可靠的斯大林分子的忠诚程度。在一

^①参阅斯大林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329—350页。

^②同上。

^③参阅多伊奇尔，《斯大林》，第351页。

^④参阅斯大林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336、307页。

^⑤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德文版，第874页。

九三〇年，尽管当时对右派采取了惩罚措施，但只有六名中央委员没有再次当选；而这一次，在七十一名全体中央委员中（已自杀的斯克雷普尼克不计算在内）就有十三名中央委员未再次当选。在候补委员中，简直可以说出现了山崩地裂，在一九三〇年获得这一职务的三十六人中，有三十人被剥夺了这一职务。没有证据说明，采取这样规模的改组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有组织和有原则的反对派集团。很明显，这次改组涉及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危机的年代里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

有谣传说，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在最核心的人物中似乎出现了新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政治局已分成两派，即强硬派和温和派。^①被认为是自由派（指温和派——译注）的有：伏罗希洛夫、加里宁（他们在一九二八年曾动摇过）和鲁祖塔克（他刚刚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基洛夫（他是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人们认为他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强硬路线的最杰出的拥护者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九三四年，“自由主义者”好像占了上风；在经济方面，人民得到了喘息时机，对老的反对派分子的迫害程度也减弱了。似乎狂飙与突进时期已成为过去。

回顾当时，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曾盼望有一个安定的时期，以便能更安稳地消除他的政权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老反对派分子对他所构成的威胁。从他对反对派分子采取的行动来看，他是犹豫不决的、出尔反尔的；他当时也许还没有最后决定采用他尔后所采用的方针，他也许还害怕过早地采取暴力措施，将使反对派分子赢得同情者。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肃清反对

^①参阅《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见多伊奇尔，《斯大林》，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353、354页。

派分子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新的外部威胁，也许是害怕人们对他即将与外国民主主义力量结成联盟而提出批评。

斯大林针对他的敌人所制定的计划完全像他的统治野心一样，可能是在与他们争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然，他的小心谨慎的心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集体化造成的危机已经过去，当人们幻想友好的时代即将开始时，他才寻找借口来彻底肃清所有会惹他发怒的分子。斯大林的政权在集体化运动期间是否已受到右翼反对派的严重威胁，这还是个疑问，对这个问题也许从未有过回答。在研究苏联一九二九年以后这段历史时，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未解开的谜，因为没有纪实资料。一些观察家们认为：斯大林感到他的政权受到右派分子的威胁，这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不了大气候，是因为他们缺少坚定而又果断的领导。由于证明材料贫乏，所以人们只能从少量的有关在这个时期党组织内右倾问题的已知的资料中得出结论。

尽管右翼反对派的警告已如此明显地得到证实，但这个时期的右翼反对派仍然是虚弱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党内右倾思潮的基本特点：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固的、有组织的集团；它从未明确地阐述过在反对领导集团的斗争中能作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存在于谨慎的列宁主义之中的各种右倾倾向从来没有同时转变成积极的因素。斯大林领导集团中的个别成员从一九二八年起的几乎十年里不时地感到局势不稳，并加入了由反对派分子组成的正在日益壮大的集团，而这个集团就个人来说是认真负责的，但在政治上则是瘫痪的。

但是，右翼反对派的弱点（与左派相比，它缺乏原则性，而且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同时又是它能生存下来的原因。然而，它始终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右倾势力，这一点在以后的危机中暴露得更为明显。人们也难以严格区分早期的右派分子和后来反对强

制推行领袖政策的一批斯大林分子。因此，领导理所当然地把党的重要部门中出现的任何动摇倾向（例如一九三四年的“自由”派，假如它确实存在的话）与右倾倾向联系在一起，即使它没有直接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左翼反对派被完全消灭，在清洗运动过去之后，仍然要反对布哈林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的俄国战俘中出现了一场伏拉索夫运动，人们从这一运动中还可以听到右翼反对派的反响。与布哈林分子保持直接联系的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M·A·苏科夫，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儿子，曾是布哈林领导下的《消息报》的副总编。在与德国人勾结期间，他显然已直言不讳地接受了右的温和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斯大林。^①

当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取得政权并担当起国家领导的责任重担时，潜在的右倾倾向又到处出现了。如果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希望能逐步地并采用很少的暴力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他显然是在效法布哈林。直到一九四八年垮台，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总书记。^②因此，哥穆尔卡和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被开除出运动时的一个理由就是被指责为“右的民族主义倾向”。^③

当铁托在一九四八年起来反对苏联的统治时，在斯大林分子对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控告中甚至也出现了布哈林的名字。^④共产

^①参阅格奥尔格·菲舍尔：《反斯大林的苏联反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预谋案》，一九五二年剑桥版，第39、40、148页。

^②参阅亚当·乌兰：《铁托主义和共产党情报局》，一九五二年剑桥版，第158页。

^③参阅《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决议》，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纽约时报》。

^④参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见《苏南纠纷》，一九四八年伦敦版，第15、43页。

党情报局控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是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没有认识到（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日益尖锐；相反，他们却在宣传（就像布哈林一类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资本主义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①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逐字逐句地反驳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并在与莫斯科决裂的头三年里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整个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②就某些方面看，这种反击不仅带有布哈林反对派而且带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气味；南斯拉夫的思想家们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提出的“公社国家”的无政府思想以新的生命；并且指出，在苏联可以观察到社会主义在发生官僚主义蜕化。他们指责说：苏联是“对工人实行官僚主义的专政”，“对劳动群众实行新的剥削”，“对马克思主义的官僚主义修正”。^③这种指责听上去与俄国反对派的观点很相似。

在苏维埃俄国，人们没有让右倾危险绝迹（相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威胁却很早就被作为一段历史而结束了）。如果说人们是想借反右倾来封住经济学家的嘴巴（因为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党领导的严格标准），那这场运动只能加倍地召唤布哈林主义幽灵。一九四七年，欧根·瓦尔加遭到了指责，说他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在指责中人们使用了当年批判右翼反对派时所使

① 《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公报》，《苏南纠纷》，一九四八年伦敦版，第62、63页。

② 参阅H·F·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哥利亚》，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82—114页。（哥利亚系《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勇士，后为大卫所杀。现代常以此名比喻巨人。——译注）

③ 纳伊丹·帕希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在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蜕变》，一九五一年一月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96、103、115页。

用的语言。^①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咒骂了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即尼·亚·雅罗申柯；斯大林将他的思想与布哈林有关尊重经济科学的思想置于同等的位置。^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林科夫于一九五五年二月被免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之前不久，人们也指出了右倾危险。问题主要涉及到重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关系；《真理报》主编D·T·谢皮洛夫大肆指责主张把重点放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经济学家，他说：

“人们真难以想像一种反科学的、腐朽而又使国家招致灭亡的‘理论’……”在揭露右倾投降主义者（他们想迫使党接受‘印花布工业化’的纲领，以便保证轻工业的优先发展）的理论过程中，斯大林说道：“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③同样，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还可以听到主张把重点放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人的反响。四月，令人同情的雅罗申柯（他把降低对斯大林的评价说成是精神自由的再生）由于发表“反党的挑衅性的声明”加上他“腐败的个人品德因素”而再次遭到攻击。^④

为哥穆尔卡于一九五六年在波兰再次掌权，并从苏联的严格控制下获得一定的独立性时，右的共产主义也得到了辩护。与布哈林的思想相一致（但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哥穆尔卡废除了部分已经制定的农业集体化计划，制止了秘密警察的惨无人道的越轨行为和对精神生活的控制，并暂时给予产业工人在其企业委

^①参阅E·D·多马，《关于瓦尔加问题的争议》，见一九五〇年三月《美国经济评论》，第148、149页。

^②参阅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82—603页。

^③D·T·谢皮洛夫：《党的总路线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④参阅《共产党由于忠诚于列宁主义已取得并正在取得胜利》，见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真理报》。

员会中一定的自主权。哥穆尔卡的制度的界限看来完全类似于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界限：始终保持一党专政，党领导在谨慎从事的同时应在组织和思想上享有最高的权威。^①

斯大林逝世后，右翼共产党人在匈牙利起了极为戏剧性的作用。为了减轻由于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给人民带来的经济压力，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身为共产党政府总理的纳吉·伊姆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危机中，当群众性的起义威胁着要完全扫除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时，右的共产主义不再受到排斥了，右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再次掌权。从地位权力看，纳吉就是匈牙利的哥穆尔卡；但革命的事件突如其来，他不得不放弃一党专政，甚至也放弃了与苏联的结盟。因此，他陷入苏联军事干涉的境地，变成了牺牲品。然而，即使是随后的卡达尔卫星国政府，仍表现出一定的右的克制态度，以便尽量减少人民对经济的不满。

右翼反对派已成为巩固了的共产主义制度内部出现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倾向。与左倾相反，右倾不需要某种理论或传统，它产生于某种一再必然流露出来的心理：恐惧、谨慎、试探，以及希望通过向人民让步谋求人民给独裁统治以更多的支持。无疑，只要共产主义制度中有消费者存在，人们总会找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痕迹。

三、清洗运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位年轻的名叫尼古拉也夫的党员

^①在波兰，“斯大林分子”被说成是“右派”，“左派”是想放松党的控制的“修正主义者”。哥穆尔卡处于“中间”，但根据他的政治路线看，他与俄国的右翼反对派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关系的颠倒显然产生于波兰政府中这一连续现象。在改革本身制度方面，斯大林分子是“最保守的”。

大学生（看样子是为党的事务）走进斯摩尔尼学院，进入了那座因作为十月革命司令部而闻名于世的学院大楼。（这座楼此时是列宁格勒省委的所在地，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就在这座楼里办公。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看样子还是总书记未来的继承人。）尼古拉也夫闯进了基洛夫的办公室，掏出了手枪并开枪射击，基洛夫当场被击毙。这是革命以来俄国第一名落入政治恐怖主义分子手中成为牺牲品的官方人物。

当时，斯大林的制度有这样的名声：在苏联，如果有人死于暴力或者自然死亡，就会引起人们的揣测，这中间是否有领导人插手。从各方面可以断定：斯大林已经失去了他对基洛夫的宠爱；要么是直接命令杀害他，要么是蓄意让这件事发生。党的书记赫鲁晓夫本人在一九五六年就产生过这种怀疑。根据他的说法，“与暗杀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着许多使人不解的、莫明其妙的地方……有根据可以这样设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是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中的某个人的帮助”。^①那末，是不是斯大林担心，基洛夫是一个反对过分糟糕的工业化而主张考虑人民的福利的人，斯大林是否对这次暗杀作了事先安排——他曾把这次暗杀事件作为立即开始全面清洗的借口。还在真正的凶手被判处死刑之前，所谓参与密谋活动而被牵连进流血事件中去的几十个人很快就被枪毙了，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或者被从列宁格勒押送到国家的其他地方；同样，列宁格勒秘密警察局的领导人也被逮捕。这一“自由主义的”插曲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②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4页。

^②参阅托洛茨基在《反对派派别》上的撰文，一九三五年一月刊，第四十一期。

当披露了许多被牵连进这一审讯案的人的证词时，策略就清楚了：暗杀基洛夫这件事与反对派有关系。最高层的替罪羊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中间的联系就是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前曾是他们的根据地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与他们当时的许多追随者一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受到了审讯。他们被控告煽动反抗情绪，而这种情绪激励了谋杀基洛夫的凶手干了这件事。正像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们被遣送到外地或者被判处有期徒刑。

同年晚一些时候，斯大林想利用反对派为其目的服务的计划已经完全成熟。他导演了一连串闻名而又使人难以置信的诉讼程序，这已作为“莫斯科案件”载入了史册。这些案件的内容是极其复杂的，不仅出了许多叙述此事的书，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材料。这些案件用来论证斯大林制度的发展特点是极其重要的，相反，从中却很难获得关于反对派问题的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控告内容，即谴责他们从事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而言，材料也不够充分；许多被告只能承认假设的罪行——他们的思想似乎有可能导致这种行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监狱被第二次带上法庭，这次被一道带上法庭的还有另外十四个人，其中有他们当时在列宁格勒的追随者叶夫多基莫夫和巴加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伊·尼·斯米尔诺夫。以所谓新的证明材料为依据而提起的诉讼说道：这些被告分子已直接与托洛茨基勾结，他们的计划不仅是要杀害基洛夫，而且还要杀害斯大林和所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所有的被告在所有的细节问题上都承认有罪，因此，他们立即被处决了。^①不久以后，又一个叛徒集团被押上了审判台。一九三七年一月，又有十七个人（他们大多是当年的托洛茨基分子）

^①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恐怖活动中心案的法庭审讯报告》，一九三六年莫斯科版。

在纯属虚构的罪名下受到了审讯。他们的罪名是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共同密谋策划推翻政府、瓜分国家和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在受害者的人员名单中，主要人物有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前党的书记施略普尼柯夫。大多数受害者被处决了，只有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在没有加以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判为监禁。^①估计这两个人后来死在狱中。

一九三七年六月，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其中有任职多年的参谋长土哈切夫斯基）受到了审讯，并被处决了。^②第比利斯特别审讯案杀害了许多格鲁吉亚人，这些人曾参加过双方在一九二二年的争论。^③一九三七年还发生了另一起死亡案件。据公布的消息称，当时的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死于心脏病。尽管他以后在党史上仍作为英雄的形象存在，但有谣传说，他不是被清洗掉的就是自杀的，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曾对处决他的副手皮达可夫这一举动提出过抗议。^④后来在一九五六年终于有人断言说，奥尔忠尼启泽死于一次由贝利亚（当时是内务副人民委员）按斯大林的旨意策划的阴谋——逼迫他开枪自杀。^⑤

头两次审讯案刚刚结束不久，又轮到右翼反对派了。大多数右派领袖于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受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名字被列在被告人名单的最前面；托姆斯基于一九三六年通过自杀逃脱了即将到来的大逮捕。在被告席上坐着的还有

①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反苏活动中心案的法庭审讯报告》，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版。

②参阅托洛茨基：《红军内的斩首》，见《反对派通报》，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刊和第五十六—五十七期，第1—7页。

③参阅尼·格·马尔金：《穆迪瓦尼—奥库雷娃案件》，见《反对派通报》，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刊和第五十六—五十七期，第7—9页。

④参阅多伊奇尔：《斯大林》，第378—379页。

⑤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90页。

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许多当时的人民委员（其中有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他曾负责过一九三六年的审讯筹备工作）、来自苏联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干部以及医生（有人控告他们在亚哥达的教唆下进行了药物性谋杀）。最后一点就是有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头目明仁斯基一九三四年之死、主管工业的头目古比雪夫一九三五年之死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一九三六年之死等问题；这些都给控告书增添了奇特的色彩；此外，控告书再次列举了通常使用的罪名：破坏、叛变和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密谋策划重建资本主义。除了拉柯夫斯基和很少几个重要的被告，所有的被告都被判处死刑；拉柯夫斯基和很少几个重要的被告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人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①

尽管清算不可靠的斯大林分子（即斯大林的党机关内部的难以置信的清洗）不像审讯案那样骇人听闻，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明显的。凡是已引起斯大林讨厌或不信任的人（党机关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这种原因）都被无声无息地消灭了。这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关于处决的报告；既没有对此加以说明，也没有指责材料，更没有由于危害活动而提出控告——根本什么也不提。（斯大林也许同时计划对乌克兰下了台的党的领袖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一次公审，控告这些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②鲁祖塔克也秘密地受到了审讯，但他否认了自己的证词，他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被枪毙了。^③）那些在一九三八年头几个月中消失的人的名字已被直接

^①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联盟案的法庭审讯报告》。

^②参阅F·贝克和W·哥丁：《俄国的清洗与逼供》，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212页。

^③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8页。

从历史年鉴中删掉了，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人们丝毫没有公开提到这些被秘密清算的人中是否还有人活着。他们成了“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

人们也许从未知道斯大林搞清洗的原因。难道斯大林的人真的曾密谋反对他？难道他们对他的新社会和文化政策所具有的明显的保守主义感到过不安？难道他们损害了总书记的自尊心（因为他们在身材上高于他——斯大林具有拿破仑的体形；出奇的是，所有幸存下来的杰出人物都是小个子）？难道真的只是叶若夫分子——叶若夫集团（它是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名字命名的；在叶若夫本人被卷入漩涡之前，他曾领导过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对越来越多的控告、告密、逮捕和坦白招供失去了控制并最终侵犯了最高领导？难道是单纯的迫害狂？也许，斯大林的报复行动是由于人们普遍对处决反对派感到不安所引起的。事实上，在一九三七年初，在乌克兰的党的书记巴·彼·波斯蒂舍夫带领下，中央委员会已起来反对斯大林，对他处决右翼反对派的计划提出了抗议。据说，斯大林在当时只是听任此事发展，等待时机；然后进行了无情的打击。^①

在清洗运动中，最高领导人从未享有过豁免权。六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五名被清洗掉，只剩下日丹诺夫；而政治局本身的两名委员柯秀尔和邱巴尔也被处决了。七十一名中央委员中有五十五人没有再能出现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上，已正式宣布其中有些人的死亡，即使他们的死仍使人迷惑不解；有些人（老反对派分子）已被公开判刑或被处决；大多数人已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这一冬季失踪了，也许已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处决司令部杀害。至于中央候补委员，被

^①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6页。

清洗得更加厉害：在总共六十六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六十人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失踪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拉进中央委员会的十四名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中，除了卡冈诺维奇，其他人全部了结了他们的政治生涯。一九二四年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名新的候补委员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安·亚·日丹诺夫是一九二五年出现的集团中唯一幸存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一小撮走运者外，在与反对派斗争中已经取得“坚如磐石的统一”的整个斯大林阵线已被彻底毁了。①就拿一九三九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一千五百七十名代表来说，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党员代表只有三十四人。②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整个党内仅有七个人（他们在二十年代或在以前就已担任重要职务）享有自由，他们是：李维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亚·米·柯伦泰、N·I·尼古拉耶娃和以前的杜马代表阿·叶·巴达也夫。（另外还有五名臭名昭著的人物，这些人在二十年代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是当时的全部人员。）所有这些人有的肯定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死了，有的估计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死了。

像被赶下台的斯大林分子一样，当时的大多数反对派分子已被用类似的方法消灭了：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词。属于无声无息而失踪的反对派分子有：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洛博罗多夫、斯米尔加和索斯诺夫斯

①在与反对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小批机关工作人员也失踪了：莫斯科党组书记鲍曼，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古谢夫，斯大林的组织部长安季波夫，一九二三年从托洛茨基倒向斯大林的布勃诺夫，一九二一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尔茨（强硬派分子），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温什里希特，莫斯科的乌汉诺夫，乌克兰的列宁主义者雅柯夫列夫和克维林，老的地下工作者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戈洛晓金以及穆拉诺夫。

②参阅十七大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见《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80—681页；十八大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见《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688页。

基；季诺维也夫分子萨发罗夫、扎鲁茨基和阿夫杰也夫；所有民主集中派分子；工人反对派分子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布哈林右派分子乌格拉诺夫、柯托夫、瓦·米·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米特、阿·普·斯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以前的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亭和泰奥多罗维奇；以前的左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柯。

唯一逃脱清洗运动的重要反对派分子是亚·米·柯伦泰。除了她，人们所知道活下来的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反对派分子，即K·I·尼古拉耶娃，她于一九二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而一九三九年以后却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女士（虽然是在二十年代已在党内享有一定名声的女人）在大规模清洗运动开始后，她们还活着。如果说这种特殊的情况完全是一种偶然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斯大林具有的保守特性显然已发展成为一种豪侠习惯，他饶恕了女人。

许多作家已深思过这一问题，即那些受到审讯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尝试进行了各种解释，从使用了催眠药物直到斯拉夫是整个罪恶灵魂，而实际情况无疑是比较平常的：人们对他们的家庭或朋友进行威胁，并许诺，如果承认错误则减轻惩罚。反之，只要某人在承认错误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就会不经审判而被处决。人们可以回忆一下，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类人已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软弱。已不再是秘密的是，他们现在也已服从了主人的指令，而且在这次自我反省中还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

就布哈林来说，这至少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根本不肯承认别人要求他交代的伪造的证词。就个别事实问题，他一直与检察官维辛斯基发生争吵。例如，他拒绝承认他在一九一八

年，即他在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问题进行激烈争吵的过程中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谋，企图杀害列宁。相反，他却愿意承认控告者所说的，他的反对派行径造成了什么样背叛性后果；他也承认他的绝望的行动无疑是来自他的一些想加以实现的思想。就某些观点来看，布哈林顽固地保护了他个人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他觉得非常有必要全面谴责所有的反对派并替斯大林进行辩护，像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说明总书记是正确的。他详尽地探讨了使他顺从的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作出了一点回答，他认为这只能看作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所具有的洁白无瑕的信念。布哈林对法庭说：

“有人会问：‘如果你要死的话，那你为什么而死？’——那末，一个绝对黑暗的真空会突然地、十分可怕而又明显地出现在一个人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为之而死，而又要毫无后悔地死去。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新的位置。这就终于完全地解除了我的武装，进而使我屈服于党和国家。有人又会问：‘那好，假定你不死，假定你通过一项奇迹可活下来——那你为什么而活着呢？把你同所有人隔离起来，把你当作人民的敌人，把你置于毫无人性的地位，把你完全同生活所包含的一切隔绝开来……’结果是苏联在道德方面征服了它的屈膝下跪的反对派，获得了完全的胜利。”^①

只有当布哈林能感到后悔，并能说服自己，相信斯大林不是叛徒而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杰出代表，那么，苏联才可能是他为之而活着，以及为之而死去的事业。因此，他拼命努力向自己证明：他毕生的努力不完全是徒劳的。

^①布哈林在法庭上的答辩，《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联盟案的法庭审讯报告》，第777、778页。

四、死者不死

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外部世界的许多人都认为，这对他所建立的国家来说是一次沉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但是，随后几年的情况却讽刺性地表明：受到伤害的不是苏维埃国家，而是斯大林自己。

对斯大林逝世所产生的反应与一九二四年列宁的逝世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一九五三年很少有悲痛和忧虑的气氛；头几天过后，人们几乎察觉不到这样的忧虑：为替代死去了的领袖的坚强有力的手必须加强党的统一。当继承者开始愤怒地贬低死去了的独裁者的形象并清除他的一些最令人憎恨的统治特征时，人们的轻快感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以前的帮手现在已疏远他，这早在他们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决定公开谴责他后半生的领导方式之前就已经清楚了。

贬低斯大林神话般的传奇已在独裁者死后不久就秘密地开始了。他的名字突然很少出现在苏联报刊上，而熟悉的朝拜声也完全消失了。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真理报》社论详尽地讨论了“集体领导制和同志般的领导制”的优点。《真理报》（它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显然也是针对他的）抨击一些人，这些人不听取他们的下级的建议，他们“总是认为，只有他们能知道一切，只有他们能说出比较理智和聪明的话，而其他人只有赞同他们的意见”。更为奇特的是，有人用斯大林的话来支持这种观点。（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在这篇声明中颂扬了中央委员会，而就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在清洗运动中已受到重大损失。）六月，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也抓住这个主题，并批评那种认为脱离群众力量的英雄能创造历史奇迹的思想是

“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章说：“我们党……坚决反对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就是唯心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超自然的思想才能，迷信个人，无视群众、阶级和党的作用。”^①

以沉默忘掉斯大林和以宣扬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来代替斯大林的领导，这一策略（如果它是一种策略的话）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结束了（这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第一次按计划举行的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党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一次反斯大林的骇人听闻的报告。^②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描写为拙劣的工作者、自大狂、滥用职权和疑神疑鬼：他的下级反对他就是策划阴谋。自伊凡雷帝掌权起，整个世界几乎没有见到过这种精神变态的专制政治，更不用说在俄国了。“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烦，粗暴和滥用职权。”^③按赫鲁晓夫的说法，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在内政方面，斯大林的笨拙无能、无责任心和固执己见都造成了不该有的流血事件。党中央书记（他曾是斯大林本人在乌克兰的全权代表）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根本不容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于反对他的东西施加暴力，在他

①社论：《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的引导和领导力量》，一九五三年五月《共产党人》第八期，第15页。

②全体党员很快地通过党组织的各种宣传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一份基本上是完整的、显然也是真实的报告文本（一个东欧共产党政府已经得到这一文本）已掌握在美国外交部手中，美国外交部已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将它公开发表。（此文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于《反斯大林运动》英文版，以及《东欧问题》德文版。）

③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8页；《东欧问题》，第872页。

任性和专横的情况下，甚至对在他看来与他的原则相违背的东西他也要施加暴力。”^① 赫鲁晓夫彻底谴责了个人崇拜，甚至许诺要改换一些城市和企业的名字，以便结束对个人进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颂扬。^②

赫鲁晓夫的揭露证实了通过历史的观察已想见到的一点：斯大林具有十分强烈的变态心理特征，即使他的迫害狂也不能说明一切。只有很少几个人像斯大林一样能激起其同胞制定谋杀计划。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道，有一次布尔加宁当面对他说：“有时你到斯大林那里去，他把你当朋友请去，可是你坐在斯大林那里，你不知道将把你从斯大林那里带到哪里去！带到家里还是带到监狱里去。”^③ 赫鲁晓夫根据自己的观察说道：

“斯大林是一个多疑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都相信这一点。他可能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总是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直视。’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分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④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描述符合实际情况，那斯大林似乎就是一个疯子：“这是斯大林自大狂所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⑤

根据二十年代的行为所描绘成的斯大林精神状态的画像（狂热地进行自我辩护和丝毫不容许提出批评意见）又进一步被赫鲁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0页；《东欧问题》，第869页。

②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6—87页；《东欧问题》，第896页。

③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2页；《东欧问题》，第895页。

④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40页；《东欧问题》，第880页。

⑤见《反斯大林运动》，第63；《东欧问题》，第888页。

晓夫加上了一层浓浓的色彩。赫鲁晓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一次讨论会谈到了苏联遭受一次失败的情况，这次失败应归罪于斯大林的固执：

“米高扬偶然地说起当时赫鲁晓夫关于哈尔科夫战役打电话时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未曾想到，斯大林当时大为发怒！怎么能够认为，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不管是谁都可能犯错误，而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或大或小的错误。”^①

赫鲁晓夫从叙述这种精神状态转而谈到历次清洗运动所造成的灾难：

“斯大林不是说服、解释和对人不厌其烦地进行工作，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原则，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人，或者是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构，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这段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许许多多的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②

赫鲁晓夫以一九三七年的所谓波斯蒂舍夫反对派为例，说明一个人仅仅由于抗议斯大林的毫无根据的怀疑就可能遭到迫害。^③

赫鲁晓夫的抨击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外国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在第比利斯，出现了聚众滋扰。这是极大的讽刺：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52—53页，《东欧问题》，第884页。

^②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0页；《东欧问题》，第896页。

^③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2页，《东欧问题》，第895页。

自集体化以来苏维埃俄国公共秩序受到的最严重的扰乱显然是为死去的独裁者示威。党内的骚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真理报》不得不宣布：“就此为止，不再深入”，“一些腐化堕落分子企图假借批判个人崇拜之名来怀疑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党在它的队伍中从来就不容忍而且也决不会容忍小资产阶级的放荡行为和纯属反党的言论”。①

然而，在强调党纪原则的同时，新的领导仍在继续对斯大林提起诉讼并揭露了许多新的详情。新领导公开控告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后的头几个月里把苏联国防搞得一塌糊涂，并说个人崇拜已给各个领域（从军事科学直到文化艺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真理报》反问道：“我们党为什么要与个人崇拜展开一场坚决的斗争并揭露它的后果呢？”答复与一九五三年的论点相似，不同的只是这次点了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个人崇拜就是过分地颂扬个别人，鼓吹他们具有超自然的特点和特性，几乎肯定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并一味地崇拜他们。这些人，特别是约·维·斯大林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已在我们中间发展起来，并已受到多年的培植。”②

新的反斯大林路线在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获得了更为明显的激烈反响。例如，华沙电台称斯大林时代是“十分虚伪的时代”。然后它又谈到了核心问题，即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机关中的清洗运动：“这个人的思想是多么的可怕、病态和猜疑！这个人竟能假定无数中央委员（大多是老布尔什维克）是他的敌人或帝国主义特务。而这就是斯大林本人，他确定了将要逮捕的中央委员的名

① 《共产党由于忠诚于列宁主义已经取得并正在取得胜利》，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真理报》。

② 《个人崇拜为什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单。伪造的控告名单是很长的。”^①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他建立了伟大功勋，而这又驱使他后来利用自己的职权疯狂地镇压他自己的追随者。

随着对斯大林的过火行动的谴责，其专横的牺牲品（或者说牺牲者中的某些人）在他死后相继被恢复了名誉。首次类似的行动是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开始的。在没有提及他们过去的命运的情况下，人们将二位还活着的清洗运动的牺牲品抬了出来，并授予他们以列宁勋章，作为他们的生日礼物。其中的一个是马·康·穆拉诺夫，他以前曾是沙皇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最后他失踪了；^②另一个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他直到一九三八年垮台之前一直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莫斯科政治局候补委员。^③

这两次较早的平反活动是在没有明确谈到三十年代清洗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所搞的清洗斯大林分子的运动已被提及并受到了批判。已被从官方历史上完全消除痕迹的清洗运动的牺牲者这时又在党的纪念簿上获得了光荣的位置。有两个集团获得了这种恩惠：以土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军人（这些人在一九三七年受审后被处决了）和在一九三八年失踪了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袖。

给军人集团恢复名誉，首先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就已提到了，四月又被《苏共党史问题》月刊所证实。事后给予平反的除了将军以外还有二位前军队政治部领导人：安东诺夫—奥弗

^①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的报道。

^②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二十八卷，第565页。

^③参阅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真理报》文章。更为有趣的是，为了纪念他的七十五周年生日，对彼得罗夫斯基的嘉奖推迟了一年——人们非要等斯大林死后才进行。彼得罗夫斯基死于一九五八年一月。

申柯和布勃诺夫（这两个人都是当年的左翼反对派分子）。①在后来被恢复其历史地位的人员名单上，尼·尼·克雷连柯也出现了，他曾是一个左派分子，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后来曾是司法人民委员。②关于要替一批党的领袖恢复名誉的说法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就出现了。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米高扬顺带提到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斯·维·柯秀尔（他是前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认为他们受到了党的历史学家不公正的抨击。③鲁祖塔克的名字在《苏共党史问题》月刊发表的一篇有关一九二一年的工会争论问题的文章中又悄悄地出现了（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说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签字付印的）。④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花了较长的时间详尽地谈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所搞的清洗斯大林分子运动这一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这场清洗运动是斯大林的最大罪过。他列举了所有失踪了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单并大量地引用了一些信件内容，某些人在信中徒劳地乞求公正对待。被恢复名誉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邱巴尔、鲁祖塔克和柯秀尔，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和埃先（以及彼得罗夫斯基，而他是最高领导中唯一在清洗运动中死里逃生的人），还有几个级别比较低的党员干部。⑤斯大林的清洗斯大

①见《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报道。在我们得到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中，这两个军人没有被提到。

②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四十九卷，第167页。

③参阅米高扬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八日《真理报》。

④参阅卡拉夫，《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讨论时期为联共（布）统一而斗争的党员群众》，见一九五六年《苏共党史问题》月刊第二期，第20页。

⑤还活着得到平反的很少几个人中，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他在一九五九年逝世之前，度过了一个很短时间的光荣退休生活。（见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真理报》文章。）

林分子的运动看来已被彻底平反了。

赫鲁晓夫列举一些数字，以便说明清洗运动已经波及到一九三四年的中央委员和同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的统计数字并不使人感到吃惊，但从此时起受害者的数字是官方的数字：“经查明，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一百三十九人中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会场上激愤的喧哗声）……而且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拥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一千一百零八人。……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人……变成了‘两面派’并转到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里去呢？这是由于斯大林滥用职权而发生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①

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对斯大林的控诉，赫鲁晓夫还援引一个无可指摘的权威人士的话作为例子，并且还把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最终地写入官方的党史中。列宁“遗嘱”的文本已发给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赫鲁晓夫从中引用了很少一段话，以便证明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那些不良的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赫鲁晓夫宣读了两封直到目前为止还无人知晓的信件，一封是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的信，另一封是列宁给斯大林的信；这两封信就证实了过去的说法：当最后一次中风就要夺去列宁的生命时，列宁正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②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自己提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22—24页；《东欧问题》，第873—874页。

^②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6—9页；《东欧问题》，第868页。

必然要闯入所有人的脑子里：“某些同志会提出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做什么了，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反对个人崇拜而只是最近才这样做呢？”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受骗了，但人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激烈争论和斯大林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当时斯大林获得了威望、同情和支持。”^①赫鲁晓夫想对这样的事实置于不顾：反对派分子在当时就已经完全了解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恶劣品性。

尽管列宁的“遗嘱”和与之有关的文件已得到证实，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官方还几乎全然地维护斯大林在消灭反对派的斗争中和在强行建设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声称：“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唯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②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突然出现的。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道：“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大林作出了“许多违法行为”。^③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仅局限于在清洗运动之前受斯大林宠爱的人。

然而，即使斯大林向“反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展开的斗争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他为最终结束这场斗争而采用的方式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说道：“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1页；《东欧问题》，第894—895页。

^②同上，《反斯大林运动》，第81页；《东欧问题》，第895页。

^③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决议，《关于根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真理报》。

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这场斗争之所以是相当残酷的，是因为也大肆镇压了“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①

赫鲁晓夫将列宁的政治措施与斯大林的政治措施作了比较，同时作了值得注意的自白。他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一事，旨在说明列宁又把偏离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保证了他们之间的有益的合作：“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提升担任领导职务。列宁引导他们去完成党的极其重要的委托，……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赫鲁晓夫甚至把托洛茨基分子纳入他今后的大赦计划：“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足够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其中的很多人与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列宁当时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②

赫鲁晓夫极其严厉地批判了通过逼供来强迫被告认“罪”的办法。他虽然是专门针对处理被清洗了的斯大林分子这一做法而

^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运动》，第11—12页，《东欧问题》，第870页。

^②同上，《反斯大林运动》，第16—17页，《东欧问题》，第871页。

言的，但在讨论与这种强迫认罪的办法有关的问题时，以类似主题为内容的一篇文章（它是在不久以后发表的）也提到了执行这种办法的最著名的实践家安·亚·维辛斯基，即审讯反对派运动中的主要控告者。^①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于一九四九年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进行的类似的清洗运动已被公开宣布无效。如果说苏联政府已宣布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所进行的三次大的公审是非法的，那么人们按照这种先例行事对反对派采取赫鲁晓夫式的新态度，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此外，人们现在在谈到反对派时，采用的语气也与过去的咒骂语气截然不同，显然是比较温和的。在谈到有关历史问题时，托洛茨基甚至被称为“托洛茨基同志”。^②当《真理报》发表列宁的一封反官僚主义弊端的信（这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写给奥新斯基和李可夫的信）时，在他们两人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任何指责的形容词。^③

由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有关彻底修改党史和重新活跃党史研究工作的号召也许要比这些个别的姿态更为重要。米高扬转弯抹角地批评了对党史研究不够全面的现象，同时连斯大林的“简明教程”也不饶过。接着，苏联最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安·米·潘克拉托娃对此也提出了详尽的批评。她在耸人听闻的阐述过程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桎梏已经产生的影响：“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党史研究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①参阅《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联法律学的任务》，见一九五六年《苏维埃国家和法律》月刊第二期，第3—14页。

^②我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听到的有关党史和苏维埃军队的报告就以值得注意的实事求是的语气谈到了托洛茨基，但当我专门向讲演者询问托洛茨基的情况时，他们又以早已熟悉的咒骂语言来抨击他。

^③加米涅夫在一九五六年《苏共党史问题》月刊第二期上的撰文，参阅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在战前就已存在的关于党史问题的刊物已不再出版，也没有党史研究科学中心。”她提到了许多缺陷，从对不愉快的事实保持沉默直到不加批评地维持沙皇的外交政策。她也许是有所指地说：“列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的作品在我们党史文献中反映得太少了。”^①

与这些要求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被改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它的任务是专门研究整个党史和出版共产主义学说提倡者的著作。长期被禁止的许多材料，其中有恢复了名誉的清洗运动的受害者的著作，某种程度上激烈反共的作品和列宁全集第二、三版（其中有大量的符合历史客观的注释），又可被苏联学者们自由地使用了；相反，反对派领袖的作品却一直被禁用。^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文本也开始重新出版。一九五七年开始出版了一份有关党史问题的新刊物，即《苏共党史问题》月刊，但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批评性观点而著称。

背弃斯大林（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列宁的“遗嘱”及其派生情况）似乎应必然导致为所有人恢复名誉，即在当时就反对斯大林并警告当心政权发生变质的人。然而，在评价反对派方面如果实行这种转变，似乎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它将大大超过只承认审判斯大林分子和军人是不公正的而产生的后果。因此，现今的苏联领导接受了斯大林在谋取权力的漫长道路上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即：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出现派系斗争的时期，强调统一、一致和领导集团的自我辩护，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此，赫

^①参阅米高扬和潘克拉托娃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②这是由作者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发现的。反对派分子的著作没有被登记在列宁图书馆的目录上，但它们显然还被留在特刊上；如果其作者一旦被恢复名誉，就可以取出他的任何一本书。

鲁晓夫在详细地谈到列宁主义集体领导的优点时，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有关表决和在领导内部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问题，而这是列宁时代经常采用的方法。斯大林的继承人坚持了斯大林的变态的统一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是个人崇拜的根源，而个人崇拜又是他们（现在的掌权者）宣称要拒绝的东西。看来，他们不可能放弃权威，放弃领袖、神人和恶魔的提法。他们对列宁和原反对派所采取的新态度仍旧是斯大林主义的。他们以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按其性质来说，这种崇拜比对一个还活着的统治者的神化具有较小的危险。

另外，我们业已看到：作为个人的斯大林不得不充当苏维埃国家遭受无数次失败的替罪羊，特别是充当了红军在一九四一年险遭失败的替罪羊。至于贝利亚，则几乎没有必要再谈论他了，他后来几乎同前辈托洛茨基一样也被列入魔鬼的名单之中。在这期间，在赫鲁晓夫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司令部中排挤出去之后，个人领导又被恢复了。赫鲁晓夫的权力更突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甚至把政府首脑的职务也接了过来。斯大林已被从圣地排除出去了，但斯大林主义却继续活着。

第十五章 反对派为什么会失败

失败了的事业往往也具有一定的魔力，吸引人们去研究它的历史。人们可以按其意愿夸奖那些被击败的英雄和攻击那些已取得辉煌胜利并正在掌权的人，因为对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正是胜利者的某些不良性格，这对俄国革命的历史来说更是如此。自觉地为一目标而斗争的革命者已被满足于维护或扩大权力体系的人所征服。然而，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歌颂某些人或控告某些人；我们的任务应当是设法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反对派失败了，就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而言，它说明了些什么？

一、反对派政治上的虚弱

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失败是容易解释的，但导致失败的原因却有其深刻的根源。反对派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似乎万能的党组织的操纵下不断遭受失败的历史。在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反对派都表现出动摇、不一致、失策和无组织能力，从而人们不禁要问：俄国共产主义偏离者为什么尚能如此长久地坚持下来！

人们可以从反对派的历史中得出许多深刻的政治教训。首先，反对派的历史表明：领导集团对历史发展起着何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个运动缺少坚定的领导，那么，这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其次，反对派领袖所犯的各种策略性错误也是有教育意义的。

再则，反对派内部的意见不合也有助于机关人员保住他们的政权（在反对派中，一种流派总是错误地把其他流派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最后，反对派分子也是教条的俘虏；他们承认列宁主义的党的基本原则，这就妨碍了自己号召人们改变某些基本信念。

如果说政治是一种艺术，那么它就是领导艺术。而俄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缺少这一主要的东西。看来，反对派不仅缺乏才能、目光短浅，而且在每个决定性的转折时刻都表现得意志消沉。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掌权的或是反对派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尽管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的诚意，但总的说来都是极为普通的人。此外，反对派更缺乏的是毅力。即使说他们还具有一定的毅力，但它也从未与坚强的性格结合起来。在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中，有少数几个人不仅是忠实的信徒，而且是很好的领袖。但列宁和由他创建的党并没有创造良好的气氛，吸引住这批杰出的人物。

当然，在反对派中也有突出的人物；我们首先指的是托洛茨基。他作为发动俄国革命的三名英雄人物之一无疑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托洛茨基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在形象上，他比他的任何一个战友都更接近西方国家领导人。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在危机时期，他一跃成为令人鼓舞的伟人并能在反对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凭着自己的激情将运动推向前进。因此，他在一九〇五年是彼得堡苏维埃的声音，一九一七年是布尔什维克起义的领袖，内战时期是胜利的组织者。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不是政治家。在争取权力和影响的斗争中，他一直没有取得成果。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他一直在孤军作战。他既不想追随别人，又无能力把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一九一七年以后，他对列宁采取的态度也具有二重性。他仅是一个有保留意见的追随者，作为公认的运动中的第二号人物他几乎是一股独立的力

量。在树立敬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风气方面，他比某些布尔什维克作出了更多的努力，这也许是为了弥补他以前作为反对派而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坚持独立思考，并经常与列宁发生冲突。他既不是一个虚心学习的学生，也不是一个讨厌的对手。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作为反对派分子始终是一个动摇的、容易半途而废的人；他始终只是使一派产生憎恨，而又没有力量使另一派坚定信心。例如，在一九一八年有关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以及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有关工会问题以及一九二三年有关新方针问题的争论中，他都采取了这种态度。

反对派一开始就是以不坚定和无能为特点的。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列宁并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政府，但他们失去了头脑。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也没有很好利用它们在一九二〇年所积累的政治资本。最严重的一次坐失良机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放过的那个机会。要是他能以卓越的远见，以他过去所具有的部分勇敢精神和意志，动用军队力量，并有一个较好的运气的話，他完全有可能使自己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但是，他宁愿在幕后耍手腕（在幕后，他的处境是极为不利的），并让他的具有很大潜力的追随者在黑暗中摸索，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的追随者在十二月讨论中被迫走向公开斗争时，他却逃离了战场。

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间，反对派虽然有了一个较好的领导，但这已太晚了，书记机构已强大起来。在这几年里，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巩固性和政治上的果断性方面，达到了最佳状态。这主要应归功于列宁主义的另一派，即季诺维也夫集团（它当时已被推向左派一边）。另外，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要比在整个内战时期更英勇善战。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他当时以及后来在流亡时期（直至他被谋害的那一天）所表现出

来的反抗勇气。

但是，联合反对派又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联合反对派采取挺进一阵又退却一阵的策略，从而再次使它的追随者们陷入混乱之中。争论始终是在半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反对派想把争论局限在党的最高层。即使采取公开的和反复向舆论呼吁的大胆方针，也决不会比这种小心谨慎的方针带来更大的损害。正是这种错误的保守秘密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右翼反对派走向灭亡，因为在右翼的防御武器完全被剥夺以前，除了核心集团外，没有一个人能详细地知道整个争吵究竟围绕着什么问题，更不用说谁代表哪种观点。可以说，绝大部分右翼反对派领袖都缺乏意志和勇气，但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成了列宁主义的右翼。

当然，人们不能将反对派的失败仅仅归咎于领导的软弱无能或错误，因为处在党组织最高领导地位上的那些人也同样缺乏较高的政治活动家的天资。使组织很容易获胜的是反对派队伍中的意见不一致。反对派在反对列宁时之所以遭受失败，是由于温和的左派与极左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因此，这就使列宁主义者有可能在一九二一年发起最坚决的进攻，并消灭了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极左派。后来，逐渐形成的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能把左派和谨慎的列宁主义者都排除掉，原因也是如此。其后，当这两个布尔什维主义派别的领导人（他们都注重那些能推进革命发展的人的价值）认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并看到人的价值遭到无情的践踏时，已为时太晚。列宁主义者与左派之间的分裂对斯大林的崛起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分离了潜在的反抗力量；首先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成了敌人，后来又使联合起来的左派和右派成了敌人。传统性的争论促使反对派将自己的炮火指向了错误的目标，即自己的潜在朋友，而这些人在这期间则尽最大努力去破坏党内剩下的最后一点政治自由。

反对派的意见不合和缺乏果断性来源于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缺点：缺乏必要的远见，不能很好地意识到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目标。运动需要一种明确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能现实地判断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它能达到的目标。反对派分子对民主的看法往往是偏重感情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他们自己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他们的精神支柱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列宁主义严格的组织原则。他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中解放出来。

反对派的命运是理应所得。几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只要他的党在掌权和他本人受到领导的宠爱，他就只能放弃自己的民主理想。原则上讲，主张对非共产党人讲宽恕的党员是很少的，站在党的极右派一边的达·波·梁赞诺夫和站在极左派一边的格·尼·米雅斯尼柯夫则是坚持这种思想的个别人。而更多的人，首先是极左派，关心的是给所有共产党人以民主权利。就这一点而言，在一九二〇年似乎已取得很大成效，它几乎使人们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些极左派领袖，尤其是民主集中派的恩·奥新斯基和季·弗·萨普龙诺夫表现出很大的勇气，为较长期地维护他们的反权威的信念作出了贡献，并从而获得了他们一直所享有的较多的历史承认。温和的左派分子，首先是托洛茨基，在原则问题上作了那么多的妥协，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当他们自己还不是受害者而是参政者时，他们几乎没有对集体专政的强硬作法提出过怀疑，一直容忍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直到领导机关完全不受控制为止。至于后来转向反对派的列宁主义者（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右派），人们也不能说他们曾不惜牺牲民主原则，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享有真正含义的民主权利。

二、列宁主义的前提

反对派轻视民主原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一九一八年，罗莎·卢森堡针对布尔什维克写道：“仅给予政府的追随者和一个党的成员……以自由，这不是一种自由。自由永远只是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因为政治自由的所有的意义、效益和纯洁性都取决于这一本质的东西。如果‘自由’变成了一种特权，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①但是，民主在俄国之所以被忽视，这不能单纯责怪反对派，人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人们可以说，共产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对党的缔造者的政治艺术崇拜得五体投地。尽管“列宁主义”这个词和他的原则编集成法典是在列宁死后出现和发生的，但这些因素早就牢牢地扎根于党的信仰教育和实践之中。许多原则是列宁在本世纪初提出的并在一九二一年再次加以强调。口号就是统一，要与所有的一切统一，其中包括集中化、权威、纪律和正统；至于第二种声音，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竭力表明他的正统思想时写道：“党必须保证其革命方法、政治路线和传统的统一——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采用为统一目的服务的严厉的暴力措施，来保证列宁主义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不敢‘镇压’甚至是错误的。”^②

但是，列宁的党的纪律概念并没有超越欧洲议会制的灾难性实践。决定性的转变是在内战时期实行了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从那时起，党的纪律措施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消灭。但实行党的垄断

^①卢森堡：《俄国革命》，第76页。

^②托洛茨基：《这项声明的题目：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第2969号，第2页。

并不一定非要扼杀党内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还有一种多派别制发展的迹象，似乎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活动自由。然而，这条路由于一九二一年的组织决议而被突然切断了。在此之后，由于党内有列宁主义的纪律，在党外又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反对派成了一种无用的变种。

反对派运动从一九二三年起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已无法改变，因为反对派分子承认了党的这种标准。他们也十分害怕自己会成为第二政党，按照通常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党只能是反无产阶级（因而也是反革命）的力量的反映。无产阶级相对主义的思想无疑占了统治地位；经解释，共产党领导所做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而“无产阶级的”仅是共产党领导同意的。看来，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由两个或更多的党来代表。托洛茨基经历了多年的流亡生活之后，最终对一党制发表了新的看法：“有必要为两党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也许还要为三个党或四个党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有必要推翻斯大林的专政……。如果这场新的政治变革成功的话，那么群众根据这种经验决不会再允许一党专政，即一个官僚集团的专政。”^①

在党的纪律日益严厉的控制下，在共产党党内反对派中出现了混乱，反对派甚至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又停止了活动。在每一个危急的转折时期，事态发展总是经历这么几个类似的程式：意见分歧（应优先考虑原则问题还是应优先考虑实用问题）；争论；在组织压力下争论结束，从而给掌握组织和赞成优先考虑实用问题的人带来好处；反抗的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这种事态发展过程早在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也就是在一九〇九年

^①托洛茨基：《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审讯报告——调查预审委员会》，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105—106页。

发生分裂时就已被人发现。在一九一八年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争论时，这种程式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尔后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它又再次出现。由于党组织连续不断地战胜偏离者，这就为后来的反对派分子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列宁主义原则每次都比较容易地、比较稳妥地得到了贯彻执行。

事物的另一面是党的机关不断加强了其权力。建立党的机关就是为了贯彻列宁主义原则，而它本身又从这些原则中获得了力量。斯大林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总书记这一象征的胜利；总书记不仅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规章，而且也体现了贯彻执行这些规章的办法。

对一般的同志来说，运动及其合法的领袖就是一切。同样，对反对派分子来说，重要的是使自己与运动保持一致，他们只能作为运动的真正保卫者和最优秀的列宁主义者出现。尽管组织给予反对派处分，但它从未想违反列宁主义关于只能有一个，而且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原则；它不敢否认党是事业的体现，也不敢承认事业已经走上邪路。所以，布哈林不得不坦白认罪。我服从运动——这种荒谬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理上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但人们必须承认：反对派明了这一点，它却执行这一原则。当新的纪律在一九二一年被提交讨论时，卡·伯·拉狄克说道：“我觉得，这可能是针对我们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拥护决议……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这有必要的话，那么它可以在危险时刻对优秀同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①这种自我克制的态度不是永远可取和最可贵的，因为它排斥了其他原则，排斥了民主和革命的希望，而最后，使一切都丧失掉。党的原则是直接以摧毁反对派

^①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和完善国家极权制为目标的。但是，这不能完全由列宁主义来负责，这其中还有较大的力量在起作用。

三、社会演变的吸引力

革命后的俄国处在一个空前动乱的发展过程之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许多历史力量在共同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并促使这个独特的集权主义制度形成。这些因素之一是列宁主义党。但是，与它联系在一起还有革命和内战的影响，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代价，工业化社会的一般发展倾向，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这个社会走向复杂的、集中化的和有组织的社会体制。所有这些力量都以强大的压力迫使俄国接受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即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官僚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共产党党内反对派试图阻止这一历史进程，尽管它往往是勇敢的，但却又反复无常、前后矛盾。今天，回过头来看，反对派很少有成功的希望。斯大林胜利了，因为他体现了极权主义倾向，并竭尽全力加速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和充分利用了这一政权。

革命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并有它自己的规律。像俄国所经历的这一种革命（狂热的牺牲和无限的仇恨）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种专政——它在某些方面比被推翻的统治更为残暴。俄国的革命者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他们自己放出来的洪水之中。

当然，迫使共产党人接受独裁统治的最主要事件是内战的爆发（它是革命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生死存亡的斗争气氛以及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间出现的共产党组织的军事化进一步确认并强调了列宁创建的从事秘密活动的党的模式，而且还遗留下一个一党统治的制度（这在反对派看来意味着背叛）。更为不合理

的是，正是在一九二一年，公开的斗争已经结束和革命的紧张气氛已有所缓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独裁的一面却更加突出起来了。从那时起，共产党人的政权已不再靠革命的激情，而是靠它对政治组织的垄断来支撑；并且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坚持内战时期所采用的命令制。

布尔什维克知道自己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地位，他们在行动时始终清醒地想到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当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雅各宾派，即激进派。当他们希望逃脱雅各宾派的命运时，一种可能出现的“特米多尔式”反动和“波拿巴主义”专政的思想使他们惶惶不安。争论不休的各派特别爱谴责对方具有这种反动的倾向。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维护政治连续性（不同于法国制度的万花筒式的连续性），然而他们仍希望在苏联会出现根本的变化。尽管时间相隔两个或三个世纪，但人们可以看出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一九二一年发生了“特米多尔式”反动，一九二九年以后出现了“波拿巴主义”专政。

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借助于法国革命政府的特征去理解共产主义制度的现状，而是了解所有大革命都具有的基本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革命的激情和乌托邦的热情在达到顶峰后，必然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消退。在俄国，革命的激情于一九一八年达到了顶峰，接着就出现了衰退。可以认为，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历史就是革命浪潮退潮的历史。如果革命理想主义的激进派失去了革命的劲头，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转向谋求无节制的权力；靠革命激情建立起来的专政将远远脱离其原来的宗旨而继续存在，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说改革时采用的暴力手段日趋成为本身的目的，这是革命的规律的话，那么苏联的发展完全符合这种规律。

尽管革命是一种有意识地与过去决裂的激进行动，但它决不会把俄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和习惯消除掉。事实上，这些传统和

习惯似乎已与更新的力量一道逐步地重新恢复起来了。在斯大林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自彼得以来还没有一个沙皇试图借助于国家政权强迫进行如此巨大的国家改造。人们不能指望暴力的革命颠覆活动（它必然会走进政治死胡同）能促进进步；相反，它会使得时代倒退，这倒是有可能的。

沙皇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直接的政治连续性是很容易加以论证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统治者和宿命论者的独裁统治习性是不可能很好地被消除掉的。一个已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必然按照官僚主义态度的准则去行事（他从自己与旧政府打交道所得出的经验中知道了这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又是通过他革命前的主人或他革命后的同事体现出来的）。如果共产党人真的（象他们所断言的那样）“粉碎”沙皇的国家机器的话，那么他们就要被迫立即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机器；但实际情况正象他们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们只是把旧的国家机器作为原料加以改造，或者说只是仿制一个国家机器。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重建管理机构的必要性甚至大大加强了俄国官僚的独裁传统。

共产党俄国过去或后来都接受了相当多的沙皇历史的特征，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能期望一个民族在一瞬间就把政治自由的新果实消化掉。独裁主义的牺牲者怀疑一切权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先驱一般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民主并不是要求拒绝权威；而是要求承认它，要求广泛地参与合作，并要求一个民族逐步地获得本身的纪律。过急的反抗只能给自己造就一种权威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足以能击败反对它的任何人。在革命的俄国，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像会有一种制度，不靠暴力措施，也不变成一种专政，就能满足最低的要求。

除了令人厌恶的沙皇制的政治遗产外，苏维埃俄国还遇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很容易使热衷于追求过高目标

的政府遭到失败。当政治变革开始时，这个国家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分娩阵痛之中，而大多数人还没有完成从农民文化向欧洲现代生活方式的过渡。俄国是西欧文明世界之外的第一个受西方影响的并试图按西方标准进行自我改造的国家。这场革命并不是象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形势的产物；它不是工业成熟的果实，而恰恰是产生于开始模仿欧洲快速工业化时的困难局面。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是一场违反一般规律的、在一个缺乏理想条件的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运动。

共产党人并没有很充分地认识到俄国的相对落后性。对形势及其危险性作出了极其敏锐说明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斯大林开始断言落后性与社会主义前景毫无关系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必然会成为攻击目标。俄国革命政府（凡是想保持国家政权和实现国家实力地位政府）的不可逃避的任务是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它要求人们找到实现原本含义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手段和措施。左翼反对派对工业化问题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分析，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端论法”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使人望而生畏。当这种工业化纲领开始执行时，右翼反对派感到十分恐惧。斯大林则通过用各种方式而积聚起来的权力并借助于党组织的力量找到了这种手段，进而为解决问题而果断地走上了极权主义的道路。

后来，工业化虽然实现了，但它并没有减弱社会组织官僚化的发展趋势。共产党人的最大错误在于：相信监督和管理职能随着工业生活方式的扩大会自行简化，没有官员等级制的、平等的民主制将自然形成。大工业的快速建设及其正常运转需要严格的纪律、高度的领导权威和管理的集中化。但在这期间，革命已松动了所有的行动准则和管理机构，从而也为采取暴力准备了条件，采取暴力不仅是为了实现变革而且也是为了解决当前的一些

问题。所以，由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使俄国社会在实现工业化方面更容易接受组织手段，从而产生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派生现象。

苏维埃政府经过了一段不长的踌躇之后在工厂重建了独裁者的权威。随着集体化的到来，它又将独裁者的权威扩大到农业战线上。面对反对派无能为力的反抗，集体领导制很快也被废除了，并以一长制取代了它（党内的、行政管理和工业中的官员等级制就体现了这一点）。接着，在苏联工业中再次普遍地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内部组织形式和社会差别（除了国家所有制和通过计划取代追求利润这两点外）。官僚主义甚至更完善了，因为它不再会受到竞争和独立工会的限制了。

尽管俄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业国，但它在使它的社会制度适应现代化工业的必然趋势，即高度集中和纪律性方面已把所有其他国家抛在后面。它能做到这一点，应再次归功于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实用主义。苏维埃机构要比西方旧工业社会中的类似机构更不受工业增长需要和效益要求的限制。整个社会已变成一个唯一的具有纪律性和等级制的大工厂。统治阶级（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已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的“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官职大小都获得了物质报酬并享有权威。因此，“管理者革命”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①民间的官僚政治形式和军内的命令制形式在工业极权制的条件下已融合成一体。

历史状况（落后性以及需要有效地克服它）的压力清楚地说明，那种俄国革命者最初所献身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能达到的幻想。以现今形式出现的苏联制度当然也不是解决工业化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俄国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力量（出现在独特的联合

^①参阅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一九四一年纽约版。

体之中)、偶然性和某些人物的产物,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的变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形势,而不是产生于思想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人们具体地而不是教条地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平等和民主监督能尽可能地得以实现),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到俄国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目的。整个革命事实及其反复出现的政治伴随现象必然要推迟向原本含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只要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没有被克服,它就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为克服它所作的努力却又与理想的迅速实现不相容。工业主义本身又为民主和平等的发展设下了严重的障碍,苏维埃俄国的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迎合了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并使自己成了它的化身,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获胜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反对派却失败了。斯大林把列宁的关于党的概念与这种倾向结合起来了,同时把党宣称为革命后的、合乎自然的、持续不变的统治形式。在这方面,他通过大胆地给予意识形态以新的解释来保持现状与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连续性。为了使这种做法站住脚,他觉得有必要消灭那些认为现制度可能会造成危险的人及其思想。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是:他把所有能对革命后的俄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力量紧紧地集合在一起。斯大林和他的党的权力以及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倾向相互支持并互相加强了。按照他的主观设想,他把俄国铸造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形式的国家。

四、马克思—托洛茨基—斯大林

人们回过头来看,就可以明了:俄国革命不是马克思所期望的革命;它窃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继承性。正像情况所表明的

那样，社会主义的先锋战士在他们始终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同时，实际上已一步步地改变了他们的视野方向（前面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叙述）。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每个时期都出现了党领导与左翼反对派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反对派的历史作用是，它以自己的抗议行动显示了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已偏离马克思主义。

事情的荒谬性就在于：一场为追求一定目标而著称的运动却在不当的地方取得了政权，并不得不改变其目标，使之适应于面临的实际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共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建立在现有工业基础之上并力图在全民中对经济价值和政治权力进行平均分配的理想制度，而是一种旨在实现工业化和克服落后状态并把重点放在发展官僚制权威和经济等级制方面的制度。各派别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原有的和新的目标的这种对立：反对派追随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斯大林分子则要求走一条新的道路，按他们的意志创造历史。

就思想内容而言，派别斗争有其相互对立的思潮背景（这里，西方的后工业乌托邦主义的观点也有所反映，因为在俄国存在着一种向落后状态发起猛攻的独裁主义观点）。反对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的反对派分子）显然都是“曾在西方呆过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民主的建立在先进工业发展基础之上的制度。斯大林分子都是在俄国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他们认为俄国革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就是唯一客观的现实，而现实是在他们一边的。

以欧洲为依据的革命者和以俄国为依据的革命者早在革命前的俄国思想史上就已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时“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已经对这样一个问题发生

过争论：俄国的民主发展应当或者将要采取一种欧洲的还是本国的路线。在十九世纪末，类似的争论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分手了；这两个集团都主张社会主义，一派要通过追赶工业化的西方的榜样来实现它，另一派则反对这样做。最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分裂了：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想模仿欧洲的民主，并耐心等待社会主义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欧洲化中出现。而布尔什维克则想利用工人，主要想依靠俄国型的密谋组织，加速并保证革命的发展。亲西方派和反西方派之间出现的这些分裂反映了一个受到先进文化影响（这里指工业化了的西欧榜样的影响）的国家的特征。在这种影响下，展现出两条道路：一是服从于一种优越的文化，并从中崛起；或者是以本国的文化来抗拒优越的文化。当第二种方针在斯大林领导下获胜时，左翼反对派中的欧洲化了的人成了真正的魔鬼，这是不奇怪的。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者左派和列宁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在许多方面都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早期出现的裂痕的重现。左翼反对派比较类似于孟什维克，至少它比列宁—斯大林派更多地倾向于西方，更了解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业先决条件，更倾向于民主。这些类似的地方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左翼反对派的领导核心人物在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时是属于孟什维克派；而早期的裂痕直到共产党派别斗争结束为止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机关就有很好的理由一再提出控告：左翼反对派是列宁派中的孟什维克偏离者。莫洛托夫说的完全正确：“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还是我们自己队伍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种残余。”^①反对派分子也不厌其烦地宣称：这些控告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观点无疑具有列宁主义正统性，而且

^①莫洛托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真理报》。

与党的官方观点的列宁主义正统性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们不可能真正驳倒说他们是孟什维主义的指责，因为就广义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

反对派的孟什维主义的特征贯穿在它的整个历史之中。粗略地讲，孟什维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于一九〇三年首次分裂时，这种对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的反抗就是孟什维克（其中有托洛茨基和许多其他的未来的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特征。在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共产主义左派一直感到疑虑的也正是列宁主义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控制。当列宁主义者只考虑实用而不顾及其他情况时，左派不愿放弃基本原则；尽管有较好的意愿，但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地接受列宁的纪律。一九二四年，鲁祖塔克（他当时是一个可靠的斯大林分子）粗暴地（但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说道：“我想说，如果有人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建树一种信仰象征的话，那么这简直可以说是退到了孟什维主义。这正符合绝大部分反对派分子的心愿。”^①左翼反对派的悲剧就在于：它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这一非列宁主义的特征——这似乎是它最好的自卫武器。

即使说反对派分子都是孟什维克，那么他们也是较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控告者自己更应被指责为偏离者。反对派分子为了他们自己而注重理论，但并不是把理论只当作一种有政治影响的东西。他们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以及社会和经济关系制约政治活动的观点。当对列宁和斯大林来说党只要保持必要的纪律和掌握必要的暴力手段就可以实现一切时，反对派通常则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俄国的历史形势只

^①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能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遥远的目标。这正是孟什维主义的论据。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的孟什维克曾指出：斯大林的政权尽管是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行事，但它做的却只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与此相适应，这个政权的特征正在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官方给反对派贴上“孟什维主义”的标签是完全有道理的。

然而，人们也不可以忽视孟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左翼之间的区别。托洛茨基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反对派纲领的主要思想是有计划地发展能够创建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业；托洛茨基也不认为由于俄国革命的孤立性而造成的困难是容易克服的。另外，托洛茨基也没有过分地为民主问题而苦恼，只要他还能继续掌权。左翼——首先是温和的左派——也知道应把不顾一切地注重目的的思想与基本原则一致起来。但左派犯了承认列宁主义这种致命的错误，这也正是左翼注定灭亡的原因。它承认列宁主义的党的准则和反驳关于孟什维克偏离者的指责，都没有给它带来任何好处。而党的领导集团对反对派的攻击，正好是反对派在各个阶段的功绩所在。

五、 斯大林的俄国

反对派的时代是共产主义正在演进的时代。当列宁及其追随者着手争取政治和经济成果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俄国的困难形势。列宁主义精神就是要善处逆境，使之对己有利，他们宣称要克服这种状况。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石：一是它造就了一批准备用暴力和权威克服一切障碍的人；二是它教导他们，为了立即取得成果，为了运动的安全，要在实践中先抛开理想。因此，列宁主义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好了准备，以改变运动的基本性质，进行一场完全不同于

起初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俄国共产主义在列宁逝世后，已成为一场用暴力和控制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以极权主义政策）去消除落后状态的运动；俄国共产主义就是军事工业主义，它的论据是一种与事业本身毫无关系的教条。

从列宁主义者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两点：这个制度的政治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促使这个国家走上极权主义的是哪些问题。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以及解决现代化的这一迫切任务，迫使人们走向了官僚工业主义。在此情况下，一党专政和镇压派别活动以及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不断地获得了基础。发展到最后，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无所不知的独裁者的声音。为了给独裁者的每一个行动作辩解，人们任意给理论和历史作新的解释，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理论变成了教条，精神生活完全制度化。

在历史上，一些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发挥其作用）明显地是按列宁的形象缔造而成的。在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发生变化时，斯大林（狡猾、爱报复和搞个人崇拜）掌握了它的命运。无可争议的是，如果托洛茨基取得了胜利，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尽管党的专政仍会保留，但一人统治不至于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思想控制不至于发展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而且也不会出现如此病态的恐怖。另外，托洛茨基似乎也不会依靠党的机关去取胜，而是在反对它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他的胜利也许不至于导向后来的这种专政。

党机关的崛起及其代表与反对派分子之间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主义兴起的特定前提。斯大林主义不单纯是党组织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与其理想——政治行动和革命良心——之间斗争的产物。共产党党内反对派所代表的革命良心没有得到实现。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已屈服于权力的压力并遭到

了权力的诱惑；它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然后又镇压了它。很显然，这在机关人员中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有人就觉得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行动违背了培养他的基本原则。单纯的合理化运动本身是不能使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感到不安的。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是，这种运动必然要重新唤起人们继承思想遗产，并谴责所有违背它的人和思想。

苏联的试验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和伟大理想蜕化变质的历史。这种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物质缺陷，一个是精神缺陷。总之，历史条件是不合适的。无论对旧俄国来说，还是对工业化的俄国来说，社会主义的许多目标仅是梦幻。从精神方面看，革命已从内部被腐蚀，被那些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所蛀毁。采用不良手段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而俄国共产主义的恶运就在于：手段代替了目的，并成为自身的目的。

这就是俄国共产主义的本质，这也是通过对反对派历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看法。在演进过程中，俄国共产主义已远离了它起初确定的目标，违背了本来的意愿。拥护这些目标的人犯了错误（这些错误跟当时的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被从肉体上消灭了。现在，所有的标记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一个新的幽灵已在地球上徘徊，它只不过还戴着具有百年历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敌人都同样感到迷茫。

附 件

苏联共产党历史年表^①

一八九八年

三月一日——三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〇二年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

一九〇三年

七月三十日—八月二十三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〇四年

八月

布尔什维克“二十二大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①除了注明公历外，直至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为止使用的都是俄历。

一九〇五年

- 一月九日 “流血星期日”。
-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
- 九月七日——九日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里加举行代表会议。
- 十月 总罢工。
- 十月十三日 第一个彼得堡苏维埃成立(十二月三日被解散)。
- 十月十七日 “十月宣言”发表。
- 十二月十二日——十七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
- 十二月六日——十七日 莫斯科举行总罢工和起义。

一九〇六年

- 三月 第一届杜马选举(四月二十七日成立立宪会议,七月八日被解散)。
- 四月二十三日——五月八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
- 十一月三日——七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第二次(全俄)代表会议。

一九〇七年

- 一月 第二届杜马选举(二月二十日成立立宪会议,六月三日被解散)。
- 五月十三日——六月一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

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科特卡（芬兰）
举行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

十一月五日——十二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赫尔辛基举行第
四次（全俄）代表会议。

一九〇九年

一月三日——九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黎举行第五次
（全俄）代表会议。

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公历）

“无产者报”编辑部在巴黎举行扩大
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开始分裂，取
消派和召回派被开除。

一九一〇年

一月十五日——二月五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黎举行中央全
会。此会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
间的合作作了最后的尝试。

一九一二年

一月十八日——三十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第六
次（全俄）代表会议。

一九一四年

八月一日（公历）

德国向俄国宣战，社会主义政党之间
开始分裂。

一九一五年

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四日（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流亡者小组代表会
议在伯尔尼举行。

九月十八日——二十一日（公历） 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德（瑞士）举行。

一九一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以公爵李沃夫为首脑的临时政府组成（三月二日）。

三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会议。

四月三日 列宁到达彼得格勒。《四月提纲》发表。

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

七月三日——五日 “七月事变”。

七月八日 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首脑。

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等人被接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九月十二日——十四日 列宁要求举行武装起义。

十月十日 十月革命。临时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推翻。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列宁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十一月四日 赞成新闻自由和联合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辞职。

十二月二日 与德国停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开始。

一九一八年

一月五日——六日 立宪会议召开和解散。

一月七日	列宁要求缔结和约。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争论开始。
二月一日（即公历二月十四日）	采用西洋新历（即公历。一译注）。
三月六日——八日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
三月十日——十四日	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三月十三日	托洛茨基成为军事人民委员。
五月二十五日	捷克斯洛伐克人暴乱。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
六月二十八日	普遍国有化法令颁发，战时共产主义开始。
七月六日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起义。
八月	自卫叛乱分子在伏尔加河流域发起的进攻已进入高潮。

一九一九年

三月二日——七日	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
三月十八日——二十三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建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四月	高尔察克在乌拉尔发起的进攻进入高潮。
十月	邓尼金在俄国南部发起的进攻进入高潮。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进攻。
十二月二日——四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〇年

一月	自卫军在西伯利亚被击溃。
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五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五月——九月	波苏战争。

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六日	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十一月	战胜了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内战结束。
十一月——一九二一年三月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一九二一年

三月二日——十七日	喀琅施塔得的起义。
三月八日——十六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新经济政策开始贯彻执行。“关于统一”决议批判了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
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夏季—秋季	“清党”。
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二年

二月	向共产国际提交“二十二人声明”。
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四月三日	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总书记。
五月二十六日	列宁第一次发病（十月又重新工作）。
八月四日——七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
九月——一九二三年四月	关于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争论。
十一月四日——十二月五日	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十二月十六日	列宁第二次发病。
十二月二十五日	列宁的“遗嘱”（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又加了一个附言）。
十二月三十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一九二三年

- 一月——三月
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关于党的形式问题的争论。
- 三月六日
列宁与斯大林决裂。
- 三月九日
列宁第三次发病。
- 四月十七日——二十五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夏季
出现“剪刀差”和罢工浪潮。
- 八月（左右）
有关改组书记处问题的基斯洛沃得斯克会谈。
- 十月八日
托洛茨基致信党中央。攻击党领导。
- 十月十五日
“四十六人声明”发表。
- 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遭受失败。
- 十一月七日
开始讨论“工人民主”问题。
- 十二月五日
政治局作出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
- 十二月八日
托洛茨基写《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
- 十二月十四日
反对反对派的运动开始。

一九二四年

- 一月十六日——十八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始批评反对派。
- 一月二十一日
列宁逝世。李可夫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 二月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 四月
斯大林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演说。
- 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 六月十七日——七月八日
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 十月 托洛茨基发表《十月革命教训》。反托洛茨基运动开始（直至十二月）。
- 十二月 斯大林提出“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九二五年

- 一月十五日 托洛茨基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职务。
- 四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新经济政策的高潮到来。
-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受失败。

一九二六年

- 三月十二日 季诺维也夫分子被免除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职务。
- 四月六日——九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作为联合反对派出现。
- 五月十二日 英国总罢工失败。
- 七月十四日——二十三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拉舍维奇事件发生和《十三人声明》发表。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
- 十月十六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布哈林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
- 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三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开始讨论“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九二七年

二月七日——十二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强调经济计划的必要性。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五月

与英国断交。出现战争恐慌（直至夏天）。

五月二十五日

提出“八十四人宣言”。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讨论列宁的“遗嘱”。

十一月七日

反对派举行最后一次游行示威。

十一月十五日

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十二月二日——十九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批反对派分子被开除出党。

一九二八年

一月

左翼反对派领袖被驱逐出莫斯科（托洛茨基于一月十六日从莫斯科流放到阿拉木图）。

一月

粮食危机开始。

四月六日——十一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粮食问题。

五月十八日——六月五日

沙赫特审讯。

六月

季诺维也夫分子重新被接受入党。

七月四日——十二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与右派发生公开争论。

七月十一日

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举行秘密会谈。

七月十七日——九月一日	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九月——十月	莫斯科党组织中的右翼反对派遭受失败。
九月十九日	古比雪夫要求加速工业化。
九月三十日	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真理报》上发表。
十月一日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五年计划是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才确定的）。
十月十日——十九日	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会全体会议。乌格拉诺夫和右派分子投降。
十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批评右倾和颁发工业化纲领。
十二月十日——二十四日	全俄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右翼反对派在工会领导中遭受失败。

一九二九年

二月九日——十日	政治局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二月十一日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离开苏联去土耳其。
四月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研究所代表会议。机械论哲学受到批判。
四月十六日——二十三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右倾受批判。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从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六月二日	什维尔尼克继托姆斯基之后成为工会主席。
七月	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

- | | |
|------------|-------------------------------|
| 七月三日 | 加等人投降。
莫洛托夫继布哈林之后成为共产国际主席。 |
| 八月二十一日 | 开始向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发起公开的进攻。 |
| 十一月十日——十七日 | 联共（布）中央全会。右翼反对派投降。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 |
| 十二月二十七日 | 斯大林要求加速集体化和消灭富农。 |

一九三〇年

- | | |
|---------------|--|
| 六月二十六日——七月十三日 |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托姆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 |
| 十二月 | 司尔佐夫—罗米纳泽事件。 |
| 十二月十七日——二十一日 | 联共（布）中央全会。李可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接替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十二月二十日上任）。 |

一九三二年

- | | |
|-------------|--------------------------|
| 一月三十日——二月四日 |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 |
| 十月 | 柳亭事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二次被开除出党。 |

一九三三年

- | | |
|-----------|------------------------------------|
| 一月一日 | 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四年零三个月，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结束）。 |
| 一月七日——十二日 | 联共（布）中央全会。阿·普·斯米尔诺夫等人事件和清党开始（一直持 |

续到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审讯和肃清异己分子为止）。

一九三四年

一月二十六日——二月十日
十二月一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基洛夫被谋杀。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第一次审讯。

一九三六年

八月十九日——二十四日

第一次莫斯科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八月二十三日

托姆斯基自杀。

一九三七年

一月二十三日——三十日

第二次莫斯科审讯：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被判刑。

六月

土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领导人被秘密审讯和处决。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

长时间地

进行大逮捕和处决。秘密清洗斯大林主义的党领导人。

一九三八年

三月二日——十三日

第三次莫斯科审讯：布哈林、李可夫

等人被判刑和处决。

一九三九年

三月二日——十三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一九四〇年

八月二十日

托洛茨基在考约阿康（墨西哥）被暗害。

一九四一年

二月十五日——二十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

五月六日

斯大林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六月二十二日

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

一九五二年

十月五日——十四日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¹

一九五三年

三月五日

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

六月二十七日

贝利亚被捕，并被解除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受审并被处决）。

一九五五年

二月八日

布尔加宁继马林科夫之后成为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

二月十四日——二十五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替在斯大林清洗运动中受害的人“恢复名誉”。

一九五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被解除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

一九五八年

三月二十七日

赫鲁晓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